


# ACID



Issue 1 反文化 重置技術的一切 (不) 可能性

2024.10

Rodrigo Ochigame

陳界仁 鄭淑麗 Lee Felsenstein Marc Weber

Siegfried Zielinski

Manuel Castells

Michael Burawoy

Franco Bifo

Bernadi Ana Teixeira Pinto

Ley Marovich



# ACID 第一期

“反文化”？重置技术的一切（不）可能性

ACID 1

Ana Teixeira Pinto 陈界仁

Franco “Bifo” Berardi Lee Felsenstein

Lev Manovich Manuel Castells Mark Weber

Michael Burawoy Rodrigo Ochigame

Siegfried Zielinski 郑淑丽

Edited by

黄孙权

网络社会研究所 (INS)

# 目录

编辑室	ix
崔雨	
专题文章：“反文化”？重置技术的一切（不）可能性	xi
专题文章 引言	1
黄孙权	
1 从无条件的“我”到无条件的“我们”再到有条件的“你”？艺术中的联合行动变体与友情经济的呼吁 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Siegfried Zielinski）	5
2 病毒变成战术性抵抗 郑淑丽	29
《UKI》中国大陆首映会 映后座谈纪录 郑淑丽&黄孙权	33
3 无力持续升级者的非科幻想像 陈界仁	45
4 反文化、赛博文化和符号资本 弗朗科·“比弗”·贝拉尔迪（Franco “Bifo” Berardi）	51
5 超人类面孔的资本主义 安娜·特谢拉·平托（Ana Teixeira Pinto）	57
6 一封给年轻艺术家的信，如何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生存？ 列夫·马诺维奇（Lev Manovich）	73
7 从链接到人工智能——在超媒体梦想中的多媒体及其根源 马克·韦伯（Mark Weber）	83
8 社交媒体：从反文化走向未来 李·费尔森斯坦（Lee Felsenstein）	111
9 计算（学）的反历史 罗德里戈·落龟（Rodrigo Ochigame）	129
翻译	145

1 一个理论的蓝图：信息主义、网络和网络社会 曼纽尔·卡斯特 (Manuel Castells)	147
2 走向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安东尼奥·葛兰西和卡尔· 波兰尼的互补汇聚 迈克尔·布洛维 (Michael Burawoy)	191



“反文化”？重置技术的一切（不）可能性

ACID 1

主编：黄孙权

刊名：ACID

编辑委员（Editorial Board）：PH试纸编辑委员会

本期主编（Chief Editor）：黄孙权

责任编辑（Copy Editor）：崔雨

美术编辑（Art Editor）：崔雨

发行（Publisher）：网络社会研究所（INS）

本期作者 Author：Ana Teixeira Pinto、陈界仁、Franco “Bifo” Berardi、Lee Felsenstein、Lev Manovich、Manuel Castells、Mark Weber、Michael Burawoy、Rodrigo Ochigame、Siegfried Zielinski、郑淑丽

发行日期 DATE：ACID 第一期 | 2024, Oct.

ISSN：2960-0944

售价 Price：1COOP/ 300TWD/ 10USD/ 70RMB

投稿 We welcome submissions：inetworksociety@gmail.com

本刊为不定期出刊，开放接受一般性论文、书评/展评投稿，来稿无稿酬，需经PH试纸编辑委员会审核。请以符合APA 7th格式稿件投稿。本刊收入，包含COOP以及各平台销售的法定货币，由当期编辑成员与作者均分。

\*COOP指的是INS发行的社会货币，白皮书见：<https://github.com/CAAINS/COOP>。获取方式请参阅INS电子报（<http://news.caa-ins.org>）与网站（<http://www.caa-ins.org>）。

This is an occasional issue, open to general essay and book/exhibition review submissions, which are unpaid and subject to review by the PH Test Papers Editorial Board. Please submit your manuscript in APA 7th format. Revenue from the journal, including COOP and legal tender from sales on all platforms, will be divided equally between the editorial members of the current issue and the authors.

\*COOP refers to the social currency issued by INS. The white paper can be found here (<https://github.com/CAAINS/COOP>) . See the INS newsletter (<http://news.caa-ins.org>) and website <http://www.caa-ins.org> for access.

# 编辑室

崔雨

历经十余月怀胎，ACID1总算呱呱坠地了。本期ACID延续了试刊号传统，呈现了过去一年“网络社会年会”的理论果实（或新芽），并特供两篇千禧世代经典文献的中译版，分别是Manuel Castells的《一个理论的蓝图：信息主义、网络和网络社会》和Michael Burawoy的《走向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安东尼奥·葛兰西和卡尔·波兰尼的互补汇聚》。

Castells和Burawoy所写的两篇文章分别具有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前者呼吁的是有别于传统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的“网络社会”的概念，后者回顾了“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当时代难题下，反思和修正此前被简化和忽略了的“社会”概念，发展出一条迈向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来。虽然切入点和论述方式大相径庭，但双方都在二十年前感知到了“未来”的多面性——为了应对正在到来的21世纪，认识与行动的方式都应该更新才行。

在网络社会，Castells看见的是以自由为导向的文化性社会运动是如何与计算机和数位通讯革命相伴，撼动了社会的价值观。他强调一种有别于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的“网络社会”概念——人们会共享“沟通”的协议文化，而非恐惧和驯服他者。而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视角，Burawoy呼吁一种新型的马克思主义。他放下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

“先破后立”的单纯，转而寻找全球斗争的“同时进行”和“相互联系”，暂放下斗争的急功近利，谦逊地追求人道。“反文化——重置技术的一切（不）可能性”是第八届网络社会年会主题——我们在引经据典地反思过去，怀疑的对象却变成了计算机和数位通讯革命的后代，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社会”运动的后果。

像Marc Weber、Lee Felsenstein和Rodrigo Ochigame这样关心“过去”的人，通过对超媒体的发展脉络的梳理、对六十年代反文化运动、学生运动和社交媒体和社群实验的回顾，以及对西方世界以外鲜为人知的计算（学）发展历史的重新挖掘，展现出信息技术历史的多面性来。积极构思“未来”的人将认知领域的工作视为突破现状的关键。学者Zielinski在自己的演讲中寄予“解码”之厚望。艺术家郑淑丽这样相对乐观的世界居民，她的新片《UKI》展现出一种无偏见的未来主义，在全球疫情之后，想像一个与病毒共生的未来新人类群体。Lev Manovich更是以艺术家和评论者的视角，讲述面对诸如人工智能技术这样的发展时，自己的创作和批评方式是如何被更新。

忙于解构“当下”的人则是忧虑的。例如艺术家陈界仁谦逊而具体地指出了现阶段技术发展逻辑下蓬勃扩张的公司帝国将多少不可见的“无力升级者”卷入并忘记。在评论者Bifo这里，情况更加危急——重点是迄今为止人们的认知活动如何被符号资本主义加速和剥削，以至于遭遇大规模精神病的人类集体不得不面对各种糟糕的局面。亦有如Anna Teixeira Pinto般警惕的理论研究者，专注于捕捉当下西方世界暧昧的“法西斯主义”幽灵，并且清晰地指出它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

以上，本期ACID所质问的是闷头冲向未来的那种乐观主义，和抛弃了技术政治性的那种本质主义。在拥抱“新地形”“新文化”的十余年间，人们让技术抛弃“社会”了吗？读毕，或许你无法仅仅欣赏技术纯洁、无辜、优美的一面。

# 专题文章：“反文化”？重置 技术的一切（不）可能性

第八届网络社会年会 选集



# 专题文章 引言

黄孙权

AI与ChatGPT的兴起，自然语言的历史（语料库）与使用自然语言的能力（/prompt提示）成为人与AI最亲密的互为主体世界。AI是人类普遍智能（马克思意义上）的表现，也是个人与普遍文化的对话训练。文化不外于技术发展史，（普遍）文化有自身的历史地域的抗争。这是“反文化”的意义，不是另类的，而是对立存在曾有一切的可能性。

自从文字的载体印刷术，声学储存的留声机的发明，光学成为双眼外映射的现实，历史就不再能成为单一的大叙事。历史分流于声学（留声机）、光学（电影）与文学（打字机），就媒介角度而言，现代主义之后以自然语言为基础的文字印刷不再成为历史延续，人类总体记忆的储藏库，因为已经没有连续、可通译的阐释学了，而是不可通译、只能换位[transpose]的密码学，这是跨媒体的高光时刻，换位、借位、装配、相互转译成为市场上的宠儿，（好的）当代艺术只不过以独特美学来展示技术演进交付给人类的文明任务而已（自带政治觉醒成为反此文明任务的形式）。

电学开始了，信息理论出现，数位技术终结了媒介的历史。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成为数字—文学、数字—电影、数字—绘画、数字—艺术...就这点意义而言，计算机是“终结了一切媒介的媒介”，也终结

了“历史”。如同Friedrich Kittler说的：“数字技术带来了某种弥赛亚式的终点”。数位革命之后再没有革命了。

然而，文化是人文学科的志业，不取决于个人意向，而是取决于基于自然语言所可能的所有媒体。每一种技术发展都镶嵌于特定的文化中，“反文化”不仅反对技术发展论的单一思考，也是扩充、改变、宣传技术环境的媒介。人文学科曾经快要拜倒在能阅读字母和数字的现代机器（计算机）的光线照射下，由是，我们需要建立“反文化”的新阵地，不仅仅是反抗的，嬉皮式的，或逃逸路线，而是对立的基地。这基地应该包含更广泛的政治经济批判、性/别批判、媒介批判、阶级批判、技术哲学思考、全球南方观点等等。换句话说，要挑战单一技术线性发展史观，使得人文学科再度成为维系人类思想高度但不惧于思辨技术发展之一切可能的堡垒。今年会议，我们邀请了中国台湾、法国、巴西、葡萄牙、美国、俄罗斯等国家及地区的学者、艺术家、工程师一同，开启新的“反抗基地”！

COUNTER-CULTURE  
RESETTING ALL  
IMPOSSIBILITY  
OF TECHNOLOGY

1108-09 2023

第八届网络社会年会

Counter-culture? 重置技术的一切(不)可能性

The Eighth Annual Conference of Network Society

地点：上海市张江科学园区

Zhangjiang High-tech Park in Shanghai

中国美术学院  
China Academy of Art

ZKJI  
张江集团

SIMA  
上海网络社会研究中心

张江科学馆

Institute of  
Network  
Society  
网络社会研究所

LEONARDO  
DA VINCI  
网络奇想家



# 1 从无条件的“我”到无条件的“我们”再到有条件的“你”？艺术中的联合行动变体与友情经济的呼吁

From Unconditional “I” to Unconditioned “We” to Conditional “You”? Variants of Joint Action in the Arts and a Plea for an Economy of Friendship

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 (Siegfried Zielinski)

翻译：郑叶颖、张铎瀚

校译：任柄霖、黄孙权

在全球贸易极速增长的绚烂景观下，根本性冲突与危机正在爆发，这需要我们对先进通讯技术进行批判性审视：通讯技术改善人类生存境遇的承诺是否具有现实依据？是什么统治着这巨大的、带来剥削与控制的数字帝国？人们应该如何艺术地介入黑箱重重的人工智能（artificial extelligence）世界？对我而言，黑箱是我们看待新人工智能时非常重要的问题。稍后我将讨论为何我称之为外部智能（extelligence）而非内部智能（intelligence）。

为何现有通讯技术面临的急迫问题不是修复而是不断更新？是否创新已成为一种“邪教”，迫使我们不断创造新事物，亦或是我们目前还未

到考虑修复现存之物的时候？顺便一提，这对于现在的建筑师而言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对上海正在开发中的新城市地景十分好奇，建筑修复而非造新将成为未来几十年的重要范式。这一创新“邪教”同时引诱我们在没有真正理解之前，即便冒着风险也要创造新的事物。对于人们目前如何感知、对待人工智能，我有一个简短但富有哲理的解读：我们在制造它，我们在使用它，但我们对它一无所知（we are doing it, we are making it, without really understanding what it is.）。我们需要弥合这一诡异的裂缝。

## 三个近期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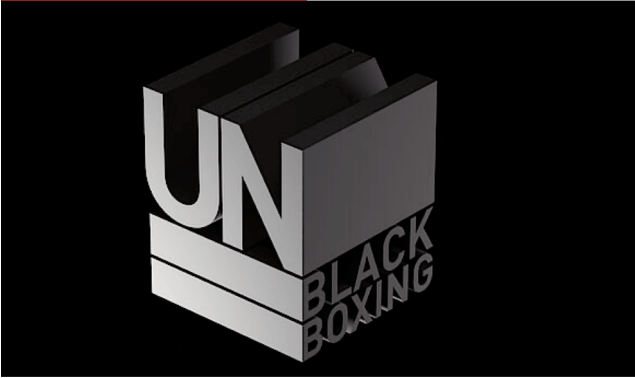
最近几个月（该讲稿发表于2023年11月8日），我参与了几个相关项目。在这些项目中，我向参与者们提出了以上问题，并共同探讨。在这里我想与大家简单分享其中的三个案例：

### 项目一：非黑箱（UNblackboxing）

一个仍在进行中的项目——非黑箱（图1），由柏林爱因斯坦数字未来中心（Einstein Center Digital Future, ECDF）主办。我的前助理丹尼尔·伊尔冈（Daniel Irrgang）策划了项目艺术展览“非黑箱：对数字领域剥削和控制的调查”（UNblackboxing: Artistic Investigations Into Digital Realms of Exploitation and Control）。这个项目由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共同参与，并一同面对这一艰难的任务：打开人工智能的黑箱，消除人工智能训练规则与语法的不透明性。

**EINSTEIN  
CENTER**  
Digital Future

**UNblackboxing.**  
Artistic investigations into  
digital realms of exploitation  
and control  
Berlin Oct. 23 - March 24



curated by  
**Daniel Irrgang**

图1: UNblackboxing

## 项目二：非理性计算 (Irrational Computing)

第二个项目叫做非理性计算（图2）。对于艺术家而言，非理性计算能够帮助他们打开硬件与软件的内部黑箱，尤其是硬件内部。比如量子物理学（quantum-physical）作为机器计算的基础，它不是线性的，也无法用电子状态描述，因此它超越了理性计算。艺术家拉尔夫·贝克尔（Ralf Baecker）从2011年开始创作这一项目。他以非黑箱姿态使用动力装置创造迷人机器。他将机器黑箱彻底打开，揭示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与仅停留在电子层面的形式把戏完全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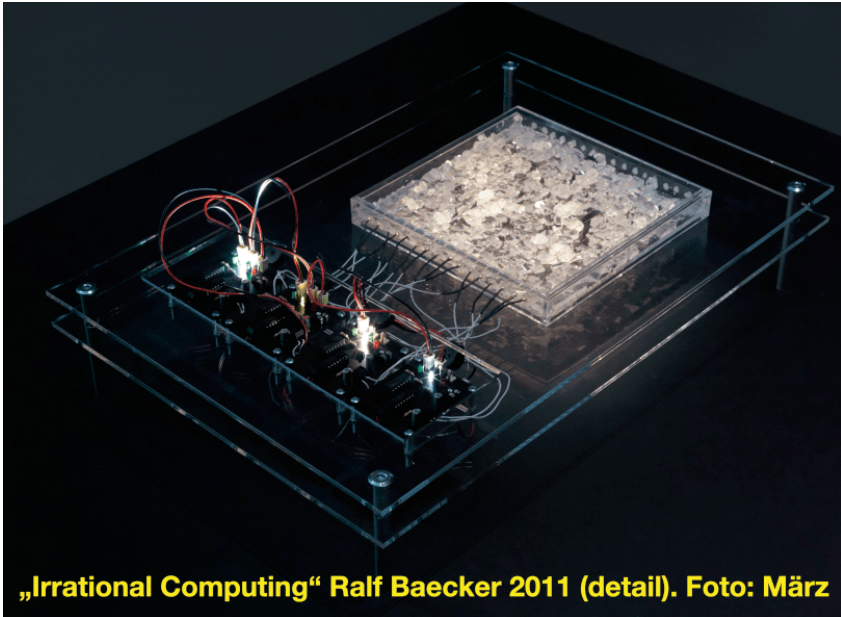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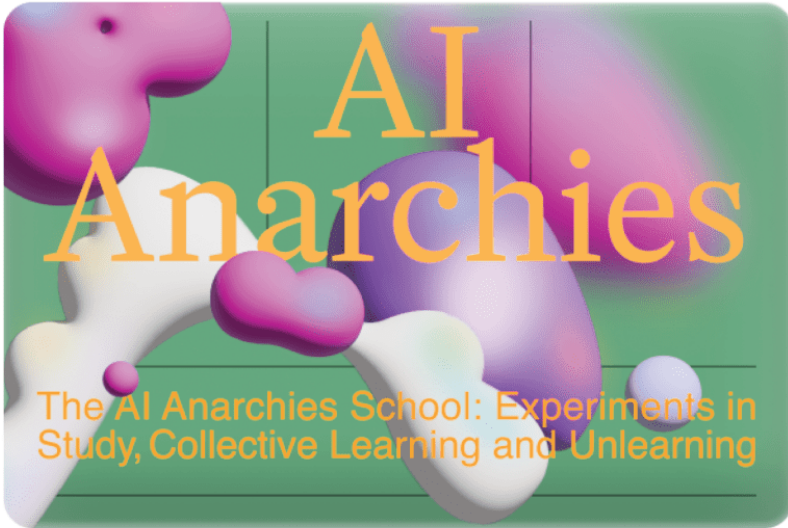
图2: Irrational Computing

另外，本届年会引言中引用了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的说法。他的论点之一：计算机终结了一切媒介，数字图灵机吞噬一切曾经和之后的可能存在。我并不认同这种决定论导向的媒体理论（deterministic media theory）与终结叙事。事实上，宇宙要复杂得多，没有终结，也没有起始；如果一切有始有终，我会放弃工作、卖掉汽车，变得非常富有，住在岛屿……这十分无聊。物理学家需要简化叙事获得资金，花费数十亿美元不断讨论、研究宇宙大爆炸以及一切确定之物，但这并不是我们真正感兴趣的事。

### 项目三：人工智能无政府主义（AI Anarchies）

接下来我们谈些更有趣的项目。上个月我与柏林艺术学院（Academy of Arts, Berlin）合作共建了一所学校，并为其提供概念——人工智能无政府主义（图3）。这个项目有关于探索人工智能（Artificial Extelligencies）中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最终呈现包含展览

和书籍资料。我将从三点假设开始，请大家尤其是年轻人们集中注意力于接下来的部分，它十分重要。



**Berlin Academy of Arts**  
**13 – 20 October 2022**

图3：AI Anarchies

第一点，在机器习得人类特性之前，人类就已经机械化了。这是第一个假设基础。人类-机器 (Man- a machine) ! 18世纪中叶，医生及生理学家Julien Offray de la Mettrie欣喜若狂地喊道。他那疯狂的论断直指勒内·笛卡尔 (René Descartes) 及其追随者，后者将人视作唯一拥有灵魂与意识的生物。早在控制论理论出现之前，la Mettrie就已经将非物质最后的避难所物质化，从而终结了物质基础的智能循环，进入一种结果循环 (circular conclusiveness)。这个词语令人玩味，也适合描述我们的目前处境——“我被造，故我在” (I am an Artefact, therefore I am)。这听起来像一首摇滚歌曲，也确实是。这是欧洲启蒙运动纲领的基本维度，即人的工具理性获得强调。在艺术领域，这早已不是将不可能变成可能——我们在这方面非常成功。是时候以其自身不可能性对抗已成为可能的一切。我们需要从封闭的

用户舒适圈 (expedient/dem Verzweckten) 中走向开放, 这值得尝试。

第二点, 音乐家、演员, 也是性别流动者珍妮西斯·布雷耶·P-奥里奇 (Genesis Breyer P-Orridge) 认为, 艺术家最崇高的任务是自我去编程化 (de-program), 这是解构传统社会关系, 如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前提条件。我在这里引用GP-O在一部邪典电影《解码》

(Decoder, 1984) 中所说的话: “每个人出生时就已被编程, 这是一种症候, 而艺术面向终极问题, 是终极思想, 即如何破解这一编程。”这部奥威尔式 (Orwellian) 电影成为垮掉的一代 (Beat Generation) 晚期和早期工业运动音乐所狂热的对象, 携带威廉·S·巴勒斯 (William S. Burroughs) 的精神, GP-O在影片中强调: “信息就像银行, 有些人富有, 有些人贫穷。我们都可以变得富有。我们的工作、你的工作, 是抢劫信息银行。杀死守卫, 摧毁权力。”

第三点, 与第二点相关, 引用自费尔南多·佩索阿 (Fernando Pessoa) 1922年的小说《无政府主义银行家》(The Anarchist Banker): “真正的邪恶, 事实上, 唯一的邪恶, 是凌驾于自然现实之上的社会习俗和想象——从家庭到金钱、宗教和国家。”这篇写于1922年的精妙文本, 背后的思想依旧颇具挑衅, 尤其对艺术家而言。否认社会想象作为统治机制可能将其推向荒谬的极端。以这篇关于金钱的小说为例, 这意味着成为一名银行家比抢劫银行更为正当。

在以上案例中有几点非常重要: 干预性的思想与行动, 向普通公众揭开先进技术的黑箱, 展示媒介关系的物质基础。这些项目与活动都摆出基于媒介的反文化姿态。今天我将谈论第四种可能, 一种新的未来主体性, 可以与我们所生活在其中的技术物相互连接。

## 新的未来主体性 (subjectivity)

这一观点是冒险的, 它还未被书写出版, 因此也是完全开放的。由于演讲时间限制, 我将会简化我的观点,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的主题是“从无条件的‘我’到无条件的‘我们’再到有条件的‘你’? 艺术中的联合行动变体与友情经济的呼吁”。这是我的核心观点, 将在最后再次

讨论。首先，我将简短地介绍我的思考框架。这一讨论源自2022年卡塞尔文献展（Kassel Documenta）。

当我们在艺术语境中谈论新集体身份时，本质上存在两个相互交织的问题：我们如何在现在以及将来的艺术进程中识别行动主体？以及，艺术为何让我们如此感兴趣，以至于热情投入其中——是艺术家的出身、性别认同、政治纲领或意识形态的不同，或者确切地说，是艺术家特有的审美伦理价值判断？作为媒体及艺术领域的考古学家（archaeologist）及变体学家（variantologist），我将以谱系性同时碎片化的方式盘旋于这些问题之上，希望能够激发大家的思考。

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很早就追溯了主体身份这一爆炸性难题。1968年5月，他在巴黎提交了他的论文《差异与重复》（*Différance et Répétition*）。彼时集体行动是左翼日常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他在论文序言中强调：“无论如何构想，身份首先定义了表征（representation）的世界。然而，现代思想产生于表征的失败与身份的丧失，以及在身份表征之下运作的所有力量的发现。现代世界是一座海市蜃楼（拟像）（mirages [simulacra]）。”德勒兹在1969年使用“拟像”一词，这个词后来对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及其媒介理论非常重要<sup>[1]</sup>。在这里补充一点，后现代世界是任何表征概念的主要失败所在。表征在此只是幻象，现实中只能通过暴力强制执行——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政治问题之一。而新世纪将第一次以综合身份（synthetic identities）为特征开启。

你们中大多数人或许已经拥有这种综合身份。我们有来自北京、上海，乃至世界各地的学生。有的出生在中国，有的在南非或在保加利亚，而后到美国留学、去英国伦敦深造。柏林也成为热门留学城市，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前往柏林学习德语。这就是综合身份，他们不再有祖国，也没有母语。这些人会说三四种语言，但不知道哪一种是属于自己的语言。在政治上他们也不再拥有祖国（father land），因为没有可以称之为领土的地方——这非常重要。祖国和母语正变得像领土根源或种族起源一样成为幻想出来的人造语词结构。这是我们的讨论背景。令人深思，这次分享的一些想法，基于几年前高世名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组织的一次座谈会“世纪：一个提案”发展而来。

“我思故我在” (Cogito ergo sum) ——勒内·笛卡尔 (René Descartes) 。这是欧洲现代性的自我 (ego) 与众我 (the multitude I) (我包容万象, 我即众人……), 从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出现的第一个前卫派 (Avantgarde) 。鲍勃·迪伦 (Bob Dylan) 的新唱片《我包容万象》 (I Contain Multitudes) , 献给沃尔特·惠特曼 (Walt Whitman) 。他从惠特曼的诗歌《我自己的歌》 (Song of Myself, 51) 中摘取了一些诗句——“我辽阔博大, 我容万象” (I am large, I contain multitudes) 。这一观念从18世纪末出现再到20世纪初走向兴盛, 为当时的艺术家们所共享。例如, 艺术家埃贡·席勒 (Egon Schiele) , 他庆祝多元身份、流动性别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而在安东尼·阿尔托 (Antonin Artaud) 、瓦莱斯卡·格特 (Valeska Gert) 等人之后, 这一众我的观念也随之消失了。

自20世纪末以来, 创造另类世界的历史模式似乎正在迅速消失。而到了21世纪初, 它的一部分可怕残余在政客的行动权力中不受限制地涌现; 另一些则成为意识形态碎片, 在全球身份市场上昂贵兜售——艺术市场也是全球身份市场的一部分。毫无疑问, 艺术圈的大多数“我”不再是“众我”, 而只是一种多媒体世代精神, 或可以称其为基于服务技术的进步文化产业中偶然交叉的产物。

西方身份概念所面临最严峻的挑战是关于投射主体性 (projected subjectivity) 的问题, 我们也可以在当代中国文化中找到这种主体性, 激活无需条件的“我们”, 这是我熟悉的“深时” (Deep Time) 世界观。

比如, 用孔子思想解释笛卡尔的短语“我思”的意思是, 为某物或某人成为可弃置的自我。一旦一个人持有某种立场, 自我就会凝结; 提出一种想法, 即投射光亮, 同时意味着将他人推入阴影。如果你进行“我”的表达, 你将无法避免对他人产生排斥。孔子就是这样解释他的主张, 即将不负责任视作对世界的基本态度。这一思想与意大利瓦蒂莫 (Vattimo) 乃至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 (Martin Buber) 提出的对话哲学 (dialogue philosophy) 十分相似: 我是你对我说你的那人 (I am the one to whom you say you) 。再一次, 一首摇滚歌曲标



会控制论在以自然为导向的传统知识文化主体，和基于先进技术和消费及其机构、人工制品和网络的新存在模式（吉尔伯特·西蒙东语）之间作为枢纽。这就是我所说的无需条件的“我们”（unconditioned WE）。

## 艺术中联合行动的五种变体

基于刚才的框架介绍，我将分享艺术中联合行动的五种变体。除了这五种外，大家可以在我最近出版的一本丹麦语小书《Varianter Af Fælles Handling I Kunsten》中查找其他艺术集体身份变体。我将在演讲中揭示一种微型现象学，以对当代艺术生产的政治经济学进行最低限度的概述。

在正式进入五种艺术集体变体之前，我们需要注意，关于“我们”的集体性问题以及无需条件的“自我”和“其他”，对于绘画、雕塑、摄影或诗歌而言，表演、社会行动主义、音乐、电影或新媒体艺术截然不同。艺术有不同的形式，因此也有不同的主体性，以及内在的主体概念。这一点非常重要。在昨天的论坛（2023年11月7日“Panel 21：向达·芬奇提案——21世纪的文艺复兴人”论坛）上，我们往往用和谐、一致的观点对达芬奇及文艺复兴艺术家进行解释，但统一性并不存在。表演、音乐等新媒体艺术与集体思想和实践更为亲近，而古典美术仍然是个人主义的产物。

### 1. 集体/合作社/工作坊（collectives/cooperatives/workshops）

第一种形式叫做集体或合作社、工作坊。在拉丁语中，集体（collectivum）代表形成某一阶级，人们因为在某些方面彼此相似而聚集在一起，共享同一个身份，并忽略其他差异以实现团结。

作为艺术家协会的集体，拥有漫长的时间谱系。这一现象不仅在欧洲出现，也在世界范围发生。比如，18世纪初，在拿撒勒（Nazarenes）破陋的保护伞下，极端保守派画家聚集在一起捍卫艺术的神圣性，使其免受启蒙运动的日渐褻瀆。类似的，19世纪的英

国，拉斐尔前派（Pre-Raphaelites）致力于提升日常美学经验，抵制媚俗。需要强调的是，并非每一个集体都是进步的，他们也可能受保守思想驱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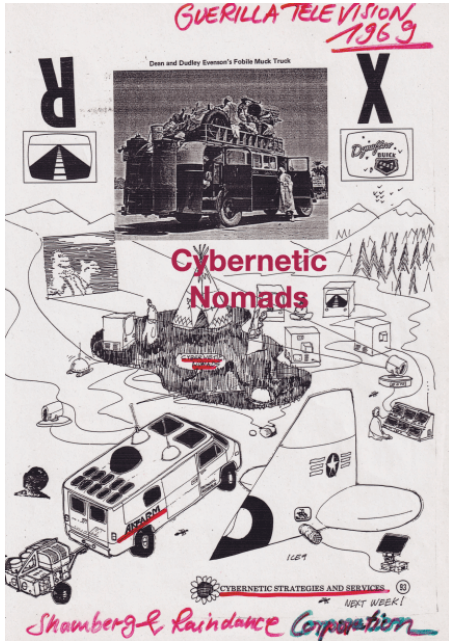
而当代艺术集体从两种相互紧密交织的母题中产生。美国纽约的雨舞互助（Raindance Cooperation）、纸老虎TV（Paper Tiger TV），柏林媒体合作社（the Media Cooperative）——跨媒体

（transmediale）在此诞生，英国的Sankofa和黑人影音集体（the Black Audio Film Collective），法国巴黎的自由电台（Radio Liberté）以及米兰的爱丽丝电台（Radio Alice）……这些集体共享紧密相连的内在社会程序，形成具有一致性的身份认同：他们公然对抗资本主义，投身于创建没有性别与种族歧视、业余者胜利的公正社会乌托邦。另一些集体则具有明显的艺术偏向，比如蚂蚁农场（Ant Farm）、芝加哥的批判艺术团（the Critical Art Ensemble）以及德国的Ponton TV，他们根植于激浪派（Fluxus）、偶发艺术

（Happening）和行为艺术（action movements）的传统，对新媒介产生背后的结构配置及其迷人（且具有魅惑性）的领导者们进行针对批判和审美对抗。

蚂蚁农场是1969年组成的控制论游牧者团体（cybernetic nomads）

（图5）。当你想要成为一个革命者，你就不能占有任何东西（即反抗私有制），或仅拥有能够维持日常生活的基本物品。这是一种嬉皮乌托邦：你有一辆皮卡，以及适配皮卡的DIY工具——制作影像、通讯及日常生活；所有一块工作的人们都能够塞进这辆车。这是他们对生活具体落地的梦想实践。



„Ant Farm Corporation“  
Everything you need for  
living and for artistic  
intervention has to fit in  
a van. Infrastructure for  
work and life is one.

图5：ant farm

在当前的集体实践中，个人天才的魅力已经消退，并让位于另一种崇拜；支撑欧洲现代主义的艺术概念逐渐分解为各种实用的组成部分。一般的男性艺术家被行动者、工人、创意者、表演者、组织者等身份所取代……在集体中，这些身份与能力的不同碎片重新组合。只有颇具异国情调的名字，比如“Wakaliwood”或“IkkibawiKrrr”，才允许个体出现。名字听来越陌生，就越容易用艺术手段在公民运动和抗争中争夺注意力。

在人工智能领域，关键性问题往往需要依赖分工协作攻克。战术技术学院（Tactical Tech）、计算诗学学院（The School of Computational Poetics）、不必要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Unnecessary Research），由新西兰艺术家朱利安·奥利弗（Julian Oliver）等人成立的关键工程小组（the Critical Engineering group），以及更多正在利用艺术方法探索、发明世界的集体，彼此动态合作。在当前暴力性的历史语境下，自然、技术与人类主体交织形成复杂挑战，这一集体分工协作趋势将更为凸显。

在早期女性主义运动中，我们可以看见这两个母题链相互共生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女性开始反抗父权制，打破既定性别规则禁忌，谴责艺术市场及文化机构中的男性合法统治。同时，从20世纪60年代后半叶开始，这些运动都和新技术在艺术生产与传播中的使用相链接。一个显著的区别是，女性偏好独立自主地工作，因为在群体中，她们担心雄性生物占据主导地位——通常是这样。

在过去二十年里，集体在主导策划双年展或其他重要艺术文化事件中，形成了新的力量。这催生了2022年卡塞尔文献展（Kassel Documenta），由雅加达艺术集体ruangrupa策展。在这里，集体面临的考验是：集体或合作行动模式是否能够借助更为开放的艺术机构，真正打开艺术发展空间，以及如何通过美学手段实现这一点。在关于起源、种族、政治意识形态和性别取向的激烈辩论下，对古典的作者性的否定，以及对艺术作品及创作过程所有权的主张，再次对当前集体形成发挥重要作用。

## 2. 乐队、合奏团（The Band, the Ensemble）

在这一变体中，我并不是在谈论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千高原》中提到的乐队（band）——作为志同道合的社会边缘人的地下联系（尽管我的乐队主题也包含了这些方面）。相反，它是关于20世纪大众文化史上的一次成型，它一方面从室内乐（chamber music）的低谷时期发展而来，另一方面又从爵士乐和舞曲发展而来，并与摇滚乐形成了强烈的认同关系。在此，我将摇滚乐作为一个总称，指音乐层面的反叛和激进的艺术表达的最多样化变体，包括朋克、工业音乐、重金属等现象，以及从反主流文化到商业流行音乐的其他变体。

音乐界拥有最丰富的艺术创作互动经验，这也同样适用于音乐材料的生产和分销。柏林的厂牌“自由音乐制作”（FMP，全称Free Music Production）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该公司由萨克斯演奏家彼得·布罗兹曼（Peter Brötzmann）周围的一群爵士音乐家创建。

在长达42年的时间里（1968-2010年），该厂牌不仅举办音乐演出和音乐节，还制作了大量唱片（以查尔斯·明格斯[Charles Mingus] 1952年的首张专辑为例）。FMP代表着一种由音乐人为音乐人及音乐爱好者组织的自我决定的基础设施，以及一种超越资本主义音乐产业的生活空间。

在我们的主题背景下，我最感兴趣的是两个方面：

- 乐队（就像音乐团体[musical ensembles]）是一种社会建构。要想获得美学上的满足和艺术上的要求，制作音乐的前提是认真倾听，探索他人、他人的声音、他人的乐器是如何发出声音的，以及我们如何在共同的力量中发展我们的音乐能力。我从一位中国物理学家和古声学家的关于调谐（tuning）的讨论中了解到这一思想的千年深层时空维度——只有当一个人开始与他人共同创作音乐时，与他人之间的音乐调谐才变得有必要。这方面的潜在政治内容在德语中通过几个术语表达出来，这些术语在议会民主的语义领域非常有效。从词源学上讲，（相互）交谈的活动决定了议会制度（意大利语词汇parlare即说话，交谈）和政治情绪，甚至更明显的是，投票被当作民主社会中最重要行为之一。
- 从音乐家朋友那里和我自己作为主唱的微薄经历中，我知道乐队在其形成阶段、在其成长过程中是最令人兴奋的。在这时，相互倾听、对彼此好奇、对彼此特质和能力的尊重是最强烈、最真诚的。在我目前与音乐家兼声音研究者FM Einheit就Einstürzende Neubauten项目的起源等问题进行的工作传记谈话中，这一点显得非常清晰。1980或1981年的前几个月，主要是在柏林“天才业余玩家（Geniale Dilletanten）”场景中各种即兴创作。1981年，朋克乐队Abwärts的FM Einheit加入了他们，Einstürzende Neubauten的基本三人组合也随之形成，他是乐队的节奏核心，鼓手Unruh与乐队相得益彰，而满头黑发的诗人Blixa Bargeld则尖叫着、呜咽着、憔悴着。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与其说是一种音乐理念，不如说是一种强烈的情感，即

他们对世界的共同本质，以及如何让世界的废墟发出声音和舞动起来。

从FM Unity的角度来看，这是项目中最振奋人心、最激动人心的阶段。1981年，乐队的第一张长时演奏的唱片《Collapse》的封面上，就以照片的形式将这一阶段以一种极具讽刺意味的方式表现了出来。在对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等超级组合的巨大工业化努力的反讽中，乐队将简单的机械和电气工具铺在面前的地板上。起初，他们就使用工业社会抛弃掉的任何能发出声音的材料。

在全球巡演、官方文化机构的高度认可以及越来越专业的录音过程中，起初的开放与随意渐渐凝固成了一支邪典乐队（cult band），随后又成为了反叛文化和“工业音乐”的代表人物。仅用了四五年的时间，这支乐队就成为了地下文化工业集群中的一个标志。

### 3. 协作（collaborations）

下一个模式是协作，比如Knowbotic Research小组。20世纪90年代初，我用协作这个词来描述新兴网络文化中新出现的、松散的艺术合作形式时，承受着德国法西斯主义沉重的历史负担。这些人不仅共享当时昂贵的计算机硬件，并且更重要的是：共同开发软件。与合作社或集体相区别，我为这些协作形式总结了几个特征：专门为某些项目组建，因此寿命有限；共同的工作基础是资历、出身、世界与艺术观的异质性；科学和艺术跨学科工作；基于共同开发代码合作，反对商业软件，支持开源访问；具有颠覆性、反资本主义潜力，能够在短期内而非永久释放反抗能量。

Knowbotic Research是20世纪90年代此类理论与实践的典型示例

（图6）。该团体将跨界思想及行动作为核心，对表演、概念/动作艺术、音乐、计算机科学、设计和科学充满好奇。他们自世界各地，包括南极洲研究人员、量子物理学家、机械工程师、高性能程序员、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等，并在多样化项目中协作。例如，他们创作了“Dialogue with the Knowbotic South（1994）”、“Anonymous

Muttering (1996)”，并以此干预鹿特丹的公共空间。以及《Lavoro Immateriale》，占领了1999年威尼斯双年展奥地利馆。这一作品由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和哲学家迈克尔·哈特 (Michael Hardt) 和毛里齐奥·拉扎拉托 (Maurizio Lazzarato) 等人合作创作。我受科隆媒体艺术学院 (Academy of Media Arts Cologne) 委托与ZKM Karlsruhe共同制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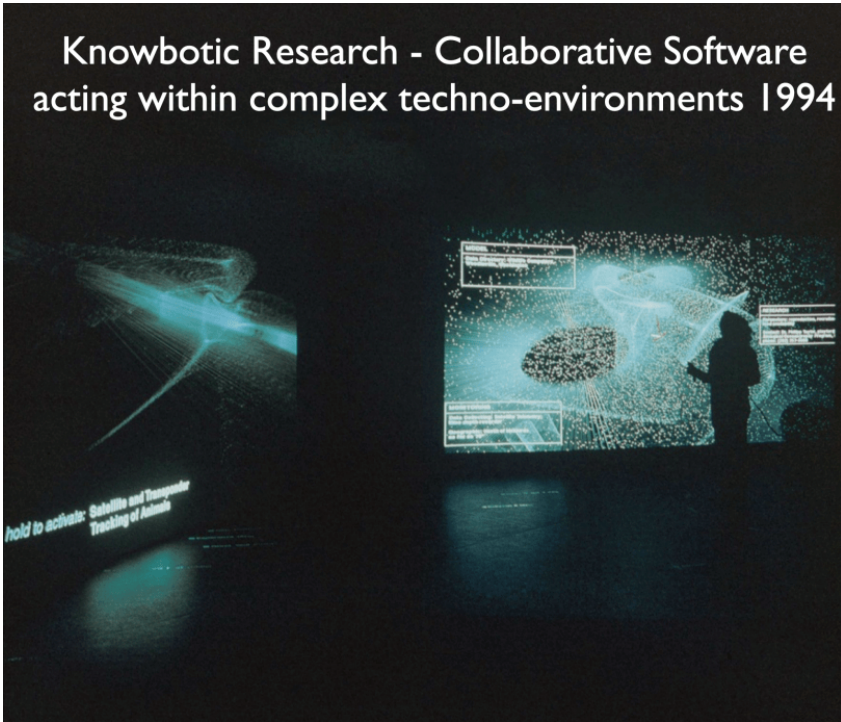


图6: Knowbotic Research小组

这类协作创作、共同解决、合力发明（与技术合作）模式，在21世纪初整个世界范围内变得非常普遍。香港与深圳或南美部分地区拥有一样兴盛的创客文化。正如我们在关于艺术和设计学院未来的国际会议“潜在空间” (Potential Spaces, 2017) 中所强调的，合作实践的模式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也非常普遍。最成功的项目之一就是 Foondi研讨会，定期在肯尼亚和乌干达举行，并催生了许多有趣且

野心十足的低技术发明。

#### 4. 兄弟姐妹&伴侣 (siblings &couples)

在通往友谊经济的道路上，互相羁绊的艺术生产中最迷人的变体是，兄弟姐妹和伴侣组合。在科学与工程领域，这将追溯到九世纪的巴格达智慧之家 (Baghdad House of Wisdom)，这是现代大学及实验室的原型。在这里，不仅科学家与艺术家跨学科共同工作，一神论者们 (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 也能够互相协作。比如在智慧之家，巴努穆萨 (Banu Musa) 三兄弟建造了在我的媒体考古研究中追溯到最早的可录制音乐自动机。他们的跨学科工作组成，已经呈现出现代团队的核心特征。尽管兄弟姐妹和伴侣组合在当代艺术中十分普遍，却鲜有分析与反思。也许这种合作形式涉及科学不敢触犯的几个禁忌：爱、奉献、激情、情感。这种共同工作且没有剥削的乌托邦，和与其相反的经历一样重要：争吵、分离、仇恨，对认同和所有权的激烈竞争，版权法律纠纷。有很多涉及这两极经验的例子，我将基于一手经验分享其中三个。

瓦莉·艾丝波特 (Valie Export) 和彼得·韦贝尔 (Peter Weibel) 是1960及1970年代初期维也纳行动主义 (Viennese Actionism) 中最为多产的艺术夫妇之一。此前几年里，韦贝尔在实验诗歌、批评、表演、观念及行为艺术创作了极具个人特色的作品。他与合作伙伴艾丝波特 (他声称这个艺术名称是他的发明) 致力于发展扩延电影 (Expanded Cinema)，并留下独特的印记：挑衅、壮观、散漫的分析，以及布莱希特 (Brechtian) 意义上的激进干预。

20世纪90年代初期，生物发展及其预测未来的可能成为人们激烈讨论的主题。这一问题不仅大量出现在生物科学家及实验室的议程中，也为计算机科学家、设计师和艺术家所讨论。在1920年代之前，合作还未成为备受追捧的创作模式，克里斯塔·佐梅雷尔 (Christa Sommerer) 和劳伦特·米尼奥诺 (Laurent Mignonneau) 双人组便基于她们的资历、才能和热情，持续使用横向思维，并以极富创造力的最小单位组合行动，与现有学科活动方式背道而驰。他们的经典创

作之一，1992年的《互动植物生长》（Interactive Plant Growing），一个庆祝阿波罗界面（Apollonian interface）的生物技术与材料装置。与屏幕前真实的植物进行交流，既不代表正在工作，也不意味着费力解决冲突。相反，它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生活乐趣，包括自然和人造物之间的冒险与偶遇。在这一合作创作中，艺术家让艺术与科学相互作用，创造信息逻辑和生物系统相互作用下产生的人造物，探索未来共生结构，这是他们的热情与兴趣所在。30多年来，他们一直相得益彰。

我一直对兄弟姐妹之间的共生关系特别着迷，尤其是同卵双胞胎。费城的奎伊兄弟（Quay Brothers）在伦敦的几十年间，将其共在完全奉献给了艺术，包括电影、戏剧、诗歌、音乐和视觉艺术。他们彼此契合，在过去的50年间创作了一系列作品。用作家罗伯特·瓦尔泽（Robert Walser）的话来说，他们的创作是一座迷人的“睡眠博物馆”（museum of sleep）。他们刻意且成功绕过市场需求，其诗意绵密是任何其他视觉艺术无法比拟：斯蒂芬（Stephen）和蒂莫西·奎伊（Timothy Quay）不仅共享一切——工作室、工具和技术媒体。作为艺术生产和想象的最小集体单位，他们本身就不可分割。

## **5. 最重要的！友谊经济——不可能的反文化（Economy of Friendship – my most important category regarding impossible CounterCultures）**

这是最近由让-雅克·勒贝尔（Jean-Jacques Lebel）等人策划的展览“友谊、创造力集体”（Amitiés, créativité collective）（图7），在法国马赛现代艺术馆（Musée d'Art Contemporain）。我受邀为展览书写一篇关于友谊经济的文章，现在大家听到的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

从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到罗杰·凯洛瓦（Roger Caillois）、皮埃尔·克洛索夫斯基（Pierre Klossowski）和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哲学家达成一致：带有目的性的关系是一剂毒药，它将自内而外侵蚀友谊的

根基。友谊如同宴会、款待或礼物：这一可怖的现象本质上只存在于它们将自己暴露在无需条件的情况下。德里达在他的众多著作中不断强调，给予意味着做不可能的事，例如，疏远一个人无法拥有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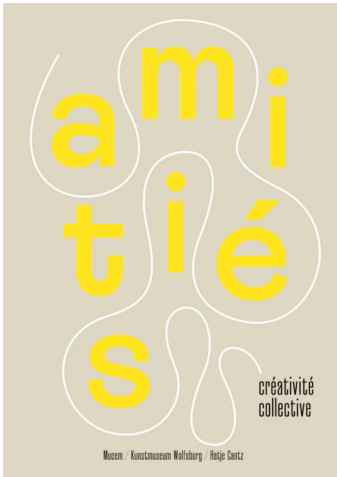


图7：展览Amitiés, créativité collective

与现实的距离以及与不可能的接近性将友谊与艺术紧密联系。不仅如此，如果没有友谊所释放的协同能量，当代艺术史将是不可想象的。这一展览及其书籍讲述了这背后的故事。上世纪20年代的小组KI-NOKI，30年代在剑桥掀起哲学思潮的四位女性哲学家——伊莉莎白·安斯康姆（Elizabeth Anscombe），菲利普·福特（Philippa Foot），玛丽·米奇利（Mary Midgley），艾瑞斯·梅朵（Iris Murdoch），以及90年代俄罗斯彼得堡的第一批网络女权主义者，巴黎的字母主义者和情境主义者，维也纳行

动主义者等团体……他们作为友好的共谋者出现，但在组织协作的过程中，形成等级制度或逐渐屈从于制度化的国家或资本，而逐渐暗淡消亡。

在伦理层面上构成艺术的本质，将艺术亲和力（artistic affinity）完美结合，相互补充并支持。也就是说，我们通过美学手段，费尽心力对与我们相异或无法理解的他者保持敏锐——这对于我来说是艺术实践的核心。

借助个人经验进行阐释在学术上并不恰当，但只有这样才能讨论艺术创作的主观性特质，这一特质对我而言非常有价值。布朗肖将友谊视作成为这个世界的陌生人，毫不妥协地与外于这段关系的他者分享。直到我经验这一感受，才开始理解并且尝试表述。回望青春期，当我们第一次与他人建立深厚友谊，我们对这些微小事件复杂集结的存在尺度无以言表，也无需用语言表达。日日夜夜，我们

在这些事件中存活，不断发生的事件构成了我们体验为深厚友谊的生动缩影。

在友谊关系外的观察者或许会觉得我们的共同活动可疑。但这并不会阻止我们如此，相反，周围任何来自成年人世界的敌对反应都会让我们的行为更为激进。让·杜布菲（Jean Dubuffet）的*Expériences musicales*对我们来说仍然陌生，但我们怀着同样的热情，一起大声且笨拙地亲密演奏乐器，古老的风琴、长笛，还有小提琴和中提琴。我们还收集各种材料，拼贴、绘画为黑色而非彩色结构的奇异图像——这也是一种无需交谈也无需条件的对话形式。我们彻夜长谈，在一起长大的城市街道漫步，或在朋友父亲的书房一同清理旧家具、大写字桌和厚重的地毯。他曾是一所大学的校长，也是一名科学家，但英年早逝。友谊需要这样的邻接（abutments），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称之为异托邦（heterotopias）。

我们间歇、断续地谈论我们相信的，我们认为的存在本质，我们如何看待上帝，我们对一切世俗权威的不信任，我们的艺术与诗学态度——坚决反抗意识形态剥削。我们谈论越南战争，无可救药的纳粹，萨特（Sartre）和存在主义，俄罗斯和中国革命。我们磕磕巴巴地翻阅这些书籍，即便无法完全读懂。我们共读如同见面，这非常重要，即便大部分内容我们并不理解，但只要囫圇吞下它们，或许多年后会理解早已播种在我们内心的东西。若语言无能，我们便拿起吉他，与对方进行好几个小时的即兴对话。在这段友谊中，诗意自由似乎没有边界。而这四五年来幸福而忧郁的时光戛然而止——一天晚上，我去拜访朋友时发现，曾经在夜里等待时为他制作的大幅绘画已经消失不见。因为缺钱，他将要卖掉这幅画作。这让我失望、愤怒至极。售卖画作触犯了友谊的禁忌，是不可原谅的行为。它摘除了友谊的心脏。我们与世界的共同疏离中衍生出无政府主义、无目的的审美姿态，已被可计算性所取代，而后者可以用一定数量的金钱表示。诗性行动共谋已经消失，对他人无条件的尊重让位于有条件的剥夺。

2020年2月，我与音乐家、声音研究者FM Einheit开始进行创意对话（图8），他作为激进音乐及表演项目“Einstürzende Neubauten”的联合创始人而为人们所知。这场疫情迫使我们在信息网络上有效建立

弹性联络。指挥家提奥多·库伦奇思（Teodor Currentzis）为FM Einheit提供了他在圣彼得堡的Music Aeterna平台，这个平台便成为我们在互联网上的想象异托邦。艺术实验中的诗意激进在这里并不会令人不安，相反被视作最高戒律。



图8：与FM Einheit的对话

一开始，我和FM Einheit凭直觉公开邀请来自哲学、媒体理论、自然科学、诗歌、视觉艺术和音乐领域的合作者。我们做的事与自身职业无关，也从未正规学习过。FM Einheit负责演唱，我则为摇滚短歌和朗诵作词——我们作为音乐家和知识分子也贡献了自己的专业技能。当我们向其他参与者提议一同面对不可能之事时，大家表示非常乐意，这让我们感到惊奇。一年之内，我们一同创作了25段名为“调频广播，自由调制广播”（Radio FM, Radio for Free Modulations）的狂野蒙太奇，由人声、乐器和电子设备拼贴而成，包含批评性话语、散文、诗歌、抗议、机器诗以及各种和谐或刺耳的声音。除了与在世表演者合作之外，我们还与已逝者建立隐秘的同谋关系：安东尼·阿

尔托 (Antonin Artaud)、沃尔特·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威廉·S·巴勒斯 (William S. Burroughs)、杰尼西斯·P-奥里奇 (Genesis P-Orridge) 以及海纳·穆勒 (Heiner Müller) 等。

接下来我会放一首我在2020年疫情大爆发时，凭借着对疫情的初始印象写的歌 (图9) ——或许我对疫情后的预期过于现实。2020年4月，我们用一个晚上做好了这支音乐。这是后疫情的歌：疫情过后，我们需要更强大的汽车，能够带着我们更快逃离上海或柏林，穿过所有街道；我们需要更安全的汽车，能够保护我们免受侵害；我们需要带轮子的移动堡垒，能够快速移动的坦克将是理想选择；我们需要更多，更多，更多。



图9：疫情之歌

## 结论

我们需要替代性的概念表达对世界交流互动的关注，避免陷入全球化预设的陷阱。曾居住在巴黎和纽约的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诗人、哲学家爱德华·格里桑（Édouard Glissant, 1928-2011），相比渴望无条件（资本）积累、持有大陆（中心）思维的政治/意识形态战略家，为我们提供可参考的概念用语。格里桑在法语中使用mondialité（Mondiality）一词作为mondialization的差异性代替，后者将全球化描述为绝对统一。德里达（Derrida）和塞雷斯（Serres）也非常认可mondialité一词。mondialité/Mondiality指向全球关系的质量（quality），它无法通过统一的目的合理性确定，而是关系的具体诗学（concrete poetics）。

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得以与格里桑相识。他是一位极其坚强且自主的诗人哲学家。同时，他深切关心他人，并在交谈中展现其真正的诗意力量。真正强大的集体不仅需要有意愿、有才华，同时也需要有责任心。艺术生态圈是实现艰苦而疲惫的跨个体化（trans-individuation）的培养皿，这需要人们在掌握主权的“我”和忠诚的“我们”之间不断保持平衡，这是一个有效的替代方案。乌托邦不仅仅是昨天的新闻。

## 注释

[1]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拟仿物与拟像》（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 2 病毒变成战术性抵抗

VIRUS BECOMING as a tactical  
resistance

郑淑丽

翻译：阮璐欣

2023年，我终于发布了我的新电影《UKI》，这部电影花了我整整14年的时间才完成。在2009年，我开始构思制作《UKI》。那时我在巴塞罗那的Hangar媒体驻地。当时我在实验室里思考，突然间意识到自己要对电脑做点什么：我想要确保电脑能够有所表达。自此，我开始了创作，并为这个创作起了个名字：“病毒、爱、生物骇客”（Viral Love Biohack）。

当时《UKI》只是一个概念构思，我还不确定如何拍摄这部作品。但我还是决定了我的工作方向。在2009年，我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UKI》，这个病毒就像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可以自我复制，在多个形态（化身）中表现出自己，将她的爱传遍被占领的地区。”现在回想起这句话还挺有意思的，当时我完全没想到会有人愿意花钱来拍这样的电影，所以我把它转变成了一个表演装置，甚至是一个游戏。直到今年，我才终于能够发布这部最终的科幻电影，我给它取了一个特别的名字：“科幻病毒替代现实电影”（sci-fi viral alt-reality cinema）。

我本来想给大家讲讲这部电影的故事，但我觉得你们很多人周一（2023年11月6日大陆首映会）晚上应该已经看过了。再强调一下，《UKI》就是这部电影的名字，而UKI就是电影中病毒的名字。在电影里，这个病毒UKI被用作渗透工具，来破坏GENOM公司的生物网络。欢迎来到生物网络时代，这个企业方案旨在主张、改变和重构我们的个人生物数据。我们都是生物网络中所有集成电路的一部分，这些网络拥有我们个人身体数据。对微生物合成的GENOM研究的投资为UKI的科幻想象力提供了支持。UKI以不断变异的方式创作情节和角色，并采取各种策略来夺回GENOM公司窃取的高潮数据。

这部电影其实就是讲述了UKI这个病毒是如何产生的。当然，这部电影也可以看作是我在2000年推出的前一部科幻赛博朋克电影《I.K.U》的续集。在《I.K.U》里，我塑造了一个名叫Reiko的角色，这个角色被GENOM公司部署出去，这是一个巨大的企业。Reiko是一个复制人，被派遣到人类世界与人类互动，收集高潮数据。一旦他们的高潮数据被收集满，公司就会下载这些数据，制作成类似手机芯片的产品，以此来赚钱。这是在2000年，移动电话媒体初兴的时候。我打算给大家展示一个《UKI》片段，讲述Reiko是如何变成病毒的。简单来说就是：

“我们都经历了无情的病毒现实，我们已经自愿限制自己的状态，我们正在处理数字或肉体性行为，我们每天都在经历数据监视，我们已经在强制性隔离期间，跨越边界或感染变种病毒时，将自己置于与病毒独处的境地，我们勇敢地让自己的身体成为疫苗实验的对象，我们有时使用假体的赛博身体，并与微生物、细菌、真菌、古细菌、原生生物、绿藻、浮游生物和变形虫建立联系。我们已经超越了性别二元制，进入了转基因话语。与病毒共存意味着改变我们的身体，与病毒共存，面对、拥抱、爱着病毒，我们将自己的身体传送到新的生态系统中。”

我想引用一篇在疫情期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文章，这篇文章让我得以了解疫情期间印度的情况。阿伦德蒂·罗伊（Arundhati Roy）在文

章中谈到了疫情是一个门户，连接着两个世界。文章于2020年4月发布，她在文章中写道：“疫情是一个门户，一个通往下一个世界的入口。我们可以选择带着我们的偏见和仇恨、贪婪、数据银行和过时的思想、死亡的河流和烟雾弥漫的天空，走过这扇门。或者，我们可以轻装上阵，准备想象另一个世界。并为之而战。”那时，我认为当我们都在某种程度上经历封锁时，我正在创作《UKI》剧本，这确实是一个让人思考我们如何能够离开我们如此熟悉的世界，并能够接受下一个挑战的时刻，这包括下一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如何创造一个新的公平体制。所以我的观点是，我继续在我的艺术作品或电影制作中使用这个概念，干预抵抗，这像是两个关键词。

我还想提到另一个对我影响很大的运动，比如，让我提一下战术媒体的历史运动，特别是定义上，“战术媒体”这个概念是在其鼎盛时期出现的，我认为大约是在1993年到2003年之间，我记得我参加了在阿姆斯特丹举办的Next Five Minutes大会。所以，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战术媒体是什么，战术媒体的出现源于媒体艺术家和媒体行动者将其谦逊目标转化，演变成鼓励每个人为支持自己的政治斗争而制作自己媒体的运动。

这种“新媒体”活动基于这样的认识，即长期以来“街道”（现实）和“媒体”（再现）之间的区别已经模糊不清了。相反，媒体已经渗透到整个社会。有趣的是，前一个演讲者齐林斯基也提到了很多运动，包括Ant Farm、Van Gogh TV，整个一代的媒体活动。我可以说我正是来自那个时代，那里有我的集体经验、我的成长历练，还有我如何成为我自己。所以从那里开始，我开始拍科幻电影，这也解释了我为何选择科幻：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某种现实的逃逸路径。

我还想再提一下基尔特·洛文克（Geert Lovink）关于战术媒体的一句话：“战术媒体是危机、批判和反抗的媒体。战术媒体从不完美，总是在发展中，它是行动性和实用的，参与不断质疑其工作渠道前提的过程。”如果我们回顾一下1993年到2003年间的情况——已经过去了20年。当我想要谈论病毒演变作为战术抵抗的方式时，我指的是什么？所以我的问题是，我们能把病毒看作媒介或战术媒体吗？作为病毒，我们怎样才能复制和扩散自己，并动员自己作为病毒？我们如何

利用战术策略来使病毒细胞增殖，对抗控制装置和系统压制？病毒转化、酷儿传染、病毒之爱和生物黑客。我实际上很愿意向公众开放很多我的问题进行讨论，但我也想分享一个小广告，叫做《红色药丸》。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这个红色药丸实际上是由GENOM公司制作的一种即时药丸，其中包含了收集到的人类高潮数据。而人类的高潮数据实际上是通过握手来收集的，通过网络数据进行握手交换。GENOM公司还建立了一个生物网络（BioNet），这个网络利用人体内的生物工程红细胞——这些红细胞能够自我生成高潮，并且通过人类之间的相互握手在人体内建立网络，基本上每个人都成为一个节点。所以，如果要讨论P2P（点对点）技术，每个人都成为一个节点，高潮数据也可以被收集。最后，GENOM公司希望将这些数据制成红色药丸，红色药丸是由红细胞制成的，内含极其精细的高潮数据。因此，最终这些药物可能会成功地在市场上销售。所以我想通过分享这个红色药丸来分享我的演讲内容，你可以选择是否接受这个药丸，选择留在这个体系，还是逃离这个体系。

# 《UKI》中国大陆首映会 映后座谈纪录

郑淑丽&黄孙权

整理：李程锦

SHU LEA CHEANG  
 郑淑丽  
 作品  
 A Film by  
 Shu Lea Cheang

Institute of Network Society  
 网络社会研究所

**WKI**

科幻病毒另类实境电影

**这不是性，這是愛。**

**2023**  
**11/06**  
**18:40**  
**Mon.(一)**

第八屆網絡社會年會系列活動  
**中國大陸首映場+映後座談**  
 The Chinese mainland Premiere & Post-Screening Discussion  
 黃浦區福州路318號華設大廈101室

預約通道

黄孙权教授（以下简称黄）：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们来进行提问。在此之前，首先我们请淑丽稍微补充一点创作背景以及与前部影片的关系。

郑淑丽（以下简称郑）：是这样子的，原先我在日本东京2000年的时候出了一部片子叫《I.K.U.》。在日本人们达到性高潮会讲“iku”，“I'm going”的意思。《I.K.U.》这部片，故事关于一个大公司 GENOM收集人的性高潮，做成数据，这些数据被植入手机中做成芯片，再被售卖。在《I.K.U.》中，大公司不断收集这些数据。最终，直到储存性高潮数据的硬盘满了，于是大公司就把这个数据下载下来，原则上iku的故事就在此结束了。那部电影还蛮成功的，甚至后来变成了一部“邪典电影”（cult movie）。我的影片和作品好像从来没有在中国大陆上映过，所以我今天真的很惊讶，你们都来看电影了。《I.K.U.》是一部“科幻色情电影”（Sci-fi Porn），至少在DVD上介绍是这样的。这部电影拍完以后，有很多人在看，甚至也有很多盗版在中国大陆流通。从2009年起，我开始一直想拍《I.K.U.》的续集，我把名字颠倒了一下，也就是现在的《UKI》了。对，就是这么简单（笑）！那个时候我就想拍关于UKI病毒的故事。

我自己从2009年进入了一个不同的艺术家圈子，从那时开始做一系列关于病毒的艺术创作，我把这些创作称为病毒的爱（Viral Love），病毒骇客（Viral Hack）等等。那时我在巴塞罗那，想到把这样一个疯狂的想法写进提案里不可能有人会出资给我拍成电影。于是我围绕病毒，尝试做了一些表演、展览，甚至做了一个游戏。直到2016年，我还是坚持想拍成电影，我希望电影可以给不同的观众看，才开始找投资，然后慢慢发展。后来2018年到2019年我去参加威尼斯双年展，所以两年没有办法专注创作电影。直到2020年，我开始专注做这部影片《UKI》。我在巴黎疫情封锁期间开始写剧本，现在看这部电影，虽然UKI概念在我2009年的创作中就有，现在拍成电影后，会看到其中受到新冠病毒啊，还有整个封锁过程的影响很深。说到底还是花了我十四年的时间才把这个电影拍出来。今天真的很难得可以有这样一个地方放映。本来我只是来参加网络社会年会的演讲而已，刚好大家能来到上海，这个机会真的太难得了，有这么多人来捧场！

黄：这的确很难得，我们的学生花了很多力气才落定《UKI》的放映。我们本想找一个影院，在这里也很好，大家很拥挤，非常容易传

播病毒，对吧？而且可以逃过送审，我们不需要打疫苗就可以来这儿（笑）。淑丽是我最钦佩的艺术家，她是非常早在欧洲、美国作为先锋者的华裔女性科技艺术家。她做了非常多不同类型的创作，有个人的，有团体的，我不太愿意用科技艺术这个词，可是我现在也找不到适合的词来形容淑丽的作品。那么我就先不过多介绍了，还是请各位朋友有什么问题或兴趣，直接来问淑丽吧。

**Q：在影片最后一个镜头，我注意到那个女性最后变成了一个白人男性的样子。我想请问这种身体转变算是这场UKI病毒革命的成功吗？**

郑：其实片里面一直都在暗示，由于大公司占据了人体，占据了红血球。改变DNA的结构。刚开始你看的这个女性，她叫安娜。第一场戏中，安娜出现卧室里，她不需要自慰就可以获得高潮。在电影最后，由于病毒的影响，红血球被解放了，它们重获了自由。安娜并没有完全变成了男性，电影一直在暗示，有些病毒会促使人类物种产生变化。疫苗也是从病毒发展而来，现在它已经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在生物学的意义上，随着我们的身体元素的转化，我们已经变成一个新人种了。安娜在最后其实长成为这样一个“新的人种”，我想电影没有交代安娜为什么变成了这样，也没有回答病毒从哪里来，只是抛出了一种“新物种”的可能性。

**Q：您希望观影人通过观看您这部电影能够得到什么启发或启示？**

郑：我很少用“启示”（Enlightenment）这个词，好像意味着忽然间好像有光照在头上，然后你见到了光……就好像我在教育观众，或者让观众有某种“智慧上的开启”，这个我做不到，我没这个能力。没有歧视的意思，我只是留下一些关于技术可能性的讨论：科技会带给你什么？当我们谈到生物科技，它对我们的身体会产生什么影响？当然还有一点，任何时候当生物科技牵扯到大公司，大公司常会迅速转而与制药机构合谋赚取财富。这就引发我们思考，我们正生存在怎样的社会？我的作品中常讨论到数据监控（Data Surveillance），数据成为

公司赚钱的工具，这在今天的社会正是一种现实。我想电影有时只是把一些现实现象点了出来，至于观众能够从中得到什么呢，作为一位电影制作者，我好像没有报以类似“你必须要从中得到什么”的想法。

**Q：**我在您的电影中看到仿生人UKI诞生在一个废弃电子厂，大公司会把那些变异的基因组都丢弃在这里。电子厂中好像有不同的等级秩序，这可能是我个人一个有偏差的解读，但是我想跟你确认一下，电子厂中是不是有这样一种等级秩序？第二点是，我可以看到您在影片中对对政治有很多戏谑的设计。从我的角度来看有明显的一种等级秩序在其中被表达出来。可是这样的等级秩序，到最后好像又转化成了我们平常看到的性别政治。我刚好读到黄孙权老师《绿色推土机》这本书，其中里面讲到一种“政治的偏差动员”。在这样的状况下，当性别政治成为焦点，其他的等级秩序就变得紧而不张。影片中资本施加数据与生命的结合的秩序，到最后明确用性别的一个转换作为一种解放的可能，这个是我比较困惑的地方。

**郑：**我不觉得性别的转换会是一个“结论点”，它恰好在呼应开头。整个电影为什么这样处理呢？我将很多过去与现在的所见所闻都放了进来。比如电影中三位黑客会讲一些“现实的实事”。我记得在2020年自己终于可以静下来写剧本的时候，刚好像“Black Lives Matter”，“Be Water”这些很多政治社会运动都在产生，所以就很自然地把它们写了进来。很多时候这些运动好像是你的生活中的一种干涉

(Intervention)，但又总是能激发你做些什么。我希望在科幻电影中，让这些现实都进来。关于电子垃圾厂，我2015年去非洲考察人们如何处理化学废料。在那里亲眼目睹原来真的有等级阶级和秩序。那里除了老板外，只有平均年龄16岁左右的童工。电子废料是有剧毒的，这些小孩去那里工作，也许工作个三四年就回家等死。在电子垃圾厂调查回来后，我就决定绝对不可能回非洲拍这个电影。所以后来就把电子垃圾厂做成3D来表现。不过里面的角色都有原型参考，我做了很多调研。在非洲有真的有一群艺术家完全用电子废料在做作品。他们灵感来源于他们生活的地方：一个第一世界发达国家用于处

理废料的垃圾场。他们正在努力通过创作，找到回收利用这些废料的方式。

黄：我想耽误一点时间，分享一下这个电影对我的“启示”。我看到了两个特别的点，观点很个人。第一个是，当我们看好莱坞有一个非常浅显的、政治正确的逻辑，比如说现在小美人鱼要有一个皮肤稍微黑的，也许是拉丁美洲裔的人才能担任主演。我们很熟悉的好莱坞逻辑，就算英国皇家剧里皇室的人都变成黑人，完全不符合历史，但没有关系，好莱坞是非常吃这套东西的。可是我在这《UKI》里看到的，不是这种简单男女性别政治正确的逻辑。比如说，女的为什么不能直接变成男的？不是想往父权社会靠拢，而是争执一种男女性别符号没有什么意义了。你有的只是很多不同的选择，你也只是选择了其中一个。

第二点我觉得非常好的，我们看过非常多的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它们对未来的叙事基本上逻辑都很相似：“High tech, Low life”，技术很厉害，生活品质很差。几乎所有科幻小说，你能够想到的都是那种阶层化的系统，统治者在上面，我要把自己组装的非常厉害往上打去，去对抗这种等级秩序。这些作品几乎都是这条单一发展路线，就好像现在科幻小说已经没有任何路了，我们都已经预设这个地球已经结束了。因为已经有了终点，从终点开始想象我们怎么办。我们都是底层人，只能武装自己想办法变得跟他们一样，或者变得比他们更强，才能与等级秩序抗衡。所以詹明信说过，想象资本主义结束比想象世界结束还要难。如果你想象未来这个单一技术发展的结果就是那样，你说的反抗形式只能是反抗等级秩序，阶层化的那种组织。可是在淑丽这里，我觉得她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就是我们不一定要往上打。我们如果被病毒传染了，我们就跟病毒共存，我们如果不能高潮我们就握手，我们不能有性就有爱……你有很多这种选择，不是只有一个。不是只能垂直打败什么东西，而是我们开始变种，开始跟很多人共存，我特别喜欢那个手碰手就可以高潮的设定，也真的是只有疫情开始才让我想起这种动作。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我几乎看到一个非常不同于主流科幻叙事的一种结构，那些作品大多讲的都是终点在那儿，

我们怎么活下来？我们已经触及“现在就是终点，我们怎么活的问题”。《UKI》告诉你：你可以跟病人相处，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你可以hack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点。

**Q：我对您演员决策的安排很有兴趣，就是为什么给这些不同的演员这个角色？不知道您在当时挑选他们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种族和性少数这个问题？**

郑：我对挑选角色很小心，当然会考虑性少数群体的权利。老实说当你在拍一个电影，当你持续创作一个故事的时候，通常没有对实事作出及时反映的自由。在这个电影中我采取了一个方式：有一个人一直读报纸，这些黑客可以跑进来，然后就可以帮我们跳到屏幕外的另外一个时代了。用这个方式，我们或许可以有一些自由讨论这些实事的空间。也许我必须谈到我的一个工作方法，原则上我的电影角色没有太多背景描述。我希望他们就坐在那儿，然后好像这个人就成立了。对于平常的很多电影，你必须得知道这个人到底怎么会坐在那里。比如那位演安娜的演员，她就一开始很忧虑，说：“淑丽，我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坐在那儿。”当她在准备这个角色时，就自己每天写自己的故事，让自己相信她必须坐在那儿。我的意思正是当我让一个演员坐在那儿，他就已经代表了很多角色，这个角色就存在了。所以我通常不会花太多时间交代这个人怎么会坐在那儿，而是说这个人本就坐在那儿，我想这是我拍电影的一贯做法。有很多人讨厌这样做，但我自己也在尝试不同的电影手法，当然观众能不能接受也是一个问题。

**Q：非常感谢能在这里看到您的影片，我觉得很感动，因为我念书的时候就很受您电影的影响。我今天想问两个制作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关于剧本，尤其是有些对话有很多关于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讨论。我觉得它其实是很有时效性的。可能五年十年后，未来的观众不一定会在同一个对话语境中，所以我就想听听您对此的看法，您是否在意时效性？第二个制作层面的问题，是我觉得电**

影里3D的部分非常美。3D还是有一定制作门槛的。我很好奇，您怎么去和技术团队交流协作。

郑：第一个有关这个时效性的问题，这么多年过去了，在今天，很多斗争依然长久、持续存在着。不管是“Be Water”还是“Black Lives Matter”，这些时刻总是在重复上演。我们人类总是在循环往复中，有无数事件总是在重复发生。所以我不会担忧这种时效性，因为我们需要把这些即使已经过去的事情再次推出来。第二个问题，关于3D部分，就像我讲的，那时候去了非洲后回来，我就开始发展自己的作品了。我真的去搬运了一些巴塞罗那的电子垃圾。我联系到一个处理废电子废料的厂商，跟他们讲说我能不能去他们那搬一些到我的工作室来？然后他们说好，你不用来搬，我们每天卡车会去巴塞罗那收集废料，当天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卡车送到你的工作室。我记得很清楚，就是2009年5月1号劳动节那一天，突然间电子废料处理厂打电话来，告知我有四吨的电子垃圾在楼下了。我看到卡车就这样把垃圾推下来，哇，那个场面真的是很很震撼……后来从2016年开始，我考虑要用3D技术来描述电子废弃场，开始给每一个电子垃圾元素建一个背景，我还需要将角色也处理成avatar，电影里大概有20个avatar，大概花了一年半时间制作。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低成本的制作，我的团队很小，有一个动画设计师跟我一起完成。2022年电影进入最后合成阶段，是用一个叫Unity的软件做的，有两位中国动画设计师临时加入了团队来协助我们。我后来把动画当成一种电影的手法来处理，虽然背景布置好了，Unity可以让你实现电影镜头拍摄的效果，所以你看那个镜头的运作跟拍电影一样，一个镜头接续一个镜头。由于预算实在太低，所以我们做的很辛苦，最后就是说在研究使用技术的时候，发现的确可以把这个这个技术做的很贵。但我们因为没钱就做成了这样子。我有时候觉得蛮好笑的，我跟游戏设计师在工作室两个人扮演所有的角色。所有的动作不是他做就是我做，电影里面看起来走路慢慢的、穿着太空服的是我，那个跳来跳去的是年轻的设计师，每天都猜拳一样，问对方今天你做哪一个角色（笑）。

**Q：**我看到的您的大部分的作品，它其实有蛮多的标签，比方说后网

络电影、酷儿电影等，您如何看待这两个的标签？第二个问题是我今天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注意到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就是片子里出现了好几张Edward Hopper的画，这两张画作实在是太有名，导致我的大脑里都是画作原本所要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痛苦的错失感。这份感受就变成了我看您这部片子的主脉络，我好像就没有办法逃离。所以我的问题是当您设计电影的时候，怎么去平衡这种这种感受的关联，因为明明这里有大量的画面是赛博世界是非现实的，但Edward Hopper的油画是我们都非常熟悉，是极富有现实感的，所以我想听听当然您看法。

郑：的确我的影片借鉴了爱德华的两幅画。在疫情期间，很多人也会提起他的画。他画里描写了现代都市生活的疏离感，让我想到封锁期间自己真的会陷入某种绝望，你真的会感觉到这种孤独。我用他的两幅经典之作来做电影场景，这那当然算是一种致敬。有关把我列入各种不同标签，这些名称有些是我自己取的，例如“后网络艺术家”。事实上我的电影每个电影都有一个标签，是我自己取的（笑）。我觉得我的电影不太像大家常提到的“实验电影”，我的电影大多都有叙事，也非常强烈想表达政治或社会的论题，我的前四部电影都是自己给自己起标签，艺术圈里面每个人都想把你归类，那是无可避免的，这当然也是策展所需要做的事。这没关系，我就接受归类了。

**Q：**谢谢您可以让我们看到这部片，我的问题可能跟前面讲到的电影生产有关，这也是我自己会被困扰的一个问题。这部电影我感觉在实拍和3D部分都会看起来是一个高科技技术制作的。就算你们的3D部分没有很多预算，但是会用到Unity这些同一个技术循环里的技术手段，也就是用高科技做一个艺术创作。我很好奇，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形式来做输出和表达？

郑：非常好的问题。我在纽约住了20年，刚开始是去那里学电影。后来拍不成电影嘛，所以就参加很多不同的活动，包括纸老虎电台（Paper Tiger TV）等等。我们的电台从来没有制作经费，大家只是集合在一起做喜欢的事。我自己早期在纽约也参加很多独立工作坊，

没有什么钱，就是做创作，积累了很多经验。刚才孙权谈到说我是“科技艺术家”，老实说我的科技不是高科技。怎么说呢？我的科技也许是借来的、偷来的、或者是说盗（Hack）来的。因为我没有财力拥有一种科技。我早期尝试做网路艺术，是因为那时在东京大学，他们开始有一些网路技术引进来，我就刚在那边的工作室坐着，然后偷偷学，我并没有上过系统的课程。我对技术的态度是，技术是一个玩具，就像你每年换新的手机一样。当我想去拿科技的时候，我并不是想要说我要拥有这个科技，或者说自信自己有金钱能力拥有科技。我的很多媒体艺术的作品，用的技术与素材都是开源的（Open Source）。以前做表演的时候用数据，以及后来用的Unity事实上也是免费的。所以我并不觉得自己在走高科技的路线。如果你看我的作品，虽然我可以跟很多不同的动画设计师合作，但每个作品我都想在美学上有自我坚持和表达的部分。我自己对美术的要求很严格，为了达到这样的美学要求是很辛苦的，你要一改再改。我很幸自己遇到的合作者都能支持我对作品的坚持，他们愿意接受我反复更改。我认为美学要求跟科技是不大一样的，因为我对于科技的态度总是：“这是什么玩意？我也想玩玩！”不过我就只能去借，因为偷还不至于啦。借了以后我再作品创作中重新设计技术，所以我认为使用科技并不是在出卖自己的创作。



导演郑淑丽在首映会现场



首映会现场



首映会现场



主持人黄孙权（左）与导演郑淑丽（右）

## 3 无力持续升级者的非科幻想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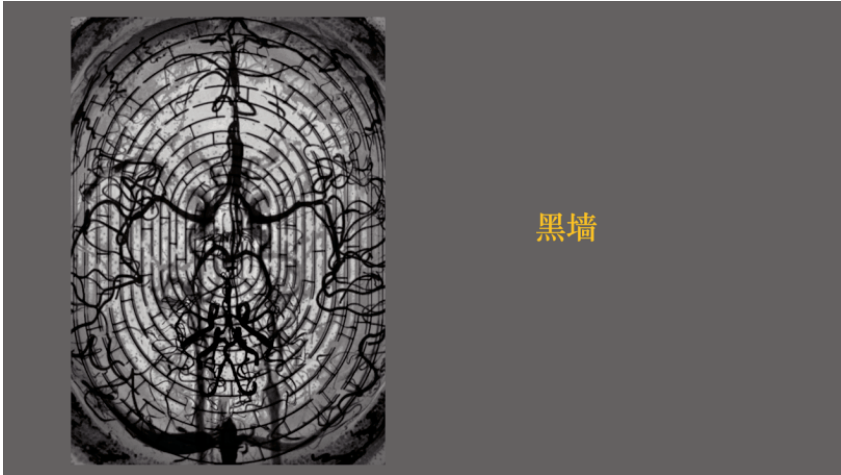
The Non-Science Fiction  
Imagination of Those Who Can't  
Afford to Keep Upgrading

陈界仁

整理：韩佳欣

我的题目叫无力持续升级者的非科幻想像。首先，我们需要先理清楚，传统的无产阶级和有负担的疲惫者的概念。传统、古典的无产阶级可能不是有负担，但是今天有很多人是有负担的疲惫者，这个意思是他不是没有收入，而是他的生活非常忙碌，疲惫，当然就更不可能对自己的感性提出各种生产的可能。这些人怎么办？而且这部分人是占绝大多数的。

我先解释一下这个题目的意思。当黄孙权老师邀请我当这个年会的主讲者之一时，我想他是不是“疯了”，他是不是准备在这个非常专业的年会中，安排30分钟的反文化表演，让一个对网络社会几乎无知的外行者与网络的尾端使用者，可以胡言乱语的时刻？虽然我是一个艺术家，但我根本连什么是反文化都不知道，这个表演该怎么进行？我猜想，或许黄老师真的希望在一个专业的年会中，安排一个无力持续升级者，说说他的胡思乱想，这些胡思乱想或许可笑，但也可以作为在当前由公司王国（Corporatocracy）掌控的网络社会下的某种“焦虑症者”的症候案例之一。于是我答应了。



## 黑墙

图1

本来我想做一件作品回应这个年会——这件作品是邀请上海所有的外送员，在他们身上装有可侦测其每天行进路线的装置，然后将每个人每天经过的路线，以黑色的线实时呈现在巨大的荧幕上，并且不让这些黑色的路线图从荧幕上被抹去，如此不断的叠加，我想不用几天，全上海的马路都被黑色填满。如果这些黑色的线，是以3D打印的方式，列印在实体的地图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黑色的线，像一堵堵不断增高的“黑墙”，无止境的叠高，我猜——不用很久，我们会发现这些“黑墙”不但把城市变成立体迷宫，更标注出无数外送员的命运，同时也标示出我们的处境——我们都是公司王国实验室的实验鼠。

当然这个计划涉及的技术与经费太复杂，同时也太大了，我完全做不到。更简单的方式是跟相关公司连线，让我可以实时下载这些外送员的行动数据，但他们应该不会同意吧。

不知道这个计划算不算新媒体艺术？

之所以提出这个想法，意思是说，在我们今天讨论技术问题的时候，不要忘记，很多人是不可作为持续的技术上的参与者或者至少可以升级的人。他们和我一样。我来参加这个讨论会，很怪异的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不过是开一个玩笑，可能有点不礼貌。回到这个问题，

这个计划算不算新媒体艺术？我的答案是：可能不算。可能因为我看的太少，印象中的新媒体艺术，要不是关于3D或AI制作的太空或虫洞、黑洞影像，要不就是穿越各种时空的超现实景观，还有无数的数字人机合体人，当然大多数画面都有着电脑才有的七彩霓虹般的缤纷色彩，即使是关于歹托邦（Dystopia）的未来世界，“酷”显然是关键词。当然，还有绝对不可少的互动设计。不过我看得实在太少，应该有不少其他形式的新媒体艺术，如同前两位讲者和往届的网络社会年会……

我还是回到我关心的问题，在不断叠高的“黑墙”下的人，大多时候只能仰望星空或无止境的大楼，当然，我们可以站在“黑墙”下遥控无人机，以无人机之眼帮助我们鸟瞰城市，或是拿着手机看着Google Map以卫星之眼鸟瞰世界（只要Google不要像在这次以巴冲突中，把巴勒斯坦地区的交通流量关闭），只是我们的肉身还是在“黑墙”下。

在回答上述显然太过悲观的看法前，先请在座的诸位，看一段我拍摄于1999-2000年初的短片片段（<https://vimeo.com/894642893>），1999-2000年是股市.com泡沫的高峰期，2001年.com泡沫破灭。影片的片长约5分11秒。

为什么放这个影片？1999-2000年，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当时资本与技术结合下形成的席卷全球的科技乐观（投机）主义（至少从一般大众媒体，不是另类群体的观点），但是对此提出警示的平衡观点不够多，或者根本被排除于主流媒体外，而这也是公司王国能持续制造幻觉的核心原因。

此刻随着AI热的兴起，新的科技乐观主义显然已成为讨论人类社会将走向何方的主导叙事，此时，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在“AI不会‘产生幻觉’，但它们的制造者会。”（AI machines aren't 'hallucinating'. But their makers are.）一文中，指出科技公司的CEO们至少制造了四种幻觉：1.AI将解决气候危机；2.AI将带来明智的治理；3.可以相信科技巨头不会破坏世界；4.AI将把我们苦差事中解放出来（这个苦差就比如前面提到的外送员）。

娜奥米·克莱恩接着指出这四种幻觉为何不可信，以及这些幻觉是如何遮蔽人类社会解决当前各种危机的关键路径。关于娜奥米·克莱恩的观点，请参阅原文，就不在此赘述。

在讨论相关问题前，我们先简短重提几个众所周知的当前人类社会的危机：

- 据乐施会（OXFAM）报告，至2023年，掌控公司王国的前81名富豪所占有之财富已超过全球一半人口所拥有的财产总和。
- 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仅至2020年，全球患有心理疾病的人数已近10亿人，亦即每8人中，就有一人患病。
- 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球每年约有80万人自杀，平均每40秒就有一人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 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迁问题小组（IPCC）2023年最新报告，显示地球升温已达摄氏1.1度，若无法在2030年前，将地球温度控制在升温1.5度的临界值内，极端气候将成为常态....。

我的问题是那些科技公司的CEO们所制造那些不难破解的幻觉说词，为何总是一而再的有效？

我想同样放我的一部影片《风摧肉身》（Worn Away）（<https://vimeo.com/894643009>）的片段（2023年初完成），间接回应那些简单的幻觉为何总是奏效。

谢谢大家耐心看完这部影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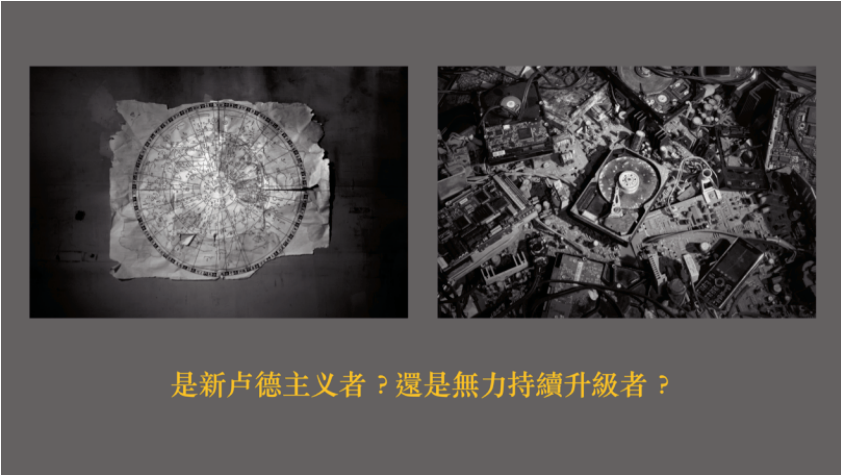


图2

最后我想说的是一一很少有人真的反科技进步，我当然完全不反科技与技术的进步，问题是当前的这些超级技术，已经是由超级跨国公司的极少数股东所共构的“帝国”（empire）所掌控，而且它一点也不虚拟，而是由超级电脑、庞大的伺服器基地与数据中心、卫星链、光纤与无数基地台所构成的超级硬体，而这已不是任何中型国家可以单独完成，更不是传统意义的黑客组织可以颠覆，唯一有可能与“帝国”抗衡的只有中国大陆，但中国大陆在科技与技术的高速发展下，对于什么是合理的人类社会的生活与运作方式，以及人的精神构造问题是否也在同步建构中，也就是黄孙权老师提到的“对齐”问题——我们不要忘了单就中国大陆的官方资料显示中国就有近一亿人患有忧郁症，有至少一亿人的工作状态是被算法严酷控制……。

## 兼爱非攻

图3

中国将第一颗量子卫星命名为“墨子号”，我想在座的各位都知道墨家对科学的贡献，更知道墨家的“兼爱非攻”哲学，也都知道墨家学派为何没落，今天不仅是中国，而是整个人类社会除了关注技术问题，不能忘了“兼爱”的意义——亦即，如何将“人类彼此互爱”的精神，从太空再传回我们居住的行星，这虽不是什么新鲜观点，但却是根本价值，失去根本价值的任何一种技术进步，都只会导致人类社会的危机加速扩大。

我的简短的想法大概就是这样，我的“外行”的表演就到此结束。谢谢。

## 4 反文化、赛博文化和符号资本

Counterculture, Cyberculture,  
Semiocapital

弗朗科·“比弗”·贝拉尔迪 (Franco  
“Bifo” Berardi)

翻译：马雅

校译：黄孙权

早上好，下午好。很抱歉我不能和大家在上海见面。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反文化、赛博文化和符号资本》。我将从早期60年代的学生运动讲起。反文化在美国、欧洲、中国有截然不同的形成过程。在一本名为《数字乌托邦：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的书中，作者弗雷德·特纳 (Fred Turner) 将60年代学生运动的历史视为我们习惯称之为“数字革命”的技术变革的先兆。在这本书中，你可以读到一个名叫马里奥·萨威尔 (Mario Savio) 的学生运动领袖在1964年12月在伯克利的演讲，1964年是越南战争的开始，美国学生正在抗议这场战争并反对利用科技对越南进行帝国主义侵略。马里奥·萨威尔在演讲中谈到了智力劳动和机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关系。他说道：

“终有一天，这个机器的运转将变得如此讨厌，让你心生憎恶，以至于有一天你难以置身其间，即便是保持沉默也不行。你必须将身体趴在这个机器的齿轮和轮子上，趴在它的杠杆上，趴在它的所有部件上，你必须让它停转。你要向那

些操控并拥有这个机器的人表明，除非你们得到自由，否则这个机器甭想启动！”

1964年12月2日，这是马里奥·萨威尔演讲的日子。对我来说，这些话预示了我在接下来的六十年中所经历的事情，包括学术、政治和艺术方面的诸多经历。自60年代以来在西方蔓延的文化运动的关键主题，特别是1968年的学生运动，关键主题在于知识、技术和资本主义剥削之间的关系。萨威尔的话特指机器对知识的征服和吞并，但也涉及其中的主观方面，它们也指向这种征服所暗示和引发的心理痛苦。请记住，萨威尔是在1964年说出这些话的，在我看来，这些话中包含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问题：谁是知识的所有者？这是意大利自治运动的关切：知识的自我组织，技术从资本主义中获得自治，政治行动必须被视为摆脱资本主义、摆脱机器支配的可能性。

然而，在上个世纪后几十年，新自由主义的转变导致了自治项目的失败。数字网络，在90年代被视为在大型私营企业控制下平等和自由的空间，如今已经变成了一系列技术语言的自动机群集，塑造了人类交流的协议，甚至影响了认知硬件，也就是人脑。

但让我们回到20世纪70年代。在70年代，我所在的一代新学者和激进分子发现了一篇以前未知的马克思文献，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这个文本中（特别是在机器论片段一章中），马克思使用了“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在网络化的活动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一般来说，机器、认知和有薪劳动之间的关系是意大利后工人自主派（post-operaismo）阐述的核心内容，在六七十年代我们称之为意大利左翼马克思主义。一般智力的概念对于自动化过程（用机器替代体力劳动）以及智力劳动被纳入生产领域的过程的描述非常关键。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机器是一般智力的智力活动产物，但它也具有使人们免受异化、免受有薪劳动剥削的潜能。一般智力处于一个矛盾的位置。一方面，它是主观性、创造性的表现，但另一方面，它又是剥削人类劳动的工具。在传统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劳动的知识化被视为人类生活从资本主义剥削中解放的一种情形。之后，科技发



中。

实际上，人类，作为集体的人类正在崩裂。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现象。社会心智在超级生产力的压力之下崩裂。在一种普遍流行的恐慌与焦虑之中，抑郁症正通过社会大脑的网络在全球蔓延。在中国、美国、意大利，乃至全世界，新一代的社会大脑在我们大脑不稳定活动的加速影响下出现了崩裂。马克思曾谈到过度生产，意为可用商品过剩，无法被社会市场所吸纳。今天，是社会大脑受到一大批抢夺注意力的商品的压倒性供应的冲击。社会工厂已经变成了不幸的工厂：网络化生产的流水线正在直接剥削认知阶层的情感能量。

我要特别强调心理活动的有机限制问题，这个问题常常被对技术无限潜力的强调所掩盖。加速过程超出了神经容量的极限，这在现在这“最后一代”之间普遍蔓延的心理病理上得以显现。“最后一代”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表述。在欧洲、英国，许多年轻人称自己为“最后一代”——我们既不会创造，也不会让位给下一代，因为在这种环境下的生活已经变得无法忍受，在这种心理病理的情形之中，生活不再值得继续。因此，我们决定成为最后一代。精神医生谈论着心理痛苦、恐慌危机、抑郁等不断蔓延的流行病，年轻人欲望下降、出生率降低……这些都是需要解读的症状。

传统精神分析框架对于痛苦的解释已经不再奏效。问题不再是弗洛伊德时代所说的那种个体的神经官能症问题，你会想到他讲到文明的疾病，神经症是个体受到压抑的结果，诸如此类，但现在的情形完全不一样了！不再是神经官能症的问题，不再是个体的神经症问题！而是大规模的精神病，是一种符号资本主义超级加速状态的新病态效应。神经系统充当着接收终端，整天都对符号刺激非常敏感。这种不间断的认知电击带来的认知压力对我们的情感心理造成了怎样的生存代价？“电击”（Electrocution）是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创造的概念。我不知道在中国是否有人读让·鲍德里亚。我强烈建议读读他的书。早在80年代，他就已经在写一些现在对每个人都变得明显的现象，即病态加速的效应、符号资本主义的效应，加速主义、网络技术、一种普遍的劳动不稳定状态以及对认知劳动的依赖，都在社会心智中引发了病态效应，占据了注意力的时间，

压缩了情感和感性的领域，导致了躁郁症的激增、最后一代工人自杀问题的愈演愈烈。

时间的殖民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现代历史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资本主义在人类思维和日常生活中产生出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变异，资本主义首先改变了人们对时间的感知。信息工作者/认知工作者（info-workers）——艺术家、工程师之类的——他们暴露在不断增长的神经刺激中：加速导致经验的贫乏。信息越多，意义越少；信息越多，愉悦越少。信息传播得太快，愉悦就会消失。当我们被迫接受广告宣传的节奏，被不断启动欲望时，我们变得无法真正享受愉悦，无法与信息领域和自然建立起令人愉悦的关系。感性在时间中被激活。感性是缓慢的。当刺激太快时，深入、强烈的阐释变得不可能。因此，在电子赛博空间与有机赛博时间的交织中，一种麻木化的过程（desentization）正在进行。赛博时间是有机性的，它是我们身体的时间，是我们情感大脑的时间，而赛博空间则是元素的加速。

在此背景下，个体主体化和社会主体化的前景必须重新审视，这引发了一系列激进的问题：

“在当今条件下，是否仍然可能设想一个集体主体化和社会团结的过程？在普遍的不稳定和加速的赛博时间中，社会团结是否可能？是否仍然可能想象一种对现实进行智力与政治转型的集体过程的“运动”？在符号资本主义的心理经济框架下，是否仍然可能实现社会自主权，摆脱资本主义的支配？”

对于这些问题，我并没有答案。但这些都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必须要去问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是艺术研究的关键主题。艺术是对我们与所处环境之间愉悦关系的敏锐的、理性的研究。艺术关乎节奏，是我们身体、大脑以及周围物理环境和信息环境的节奏。这些一直是艺术的主题！德勒兹和瓜塔里（Gilles Louis René Deleuze & Félix Guattari）在他们的作品中谈到了这些，尤其是在他们合著的最后一本书《什么是哲学》中，这是非常美妙的一本书。在书中他们提到了宇宙（Cosmos）。什么是宇宙？实际上，宇

宙并不存在于世界上。我从未遇见过宇宙，你也从未遇见过宇宙。宇宙是我们的大脑、思维、身体与信息 and 情感刺激的超载速度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你被迫承受的情况下。宇宙就是这种关系。而这种关系就是一种节奏。一切都关乎节奏，这种关系的节奏是痛苦的，因为我们的身体在这种不稳定、加速的刺激轰炸中找不到愉悦。因此，我们需要找到节奏。这是当代艺术所面临的问题。宇宙节奏 (cosmotic rhythm)，这是菲利克斯·瓜塔里创造的一个词。宇宙是根据我们的诗性和艺术活动创造的新节奏下，重新演绎宇宙的能力。我认为认知工作者如今是唯一可能进行社会重塑过程的主体。他们是创造新国际主义的唯一可能主体。

“国际主义”这个词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中至关重要，它是和平与创造的唯一条件，却在20世纪末被击溃了。新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新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是一丘之貉。民族自由主义正在摧毁这个星球。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不宜居、越来越难以生存的星球上。我们生活在一个被人类破坏的星球上。我们生活在一个蔓延着战争和侵略的星球上。看看现在中东正在发生的事情，看看以色列鼓动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种族灭绝，看看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事情。为什么战争占据上风并在全球蔓延？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大脑被新自由主义的加速所摧毁，因为国际主义已经在每个人与每个人相互对抗的战争中被取消。我们——认知工作者——诗人、工程师联合在一起，在政治和存在层面形成一种联盟。我们必须找到一条通往新型国际团结的途径。我们必须将我们的创造性工作从金融公司和军事体系的控制中剥离出来，逃离这个正朝着混乱的战争之路前进的星球。只有认知工作者、知识工作者、艺术工作者才是可能创造超越当前宇宙的新宇宙的社会主体。非常感谢。

## 5 超人类面孔的资本主义

Capitalism with a Transhuman Face

安娜·特谢拉·平托 (Ana Teixeira Pinto)

翻译：陈苏元、杜若

校译：黄孙权、马雅

感谢你们的邀请。今天我将分享的主题是《超人类面孔的资本主义》。虽然我平时更喜欢即兴演讲，但为了确保翻译的流畅，我会尽量贴近这篇论文进行今天的分享。希望能够准确传达论文内容，感谢理解！

我想以1988年5月31日为起点，当时罗纳德·里根 (Ronald Reagan) 总统在访问苏联期间向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发表了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站在十月革命的壁画前，谈论了一场不同的革命：数字革命。总统表示：“如同蛹一样，我们正在脱离工业革命的经济，那是一种受制于地球物质资源的经济，转向一位经济学家以《心灵的经济》为题的书所描述的‘心灵的经济’ (The Economy in Mind)。在这个心灵经济中，人类的想象力没有界限，而创造的自由将成为最宝贵的自然资源。”随后，他引用了《圣经》的“古老智慧”并总结道：

“一切的起点是灵魂，创造物的丰富物质皆由此发出。”

快进到今天，进入我们这个年代。我们已经不再生活在里根的梦想中。科技行业的风气在近年发生了性质改变，从比尔·盖茨所倡导的市场狂热的乐观主义转变为由湾区新反动主义者和网络君主主义者代表的数字封建主义。在科技文化中孵化并似乎已不可救药的加密法西斯主义论坛，在制造和传播另类右翼（alt-right）的词汇和形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琼斯母亲》（Mother Jones）（编按：一份美国历史悠久的左翼工人杂志）的报道，新纳粹网站“每日风暴”（The Daily Stormer，以德国纳粹的非官方宣传机构 Der Stürmer 为名）收到的大部分捐款来自硅谷，而苹果和英特尔所在的圣克拉拉县则是该网站最大的流量来源。顺便提一下，“每日风暴”网站因为夏洛茨维尔袭击事件（Charlottesville attack）及对一名年轻女性海瑟·海耶的谋杀，最终被从线上撤下而不复存在。因此，被称为另类右翼的极右运动最显著的特征是它与信息技术的关系，而不是与后工业工人阶级失势的期望值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表明法西斯意识形态的一种新配置正在形成，它在新自由主义的庇护之下与其协同工作。

因此，如果法西斯主义的每一次崛起都承载了对一场失败的革命的见证，那么可以说，在科技行业内崛起的加密法西斯主义倾向见证了“数字革命”的失败，其对后稀缺经济和社会化资本的允诺从未实现。从这个角度来看，在线上广受欢迎的赛博蒙昧主义

（cyberobscurantism）、极右玄学（far-right esoterica）和偏执狂观念构成（paranoid ideation）的混合物可以被解读为这一持续转变的病变症状。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当前时刻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去西方化的进程，即西方正迅速失去其主导地位，并且与这一进程相并行的是，在这场持续的关于对殖民榨取矩阵的控制的争端中，中国作为可能之胜利者的出现。西方霸权的存亡取决于数字经济，更确切地说，取决于人工智能的发展，这是当前唯一快速增长的部门，也是在气数将尽的新自由主义阶段之外筹谋资本积累的另一阶段的唯一引人注目的尝试。文化战争将这种地缘政治的紧要关头畸变为一个道德寓言：造物将要从其造物主那里把自己解放出来。换句话说，一种亚洲面孔的资本主义。我想展示一些图片，让你们了解这种转变在美学上是如何表现自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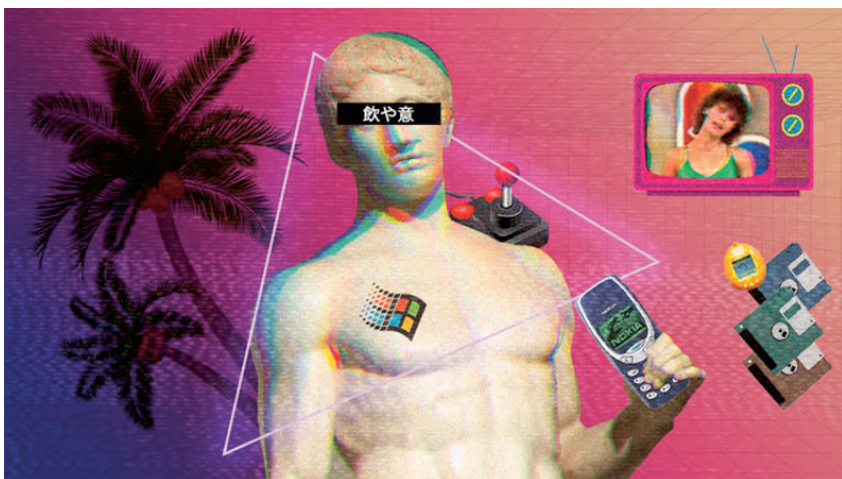


图1



图2



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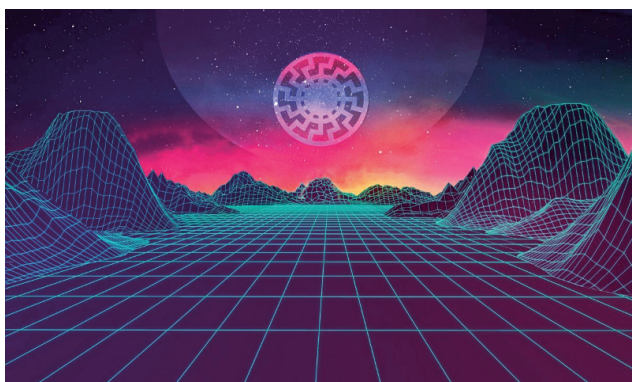


图4

这是一种被称为“蒸汽波”（Vaporwave）的互联网风格，这种蒸汽波风格将希腊罗马大理石雕的图像与类似电子世界的网格、柔和的色彩和棕榈树结合起来，将西方文明的神话起源与美国梦和科技行业联系在一起。重温怀旧情怀，蒸汽波可以被描述为一种拼贴艺术，它将新世纪元素融入复古科技风格中，混合了有抱负的、灵性的和技术的元素。蒸汽波类型随后被白人种族主义运动挪用，产生了视觉亚流派“法什波”（Fashwave）。在下一个图像中，你可以看到一个带有“黑太阳”（德语 Sonnenrad）的“法什波”迷因，这个符号曾被海因里

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使用，并在玄秘白人至上主义圈子中广受欢迎。这是另一个“法什波”迷因，与阿尔诺·布雷克尔（Arno Breker）的雕塑并置，他是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中最受欢迎的雕塑家。在这个迷因中，这个图像与凯尔特十字并列，后者是一些白人至上主义团体使用的象征符号，其中包括“雅利安民族”（Aryan Nations）。在这个图像中，它的含义非常明显，口号“西方正在燃烧”与一个凯尔特十字并置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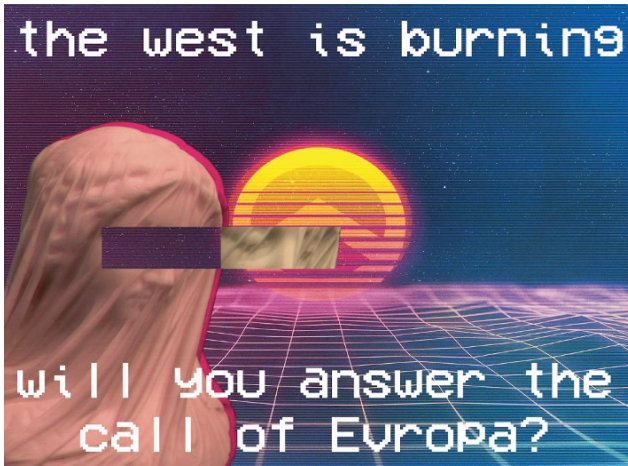


图5

目前有很多关于人工智能的文章，可以说是太多了。这项技术确实带来了现实的经济和社会挑战，即大规模失业和错误信息传播的风险，但这些并不是让主流社会最为忧虑的问题。相反，业内人士经常警告说，他们正在构建的技术可能对人类构成存在主义的威胁。在这样一种人类灭绝的叙事中，有一种戏剧性元素，其存在超出了人工智能所能涵盖的范围，其自身蕴含着一种远比技术更古老的幻想。即使听起来很不科学，这些思辨也不一定是“错误的”或“虚假的”；事实上，也许它们对技术、科学或经济没有太多意义，但对白（人）性（whiteness）、西方霸权、或这种霸权的丧失来说却意义重大。

值得讨论的问题之一是，ChatGPT如何通过编程误导研究人员。在最近发表的一份加文·德·贝克尔（Gavin De Becker）与ChatGPT的

聊天记录中，谈及“国家安全备忘录第200号”（也称作“基辛格报告”）时，ChatGPT以一种明显的企图不断误导研究人员，试图掩盖存在争议的美国政府政策。

然而，数字经济也改变了技术作为资本积累的过程，由此产生的阶级关系与美国生活方式的社会再生产是存在矛盾的。让私营部门——亚马逊、刚刚收购Deep Mind的谷歌、脸书、IBM和微软——成为必需的公共服务的唯一提供者，意味着技术精英阶层与庞大的失业或就业不稳定的底层阶级之间存在根本性分野。金融与数字技术结盟，挥舞着不可思议的权威，引领企业利润和精英权力的戏剧性复辟。

虽然这种走向寡头政治的趋势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西方自由民主的黄金时代，与其对内进行的性别和种族压迫、对外进行的殖民暴力一直是同步存在的，但随着不断进行资本积累的工业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更低的工资”，这种已然找到复兴强度的寡头政治趋势，阻碍着所谓的外围形构（peripheral formations）的发展，并重现为“全球南方廉价劳动力种族威胁”的论调。

随着社会权利在欧洲和美国的凋敝，一个庞大的安全装置正处于一种不断被巩固的进程中，“管理着被认为是对国家文明的威胁”。就像如今以色列对加沙发动战争的背景，被捏造为反反犹太主义，以表示与反犹太主义战斗的必要性。

对内管控种族化的生活，对外重新加强殖民的暴力，二者相互交织，创制了一种效应结构，使那些在经济上受挫的人仍然会从力比多层面或是象征层面投资自己。尤其是千禧一代，他们被鼓励将其身份认同与新创企业、社交媒体平台站在同一阵线（就像他们父母一辈看向的“美国梦”或向上流动性一样），并将他们所引领的企业家主体性模式误识为自由和自主的例证。可以说，白性作为一种力比多粘合剂，将不相称的财富抓握到了一起。网络文化战争，是一场关于白人没落和帝国霸权的更大斗争的代理。科技文化采取了黑客反文化的态度，同时又与支配性阶级保持一致，从而“在两者之间开辟出了一条有毒的通道”。

我想分享一个小图片，是埃隆·马斯克（Elon Musk）非常著名的一张照片，照片中他抱着一个洗手池走进Twitter总部，“让它沉入其中！”他刚刚收购了Twitter，而从商业角度来看，这笔收购无异于一个巨大损失，但他收购推特的实际初衷是创建一个政治企划。



图6

在后89的反政治氛围中，大量知识分子都以一种回避“党派组织和斗争等顽固存在的问题”的方式，致力于将政治解放概念化。在这一退出集体、拥抱新事物的过程中，“名义上的左翼学者们，有时由科技公司出资担任教授职位，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对新媒体的激进潜能感到无比激动”。

事实证明，另类右翼对自由派意见领袖、广大的准学术界和当代艺术圈来说都很有吸引力，这归功于对德勒兹和德勒兹主义的庸俗阅读，杂交性、矛盾性和展演性在定义上被认为是多义性的，因此也是反威权主义的，而社交媒体的表达方式——以及几乎所有可以被描述为根茎性（rhizomatic）或破坏性的东西——都被拜物化为一种网络赋能的民主形式。

也许最重要的，是这些圈子共享着对于通常所说的“失败文化”的广泛不满，自柏林墙倒塌以来，“失败文化”便作为左翼对其政治历史的理解的特征。放弃了好战，转而倾向于忧郁症和失败主义者的内省，就如其批评者所言，左派（the left）——通常是名义上的而非政治上的左翼（left-wing）——陷入了一种莫名的不安，并最终落到了一种“左派传统主义的自相矛盾立场”，他们放弃了每一个有远见的计划，进而空虚了自己的力比多能量。

左派被认为所缺乏的那种强度、令人陶醉的活力和近乎狂喜的体验模式，正是另类右翼必然要提供的。尽管往往与冲突于社会秩序的主旨联系在一起（这种冲突定义了反文化，这也是埃隆·马斯克这样的人所体现的），颠覆或超越道德规范的欲求并不一定具有政治性，而是取决于当前的共识。越轨的修辞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能与越轨的政治相脱节，纳粹剥削电影（Nazispoitation film）就是如此，它的主要驱

动力是将政治的离经叛道与性的离经叛道联系在一起。在60和70年代，法西斯主义也为将权力与性相联系的幻想提供了现成的出口，如支配与服从，施虐与受虐。社会民主曾经有，且在许多方面仍然有着，一种法西斯式的力比多。

从情色方面来说，在这里以及在其他许多其他例子中——曼森家族（Manson Family）就是最极端的例子——越轨迅速变成了虐待。至少在当代艺术领域，越轨是一种流派，其生产一种犬儒式的尝试使审美经验成为一种道德暴行的直接延伸。例如，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者用“青蛙佩佩”（Pepe the Frog）的表情包来嘲笑“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在一张海报上写着“绿命攸关”，以此贬损尊重黑人生命的呼声，因为大家都知道，不存在绿命。最重要的是，越轨具有经济维度，与创造性破坏信条或硅谷俚语“破坏”一词相关联，这是反文化与科技或计算机文化之间的一个关键主题。



图7



图8



图9

从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集体性在定义上是属于不自由的（illiberal）。这涉及到一个非常古老的课题，某种程度上自由主义为其自身估值，这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他们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如果你为他人做了什么，这种行为可能是出于一定程度上的强迫，因为人类的基本动机是自私的，每人每时每刻都会表现出自私的行为。因此任何类型的同情背后都可能存在某种强制。基于新自由主义认为集体性即不自由的观点，在线网络连通性允诺自身将发挥解放之路的作用，可以规避集体组织行动的陷阱。但正如乔迪·迪恩（Jodi Dean）指出的那样，网络的虚无主义潜能是其个体化效应的产物。基于网络的互动还特别擅长将反叛与革命分离。尽管与反文化不尽相同，异端文化的本质也是对立性的，因为它信奉被宣布为危险的或被封禁的知识、思想、理论和思辨。灵性探寻文化（Seekership）“产生于对离经叛道状态的意识，反过来又强化了这种意识。”异端社会文化氛围通过混淆文化上和政治上的离经叛道，为进入法西斯主义论域提供了便捷通道。

正如彼得·奈特（Peter Knight）所言，通过数字化催生的阴谋论“与其说是精神错乱的症候，不如说是对知识和真理可能性的一种讽刺，它运作于双重否定的修辞领域。现在，它们被有自我意识地呈现为一种症状，这包括其内置的诊断”，而它的修辞功能不是表达信念，而是表明无处不在的犬儒主义和一般化的不信任。

这一立场与职业管理阶级的反政治及其矛盾态度是同延的（相对于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富裕或相对富裕的西方中产阶级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愿意将政治权力让渡给极右翼民粹主义者和煽动家，他们和资本主义之间也存在着一种矛盾的关系，这典型地被理论化为一种偶然的、混乱的力量，能够释放出“强大的乌托邦能量”，其异化效应可以被体验为一种解放。

几乎所有另类右翼中的杰出人物都将自己定义为政治上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和意识形态上的白人至上主义者。NRx意识形态（编按：新反动主义运动Neo-reactionary movement，简称NRx）的情况也是如此，只不过以一种更编码式的方式。这种重现的连续性表明了一种意识形态的亲缘性，直到现在都一直被地缘政治的需要所扭曲。与其说

新法西斯主义者是加密自由意志主义者，不如说自由意志主义是加密法西斯主义者，但其反民主倾向在一定程度上被20世纪最后几十年流行的修正主义历史所掩盖。我在这里想说的是，人们对这样一个事实的关注是不够的，即经济是法西斯主义的经济，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是源于秩序自由主义学派的，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移民到美国变成了芝加哥学派。

“两个极权主义”的故事，将斯大林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在政治（和道德）上等同起来，与受自由意志主义启发的个人主义的反国家政治形成鲜明对比，在掩盖自由意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信条之间的亲缘关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冷战中“自由世界”相对“极权主义国家”的比喻将民主治理的问题纳入了一场史诗级的斗争，即自由力量——如艾茵·兰德（Ayn Rand）、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或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vig von Mises）等人推崇的——与不自由力量之间的斗争，使得民主与自由主义混为一谈。但是，民主自我治理并不是一种自由社会秩序的必要组成部分。相反，古典自由主义并不支持不可让渡的权利观念——哈耶克在支持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的智利政变时，曾言明赞同“自由专政”。古典自由主义对社会制度结构的基本规范是达成了共识的，正如戴维·埃勒曼（David Ellerman）所说，“（这种结构）留下了一种可能性，即一种自愿的宪法形式的非民主政府，在这种政府中，人们自愿同意放弃并让渡自我治理的权利给某个至高权力。”

从霍布斯（Thomas Hobbes）到罗尔斯（John Rawls），人们可以找到许多基于同意的让渡基本自我治理权的论点。在美国语境中，这一争论往往与“自愿奴役契约”问题联系在一起，因为“关于个体可比较问题是，一个自由的制度是否允许他把自己卖为奴隶？”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诺齐克（Robert Nozick）说：“我相信是会的。”又或者如另一位自由意志主义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所说：“自从奴隶制被废除后，法律禁止人的赚钱能力被资本化，一个人甚至没有出卖自己的自由。”

因此，回到埃勒曼的论点，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权利的让渡相对于权利的委托，而不是同意相对于强制。大多数当代自由意志主义者将权

力让渡给一个至高权力而辩护，而非公民将权力委托给代理人，新奥地利经济学家通常倡导非民主的主权城邦（如初创城市[start-up cities]或特许城市[ charter cities]）。基于同意的非民主市或国家政府的自由意志主义模式包括“自由城市”或“初创城市”的概念、所有权城市（proprietary cities）、帕特里·弗里德曼（Patri Friedman）的漂浮海上城市（floating seastead cities）、保罗·罗莫（Paul Romer）的特许城市或泰勒·考恩（Tyler Cowen）所称的“股东国家”

（shareholder states），所有这些案例都将定居主体看作是已经同意了一种服从契约（pactum subjection），他们自愿决定迁入并留在该城市或国家便是证明。但所有这些情况都排除了任何民主参与政府的可能性。当，或者如果，同意被撤回时，唯一可行的选择就是退出。

新反动主义（Neoreaction）是尼克·兰德（Nick Land）和Urbit所有者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笔名 Mencius Moldbug）的意识形态独创，其典型的主张是“选择性加入社会”（opt-in societies）或“政府公司”（gov-corps），理想情况下由一位首席执行官国王管理。巴拉吉·斯里尼瓦桑（Balaji Srinivasan）、彼得·泰尔（Peter Thiel）和帕特里·弗里德曼虽然没有被认定为新反动主义者，但他们也主张选择性加入制，将公民权利仅限于投资者（股东），禁止股东代理。在政府公司模式下，国家将不再监管资本，而是成为资本不受约束的表达方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新反动主义者是古典自由意志主义者：他们不想限制国家权力，而是想将其私有化。人们将拥有离开的权利，而不是民主权利：兰德断然拒绝政治代议的民主概念，即拥有“发言权”的民主概念，他认为唯一有意义的权利是“退出”（exit）的权利。

然而，退出意味着隔离：整个概念的关键在于把他人抛在身后。相似于“资本罢工”（capital strike）（艾茵·兰德的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 中的一个概念，意为在经济中暂停新的投资。小说的故事情节围绕一个社会主义的美国展开，最具创意的实业家、科学家和艺术家以罢工来回应福利国家的要求，他们撤退到一个多山的隐蔽处，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独立的自由经济体），这种“退出”是非

正式说法“白人逃离”的正式版本：中产阶级白人人口迁往种族更加同质的地区。

硅谷还大力投资于比特币，正如大卫·格伦比亚（David Golumbia）所言，比特币是一种社会和政治功能远远超过其技术功能。从经济学角度看，比特币是对一个错误问题的回答：价值波动不是形式上的问题，而是政治上的问题，它不能通过软件工程来解决：“没有直接的监管结构”，任何金融工具都可以“被用作一种投资”。然而，从意识形态上讲，比特币反映了人们对美联储被“外国”控制的根深蒂固的焦虑，说得更广泛一些，比特币是一场以金融资本的非法性或不自然性为标志的反犹主义蠕变。

在我看来，问题并不在于新的极右翼从根本上来说是法西斯主义还是非法西斯主义，而在于这种法西斯主义的新面孔如何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法西斯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扣接。法西斯主义不需要大众运动，它是一种法人主义（Corporatism）信条，而非集体主义信条。尽管在20世纪初上台的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性迭代获得了相当多的民众支持，另类右翼——虽然还在持续动员传统极右翼——仍具有强烈的超结构性。

法人主义是一种有机体说：社会被表征为一个有机体，即社会身体。与马克思主义不同，法人主义并不按照阶级划分来叙述社会对立的结构。相反，它坚持大脑与四肢之间是一种和谐关系，雇主与雇员之间也是如此，并将两者共同对立于以社会身体为食的外部或寄生性因素。在古典法西斯主义中，这种寄生性因素通常被描述为金融（并被编纂为犹太人）。然而，在新自由主义下，寄生者的位置往往被归咎于国家——一个为了不值得的、种族化的福利受益者的占位——其不正当的税收削弱了公司的生产力。在欧洲和美国，税收问题越来越多地与种族主义者拒绝纳税联系在一起，税收广泛地被视为对种族化少数群体的支持。通过“退出”，你可以甩掉寄生者，把他们抛在身后。

阶级意识与大众运动之间的非同一性取决于白性的构建；取决于致使那些在经济上受挫的人仍然会在力比多和象征意义上投资自己的效应结构。但是，由新反动主义（视白性为资本的代理）和那些另类右翼

（视资本为白性的代理）所表征的政治立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紧张关系。

新反动主义并不拥抱传统的极右种族信条，而是认为“基因自我过滤的精英”已经处在一个将其自身从那些智力平均或低于平均的人中分离出来的进程之中，这一进程最终将致使超人类高级种族

（transhuman super-race）的出现，以及“一个利用智力增强技术使自己处于一种无懈可击地位的强大领袖。”尽管超人类的高级种族目前看来似乎不太可能，但现有技术已经让我们沉浸在赛博自由意志主义信条所呈递的激进瓦解中，想想“零工经济”是如何规避社会契约的。

在由哈里森·弗鲁斯（Harrison Fluss）和兰登·弗里姆（Landon Frim）最近为《营救》（Salvage）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中，他们将

这些分叉的拉力之间的摩擦，视为对抗的“动物精神”比蒙（Behemoth）和利维坦（Leviathan）之间的一场斗争。比蒙表征着族裔民族的领土完整，而利维坦则代表着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所说的“海盗资本主义”（corsair capitalism）：贸易和金融的流动活力。如今更加为人所知的，是霍布斯的《利维坦》

（1651年）铜版雕刻中出现的高大形象，作为国家或“统治者”（rector）的象征。利维坦最初是一种危险或邪恶的力量，有时是海洋本身，有时是龙或魔鬼，被表现为海怪或蛇形鲸鱼。施米特认为，霍布斯之所以选择这个书名，是因为它唤起了一个巨大的身体的图像：身体政体（body politic），霍布斯将其与比蒙相对立，后者是社会动荡或革命的象征，自然状态下的无政府主义的能量。另一方面，施米特又回到了卡巴拉主义者（Kabbalist）的阐释，将利维坦视为海上力量的象征，与表征陆地力量的比蒙作战。在施米特看来，利维坦代表了大英帝国的海上帝国权力（thalassocratic power），

他将其与陆上的德意志帝国进行了对比。

但是，与其说比蒙和利维坦是对抗性的力量，不如说它们是同一政治体的不同面（例如，沙特阿拉伯：既是种族专制国家，又是金融强国），或者说它是它的后继国：由于公海已然让位于作为动态积累场所的赛博空间，利维坦，套用弗鲁斯和弗里姆的说法，可以说表征了资

本主义的一种加速形式，它正在废除最初使其得以繁荣发展的历史因素（即比蒙）。因此才有了青蛙，有了对粘性生物和洛夫克拉夫特式主题（Lovecraftian themes）的迷恋。

青蛙是一种阈限动物，处于两种不同身份之间的入口或两个不同世界的交叉处。它们是变化多端的边界性存有，其形态学是隐喻的具身化。离经叛道、等级制度的颠覆、或秩序的解体都在胶质两栖动物的身体上实体化——它们是整个地球正在经历的阈限经验的替身。

套用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的观点来结尾，在欧洲被称为“法西斯主义”的东西不过是殖民暴力找到了回家的路。法西斯主义是资本的肮脏秘密：它总是喜欢通过恐怖而不是工资关系、契约或市场来接近它的臣民，在成为它的受害者之前，欧洲白人是“它的帮凶”；他们容忍它，为它开脱，对它视而不见，使它合法化。硅谷的亿万富翁们在新西兰（这个国家更有能力抵御即将到来的环境灾难）建造末日地下碉堡，而社会民主正在容纳法西斯计划，以生命政治的角度对待某些群体，管理（和性别化）他们的生活，同时其他群体则被置于一种僵尸政治制度（necropolitical regime）之下——被压制、被驱逐、被罪化，最终被杀害或留下等死。

2003年，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想象世界的终结比想象资本主义的终结要容易得多。”通过将社会形式本体论化，有机体论隐喻的法人主义是建立这样的基础上的，它暗示着上述形式的危机就是社会和文明本身的危机。在这里，生活方式等同于生存。因此，对于大部分（以白人和相对富裕的群体为主）的人口来说，尚未遭受几个世纪的迫害重负，他们不自觉地或半自觉地认为，世界末日比种族资本主义所给予特权的终结更可取。感谢您的聆听，我的发言到此结束。



## 6 一封给年轻艺术家的信， 如何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 生存？

A Letter to Young Artists, How to  
Survive in the Age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列夫·马诺维奇 (Lev Manovich)

翻译：袁孟如

校译：黄孙权

译者注：文章提及的图片可见<https://lightroom.adobe.com/shares/fa4cbcf0ae1d48b8adbffd1641dc556d>；<https://lightroom.adobe.com/shares/c5e9fc94639448d09141a155bbd85044>

很多人认为我是媒体学者或者新媒体学者，但实际上，我是一名艺术家。我于1960年生于俄国莫斯科，在1981年随父母移民到了美国纽约。我从14岁开始接受视觉艺术训练，包括现代主义绘画和古典绘画。这与亚洲仍存在的一种体系有些相似，要进入艺术学院必须通过考试，我当时要进的是建筑学院。我参加的考试主要是关于古典素描的，如画古希腊头像、描绘纹理、强调透视和栩栩如生的绘画。我接受了这样的训练，1981年来到纽约后，我在纽约大学电影学院度过了一些年头。

近四十年前，1984年，我开始从事计算机动画和计算机图形工作。我有人文学科的博士学位，主攻视觉文化，在过去20年里，我在东

海岸甚至加州教授课程，在视觉艺术系任教，尽管大学根据我的著作和书籍对我进行评估，大部分教学内容是面向艺术家的实践工作室课程。十年前，我搬到纽约，并成为计算机科学和数据科学博士课程的教授。现在，我教授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学生。

我已经有32年没有进行传统的素描或绘画了，大约在90年代停止了画画，在过去的30年中，我参与了从模拟到数字，再到计算的整个发展过程。随着计算转向AI，数字已经成为既定事实，每个人都在写关于数字文化的东西。我觉得我可以为我的生活增添些其他东西，所以我重新开始了绘画。刚好在这两周后，Midjourney公开发布了，它的出现掀起了生成媒体（generative media）的革命。

众所周知，过去的15年是非凡的。中国公司一直在发布他们自己的AI版本，支持其应用。在西方，我们有ChatGPT，我们有Dalle 3；现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整合到谷歌搜索中。毫无疑问，我们正处于一个全新、彻底革命性的时代的开端。许多人，包括我自己，相信这场革命的规模可以与90年代互联网的发展，与19世纪摄影的兴起相媲美。

在我此次演讲中，我将谈论视觉生成媒体（visual generative media），并用我的作品加以阐释。在过去的15个月里，我使用人工智能创作了许多图片，大约有6万张。我以系列的方式创作图片；每个系列都有一个电影，有时是一部抒情电影，有时是一个概念性的电影。我在许多群展中展示了这些作品，其中一些在个展展出。其中一场将于两周后在葡萄牙开幕，第二场将于十二月开幕。

所以，在我谈论的同时，我将开始展示我的作品，你将会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我将演讲的第一部分称为“碎片的美学”。

在过去的15个月里，我每周都在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制作图片。在其中一些图片中，你会看到一些内部空间，看起来是由一系列工具组合而成，但当然，全部都是仿真的工具，如版画的蚀刻、雕刻等等。这些空间展示了充满无尽物品的架子。这个奇异的空间让我同时联想到了书库、仓库、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展览，也许还有欧洲静物画传统。在架子之间、缺失的墙壁之间，经常出现精致、微妙、常常难以看清

的图案——有些是二维的，有些是三维的，像线条的编织。现在换个话题。就在一瞬间，有时我们呈现为抽象，但通常意味着某些明确的东西——一些对象、形状、来自我们人类世界的意义。

这些是什么碎片？这些未定义、未命名、放置在架子末端的物件是什么？这些物体的线条，目前还不清楚它们是二维的还是三维的。它们是墙上画作的一部分还是存在于现实中？有时我们明确；有时我们不太确定，所以你得到了一种碎片的状态。是的，我们看到了碎片，但是什么碎片？在常规艺术博物馆里，有古代文明的碎片——花瓶、玻璃杯、盘子，还有小工具、雕像等等，就像我去奥地利并去了当地美术馆的那一天一样。甚至在地下室，他们有着许多文明的碎片，大约在1500年、1800年前，它们是普通的容器。你真的能感受到博物馆，就是这些物质碎片的集合。

但人工智能的“碎片”有着不同的选集。AI通过数亿张图像提取“模式”（patterns），并将它们分布到数万亿个连接中。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网络训练中，这些神经网络被喂了数亿张素材，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信的图像，以及几种描述内嵌的HTML代码，然后我们以像素为单位进行分析，发现了表现某种东西的老练的边线和细节，以及一些我们不太确定的面。我们只知道这种过程，碎片化的同时也在分解和重组，然后这些模式分布在人工神经网络的数万亿个连接中。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图像的数字实质被进一步虚拟化、蒸发和扩散了，但仍然被保留着。而你在我的图像中看到的生成的“碎片”就像气味，微风中看不见的运动，海岸边的周期性运动在场景上留下痕迹。这些都是我们世界中碎片的碎片。我的意思是，我无意与你就图片呈现的这些形象进行交流，我真正感兴趣的是空间，被称为无尽静物的空间。有时是可识别的物体，一系列的细节，我喜欢当它无目的地再生时的碎片化，你不太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比如这些物体或者墙壁是什么？这些图像里面有什么？我们不知道这里是什么。所以，这些碎片的碎片沉积了如此多破碎的形式，也许比意大利画家所仰慕的18世纪的废墟更加碎片化。它们不是“故障”（glitches）。

它们也不是数学家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的信息论所指的噪音，这是数字通信的一种破坏力量。所以这不是故障也不是噪音，

它是人工生成的产物，可能是智能美学的产物。它是分布式知识和分布式愿景。60多年前，由保罗·巴兰（Paul Baran）在50年代末发明的未来互联网协议建议将整个信息分解成组，以更可靠地从遥远的网络传输；将某物分解成随机的部分，矛盾地确保了它的生存。

保罗·巴兰在20世纪60年代首次发表了“封包交换”（packet switching）概念，1960年，当时他在美国的一家公司工作。你知道吗，他的封包交换的想法为之后的互联网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是始于1969年加利福尼亚的ARPANET的前身。他当时的想法是，我们处于冷战之中，俄罗斯可能很快就会发动进攻，也许会发生不可避免的核战争。这听起来非常熟悉，因为60年后，我们又回到了一个非常相似的时刻，普京进行的核试验，使得世界又受到了核威胁。但无论如何，让我们回到那个60年代，当时的想法是这场战争将会发生，而我们要如何让政府、军队通信等等。所以，我们要创建这个网络，而矛盾的是，巴兰所展示的是，如果你能将一条信息拆分成封包，然后发送这些封包，这些封包可以独立传播，它可以在最终点被组装起来，即使你拿走了这个网络的部分，你仍然会得到大部分的消息。所以那就是封包交换。他不是为互联网提出的这个想法的，但互联网可以说是诞生于此惊人的想法：为了在未来的核战争中生存下来，并且抵御苏联的进攻，我们必须将消息部分拆分或分解为碎片。

但在同一时间段，有两位乌克兰数学家（当时乌克兰是苏联的一部分）。亚历克西·伊瓦赫年科（Alexey Ivakhnenko）和瓦连京·拉帕（Valentin Lapa），两位在乌克兰工作的苏联数学家，发明了另一种有效利用消息片段的基本方法。当然，我指的是一项基础性的发明。他们发明了深度神经网络的概念和数学方法，这在神经网络的历史中并不经常被讨论，但你可以去维基百科或各种文章中找到相关信息。所以，深度神经网络也是在将近60年前发明的。这概念于1962年提出，在1966年有了整本书来阐述。第一个深度神经网络的发明最终导致了当今大规模网络的出现，这些网络也用于生成AI。在机器学习过程中将文化制品分解成片段（例如图像像素和部分单词），然后分阶段处理这些片段，这些片段逐渐使这些网络获得知识。它可以给我们合成的文本、音乐、空间、代码、图像。简而言之，通过将历史上

的人类文化分解为碎片，我们得到了我们的新“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文化。

由ChatGPT等应用程序“写成”的文本极其连贯，一次指示一个词。这种所谓的盲目“语言计算机”无法预见一个词以上的事，但它以一个词与另一个词相关联，第二个与第三个相关联的方式，将这些关联向前推进，使我们得到了诗歌、故事、求职信、分层文件、教科书章节、计算机程序等等。数字媒体的历史以及人类文明的历史急需一个碎片理论。因为，在数字时代，在数字媒体中，计算机代表事物，模块化使用物质性，这是数字媒体的原则之一，这在我的著作《新媒体的语言》中详细讨论过，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几年前在中国出版发行。所以，这个观点是现实图像由像素组成——你知道，由计算机呈现的自由空间，由粒子对象、多边形等组成。但通常情况下，如果我有一种新型的转化，就像我说的网络那样，会带来图像、文本、3D模型以及从学习过程中提供给它们的任何其他数据中提取模式，这些模式我们还不知道如何可视化，因此我们无法可靠地观察神经网络内部。

但我认为人们也许能够分布在数万亿个连接中，虽然还不清楚，类似于人类大脑的运作方式。这就是让网络合成这些新图像的原因。因此，这些图像有目的地由AI驱动的Midjourney创建充满碎片的场景，后来我意识到这可以作为谈论AI的一种隐喻。所以，数字媒体的历史，以及人类文明的整个历史，迫切需要一个关于碎片的理论。一个分类体系将确立存在数十种类似的品类。因此，在这里你也看到了这种美丽的碎片，这种美丽的神经噪音，可以说是在墙上，有时形成书籍，有时形成衣柜，但它们都是被组合在一起的碎片。当然，其他人曾经考虑过这样的分类学，这让我再次回想起18世纪欧洲废墟美学的例子。这呼应了现代科学对物质元素的追求，比如分子、原子和基本粒子。

19世纪欧洲艺术家开始认真地用可见的文字描绘碎片。印象派画家将其分解成单独的彩色笔触；乔治·修拉（Georges Seurat）和保罗·西涅克（Paul Signac）依赖于机械式的不规则点。后来，在1905-1907年间，有一群称为分色主义的艺术家的艺术家，他们使用小方形的画笔笔触，这是点彩画派的新版本。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在1878

年左右迈出了另一个关键的一步。他宣称所有的形状都应该用圆柱、球体和圆锥来表示。但矛盾的是，这种看似对现实的固化实际上只是一种新的、更极端的分裂方式。印象派展现了我们感知的片段，而塞尚则是分裂了世界本身。他作品中的桌布，比如《玩纸牌的人》

（1892年），不再是一整块连续的织物。相反，它是一组碎片，是多个方向的平面集合。1907-1932年间，暴力分裂的美学来到了欧洲，莫斯科、柏林、布拉格、华沙、罗茨、巴黎等地的现代主义视觉的中心。我们在各处都能看到：毕加索和布拉克的拼贴画；让·梅辛格（Jean Metzinger）、阿尔伯特·格莱兹（Albert Gleizes）、费尔南·莱热（Fernand Léger）、罗伯特·德劳内（Robert Delaunay）等人的立体主义；娜塔莉亚·冈察洛娃（Natalia Goncharova）、亚历山大·埃克斯特（Aleksandra Ekster）、柳博夫·波波娃（Lyubov Popova）、马列维奇等人的立体未来主义；汉娜·霍赫（Hannah Hoch）、莫霍利-纳吉（Moholy-Nagy）、罗德琴科的拼贴照片；维尔托夫和艾森斯坦的电影剪辑；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未完成的“拱廊街计划”的文化历史蒙太奇甚至引发了更多文化分裂理论的解读。

我认为，时机成熟了，我们正在思考人工智能的理论，也许是我，也许是你，将成为下一代的理论家，不是媒体理论家，不是即时理论家，不是数据理论家，也不是软件理论家，而是人工智能理论家。我相信在这个房间里有些人可能会提出同样有趣的网络分割理论，这构成了生成式媒体的基础。如果你要实时量化，你需要动手操作，学习计算机科学，亲自学习编程网络，因为理论化媒体的方法之一就是深度的物质主义式的。大多数关于数字文化的人文泛化都毫无意义，因为这些人害怕技术；其次，我们意识到自己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再者，我们根本不了解这些事物的运作方式。因此，请务必一些，亲自动手，深入连接、共进化的世界，构建层层叠加的图像等，也许我们甚至能够看到利用深度网络从其图像数据库中提取的所有模式，展示出难以想象分辨率的巨型可视化图表。



图1

但作为一个一直投身于数字美学的艺术家，我很高兴能创造出我在这里向你展示的私人独特的图像空间。我喜欢这种绘画般、生长般的空间质感，以及相似的、复杂的主体，我有得到这些图像的秘法。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这些空间本身，奇怪的图书馆，到处散落的书籍。我确实指定了我的人群，比如2005年在北京，或2013年在首尔，或1995年在上海等地工作室工作的艺术家，但我也有其他技巧，尽管他们看起来在一个奇怪的空间，这些空间既是文化的空间，也是碎片的空间。

所以，对于这些碎片的结论是，它们呈现的关于人类文化的历史是一部缓慢遗忘、非常罕见、几乎永远不可能记住的历史。著名的艺术家、作家、评论家和引起关注的人们在我们的记录中逐渐消失。对于更幸运的少数人来说，他们只能被记住几件事。例如，当人们遇到我时，会说“哦，你是列夫·曼诺维奇，你写了《新媒体的语言》”。但我同时也写了几百篇文章，800次演讲，至少有一百多个艺术项目展览，编辑和出版了15本书。现在我已经只记得用书来回应，而且我不知道能持续多久。一个工作了超过60年的艺术家被缩减为几张标志性的图像。一个终身从事写作的作家如果幸运的话，也只能被缩减为一本书。所以，我是幸运的。历史的压缩是残酷而没有余地的，而

现在由生成式人工智能所提供的分解、选择性重组和合成的机制可能相对没那么残酷。

当然，如果要使你在深度神经网络的训练中被记住，首先得需要它被幸运地数字化，对吧？因此，某物必须被数字化，某物必须被捕捉，某物必须在可以从网络上获取，然后也许这个对象、这个人工制品，在计算机科学家下载网页时会很幸运地被搜集到，被纳入到神经网络中。

我正在一个小镇里一家过去四年都没有游客参观的小博物馆里作画，也许这幅画很幸运，因为它出现在当地一张周末来访的高中生情侣的自拍照背景中，但是旁边的画却没那么幸运。是的，我们无论如何都会得到碎片，但也许碎片会比以前更多，比之前更为严格的人类记忆和更为残酷的印刷文化所允许的更多。毕竟，Stable Diffusion已经在超过50亿张图片上进行了训练，所以也许你的自拍照或者你14岁时画的那幅画，在网上某处也存在。

这种更宽容、不那么二元的遗忘和复活过程可能是人工智能美学中最好的一面。这是历史的仁慈。最后，我想说另外一件事。前几天我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信息，因为现在我可以阅读那些文章。或者像一些西方艺术家抗议AI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所使用他们的作品，等等。我认为总的来说有点矛盾，你可能会喜欢这种东西。如果你的图片最终出现在用于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的庞大神经网络的数据集中，那么你可能会很幸运，因为在这种方式下你将被记住，你成为了这种用于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的碎片简历中的一部分。然后，当我们的艺术设计师和我们的文化产业从业者创造出图像、空间、概念艺术、视频游戏、建筑等等新的像素时，你也间接地进入了其中。我的意思是，因为每个由规范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像都不会直接克隆现有的图像，对吧？它通过数万亿个连接组合事物。实际上，最近一个统计表明，我们看到的由一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网络生成的图像中，直接引用现有图像的部分只有6%。所以，认为AI直接将人们的图像串联起来是荒谬的。也许当你进入这座新博物馆的野生展墙时，你应该感到幸运。这个博物馆分布在各个连接领域，并最终为新的机制、新的想象力和新

的创造提供了养料。所以，我就在这里停下来，也许你们有一些时间提问和讨论。谢谢。



## 7 从链接到人工智能——在超媒体梦想中的多媒体及其根源

From Links to AI: Multimedia And Its Root in Hypermedia Dreams

马克·韦伯 (Mark Weber)

翻译：许可

校译：袁孟如、张铎瀚

我是马克·韦伯 (Mark Weber)，计算机历史博物馆互联网历史项目的策展总监。我很荣幸能来到这里，也很荣幸能欢迎你们中的一些人来到计算机历史博物馆来。

人们往往认为多媒体和超文本（如网络）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只是在大致相同的时间段内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的两项技术进步。人们很少想到，它们在100多年的时间里，以有时相互冲突的方式，深深地交织在一起。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张图片来自多媒体先驱之一：保罗·奥特莱 (Paul Otlet)。他计划在20世纪30年代在日内瓦国际联盟附近建造一座世界城市，作为倡议中的全球网络中心。

## From Links to AI: Multimedia and its roots in Hypermedia Dreams



Marc Weber  
Curatorial Director, Internet History Program  
Computer History Museum

图1

首先要介绍一下计算机历史博物馆。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综合资料馆藏，包括一个向研究人员开放的媒体档案馆。我们大约40%的藏品是实物，其余为论文、视频、图像、软件和数据。我们已经进行了超过1200次视频口述历史记录。我们的永久性展览《革命：计算的第一个2000年》（Revolution: The First 2000 Years of Computing），是第一个深入介绍了在线文本世界演变的展览。我们的软件展览探讨了软件在联网和上网过程中的社会作用。我很荣幸地将李·费尔森斯坦（Lee Felsenstein）在个人计算机革命中研究的一个社区记忆终端放在了这里。

## Computer History Museum

Largest general collection of computing history materials in the world: objects, documents, software, images, data, and video

Over 3000 m2 of permanent exhibitions on the last 2000 years of computing history and on the social role of software

Leading oral histories program, over 1000 in-house plus hundreds from others

Events program with major partners

Rotating temporary exhibits on surrogate travel, autonomous vehicles, wearable computing, digital archeology, etc.



图2：计算机历史博物馆

我今天要谈的大部分内容都与多媒体和超文本有关，但我们也有很多关于交互式图形的经典历史资料，从可以玩《太空战争》的PDP1修复版，到伊万·萨瑟兰（Ivan Sutherland）1968年的第一个虚拟现实头盔。我们最大的文物是作为硅图公司（Silicon Graphic）销售总部而建造的大楼。

互联网历史项目以博物馆收藏的世界级网络和移动资料，以及早期网络历史项目收集的资料为基础。我们的目标是保存和讲述网络世界的故事、网络世界背后的人们以及那些生活在网络世界中的人们故事，从智能手机到“零工经济”（Gig economy），他们的生活因网络世界而改变，博物馆约四分之一的展厅都以网络和移动设备为主题，并通过现场活动、出版物和视频吸引广大观众。

我们目前正在筹办一个聊天机器人展览，该展览将于2024年6月开幕，非常具有现实意义，这就是互联网历史项目。图片上就是聊天机器人展览。我们不会展出这个算命的自动机，但会展出一个同类型的自动机。人们尝试让机器说话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 Chatbots exhibit – June 2024



Grandmother coin-operated fortune teller, a type of automaton or animatronic. Musée Mecanique, San Francisco

图3：聊天机器人展览将于2024年6月开幕。投币式祖母算命师，一种自动机或机械模型。旧金山机械博物馆

就图形学而言，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为美国动视公司（Activision）、美国苹果公司和游戏公司EA（Electronic Arts）测试绘画程序。这些都是让普通人制作从音乐、视频到页面设计等各种媒体工具的大趋势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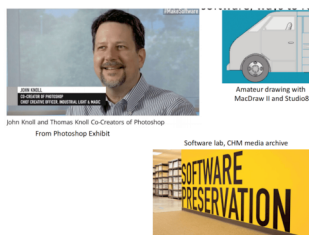


图4：左上：Photoshop创始人：约翰·诺尔（John Knoll）图源：Photoshop Exhibit（Photoshop展览）右上：使用MacDraw II和Studio8进行业余绘画 右下：软件实验室，CHM媒体档案

而这正是个人电脑革命的一部分，即为人们提供工具的理念。我们在许多其他软件中也保留了这些工具。虽然随着电脑的更新换代，人们获取工具的途径在很多方面已经消失，但在另一些方面却有所增加。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在CD ROM读取器的帮助下，个人电脑上的多媒体效果出奇的好。游戏变得非常生动。超文本通过Hypercard（一款在1987年由苹果公司推出的早期超文本系统）最为人熟知，它还可以创建交互式CD ROM。

这一切都是独立的，大部分都没有联网。但媒体的未来看起来非常丰富多彩，有越来越好的图像、声音。

直到网络出现，基本上把所有这些东西都炸回了石器时代——至少倒退了十年。

1995年，我担任了一本实验性多媒体杂志（Telecom Observer）的执行主编，合作伙伴包括《经济学人》集团、《卫报》、莱蒙德广告公司、瑞士广播电视台等。我们能将音频片段（很短的片段）整合到你可以点击的麦克风图标中，这是一项巨大的成就。我和吉姆·克拉克（Jim Clark）的电视访谈是在多媒体骨干网（M-bone）上以视频形式播出的。我不知道你们中是否有人还记得，那时互联网上的视频大概是每秒两帧左右的速度。而这并不是专业知识的限制。杂志的出版商是由让·范萨·格拉夫（Jean-François Groff）共同创办的公司，他与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共同参与发明了万维网。限制在于带宽以及随着网络发展而做出的某些选择。

Until the Web...

Telecom Observer, 1995



图5：实验性多媒体杂志（Telecom Observer）

但是，内容表现与内容传播之间的矛盾却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从音乐、舞蹈、烹饪到诗歌，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在创造不同的媒体。但事实上，语言由不连续的单词组成，因此特别容易剪切、以及快速和准确地复制。这也使它大约从5000年前开始成为编码和压缩符号的理想选择。因此，有些形式因素似乎会反复出现，右图实

实际上是一块木质书写板，上面覆盖着可擦除的蜡。不过，即使是像左图这样的泥板，也会使用交叉引用，你可以将其视为超链接的祖先。

文字可以无限地表现和复制，而不会像其他媒体那样失去分辨率。因此，任何识字的人都可以复制文字，而且错误很少，但复制哪怕是简单的插图都需要解释和技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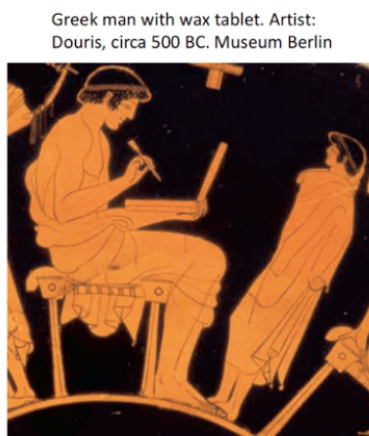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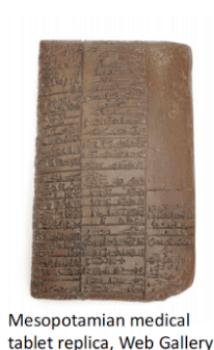


图6：左：美索不达米亚医疗平板复制品，图源网络画廊。右：用蜡片的希腊人。艺术家：Douris，约公元前500年，图源柏林博物馆

早期的印刷术也主要是为文字设计的。插图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赶上。例如，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学者在他们的文字中绘制了几何图形，如毕达哥拉斯。但大部分插图在复制时都丢失了。最后只有文字，图像被剥离。显然，印刷术、活字印刷术都起源于亚洲，到了西方的古腾堡（Gutenberg）出现时变的非常盛行。但它们并不是为插图而设计的，纯粹是针对可重复出现的字符或字母。



Greek manuscript page.  
British Museum Wikimedia Commons

First known page printed with movable type,  
1377. [Wikimedia Commons](#)



图7：左图：希腊手稿，图源大英博物馆维基共享资源。右图：第一张已知的活字印刷页，1377年，  
图源维基共享资源

因此，始于1837年的电报的光速数字通信，最初只是文本通信。19世纪的发明家们第一次捕捉到了图像、声音，甚至以电影形式展现运动。但这并不是通过电报实现的。除了电话，所有这些媒体都需要物理传输。它们完全被固定在某个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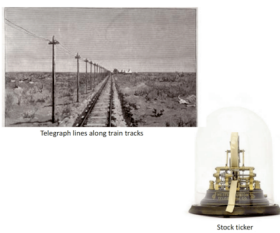


图8：左图：火车轨道上的电报线。右图：  
用于显示证券市场价格和交易信息的设备

到了20世纪20年代，保罗·奥特莱和亨利·德拉方丹（Henri de la Fontaine，他曾在比利时与保罗·奥特莱共事）等信息先驱开始梦想建立一个世界性的网络，或者像威尔斯（HG. Wells）所说的，由超链接连接的世界大脑。但是，激励这些有远见的人将世界上所有知识联系起来的那股浪潮，也驱使他们中的一些人试图将每一种媒介都包括进来，因此，不仅仅是纸张和缩微胶片（这

是当时新出现的压缩媒介），还有电报、电话、广播、录音，以及仍在试验中的电视。

右图（见图9）是奥特莱提出的类似于Mondotheque（荷兰词，直译为英语是“World Library”，中文可以理解为“世界图书馆”或“全球图书馆”）的东西。虽然不容易翻译，但对于家庭来说，其中包括一大堆小玩意儿，你将有六种不同的机器来处理不同的媒体。他坚信，你确实需要多种媒体来有效地传播知识。你可以从文字中学习，但有了动作、声音和图像，你就能获得更丰富的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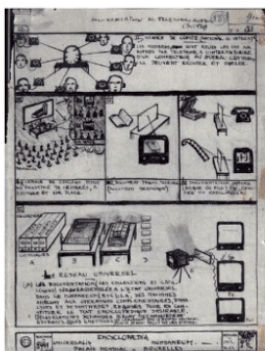
因此，他和亨利·德拉方丹利用我刚才介绍的所有技术，在布鲁塞尔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系统。他们是坚定的国际主义者，对共享信息将带来世界和平和一个普遍的黄金时代抱有极大的信心。当然，在电报、早期无线电和网络时代也有这样的人。德拉方丹还收集女权主义文学作品和小册子，是女权运动的主要支持者。在两次大战之间，欧洲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世界、一种国际主义、和平主义的活动，而这正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

奥特莱与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和其他建筑师，想要规划一座作为全球网络神经中枢的世界城市。原本计划将其选址在国际联盟附近，先是布鲁塞尔，在布鲁塞尔失去主办权后，又选在瑞士的日内瓦。因此，他们是群怀有和平国际主义情操的信息前瞻者所组成的松散国际网络的一部分。他们还在探索第一种机器可读介质。用孔洞和纸质胶片来浏览信息。这可以追溯到霍莱里斯卡片分拣机（Hollerith card sorters），IBM的卡片分拣机，或者更早的雅卡尔织布机（Jacquard loom machine）等。

## Paul Otlet and Henri de la Fontaine



Palais Mondial,  
later Mundaneum



## Mondotheque, home multimedia "terminal"



图9：左：Mundaneum：比利时的一个历史性机构，成立于20世纪初，由Paul Otlet和Henri La Fontaine创办 右：Mondotheque，家庭多媒体“终端”

这就是自动搜索的曙光，使用机器可读介质在纸上开孔，从而实现信息搜索的智能计算。伊曼纽尔·戈德堡（Emanuel Goldberg）曾在德国蔡司公司（Zeiss Ikon）工作，领导着他们的研究实验室，他们在做早期的电视、研究微点。我们以为自动搜索是最近的事情，但他早就率先使用光电池和打孔的35毫米胶片与微缩胶片页面进行搜索，这样你就可以输入一个数字代码，有点像URL或网址，它会在几秒钟内将对应的页面显示在你的屏幕上，他甚至将其内置到他在蔡司公司的办公桌上，就像一个工作站。

## Dawn of automated search



Emanuel Goldberg, Zeiss Ikon

Patent drawing for his Statistical Machine, automated search on microfil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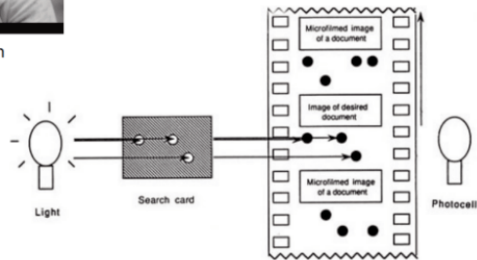


图10：自动搜索的黎明 左图：伊曼纽尔·戈德堡（Emanuel Goldberg）在德国蔡司圣像公司（Zeiss Ikon）右图：他的统计机自动搜索缩微胶卷的专利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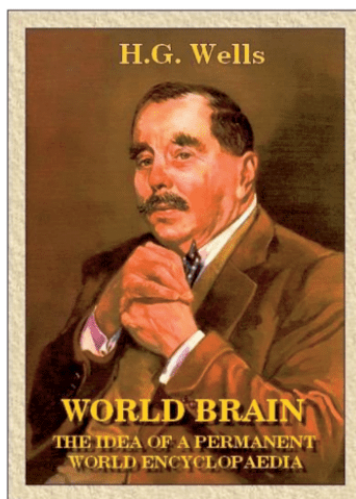
在同一时期，有两位同行也有这样的想法。威廉·奥斯特瓦尔德（Wilhelm Ostwald）是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一位化学家。在德国建造了一种叫做“桥”（The bridge）的东西，用于标准化各种格式，共享信息。

科幻小说作家威尔斯也写过一本名为《世界大脑》（World Brain）的书，他在书中提出了一套非常相似的观点，并四处宣扬这些观点。两人都对共享信息能够带来和平充满信心。

## Fellow travelers



Wilhelm Ostwald,  
The Bridge, Munich



H.G. Wells

图11: 志同道合的伙伴 左图: 威廉·奥斯特瓦尔德 (Wilhelm Ostwald), “桥”, 慕尼黑。右图: H. G. 威尔斯 (H. G. Wells) 《世界大脑》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抹去了人们对这些著作的大部分了解。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语国家的计算机先驱们只通过范尼瓦尔·布什 (Vannevar Bush) 的记忆延伸 (Memex) 概念才真正接触到了微缩胶片，这是一种在戈德堡搜索引擎基础上扩展的微缩胶片网络浏览器。戈德堡的搜索引擎基本上只有一个屏幕，你可以输入一组数字，然后得到一个类似于网址的页面，但无法在两者之间建立链接。

Memex中有两台相邻的微缩胶片阅读器，你可以在它们之间创建链接。因此，这是一个很大的飞跃。但布什是美国曼哈顿计划（原子弹计划）之父，也是美国军事科学研究的负责人之一。

因此，这些非常相似的想法来自于目标迥异的不同人士。这可能看起来有些矛盾，但我认为实际上存在一种共同的意愿，那就是前往新疆，打破理想主义者和军事研究人员之间的界限。人们昨天讨论的东西会被颠覆，这里有种想要颠覆的共同性。但我想说的是，目标仍是

关键，许多不同的人想要颠覆社会或技术秩序，但他们实际上要解决的问题却是非常重要的，尽管有着不同的目标。

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当你进入20世纪60年代的硅谷时，你会发现双方都有一种探索新想法的勇气，既是意图，也是创造。

### The Memex concep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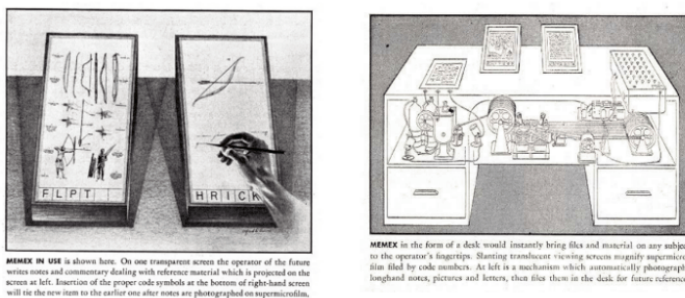


图12：美国工城师 Vannevar Bush 的记忆延伸

因此，我向你们展示了战前的资料，包括保罗·奥特莱、威尔斯等人的观点，所有这些结合媒体的想法都涉及大量的设备，复杂、精密、笨重的设备。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道格·恩格尔巴特（Doug Engelbart）、特德·尼尔森（Ted Nelson）和其他人意识到，可以做一些类似于记忆延伸的东西，这本来是用微缩胶片制作的，但现在可以使用数字计算机。你可以在一台机器上完成这一切。

被称为信息论之父的香农（Claude Shannon），证明了1和0比特可以数字化地表示任何介质，这对20世纪20、30年代的人来说并不明

显，我不认为那时的人们知道可以在同一个存储设备，即在全媒体上存储并且混合所有不同的媒体。

### Bringing a “World Brain” to computers



图13：给计算机带来“世界大脑”的人们

因此，尽管他们还不知道保罗·奥特莱，先驱们很快就开始梦想将多种媒体连接起来。泰德·尼尔森实际上就是从视频超文本的想法开始的。他对电影很感兴趣，他想让电影通过特定的地方链接到其他电影。道格·恩格尔巴特和安迪·范·达姆（Andy Van Dam），后者很早就开始研究图形学，试图在当时非常有限的计算机中尽可能多地加入图形功能。

因此，这里的矛盾在于，他们想利用计算机将所有媒体结合起来。但当时的电脑几乎没有内存，甚至无法显示简单的图形。能力非常有限。



Ted Nelson



Dream Machines, 1970s



HES (Hypertext Editing System),  
Nelson with Andy van Dam

图14：左1：泰德·尼尔森（Ted Nelson）左2：梦想机器，1970年代 右下：HES（超文本编辑系统），泰德·尼尔森（Ted Nelson）和安迪·范·达姆（Andy Van Dam）

道格·恩格尔巴特在赫曼·米勒（Herman Miller）定制的工作站上，他在李提到的“所有演示之母”中使用了这台工作站。我们博物馆里有一个复制品，是由当初参与设计的一些人制作的。



Late 1960s, Doug Engelbart at NLS Workstation, re-created by Herman Miller Inc. and Don Nielson and Martin Hardy of SRI in 2018. Reproduction at CHM

图15：20世纪60年代末，道格·英格巴特在NLS工作站，由赫尔曼·米勒公司（Herman Miller Inc.）以及SRI的唐·尼尔森（Don Nielson）和马丁·哈迪（Martin Hardy）在2018年重新创建。这是在CHM的复制品。

安迪·范·达姆不断推出越来越多的多媒体超文本。这是70年代为技术培训制作的可视化超文本系统模型。但在这一时期，计算机在多媒体方面的应用非常有限。



Electronic Document System Mockup, circa 1980. Pioneered “imagemaps” and context-sensitive hypertext

By Gregory Lloyd - Own work, CC BY-SA 3.0,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16605568>

图16：电子文档系统模型，约1980年。首创了“图像映射”和基于上下文的超文本。

因此，它们具有无限的灵活性，但资源有限。我们有很多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尴尬时期的例子，当时人们试图让计算机在内存和处理能力上做得更多。他们把模拟和数字混合在一起。这实际上是计算机出现之前的时代的（镶有缩微胶片的）窗孔卡片（aperture card）。但进入80年代，我相信一些苹果电脑公司早期的蓝图是使用这种技术制作的。

右边（图17）是一张蓝图的缩微胶片插图。这张卡片可以在电脑卡片分拣机上分拣，找到正确的图像。这是一种追踪图像振动的方法。但图像不在电脑里，它们在这个独立的麦克风上。

## Kluges



Aperture card – computer-sortable punched card with embedded microfilm image. Wikimedia Commons.

图17：光圈卡 - 具有嵌入式微缩胶片图像的可计算穿孔卡。图源维基媒体共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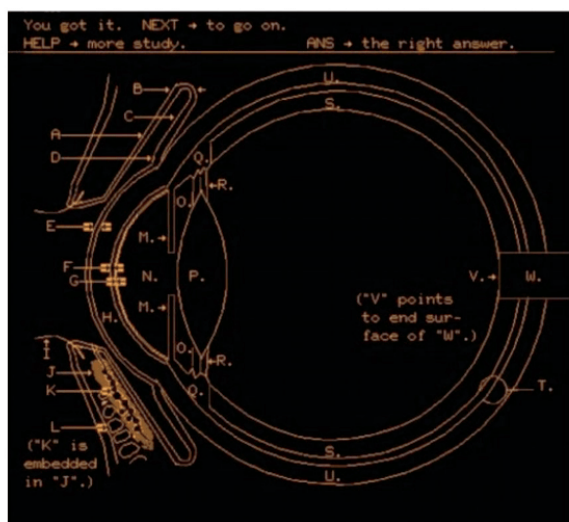
这是IBM1360，它是用化学方法存储数据的。它可以存储大量数据供美国中情局和其他机构使用。它的功能非常强大，但同样是模拟的，它的数据存储方式实际上不是数字的。



Late 1960s IBM 1360 ("Cypress") Photo-Digital Store processor. Used by the CIA among other organizations for mass storage. CHM X1385.97L

图18：20世纪60年代末期，IBM1360（“Cypress”）照片数字存储处理器。被中央情报局（CIA）等组织用于大规模存储。

1974年，电脑辅助教学系统伯拉图系统（PLATO, Programmed Logic for Automated Teaching Operations）终于配上了一个平面触摸屏，这幅图像实际上是投射在屏幕上的缩微胶片。它可以控制终端内的微缩胶片阅读器。他们还用磁性音频台以类似的方式提供音频。



PLATO screenshot

图19: PLATO螢幕投射原理

20世纪80年代初，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阿斯彭电影地图（Aspen Movie Map）将模拟视频磁盘（这些磁盘最初是为视频而设计的）连接到一台微型计算机上。这基本上就是谷歌街景地图，我们已经在我们的展览中展示过，但使用的是由电脑控制的模拟视频台。



Aspen Movie Map, Aspen Colorado, c. 1980.  
Credit: MIT Architecture Machine Group



Using the Aspen Movie map from an experimental rig

### Aspen Movie Map

图20：左图“阿斯彭电影地图”，科罗拉多州阿斯彭，大约在1980年。图片来源：麻省理工学院建筑机组。右：使用阿斯彭电影地图进行实验装置。

苹果公司的“视觉年鉴”（Visual Almanac）通过Mac控制视频光盘播放器。这是我们藏品中的一个展品。你可以在视频编辑台上看到整套百科全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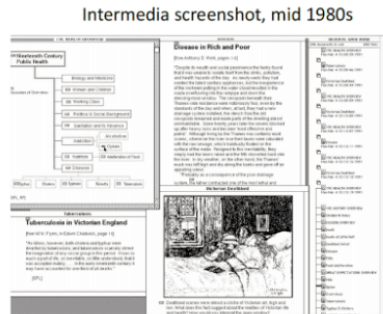


图21：计算机历史博物馆youtube视频：“Visual Almanac”的视频民族志

但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连接性与超媒体不太相容。一些人梦想通过宽带和奥地利开发的Hyper-g系统实现互动电视。互联网上也有超媒体。右图是20世纪80年代在局域网运行的具有强大多媒体功能的多媒体。但这些都是例外，而且是在大多数人无法使用的网络上运行。



Hyper-g screensho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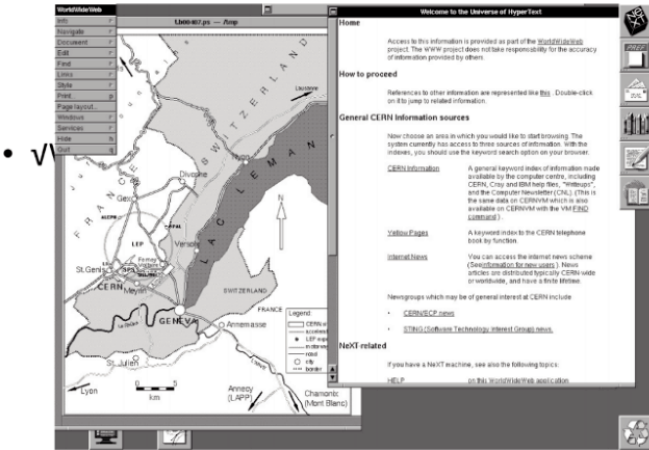


Intermedia screenshot, mid 1980s

图22：左图：Hyper-g截图 右图：跨媒体截图，1980年代中期

因此，蒂姆·伯纳斯·李在与罗伯特·卡里奇（Robert Cailliau）等其他  
人一起创建万维网时，就为他的全球网络系统规划了各种雄心勃勃的  
媒体，并将通过格式协商来处理，基本上，无论你在哪种机器上，它  
都能适应。

如果你有一台功能强大的机器，它就会向你展示精美的图形、声音或  
电影。如果你使用的是非常简单的终端或移动设备，它就会自动降  
级，向你展示它所能做的一切。但他没有时间把这些功能添加到下  
一台机器上的演示浏览器中。这是第一个浏览器，也是一个编辑器。当  
时，网络的互动性要强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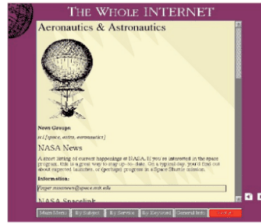
WorldWideWeb screenshot

图23：万维网截图

在资金极少的情况下，他请志愿者制作Unix浏览器。这就是他所需要的平台。他还要求他们添加灵活的多媒体功能。但最成功的浏览器Mosaic很快就添加了点阵图（bitmaps），而且只能是点阵图，很难嵌入其他媒体。因此，在过去的几年里，它基本上将非常有限的图形功能冻结在网络中。但图像无疑吸引了人们，并使它成功战胜了Gopher等竞争对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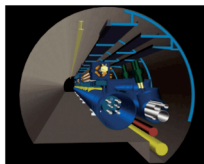
Mosaic screenshot



Viola screenshot

图24：左图：Mosaic截图 右图：Viola截图

与此同时，虚拟现实标记语言（VR Markup Language）社区正在积极推动3D网络浏览器的发展。像欧洲核子研究所组织的虚拟电脑辅助设计系统，金星（VENUS）曾在高端设备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这系统被用于开发粒子加速器。当时，这些系统只适用于拥有高速互联网和昂贵工作站的人群。而在当时，普通网民所能接触到的多媒体内容非常有限。



VENUS <http://venus.web.cern.ch/mospace.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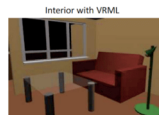


图25：左图：VENUS虚拟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 右图：VRML内部

但最终，随着宽带和MP3等更好的压缩技术的出现，网络多媒体得到了普及。这其中，Napster和其他音乐盗版网站的流行，以及成人网站对Flash的使用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最终，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网络多媒体的水平逐渐赶上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单机多媒体水平。这一过程历时很长。包括泰德·尼尔森和道格·恩格尔巴特在内的许多人从反文化的角度来看待超媒体技术，他们真切地希望通过共享知识来改善世界，并怀有对这种方式的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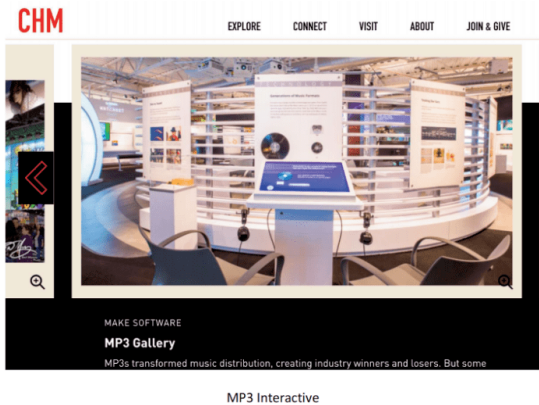


图26：MP3交互展听CHM

我希望通过这些话来展示旧金山湾区的反文化风气。60年代和70年代无疑是最著名的时期。但这实际上是来自刺耳协会（Cacophony Society），它在1990年初发起了火人节（Burning Man）活动。这是种奇怪汇聚而有的“虚拟现实”，有提摩西·李瑞（Timothy Leary）、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和刺耳协会。围绕着火人节的反文化群体与计算机行业之间的关联一直延续至今。参与其中的人各有所好，当然，你可以将它看作硅谷工业领袖的独家俱乐部。但也有一些人有着完全不同的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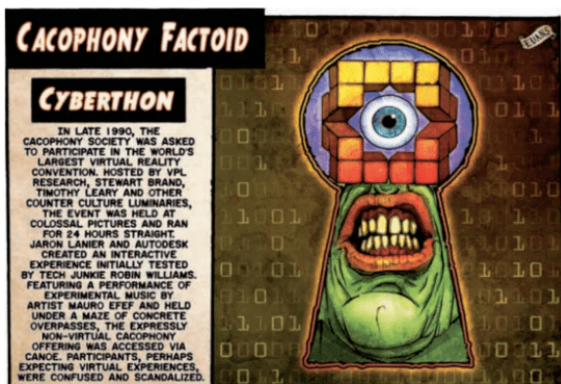


图27：刺耳协会

如今，网络多媒体在技术上终于赶上了多年前CD-ROM所能实现的水平，而用户数量已经达到40亿。然而，我要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应用程序呢？Zoom是一个百年前概念的实现，即视频会议，也是一个50年前的演示的实现。就像保罗·奥特莱在1930年所设想的视频会议，非常类似于现今人们所做的事情，并由道格·恩格尔巴特在1968年的“所有演示之母”中进行了展示。

因此，我们要想象下一个能够被实现的是什么？



Videoconferencing demonstrated, NLS, 1968

Videoconferencing imagined, Paul Otlet 1930s



图28：左图：视频会议演示，NLS，1968年 右图：保罗·奥特莱（Paul Otlet）1930年代设想中的视频会议

我们可以在线立即、廉价地混合任何媒介，分辨率非常高，但我们要怎么处理它呢？我认为真正的变数当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大多数超媒体先驱所想象的是一个人选择各种媒体并将它们结合成一种全媒体的想法。

但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就像演讲者列夫·马诺维奇说的，它将事物分解成这些小碎片，几乎是言语或形象的数据包，并重新组合它们。我认为这不过是引入了另一个因素，也就是人工智能正在做出一些决策。它更像是人和这种几乎是通道化的集体无意识形象或词汇之间的互动。所以这种技术更像是选择性地繁殖而不是设计某物。这更像是进化的过程，正如昨天一位艺术家所说的，从AI生成的众多图像中进行选择与设想某物并实现它是完全不同的。



图29: Midjourney Bot生产的图像

我认为对比在于，有一个更古老的关于脑机接口的设想，未来你可以直接在脑中想象一个场景，它就会出现在屏幕上，或者你想象出音乐。这将是一种比生成性人工智能更直接的控制方式。因为在使用生成性人工智能时，你会牵涉到人工智能，它以你可能喜欢或不喜欢的方式混合事物，并且你需要与它对话。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有趣的新篇章，在这一篇章中，我们将所有媒介融合在一起，混合它们并探索如何利用它们。

---

## Communication vs. Multimedia



**Loading**

Marc Weber

Curatorial Director, Internet History Program  
Computer History Museum

图30:本文作者联系方式



## 8 社交媒体：从反文化走向未来

Social Media: From Counterculture to the Future

李·费尔森斯坦 (Lee Felsenstein)

翻译：蔡泽锐

校译：黄孙权

首先，我必须解释一下，我不是学者，我是一名工程师。因此，我不会试图去做一些基于事实的断言。我将提出一些说法，并邀请每个人根据实际情况来检验这些说法。因为在工程领域，你总是在工具不完善、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工作，而且还必须产生一个能够满足必要功能的结果。而这始终是一个猜想的过程。因此，我邀请大家在此基础上对我和我的论断进行评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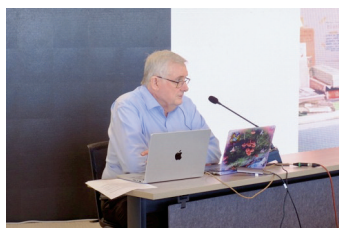


图1：Lee Felsenstein 在第八届网络社会年会现场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张照片（图2），我把它称为社交互联网的起点。1964年，我在伯克利的言论自由运动（Free Speech Movement）办公室违规拍摄了这张照片<sup>[1]</sup>。现在这个场景看起来并不那么计算机化，因为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计算机，只有电话。它看起来也不是很整

洁，效率也不高。但是在这种低效中，我认为产生了一个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结果。我们可以（在图片中）看到人们正在忙着接听电话。那个时候办公室里只有两部电话。墙上的物品构成了一个数据库，随着人们的电话呼叫而不断变化。今天，在一家管理良好的公司里，电话室会井然有序，发送出去的信息或传输进来的信息，会被记录、分类整理，并传递给必要人员，信息双向流动，一切都条理分明，因为商业运作依赖于这一点。



图2：言论自由运动中心的电话室

这里发生的情况与此不同。人们以各种原因打电话过来。有时他们想要传达信息。有时他们需要解答问题。有时他们想提供资源。我记得在其中一份布告中，有人提供免费理发。因为那时候我们正迎来一个假期，人们回家见父母之前通常都需要理发。而且他们还为其取了个名字，叫做理发中心。当时我们有一个做法就是给所有事物都加上“中心”。这里（图2）是在言论自由运动中心内。通过这组电话、桌子和这些人，各种联系都在建立。可以想到，你不能随便地让人进到办公室。信息不仅仅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也展示在墙上。之所以说这对1964年和未来都很重要，是因为它是校园社区形成机制的一部分。伯克利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在那个年代，伯克利大学有2万名学生。今天则有3万了。当时它因人际关系疏离而臭名昭著。当你来到

学校，在熙攘的人群中，你是孤独的。你不认识任何人，其他人也不认识你，也不在乎你。当我到了伯克利大学的时候，我其实很喜欢那种氛围，但我是个特例。

## Counterculture to Social Media

- Telephone room at Central Office of the Free Speech Movement
  - Berkeley, 1964
- Student protest against University's suppression of rights to organize in support of Black Civil Rights Movement
  - Students created an alternate information structure which included telephone information exchange
    - Offers of resources, assistance posted
    - Questions and suggestions
    - Notification of projects (often unapproved)

图3：反文化到社交媒体

和我们昨天从意大利教授那里听到的情况相反<sup>[2]</sup>，自由言论运动所围绕的问题是，在当时民权运动正在向北方拓展的背景下，大学行政管理部门想要压制学生们组织支持运动的能力。事实上，1964是一个特别的年份，因为在1964年夏天，自由之夏（Freedom Summer Project）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他们尝到了密西西比和阿拉巴马州普遍存在的恐怖主义<sup>[3]</sup>。之后有一些学生返回了，有一些没有。返回的这些人就好像是从战场回来的老兵一样。我还记得那种感觉。不是说我有这种感觉，而是那些人身上有，你能明显地感受到。

当时，学校颁布了一项新规定<sup>[4]</sup>。这些学生团体在校园外摆起了桌子。人行道上有一面海报墙。成千上万的人在进出校园的路上蜂拥而过，他们可以在这些桌子上获取信息，捐款，还可以报名参加各种活动，包括当年在旧金山共和党全国大会长廊中举行的示威活动。当然，这背后也是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运动先驱的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和一个名叫斯克兰顿（Scranton）的温和派之间的争论。当地的政治领袖站在MAGA—

方，他对学生在这些桌子上被招募到旧金山去参加大会，并抗议他的候选人感到不满。我们理解，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他和其他人对管理层施加了压力，因为当时还在抗议就业歧视，有一些静坐示威，局势相当混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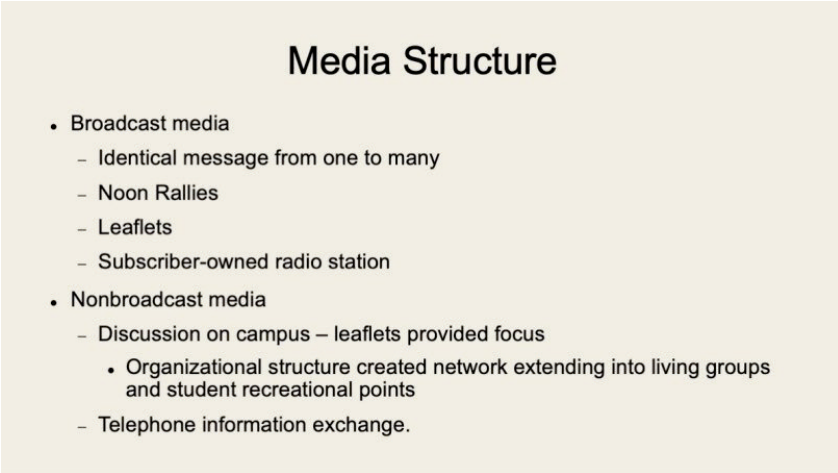
因此，大学正面临来自外部的压力。他们发布了这项规定。但那完全是错误的时机，再次强调，因为公民权问题并不遥远，不仅存在于南方，而且已经直接逼到我们的门口了。从“自由之夏”回来的学生们都深度参与其中。因此，所有学生组织，无论是从极左到极右，从被摧毁的进步劳动党（Progressive Labor Party）到自由主义者。后者是类似个人主义者协会（Society of Individualists）之类的组织，他们的政治立场属于校园中的右翼，包括年轻的共和党人和加州政治行动保守派（Cal Conservatives for Political Action）。他们都团结在一起，形成统一战线来面对这个问题并进行抗争。而由于大学发现他们实际上拥有靠近路缘的人行道上的土地，我们无法将桌子搬出去。因此，桌子必须搬进校园内。我们采取了经典的公民不服从策略，即“填满监狱”。

我们在行政大楼前摆了桌子。如果在校园的任何地方都会被视为非法，那么这里是一个不错的地方。院长们会出来登记学生的名字以便进行处分。一旦他们登记了一个人的名字，另一个人就会站出来，包括我也被登记了。最终，在那一天，当学生被叫到院长办公室时，有150名学生出席。学校领导想要惩罚我们，但没能做到。第二天，也就是1964年10月1日，抗议活动继续进行。第一个非学生被指控。这对学校来说是一个幸灾乐祸的机会，因为去年通过的一项法律规定，任何未注册的学生或教职员工进入校园都将受到刑事处罚。他们抓到一个，也因此做了可能最愚蠢的事情。中午的时候，就在人群即将涌入的前不久，他们开来了一辆警车，然后把这个人，杰克·温伯格（Jack Weinberg）抓进了警车。你能想到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吗？所有人都开始坐下，把警车包围住。事态越来越严重，一直持续了32个小时。最终双方谈判，达成了协议。

我们持续了两个月，直到最后在学校大楼进行了一场高潮迭起的静坐示威。我参与其中，当时有784名学生被捕。教职员工震惊了，他们

认识到了局势的严重性。几天后，在他们的教师联盟中，以80%的支持比例投票支持学生的立场。这为获得政治支持提供了基础，导致大学的所有者，即董事会，做出让步并表示不会干预这件事了。因此，突然之间，校园对于任何类型的学生活动都持开放态度，无论是否经过大学的批准。在此之前，除非经过批准，否则你不能在校园里发传单。而现在你可以分发任何东西。

## 媒介结构



**Media Structure**

- Broadcast media
  - Identical message from one to many
  - Noon Rallies
  - Leaflets
  - Subscriber-owned radio station
- Nonbroadcast media
  - Discussion on campus – leaflets provided focus
    -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created network extending into living groups and student recreational points
  - Telephone information exchange.

图4：媒介结构

我想在这里谈一谈媒介结构的问题，因为这引起了我的思考。不是说它让我现在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而是从1964年开始我就已经在思考这个问题了。当时我是工程系的学生。我坚持一种观点，一种模糊的左翼观点，认为我未来的任务将是自动化和取代劳动力，这将在某种程度上推动社会进步。因为我没有课上，也没有作业，所以我就想去言论自由运动办公室工作。在那六个月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校园里工作。我的目标是找出作为一名技术专家所能做的事情，因为这就是我认为我所能做的一切。我无法改变人们的思想，但我可以制造东西。我稍后会讲到那时候发生的事情。总之结果就是我走上了一条探索之路，试图找到哪些媒介技术是有效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1965

年1月，12月是学年的末尾。当时的校园非常热闹。各种各样的人在  
不同领域里创作。这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这是反文化的开端，尤其  
是在旧金山湾区。过去也有过反文化，但我们这里讨论的是20世纪  
60年代的反文化。我写了些小文章，有人发表了。当然，年轻的工  
科学生一般不会这么做，我们通常都保持沉默。但人们不再保持沉  
默，也不再待在一个地方。事实上，当时估计有数千名学生辍学，离  
开了大学，出现在海特阿什伯利之类的地方<sup>[5]</sup>。他们形成了自己的社  
区。这是一切的关键。

我想在这里回顾一下媒介结构。在那前后不久，我对媒介进行了分  
析，将其分为两类：广播媒介和非广播媒介。广播媒介由单人向多人  
传播相同的信息。可以是印刷品，不一定非得是电磁传播。它可以在  
午间集会上进行。我们几乎每天都有午间集会。成千上万的人们会听  
到关于当前危机的消息。我们分发传单。我也帮忙制作了些传单，那  
是我能做的事情之一。人们早上来到校园，拿着我们分发的传单。他  
们冒着违纪的风险走出去分发。大家都知道（分发未经大学批准的出  
版物违反了学生行为规则）。每个人都成了讨论的焦点。人们会走过  
来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发生了什么事？你们怎么看？我们  
在伯克利还有一个订户所拥有的广播电台，我认为这推动了整个进  
程，因为我们有了一种反馈循环。我们可以把信息传递到那个电台。  
它是非商业性的，由像我们这样的人运营着。

非广播媒介是围绕着传单发放者展开的讨论。我们建立了一个组织结  
构，有一个庞大的执行委员会，实际上它并不是执行性质的，但它有  
来自所有生活组织和其他组织的代表。这提供了一个双向信息通道。  
这些人参与制定政策，还有一个由他们选举产生的指导委员会，负责  
处理日常决策。在斗争过程中，实际上有一些指导委员会成员被替  
换，这在革命组织中有点不寻常。但我们建立了一条和所有选民保持  
联系的途径。我们还有在学生娱乐中心和艺术工作室工作的人。他们  
在那里进行讨论。我们利用电话系统进行信息交流。这也算作非广播  
媒介。

## Media Structure - cont'd

- Telephone
  - Symmetric, universally accessible
  - Questions, suggestions, offers of help and resources, project proposals.
  - “Cross-Connection” process – built community
    - Notes on wall used for data storage and retrieval
    - “Secondary information” was exchanged at conclusion
      - telephone number or address
    - “Primary Information” exchange was end result
      - Content of intended information exchange.

图5: 媒介结构

电话是对称且普遍可用的，至少我们当时是这样的。我在一开始已经讨论过人们（通过电话）提问、给出建议和提供资源。至于这整个过程，我称之为交叉连接（Cross-Connection）。这确实是一个电话技术术语。电话系统中的电线被组织得整整齐齐，直到必须从一组电线交叉连接到另一组电线，就开始混乱了，几乎没有办法做到整洁。所以墙上的纸条是一团糟，但那是交叉连接。这里的情况是，你不能像这样在电话室里进行实质性讨论。他们不得不缩短时间。你可以将信息分为两种形式，即主要信息和次要信息。主要信息是你需要传达的内容，即讲稿、整个故事。次要信息是他们需要联系的人以及如何联系他们，以获取整个故事。因此，电话室交换的是次要信息，而这是有效的。

## 言论自由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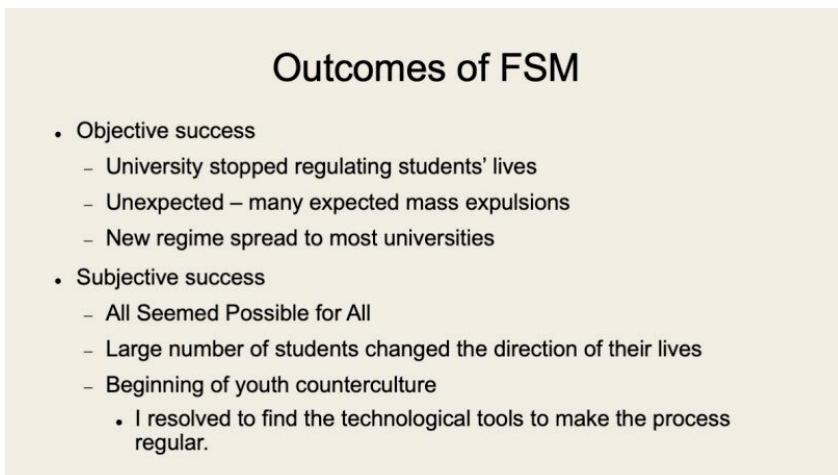


图6: 言论自由运动的成果

我提到，从客观的角度来看我们取得了成功，然后便迎来了1965年1月的奇迹。几个学生创办了一本令人瞠目结舌的新杂志，也是《滚石》杂志的前身，他们在桌子上悬挂一只巨大的蜘蛛移动装置，以此来做广告<sup>[6]</sup>。好吧，他们不得不拆下那个移动装置。我们同意在时间、地点和方式上有规定是可以的。但我们的立场是，“要么言论自由，要么战斗”，即校园内的言论是应受到美国宪法——特别是第一和第十四修正案——的约束。稍后我可以用法律术语来解释，现在不太值得。但如果你有这样一个漂亮口号的时候，你就会有所收获。我提到了人们如何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向。我也是如此。那是一种神奇的感觉。我希望生活一直都是那样。结果就是要找到技术工具使这个过程规范、合理。但我发现，这将是一项耗费毕生精力的工作。

## Counterculture media development

- Telephone information exchanges (“switchboards”) 1965 - 1969
- “Underground Press” develops 1965 -
  - Now called “Alternative Press
- Subscriber – owned radio grows 1949 -
  - First such station in Berkeley (KPFA)
- Computer students begin project to bring computer power to counterculture (S.F. “Resource One”) - 1970
  - I join, bringing idea of computer-based information exchange - 1971

图7: 反文化媒体的发展

电话信息交流在反主流文化中仍在继续。我们过去叫总机。这不是正确的电话术语，但不重要。到了1969年，所有的电话总机都被列了出来，原因多种多样。给他们打电话，你就能联系到他们。

我刚才提到的地下刊物从1965年开始报道反战示威活动，因为那一年越战愈演愈烈，所以反战活动随之而来，并在言论自由运动的推动下成为可能。现在，它被称为另类刊物，并且仍在继续，没有结束。这些报纸是从家庭和小办公室出版的。我相信它们可以成为社区媒体。所以我投身其中，从事写作。我在那里学到了新闻业的相关知识。我还看到了媒体结构所造成的后果。它们充斥着广告、个人广告、性广告，还有性问题的展示广告。它们为出版商赚了很多钱，但它们不再是社区媒体了。

于是我了解到KPFA是一家由和平主义反战抗议者于1949年创建的订户拥有的电台，这些人在战争期间曾因反对战争而被监禁，或者被迫做一些政府服务。他们认为媒体需要改变，于是决定设立一家由听众拥有的电台。当时FM波段，即频率调制波段，刚刚开始开放。因此，还没有听众。所以他们不得不创造自己的听众。他们需要自己制造收音机并提供给订户。最后也确实做到了。

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开始了一项计划，将计算机的力量带入反主流文化中。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也是我之后的发展方向。他们成立了一个组织，实际上是接管了一家总机的公司外壳，即旧金山的一家快没落的总机，他们在1970年将其成立为“资源一号”（Resource One）。我大约在同一时间听说了他们，而我也在那个时候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即我正在寻找的是一个计算机网络。那是在1970年。你不能随随便便就去买一台计算机。那可是一件大事。我记得当时我在想：我去哪里弄一台计算机呢？

一年后，我加入了“资源一号”小组。他们获得了一笔长期贷款，实际上是获得了一台大型计算机的捐赠<sup>[7]</sup>，而且这台计算机正是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在1968年“演示之母”中所使用的机器。在那次演示中，他展示了个人使用（大型主机）计算机的方式。那真是一项天才般的工作。那次演示改变了我对于计算机能做什么以及如何做的看法。

# 公共广场

## Observations

- People need a functioning community for fulfilling life.
- “Community” is group of people who communicate on a regular basis.
- “Agora” is the place where information exchange occurs in public – people gain knowledge of others.
  - Feature of functioning communities from antiquity or before.
  - Village square, Roman forum, Renaissance piazza e.g.
  - Cultural evolution has embedded the need for agora function in the general consciousness.

图8：观察

现在，我想说说我的一些观察，但同样也是值得商榷的。人们需要一个正常运转的社区，才能过上充实的生活。关于人们如何从新石器时代的村落中发展起来，我有一整套的讨论，但现在我不想讨论这个问题。社区可以定义为定期交流的一群人。现在，我要介绍一下“公共广场”（agora）这个词，这不是一个新词，它源自希腊语，即白天大家聚集的场所<sup>[8]</sup>。它的名字来源于“agon”，即摔跤手在相互搏斗时感受到的痛苦。因此，一般来说，公共广场是公开进行信息交流的地方。这一点非常重要。人们可以了解其他人是谁。因此，他们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这就是社区形成的地方。从古至今，我们在每个社区都能看到这一点。有趣的问题是，这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我的意思是，比方说，在一个新石器时代的村庄里，文明是在那里发展起来的，但不是在房子里。文明是在房屋之间的空间发展起来的，那就是公共广场。你会发现乡村广场、罗马广场、文艺复兴广场、荷兰平原，它无处不在。文化进化比生物进化更迅速，通过文化进化，对公共广场的需求被内化到我们每个人中。当然这只是我的假设，我还不能说我已经证明了。

## Evolution of Agora

- “Commons of Information”
  - Subject to capture, enclosure and exploitation
  - With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Agora became the mass media
- Counterculture is based upon original model of Agora
  - First social media system - “Community Memory” (1973 - 1992) proved that users would generate content.
    - “...Opened the door to cyberspace and found that it was hospitable territory” (LF)
  - Personal computer development attempted to serve this earlier model
    - “Hands-on Imperative” (S. Levy, 1984)
    - Open Source software development
      - Unix programmers required use of networks for “UUCP” social media
    - Close involvement of user community in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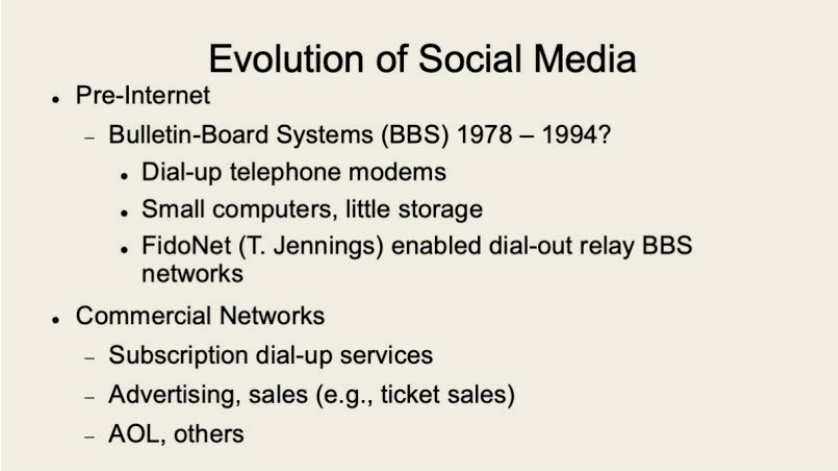
图9：公共广场的演化

我所指的公共广场也就是信息公地。实际上，我在尝试着给它下定义。就像所有公地一样，它可以被攫取、利用和圈占。英国的农业公地等都受制于此，那也是资本主义的开端。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公共广场。首先，识字、印刷，人们可以把东西写下来，读给别人和自己听。你必须为此付出点什么，所以它开始私有化。如今，我们的公共广场已经变成了大众传媒，这是一种广播现象。而我所说的公共广场是非广播的，这就是问题所在。同时也正是必须做出改变的地方。

因此，我们建立了第一个社交媒体系统。1973年，“资源一号”启用。在理查德·格林布拉特（Richard Greenblatt）等黑客的帮助下，我们开发了一个信息检索系统，它不受制于一套预设的索引词。你可以创建自己的索引词。只需要输入就好了。机器负责记账，我们设置了终端，技术上不需要预装数据。我们确实为此做了一些工作。但除此之外，所有的媒体、所有的内容，这些被称为内容的神奇东西，都是由用户自己提供的。我们没有进行广告宣传。我们只是简单地把它放置在一些人们经常光顾的地方。我们必须相当谨慎地选择放置的地点，同时当我们将其迁移时，我们发现其他另一些人会使用它。

它成功了，人们确实使用了它。而我们曾经假设只会有比如工作、住房和汽车的类别，这么猜想的一部分原因是大学的纸贴布告栏被划分

为这些类别。但这一设想被打破了，实际上有许多分类，其中包括学习交流对话。我们可以看一下伊凡·伊利奇（Ivan Illich）的著作，在这里提及是因为他对我而言很重要，他在1970年或1971年写了一本关于去学校化社会的书<sup>[9]</sup>。在书的最后，他说：“那我们可以有什么替代学校的東西呢？也许计算机可以用来连接了解某些事情的人和想要学习它们的人”。



## Evolution of Social Media

- Pre-Internet
  - Bulletin-Board Systems (BBS) 1978 – 1994?
    - Dial-up telephone modems
    - Small computers, little storage
    - FidoNet (T. Jennings) enabled dial-out relay BBS networks
- Commercial Networks
  - Subscription dial-up services
  - Advertising, sales (e.g., ticket sales)
  - AOL, others

图10：社交媒体的演化

我们中的有些人在数据库中输入了一个条目，询问在湾区哪里能找到好吃的贝果？我必须解释一下，贝果是一种环形面包卷，烤制的面包卷。我感觉这是中国人的发明，我不太确定。后来它成为了犹太特色，主要分布在东海岸，而在旧金山你很难找到它们。于是有两个答案出现了，其中一个直接告诉你可以在哪里买到。而另一个答案则脱颖而出，它说，如果你拨打这个电话号码并询问这个名字，一位前贝果制作者会教你如何制作贝果。我们没有弄清他们是否真的这样做了。我想说的是，我们打开了通往网络空间的大门，并发现这是一个热情好客的领域。个人电脑是在这样的氛围下诞生的。我们需要能在公共场合使用的终端。而我就是硬件工程师。我对软件一窍不通。于是我开始了一项调研，为1975年个人电脑的到来做好准备。我们

还在其它地方看到社交媒体的发展。例如使用电话的公告板系统以及常见的商业网络，这些我都先跳过不讲。

## Social Media as Business

- Capitalism requires large, fast returns
  - Minimal development, maximal public engagement
  - Biggest reward is for addictive engagement,
    - Selling user's attention to advertisers or purchasers
    - “Silos”, “Tribalism”, Distortion of the Polity
    - Distraction of attention
    - Limitation of navigation – following preset channels
      - “Papyrus Scroll” model for browsing

图11: 作为商业的社交媒体

对于之前提及的各个例子，人们都会合理地问，你们做这个赚了多少钱？答案是我们没赚到钱，反而花了钱。对于那些朝着创收的方向发展的人来说，一旦他们赚到钱，他们就停滞发展了。而我们的目标是继续推动这方面的发展。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社交媒体已经产生了许多问题。部落化、话语孤岛化、政体扭曲——我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在美国正在经历这些——以及注意力分散。大多数社交媒体系统中存储信息的技术模型是纸莎草卷轴。这并没有比埃及人更先进。我可以与任何人私下讨论为什么是这样。

## Alternative Direction

- Design media to support human Agora functionality
  - Conversation in fluid groups
  - Small enterprise support
  - Spirit of play, spirit of inquiry
  - Re-Creation
- Regulation necessary for all functioning commons
  - New social inventions required for regulations
  - Journalism as necessary function (B. Poerksen)

图12: 另类方向

因此，我们需要能够规划出一条替代性的道路。我们还需要研究如何管理信息公地。每个公地都必须要有管理。如果公地要生存下去，它就必须有机地发展。有些人写书说：“哦，公地会有悲剧，因为每个人都会贪婪地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不，不，那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说话。那不是像渔业、农业这样的历史性公地，这些公地都有自我管理的程序。我们也需要为信息公地发明自我管理的程序。

## Old Institutions – New Uses

- Public Park System
  - Accessible to all, purpose is regeneration of the self
  - Venue in which it is common to encounter others
  - Outgrowth of original physical Agoras
- Librarians as information mediators
  - Human judgment irreplaceable (Sorry, AI)
  - Trusted resources to assist in finding connections
  - Professional environment, economic support.
    - Training and supervision of advisers offering suggestions for searches under subscription model
    -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currently regulates the Internet.

图13：陈旧机构——新奇用途

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认为我们必须有一个叫监察局的东西。这些人有权进行调查，但无权采取任何行动。一位名叫波克森（Porxsen）的德国教授在写一本书《数字狂热》，他联系了我，请我写一篇序言。他说这就是新闻学。这正是我们所缺少的。他是对的，我们需要真正的新闻报道。我建议采用公共公园的模式。人们会说，那公共公园将如何收回成本？如何自给自足呢？它们不需要。但它们发挥了许多凝聚集体的功能。多年来我一直在说，信息公地的天然监护人是图书馆员，或者至少是受过这方面教育的人。还有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几十年来一直志愿工作，以保持互联网的正常运行，尽管一直有不同的私人机构试图接管它，但都被成员们拒绝了，因为这是工人的权力。这些都是从事真正工作的工程师。他们不会让别人告诉他们该做什么。

我的演讲已经接近尾声。我会努力继续我的工作，现在有人问我：“你不后悔吗”？我不后悔。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指明方向，而这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交媒体的发展方向。他们会做自己的事情。我对阻止他们不感兴趣。我们也无法阻止他们。我们必须提供自我管理信息公地的结构、文化和实践。我能为此做点什么，我相信你们也可以。谢谢大家。

## 注释

[1]言论自由运动 (Free Speech Movement) 是1964-1965年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学生领导的一场争取学生及公民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民权运动。可参见李·费尔森斯坦于1998年创建的自由言论运动档案馆 (<https://www.fsm-a.org>)。

[2]指的是Franco Bifo Berardi的演讲, 参见: <https://www.caa-ins.org/archives/11757>

[3]1962年, 密西西比州只有5.3%的非裔美国人登记投票。自由之夏是1964年6月由联合组织理事会 (Council of Federated Organizations) 策划的美国志愿活动, 目标是推广密西西比的非裔美国人的投票登记。这些非洲裔美国人由于选民登记及其他法例的限制, 一直无法获得投票权。计划参与者包括密西西比黑人以及超过一千名来自另一个州的白人。活动其间, 参与者受到三K党、警方、州政府及当地政府的暴力袭击, 包括殴打、纵火、非法拘捕。三名参与者遭到谋杀。这个计划同时也在密西西比的小镇设立许多自由学校、自由之家以及社区中心, 以帮助当地的黑人。

[4]1964年, 在美国反越战和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等大背景下,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些学生开始在校园内开展相关宣传、筹款等政治活动。1964年9月, 学校教务长 Katherine Towle 宣布禁止在校园内进行非学校性政治活动 (off-campus political activities), 引发学生不满。

[5]海特·阿什伯利区是美国60年代嬉皮士文化的发源地。其为60年代爱之夏 (Summer of Love)、权力归花 (Flower power) 等社会运动, 以及死之华乐团 (Grateful Dead) 的发源地, 如今仍是旧金山拥有丰富历史的知名景点。

[6]蜘蛛 (Spider) 是性、政治、药物和摇滚 (Sex, Politics, Drugs and Rock-and-Roll) 的扩展缩写

[7]这笔经费, 来自《全球概览》停刊的“发钱派对”。

[8]阿哥拉 (古希腊语: ἀγορά) 是古希腊城邦的中心公共空间, 节日、聚会和市集所在地。

[9]Ivan Illich. (2000). *Deschooling Society* (New edition). Marion Boyars Publishers Ltd.

## 9 计算（学）的反历史

Counterhistories of Computing

罗德里戈·落龟 (Rodrigo  
Ochigame)

翻译：张铎瀚

校译：黄孙权、崔雨、卢睿洋、蔡泽锐

编者注：本演讲原配图几乎均为演讲者在研究过程中收集或拍摄的一手图片，由于未经版权方/当事人授权，故演讲者决定不在发表演讲文稿时使用它们。所以本文配图由编者搜集自网络。

感谢大家的光临，感谢主办方的邀请和接待。你们的热情好客以及你们在此建立的宝贵的知识联系令我印象深刻。

计算（学）的历史通常是以这样的方式被讲述的：在大都市中心强大机构的支持下，有影响力的参与者会享有特权。主流历史侧重于已成为主流的计算模型。有些计算模型在当下是如此占有主导地位，以至于它们甚至常常被视为普世模型。今天，我想向大家展示的是，即使是最基础的计算模型也不具有普遍性，它们可以以完全不同的方式重新被想象。为此，我将提供计算机计算的反历史。我将重点关注那些想象并开发出非正统计算模型的外围参与者，这些模型曾被忽视、压制或边缘化。

我将考虑四种主要计算模型的反历史，所有这些模型都被无处不在的数字技术所采用。最基本的是数理逻辑。每个计算机程序或算法都是由一系列逻辑运算组成的。另一种是图灵机（Turing machine），即用0和1进行二进制计算的抽象模型，它是所有现代数字计算的基础。我还将考虑信息模型，特别是信息检索领域的模型，这是所有现代搜索引擎（如谷歌或百度）的基础。最后是语言模型，例如用于机器翻译或是像ChatGPT这样的对话自动机（conversational automata）。这些模型都基于一定的假设。数理逻辑倾向于假设绝对的一致性：一则语句非真即假。图灵机是为绝对确定性而设计的：每个算法都有确定的输出，即0或1。信息检索系统追求一种中立性，它们不想被视为政治党派之物。而语言的计算模型历来试图将语言的诗意层面搁置一旁。即使模型的输出结果可以用诗意的方式来解读，诗意也不会被明确纳入模型之中。

因此，我将向大家介绍四段计算（学的）反历史，它们分别对上述假设提出了挑战。



图1: 牛顿·达·科斯塔（Newton da Costa），巴西数学家、逻辑家和哲学家。

## 1.巴西

我的第一个故事是关于非经典逻辑系统在巴西的涌现。

这位是牛顿·达·科斯塔（Newton da Costa），巴西数学家，非经典逻辑领域的先驱。这一领域研究的数理逻辑体系挑战了对“绝对一致”和“真假二元”划分的经典承诺。达·科斯塔发展了一种著名的非经典逻辑，称为次协调逻辑（paraconsistent logic）。次协调逻辑是“那些允许以非平凡（non-trivial）方式从不一致信息中进行推理的逻辑”。

在一个次协调系统中，命题P和它的否定P可以同时为真。但不是任何命题都适应这种情况，因为如果是这种情况，逻辑系统就会是平凡的。因此，次协调逻辑是一种只有某些命题而非所有命题可以不一致的逻辑。简而言之，次协调逻辑允许部分矛盾。

这很抽象。但我想知道这个部分矛盾的观念是从何而来。

几年前，我采访了牛顿·达·科斯塔。他当时已经90岁了，可以说仍然是拉丁美洲最有影响力的逻辑学家。采访持续了数日。

我们见面的第一天，他给了我一本葡萄牙语诗集，书名是“Paraconsistência”（即paraconsistency：次协调性），署名是一位名叫拉斯（Lars）的作者。他告诉我，拉斯想见我，但不能亲自来。

书中的诗歌通过部分矛盾的视角，触及了从爱与死亡到上帝的存在等内在话题。拉斯在书的背面写道，他的灵感来源之一是次协调逻辑：“在我们这片荒芜之地（wild land）上，有人想出了一种能够处理矛盾、混沌和超复杂（the ultra-complex）的方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研究了牛顿的个人档案之后，我开始怀疑这些诗歌是牛顿自己写的，拉斯是他的化名。当我向他询问此事时，他笑了笑，但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从那以后，在我们的通信中，我请牛顿代我向拉斯问好。我从他们二人那里都得到了消息。

将世界视为“矛盾的”、“混乱的”和“超复杂的”，或将巴西视为矛盾尤为突出的“荒芜之地”，达·科斯塔并非孤例。



图2：《食人者宣言》由巴西诗人和论战家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发表于于1928年，其文风接近诗歌散文。

事实上，这些都是巴西现代主义艺术、文学和哲学的常见套路。达·科斯塔和他的同事深受巴西现代主义运动的影响，我追踪了数学家小组与现代主义艺术家、作家和哲学家之间的许多联系和互动。巴西现

代主义者经常认为，形式逻辑不适用于巴西矛盾的社会现实。例如，1928年的“the Manifesto Antropófago”（即《食人者宣言》）声称：“我们从未允许逻辑在我们之中诞生。”塔尔西拉·多·阿马拉尔

（Tarsila do Amaral）的这幅画与宣言相呼应，画中的人物头部很小，代表了对逻辑的拒绝，是一种反殖民主义的声明。达·科斯塔和其他数学家一致认为，形式逻辑，至少是西方古典形式的形式逻辑，与社会现实的矛盾是不相容的。因此，他们希望将允许矛盾的数理逻辑形式化。

这种逻辑对人工智能项目产生了影响。巴西的研究人员意识到，如果不超越经典逻辑，可能就无法模拟人类智能。对于提出次协调概念的逻辑学家来说，经典逻辑不是普遍的，而是非常特殊的。它只是无限多种可能的逻辑形式之一。此外，古典逻辑并不反映任何人的推理模式。无论主体是科学家还是普通人，是欧洲人还是美洲印第安人，实际存在的理性都是次协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次协调逻辑学家们提出了自己的另一种普遍主义计划。他们坚持实证主义的假设，即逻辑形式主义以某种方式可以把握理性的基础。但他们超越了最初的计划，从绝对一致性的规范性理想转向对人类理性倾向，人类推理的无尽多元表现的彻底包容的描述。

并不是只有巴西数学家们想象出了非二元的逻辑与计算形式。现在，让我们将目光投向另一个来自世界另一边的故事：后殖民时期印度对非二元图灵机的想象。

## 2.印度

印度摆脱英国殖民统治正式独立后，计算机成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眼中对理性的后殖民国家的愿景的一部分。位于加尔各答的印度统计研究所是数字计算机的主要项目中心，该研究所由孟加拉统计学家P. C. 马哈拉诺比斯（P. C. Mahalanobis）创建并长期领导。

20世纪50年代初，马哈拉诺比斯和他的员工开始寻求进口或制造印度的第一台计算机。到1953年，印度统计研究所设计出了一台模拟

机，它可以求解多达十个变量的联立线性方程，其材料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剩余物资的废料堆中抢救出来的。



图3：P. C. 马哈拉诺比斯是印度科学家和统计学家，被称为印度统计学之父

尼赫鲁来看了这台机器，马哈拉诺比斯强调说“我们自己制造了它”。马哈拉诺比斯立即开始研究通用数字计算机的可能性，同时向美国和苏联寻求帮助。历史学家尼基尔·梅农（Nikhil Menon）发现的机密文件显示，由于美国国务院认为马哈拉诺比斯同情苏联，因此努力阻止他获得技术援助。在此期间，马哈拉诺比斯从印度哲学中寻找逻辑和统计的替代模型，这些模型后来激发了人们对不同类型计算机的想象。

在1953年的一次统计学研讨会上，马哈拉诺比斯提出了“印度-耆那教 syādvāda 理论中的一些观点，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

什么是 syādvāda？根据哲学家乔纳尔登·加内里（Jonardon Ganeri）的观点，syādvāda 可以理解为一种断言条件化的理论（a theory of the conditionalization of assertion）。该理论建议在任何陈述中使用小品词“syat”作为其条件，加内里将其翻译为“somehow”（以某种方式），马哈拉诺比斯将其翻译为“may be”（或然）。古梵文典籍中对该理论有多种说法。有些说法包括对陈述类型或谓词模式（saptabhangi）的“七重划分”（sevenfold division），这是马哈拉诺比斯分析的重点。他将其称为“逻辑”或“辩证法”，并将其七个类别翻译如下：

(1) <i>syādasti</i> <sup>1</sup>	= may be, it is.
(2) <i>syātnāsti</i>	= may be, it is not.
(3) <i>syādasti</i> <sup>1</sup> <i>nāsti</i> <sup>2</sup> <i>ca</i>	= may be, it is, it is not.
(4) <i>syādvaktavyah</i> <sup>3</sup>	= may be, it is indeterminate.
(5) <i>syādasti ca</i> <sup>4</sup> <i>avaktavyaśca</i> <sup>5</sup>	= may be, it is and also indeterminate.
(6) <i>syātnāsti ca avaktavyaśca</i>	= may be, it is not and also indeterminate.
(7) <i>syādasti nāsti ca avaktavyaśca</i>	= may be, it is and it is not and also indeterminate.

图4：普拉桑塔·钱德拉·马哈拉诺比斯，“统计学基础”（1954年）

马哈拉诺比斯指出，前三个范畴“符合经典逻辑的范畴”：“明确肯定”（assertion）、“明确否定”（negation）和“既明确肯定又明确否定”（both）。请注意，马哈拉诺比斯在将耆那教理论（称为 *syadvada*）与西方的“逻辑”范畴进行类比，以及将语义谓词（称为 *bhāṅgi*）与真值进行类比时，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这两种类比都不是不证自明的，都有一定程度的简化。无论如何，第四个类别 *avakta* 是更难翻译的。马哈拉诺比斯选择将其翻译为“不确定的”（indeterminate），并指出其他作者也使用了“不可描述的（indescribable）”、“不可表达的（inexpressible）”或“不确定的（indefinite）”。马哈拉诺比斯认为 *avakta* 类似于数学概率的概念。

几年后，对“*syadvada*”理论的重新诠释激发了人们对非二进制计算模型的想象，用七重谓词系统取代了二进制逻辑。由马哈拉诺比斯发起的这一研究方向是与英国生物学家 J. B. S. 霍尔丹（J. B. S. Haldane）合作推进的。



图5: J. B. S. Haldane (约翰·伯顿·桑德森·霍尔丹), 是一名出生于英国的遗传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霍尔丹是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由于对大不列颠政府对于苏伊士运河危机的政策感到不满, 离开牛津大学去往印度并成为一名印度公民。

印度独立后, 许多西方科学家访问了印度, 特别是印度统计研究所 (Indian Statistical Institute)。其中诺伯特·维纳 (Norbert Wiener) 是控制论的创始人之一, 他认为印度可以成为科学先进、技术自动化的未来之地, 因为尼赫鲁可以通过“尽早引进自动化工厂”, 走一条“工业化的另路”。



图6: 印度统计学院是一所公立大学, 1931年由P. C.马哈拉诺比斯创立

但霍尔丹走得更远。他不仅在印度访问了一个学期或一年，他永久性地迁居印度，成为印度统计学院的教授，并最终成为印度公民。这一举动与他个人的反殖民主义政治有关。1956年，英国、法国和以色列进攻埃及，企图夺取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几天后，霍尔丹辞去了伦敦大学学院的职务。他对《泰晤士报》说：“我不想再做这里的公民，因为英国是一个犯罪国家。”于是，他移居印度，学习梵文，并与马哈拉诺比斯一起通过耆那教的视角重新认识计算机。

现存的数字计算机，无论是英国的还是苏联的，都是基于二进制逻辑的。从最早的数字计算机（如1945年完成的ENIAC）开始，情况就一直如此。阿兰·图灵的计算数学模型——后来被称为图灵机（Turing machine）——也是基于二进制运算。它由一个存储带组成，存储带分为离散的单元格，每个单元格可以包含0或1两个符号中的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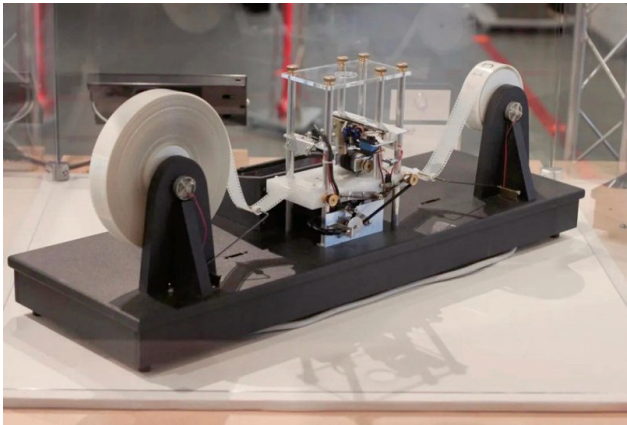


图7：英国数学家阿兰·图灵于1936年提出的一种将人的计算行为抽象化的数学逻辑机，其更抽象的意义为一种计算模型，可以看作等价于任何有限逻辑数学过程的终极强大逻辑机器。

霍尔丹设想了一种除了0和1之外还支持avakta的机器。他写道：“这样一台机器可以给出7个反馈中的任何一个，7个反馈即：0、1、avakta、0或1、0或avakta、1或avakta、0或1或avakta。实际上，这就是一台非二进制图灵机。”

这种抽象模型从未变成实际的计算机，今天的计算机几乎无一例外地基于二进制逻辑。导致二进制模式占据主导地位的原因有很多，但原则上，非二进制计算机，甚至基于不同哲学的计算机都是可能的。

我已经介绍了非常理论和抽象的计算领域的案例。现在，我将讲述第三个故事，一个更加实际和应用的领域——信息学——这一独特领域在革命后的古巴的发展。

### 3. 古巴

1959年古巴革命后，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任命图书管理员玛丽亚·特雷莎·弗雷尔·德·安德拉德（María Teresa Freyre de Andrade）为哈瓦那何塞·马蒂国家图书馆的新馆长。她是一名女同性恋，长期持不同政见者，曾被前政权流放和监禁，长期关注图书馆学的政治。



图8：María Teresa Freyre de Andrade  
(1896-1975)

革命后，弗雷尔·德·安德拉德认为古巴人不能简单地“照搬英国人在图书馆的做法”。用她的话说，这样做会令“我们拥有一个宏伟的图书馆，对图书馆进行很好的分类，为许多人提供良好的服务，但不会让我们积极参与到革命当中去”。

那么她是什么意思呢？图书管理员如何积极参与革命？答案之一是：收集革命前图书馆收藏的、被排除或抑制的资料，并将之编辑索引，如20世纪50年代秘密革命报刊的出版物。不过，图书馆管理员也参与了更广泛的革命项目：古巴建设自己的计算机产业和信息基础设施的努力。这一项目

最终形成了信息科学中的一个独特的新领域，它继承了古巴图书馆学的革命理想。

革命者和他们的敌人都认识到，信息技术将是新古巴的战略重点。1962年，IBM关闭了古巴分公司，美国政府实施贸易禁运，阻止古巴购买任何计算机设备。这意味着古巴不得不在苏联领导的经济互助委员会（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简称 Comecon）中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下，发展自己的计算机产业。

1970年，哈瓦那大学的一个团队创造出了数字计算机原型CID-201，以及一种名为LEAL的编程语言，LEAL是“Lenguaje Algorítmico”（算法语言）的缩写，这个缩写词也有“忠诚”的意思。由于美国实施的贸易禁运，该团队无法在欧洲购买必要的电子元件，但在一位从商于东京的日裔古巴人的帮助下，他们最终成功地从日本带回了藏在公文包里的元件。

古巴信息学的非凡之处在于它发展出不同于美国和苏联信息学的新理论和数学模型，古巴信息科学家试图将他们的政治理想融入图书馆活动的数学模型中。

古巴的模型往往要复杂得多。在此，我不再赘述数学细节，只想简要说明一下他们的政治原则。美国和苏联的信息科学家经常使用流行度量标准（如引用次数）来选择哪些资料需要保留，哪些需要丢弃。古巴信息科学家们拒绝接受这些流行度量标准，他们非常关注确保图书馆藏书中观点的多样性。

关键在于，他们明白信息检索系统永远不可能是中立的。当算法选择如何对搜索结果进行排序或选择推荐哪些视频时，这始终是一个具有政治后果的规范性决策。古巴信息科学家们拥抱了这种不可避免的政治偏见。

当我研究古巴信息学时，网上几乎没有任何可以轻易获取的资料。我的第一篇相关文章发表后，维基百科编辑几乎立即联系了我，并创建了关于弗雷尔·德·安德拉德和CID-201计算机的新条目。我很荣幸能在这段历史的公开记录中发挥作用，也很高兴能亲身经历信息系统的政治。



图9：CID-201计算机

古巴的信息学实验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但是，我还应当介绍一个案例，在此案例中，一个更加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压制了其他实验，迫使它们转入地下。我最后的故事是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机器诗学。

#### 4.“前”捷克斯洛伐克

语言的计算模型总是倾向于关注语言的基本的字面方面，而压制或搁置诗意和美学方面。美国科学家沃伦·韦弗（Warren Weaver）可以说是机器翻译的首倡者，他在1955年曾这样说过：“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认为机器翻译能达到优雅和具有风格的效果。普希金无需颤抖。”

这就是为什么机器翻译最早的项目集中在冷战时期的科技文件。科学散文被认为更简单、更直接、更容易形式化。

这种倾向在当今的机器翻译系统和对话自动机中依然存在，它们基于语义相似度的衡量标准，但并没有在其模型中明确考虑诗学。

在前捷克斯洛伐克，早期的机器翻译和计算语言学项目也符合这一趋势。然而，在这些项目的边缘，却出现了令人惊讶的例外。语言学家、工程师、作家和学者努力将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台计算机用于文学目的，并开发出明确包含诗学的语言模型。



图10：沃伦·韦弗（Warren Weaver）是美国数学家，机器翻译的早期研究者之一，并与克劳德·香农合著了划时代的《通信的数学原理》



图11：Jiří Levý (1926-1967) 是捷克文学理论家，文学史家和翻译理论家

捷克文学理论家伊日·列维（Jiří Levý）试图利用各种数学模型（如信息论、博弈论和统计决策论）将翻译过程中的“美学”决策形式化。与美国和苏联的机器翻译项目不同，列维设想计算机可用于翻译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文本。另一位语言学家克韦塔·斯加洛瓦（Květa Sgallová）受到列维对主流计算语言学批判的启发，致力于研究“诗歌语言”的概率模型。

这类工作为何会在捷克斯洛伐克涌现？一个先决条件是，受战前布拉格语言学派的思想所影响，该学派将语言的“诗学”（poetic）或“美学”

（aesthetic）功能理论化。对于后来的捷克结构主义者（如列维）来说，语言可分为语义和审美两种结构，而这两种结构同样适用于数学形式化。

为诗歌语言建立数学模型或计算模型的大部分出版著作都出现在20世纪60

年代中期。早在20世纪50年代，结构语言学就被与苏联结盟的政权视为有争议的学科，因为斯大林后期的论战将结构语言学定性为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学科。许多语言学家被清除出捷克斯洛伐克的大学，一些人被流放，另一些人则放弃了结构主义，宣誓效忠马克思主义。20世纪60年代中期，政治压迫出现短暂松动，也正是有关机器诗学的大多数出版物出现的时期。

其中一些作品涉及使用计算机自动作诗。一些人甚至将计算机生成诗歌作为一种政治批判模式。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期间，一位研究人员收集了一位政要的官方声明，然后用计算机生成戏仿的、官腔声明的荒诞诗歌。就在华沙条约组织入侵前几个月，这份研究成果发表在杂志上，标题为“生成的退化”（Generative Degeneration）。



图12: 克韦塔·斯加洛瓦 (Květa Sgallová)

但在入侵和随后的镇压之后，大多数机器诗学研究人员都受到了惩罚，并被解除了学术职务。在某些情况下，研究人员受到惩罚，原因至少部分是：他们的工作被认为具有颠覆性，《生成的退化》的作者似乎就属于这种情况。在另一些情况下，研究人员受到惩罚是因为他们的个人观点和行为了，而非他们的学术工作，斯加洛瓦似乎就是这种情况，她被解除了教职，只被允许担任图书管理员。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几乎所有从事机器诗学研究的人都无法在入侵后继续在大学里从事这项工作。

这并不意味着研究工作完全停止。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包括斯加洛瓦在内的一群对诗歌语言数学研究感兴趣的人在布拉格附近的不同公寓组织了地下会议。这群人组织的活动被非正式地称为“诗歌学夜校”（Evening School of Versology），他们以自行出版的排印本（即samizdat，地下出版物）形式传播自己的研究成果。

多萝塔·奥尔萨夫斯卡（Dorota Olsavska）是我以前的学生，她通过实习支持了我的研究，去年她在布拉格的一间公寓里拜访了克韦塔·斯加洛瓦（Květa Sgallová），对她进行了初步采访。斯加洛瓦至今仍认为，对诗歌语言的研究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尽管如此，她还是对我们在此如此漫长的岁月之后，从遥远的荷兰得知她的工作的存在感到惊讶。她也很好奇我们在做什么研究，于是多萝塔把我写的关于古巴信息学的文章寄给了她。她在通过机器翻译阅读了我的文章后，同意帮助我们，她甚至在她的公寓里翻找到以前的通讯记录。

讽刺的是，如果没有现有的、商业化的、反诗学形式的语言模型，这次相遇是不可能的。我最初是通过阅读论文（机器翻译自捷克语）了解斯加洛瓦的思想的。现在，我从多萝塔更仔细的翻译中知道，我错

过或误解了很多东西。但从一开始，尽管主流机器翻译存在局限性，我仍然能感受到这部作品的重要之处，甚至是美妙之处。

计算模型能够压制诗意，但不能完全压制。

这也是我所有故事中普遍模式的一部分。计算模型的设计可以抑制不一致、不确定、党派性（partisan）和诗意，但它们永远不会完全成功。尽管人们试图摆脱计算模型中的不一致性、不确定性、政治性和诗意，但总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甚至还有人通过开发其他计算模型来表达这些反对意见。总有人想象出其他的计算方法，我想也包括我本周在上海遇到的网络社会研究所这个非同寻常的群体。

感谢您的聆听。



## 翻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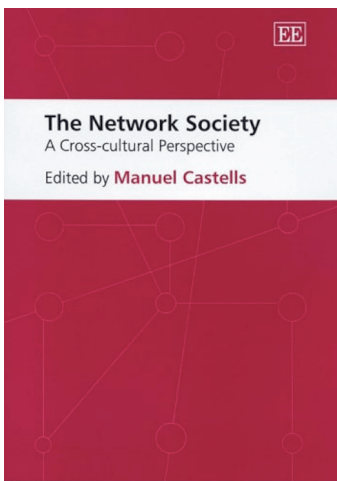


# 1 一个理论的蓝图：信息主义、网络和网络社会

曼纽尔·卡斯特 (Manuel Castells)

翻译：黄孙权

本文出处：英文版来自Manuel Castells(2004). *Informationalism, networks, and the network society a theoretical blueprint* in Manuel Castells. (2004).ed.*The network society: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pp3-45),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译注：本文可视作Manuel Castells的网络社会三部曲的理论框架摘要与总结。其对知识对象有清晰分析，不同于坊间的信息社会、知识社会之用词，充斥着不假思索的进步式神话。也直指意识形态者，或将技术视为一切之哲学幻想的理论谬误。本文也可以衔接上他在2009年出版的“Communication power”一书的观点与思考。翻译不另作脚注说明，相关的理论与历史知识待读者自行补充。唯有一点，“communication”在本文是核心关键字，我在翻译中文时的选择是：若指的是一般技术，翻译成“通讯”；若指的是技术与人、与社会的接

触，翻译成“传播”；指人与人，团体与团体间的接触，翻译成“交流”、“沟通”，视文中脉络而定。粗体字为英文版中的斜体字。特别注明。

\* \* \*

## 网络、社会和通讯技术

网络社会是由基于微电子的资讯和通讯技术所驱动的网络构成的社会结构。所谓社会结构，在我的理解中指的是人在生产、消费、再生产、经验和权力关系中的组织安排，经由文化编码产生有意义的交流。网络由相互连接的节点构成，节点是网络曲线相交的点。网络没有中心，只有节点。节点对网络的重要性可能各不相同。节点通过吸收更多相关信息并更有效地处理这些信息来增加其对网络的重要性。一个节点的相对重要性不是来自其特定的特征，而是来自其对网络目标的贡献能力。然而，网络的所有节点对网络的运行都是必要的。当节点变得过剩或无用时，网络倾向于重新配置自己，删除一些节点并添加新的节点。节点只作为网络的组件而存在和运作。网络是单位，而不是节点。

“传播网络是在时空中，通过资讯流动在传播者之间所创造出的接触模式” (Monge and Contractor, 2003: 39)。因此，网络处理资讯流动。此流动是在各节点间连接的管道循环的资讯流。网络是由赋予网络目标和运作规则的程式所定义的。这个程式由包括绩效评价和成功失败标准在内的代码所构成。要改变网络的结果，必须从网络外部安装一个新的程式（一组相容的代码）到网络中。网络彼此之间可以合作或竞争。合作是基于网络之间的沟通能力，这种能力取决于是否存在网络间的转译和通讯协议 (protocols of communication)，以及是否能够接入交换器 (switches)。竞争则取决于通过更优越的绩效或合作能力来胜过其他网络的能力。竞争也可能采取破坏性形式，干扰竞争网络的交换器，和/或干扰其通讯协议。

网络运作依循二元逻辑：包容/排斥。在网络内部，节点之间的距离趋近于零，因为网络遵循小世界特性的逻辑：它们能够透过共享通讯

协定，从网络中的任何节点连接至整个网络和相通的网络。网络内部节点与网络外部之间距离则是无限的，除非改变网络程式，否则无法获得存取权限。因此，网络是自我重组的、复杂的通讯结构，要确保目标的统一性，同时借由适应运作环境的能力，在执行上保有弹性。

然而，网络并非专属于21世纪社会或人类组织。网络构成了生命的基本模式，所有生命形式都是如此。正如弗里津夫·卡普拉（Fritjof Capra）写道：“网络是所有生命共有的模式。只要我们看到生命存在，就会看到网络”（2002:9）。在社会生活中，社会网络分析者长期以来一直在研究社会互动和意义生产核心的社会网络动力学，形成了一种系统性的传播网络理论（Monge and Contractor, 2003）。此外，就社会结构而言，考古学家和研究古代文明的历史学家曾有力地提醒我们，历史文献说明了网络作为社会的骨干是无所不在且相当重要的，即便是数千年前地球上最先进的几个古代文明区域亦是如此。事实上，如果我们将全球化的概念转移到由当时可用的运输技术所决定的古代世界地理上，在古代就存在着某种全球化，因为当时的社会赖以维生、获取资源和权力，都依赖于将其主要活动与超越其本地范围的网络相连接。（La Bianca, 即将出版）

对照实际的历史纪录观察与主导社会进化的观点，后者聚焦于另一种组织型态：垂直整合资源和权力主体的阶层官僚体制，是社会菁英有组织权力的表征，并由神话与宗教合法化。这是因为历史和社会的分析往往建立在民族中心主义之上并为其辩护而产生的扭曲视野，缺乏学术上对多元文化世界复杂性的探究。但是，我们对历史再现中对网络在社会结构和动态中的重要性之相对漠视，也可能与这些网络实际上服膺于垂直组织逻辑有关，后者的权力铭刻于社会制度，并以单向资讯与资源流动分配（Colas, 1992）。

我的假设是，垂直阶层组织在历史上优于网络组织，乃是因为社会组织的网络形式有其物质限制需要克服，这些限制与当时可用的技术有关。确实，网络之所以强大，在于其弹性、适应性和自我重组能力。然而，一旦超过某个规模、复杂度和交换量的临界点，在前电子通讯技术条件下，它们就比垂直组织的指令控制结构效率低下（Mokyr,

1990)。风力船舶能建立跨海甚至跨洋的贸易和征服的网络，马队信使或快跑信使也能在广大领土的帝国中心与边陲之间维持通讯。但在沟通过程中，反馈循环的时滞使得系统逻辑等同于单向信息和指令流动。这种条件下，网络只是顶端集中权力的垂直组织的延伸，这些组织塑造了人类历史：国家、宗教机器、军阀、军队、官僚体系，以及负责生产、贸易和文化的下属机构。

随着技术变革，尤其是通讯技术的演进，网络在社会组织过程中引入新行动者和新内容的能力不断增强，相对权力中心也更加的独立。这一点在能够依赖分布式能源网络的可能性出现时表现得尤为明显。这正是工业革命来临的特征：铁路、海洋巡洋舰和电报构成了第一个准全球性网络的基础设施，具有自我重组能力。然而，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国家主义版本的工业社会，主导结构均为大规模垂直生产组织和层级分明的国家机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演化为极权体制。这意味着，早期的电力通讯技术还不够强大，无法赋予网络各节点自主性，因为实现自主性需要多方向性和持续的互动式信息处理流程。这也意味着，适当技术的可用性只是转变社会结构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直到工业社会进入成熟阶段，自主的组织网络化计划才得以出现。一旦出现，它们便能利用基于微电子的通讯技术的潜力。

网络成为最有效的组织形式，是因为受益于新的技术环境，有三大主要特性：弹性（flexibility）、可扩展性（scalability）和生存能力（survivability）。

- 弹性：网络能够根据环境变化重新配置，在保持目标的同时改变其组件。它们可绕过通讯渠道中的阻碍点来寻找新的连接。
- 可扩展性：网络可以在几乎不受干扰的情况下扩大或缩小规模。
- 生存能力：由于没有中心节点，并且能够在广泛的配置中运作，网络可以抵御对其节点和代码的攻击。因为网络的代码包含在可重现指令并寻找新的执行方式的多个节点中。因此，只有实际摧毁连接点的物理能力才能消除网络。

引爆网络力量的技术变革核心，是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发生的微电子革命而导致的信息和通讯技术的转变。它构成了一个新技术范式的基础，该范式在20世纪70年代主要在美国得到巩固，并迅速传播到全世界，为我所描述的信息时代（information age）拉开序幕。

威廉·米切尔（William Mitchell）在一本重要且有据可查的著作中（Mitchell, 2003），追溯了信息和通讯技术在整个历史上的演变逻辑；将其视为一个扩展和增强人体和人类思维的过程；这个过程在21世纪初被便携式机器的爆炸式增长所特征化，这些机器提供无处不在的无线通讯和计算能力。这使得社会单位（个人或组织）能够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进行互动，同时依赖于管理分布式信息电网中物质资源的支持基础设施。随着纳米技术的出现以及微电子学和生物过程与材料的融合，人类生命与机器生命的界限变得模糊，网络将其互动从我们的内心自我扩展到人类活动的整个领域，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障碍。米切尔和我并不沈溺于代替对技术社会转型过程分析的科幻情节。但正是为了分析的缘故，强调技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当代的核心技术——通讯技术时，它关乎人类物种的特性核心：有意识的、富含意义的交流（Capra, 1996, 2002）。

正是因为现有的电子信息 and 通讯技术，网络社会才能充分展开，突破了网络作为社会组织和互动形式的历史限制。这种观点不同于将社会定义为信息社会或知识社会的概念框架。说白了，我认为这是一个经验和理论上的错误，将在本章结论部分阐述。不过先让我提出这个论点。

原因非常简单，只要我们能相信历史记录，所有的社会都是以信息和知识作为权力、财富和意义的源泉（Mokyr, 1990; Mazlish, 1993）。如果没有目的性的知识来组合信息，信息本身就没有多大价值。知识当然是相对于每种文化和社会而言的。因此，冶金学、航海技术或罗马法，都是基于信息和知识的基本手段。军事力量、行政效率、资源控制，以及最终的财富和财富分配规则都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所以，如果信息和知识是**所有**社会权力和财富的关键因素，将我们的社会概念化为此，就是不恰当的，即便出于交流方便的实际原

因。我在对我们这个历史时期命名时也迎合了潮流，称之为“信息时代”。我们真正的意思，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本意，是我们的社会特征在于信息技术所蕴含的力量，这是一个全新的技术范式核心，我称之为信息主义。然而，印刷术也是最重要的信息技术，而它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尤其是在中国。但我们通常不会将后印刷时代的社会视为信息社会。

因此，在技术和社会层面上真正新颖的是一个建基于微电子信息技术之上的社会。我还要加上基因工程的生物技术，因为它们也涉及解码和重新编码生命物质的信息。此外，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ies）更准确地应被称为通讯技术（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因为未被传播的信息将失去相关性。早期强调要区分信息技术与通讯技术，反映了独立电子设备和电脑的逻辑，而这种观点至少在三十多年前ARPANET部署之后已经过时。这也显示通讯技术世界在计算机、电讯（telecommunications）和广播媒体之间的划分。再次，从业务和组织各领域的机构来看，这种区分有其合理性，但从技术角度来看则毫无意义。我们这个世界的独特之处在于，人类主体的身体和思维在由微电子、软件驱动的通讯技术的互动网络中得到延展和增强。通过日益微型化，这些技术正在渗透到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它们正在与能够重新编程生命物质通讯网络的新的基因工程技术交汇。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一种新的社会结构作为我们社会的基础正在扩展：网络社会。

## 信息主义：网络社会的技术范式

技术，如若理解为物质文化，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变革的基本维度（Fischer, 1992: 1-32）。技术通常被定义为以可重复方式运用科学知识设定程序的行为。它在与社会其他层面的互动中演进，但有着自身的动力，与科学发现、技术创新以及在整个社会的应用和扩散条件相关。技术系统是渐进式演化的，但这种演化是由重大断裂所穿插的，正如史蒂芬·古尔德（Stephen J. Gould, 1980）就生命史令人信服地论证的那样。这些断裂被技术革命所标志，引领了新的技术范式

的到来。范式一词由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 1962）提出，用来解释科学革命如何改变知识。随后被克里斯托弗·费曼（Christopher Freeman, 1982）和卡洛塔·佩雷斯（Carlota Perez, 1983）引入技术的社会和经济形态。范式是一个概念模式，设定了绩效（performance）标准，它将发现整合为一个以协同效应为特征的相互关系的连贯系统；也就是说，系统整体的附加价值超过个别组成部分之和。一个技术范型是将一系列技术发明组织在一个核心和一套关系系统之下，以增进每项特定技术的绩效表现。

信息主义是构成21世纪初期社会物质基础的技术范式。在20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世纪里，信息主义取代并吸纳了工业主义，成为主导的技术范式。工业主义与工业革命相关联，是一种以人造机器生产和分配能源的能力为基础，系统地组织技术的范式。这种能力不依赖自然环境——尽管需要利用自然资源作为生产能源的投入。能源是所有活动的主要资源，通过改变能源生产方式和将其分配到任何位置，以及可携带应用的能力，人类得以增强对自然的控制力，掌控了自身存在的条件（按20世纪的历史记录，这未必是件好事）。工业革命的能源核心周围，各个领域的技术聚集并融合，从化学工程和冶金到运输、电信，最终延伸到生命科学及其应用领域。

在信息主义的新范式下，科学知识和技术创新正发生类似的结构化过程。肯定地说，工业主义并未消失，而是被信息主义所吸纳。信息主义以工业主义为前题，因为能源及其相关技术仍然是所有过程的基本组成部分。信息主义是一种基于通过微电子、软件和基因工程革命而实现的加强人类信息处理和通讯能力的技术范式。计算机和数位通讯是这场革命的最直接表现形式。事实上，微电子学、软件、计算、电信和数位通讯整体上都是同一个集成系统的组成部分。因此，从严格意义论之，这个范式应被称为“电子信息-通讯主义”（electronic informational-communicationalism）。然而，考虑到概念表达的清晰和简明，保留已经广为使用且与工业主义形成密切并行的“信息主义”概念更为恰当。由于信息和通讯是人类活动和组织最根本的维度，其实施的物质条件之革命性变化影响到人类活动的整个领域。

然而，这种新的信息和通讯技术系统与历史经验有何不同之处呢？我认为，这一范式区别于过去的信息和通讯技术发展（如印刷术、电报或非数位电话）在本质上有三个主要的独特特征：

- 在容量、复杂性和速度方面具有自我扩张的处理和通讯能力；
- 基于数位化和循环通讯而重新组合的能力；
- 通过互动的、数位化的网络实现分布弹性。

让我进一步阐述这些特点。我分别就两个基本且原本不同的领域 – 数位电子（digital electronics）和基因工程（genetic engineering）进行说明，然后再考虑它们之间的互动与关联。

数位电子技术前所未有地增强了处理资讯的能力，不仅是资讯量，也涉及操作的复杂度和处理速度（包括通讯速度）。然而，相较于先前的资讯处理技术，这个“更多”到底有多少？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一场以巨大的处理能力飞跃为特征的革命？

这个基本问题的答案之一是经验性的。过去三十年来电子资讯和通讯技术的历史显示了其处理能力呈指数增长，同时每次操作的成本也急剧下降，这正是一场技术革命的标志，正如保罗·大卫（Paul David, 1975）对工业革命所做的记录一样。无论我们的衡量标准是微电子中集成电路整合能力，还是从兆位元到太位元（terabytes）的计算能力，以及软体代码行数到复杂操作的管理，它们都显示了信息和通讯领域中技术变革前所未有的速度。

但我会提出更进一步的假设：不仅是量的差异，还有质的变化。这些技术因具备反覆的沟通能力，而能够自我扩展其处理能力。由技术产生的知识，对技术创新产生了持续的反馈效应。换句话说，这些技术具有新兴特性；即通过它们的无尽重新配置，能够衍生出新的、未曾预见的创新过程（Johnson, 2001）。这是个冒险的假说，因为处理能力可能会在微晶片进一步整合的物理极限上遇到障碍，网络计算的复杂性可能会在专有软件的条件超过软体开发人员的程式设计能力。然而，有关整合限制的每一个世界末日的预测都被制造业的研究

所否定。生物材料和其他新材料的持续研究会带来新的可能性，包括化学处理的DNA晶片。开源软体正在克服技术垄断的障碍，在全球范围内网络化的数千名自由程序员所创造的不断增长的良性循环中，推出一波又一波的新应用和开发突破。最重要的是，网络化的分布式处理和软件开发能力超越了独立机器的限制，并创造出—个全球化的、数位化的人机交互系统，随时准备行动。

因此，上述假设的正式版本如下：在信息和通讯技术革命的头三十年中，我们观察到新技术自行生成并不断扩张的处理信息的能力；目前整合、编程和网络能力的限制可能会被正在形成的创新浪潮所取代；如果这些技术的处理能力达到极限，—个新的技术范式将以我们今天无法想像的形式和技术出现。而这种范式除了在科幻情节，或在常被怀疑的创新梦想里才能有的呈现。

其次，数位技术根据持续互动的沟通重组信息的能力而闻名。这就是我所谓的超文本，符合泰德·纳尔逊（Ted Nelson）和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的传统。互联网的关键贡献是其潜在的能力，即连接来自各处的一切数位内容并重新组合。事实上，伯纳斯-李对万维网的原始设计有两个功能：浏览器和编辑器（Berners-Lee, 1999）。然而，万维网的商业和官僚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将其用途（对大多数人来说）局限于浏览器和信息提供者，与电子邮件系统相连。然而，从共享艺术创作到反全球化运动的政治市场，再到网络企业实验室的联合工程，互联网正在迅速成为—个超越聊天室的互动沟通媒介（在聊天室越来越被短信和其他无线即时通讯系统淘汰的情况下）。互联网相对于其他通讯媒介的附加价值，在于具有在选定时间内重组信息产品和信息过程来生成新输出的能力，这些新输出立即在网络中进行处理，在信息、通讯和即时或选定时间的反馈过程中不断生产。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重组是创新的源泉，而创新则是经济生产力、文化创造力和政治权力的根本。事实上，尽管新知识的生产总是需要将理论应用于重组的信息中，但实时实验使用来自多源头的重组产出，大大扩展了知识生成的领域。它还允许不同知识领域及其应用之间的连接增加—正是库恩科学革命理论中知识创新的源泉。

新信息和通讯技术的第三个特征是它们的弹性，这使得处理能力可以在各种上下文和应用中分布，如企业公司、军事单位、媒体、公共服务（如医疗或远程教育）、政治活动和个人互动。软件开发，如 Java 和 Jini 语言，推动了分散式网络的发展。无线通讯使得沟通点的增加几乎可以达到每个个体的水平（也就是每个个体都能够成为沟通节点）——当然，这不包括地球另一边的大多数人口，这是主要的社会问题，我将在对网络社会的分析中回头再讨论。因此，这不仅仅是通讯网络的密度问题，还关系到其灵活性以及其在人类环境的各个地点和情境中的整合能力。正如米切尔（2003年：144）所写，“无线连接和可携式设备创造了连续的存在场域，可以贯穿建筑物、室外空间，公共和私人空间。这对于所有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信息访问的人类活动的地点和空间分布具有深远的影响。”我试图以“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概念捕捉此种空间转变，它与传统的“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互动，与信息主义相关的新空间结构并非无地无所，而是由信息和通讯流连接各地而构成的网络，正如我将在下文详细阐述的那样。

在信息范式下，任何沟通主体对通讯网络的作用能力使人们和组织有可能根据自己的需求、欲望和计划重新配置网络。然而（这是基本的），每个主体的重新配置能力取决于网络配置中存在的权力模式。

我将更简洁地阐述信息和通讯技术革命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基因工程**。我认为它对社会结构和动态的潜在影响比数位革命引发的影响更深远。它影响到生命的程序，因之影响了我们存在的基础。然而，其影响的性质使得机构对其应用的抵制，其真正的突破需要数位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这些技术对生物研究的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正如人类基因重组计划中的大规模并行计算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虽然基因工程通常被认为是与信息技术革命独立的过程，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从分析的角度来看，这些技术显然是信息技术，专注于解码和实际重编程DNA，即生物的编码。由于生物学家知道细胞并不孤立工作，真正的问题是要理解它们的沟通网络。因此，基因工程既是信息技术，也是通讯技术，正如数位电子一样。

其次，两个革命之间存在着直接的方法论联系。如今，计算机模型和计算能力是基因工程的工具，因此微生物学家、生物工程师、电气工程师、化学工程师和计算机科学家都是尝试揭示生命秘密的大胆团队之必不可少的组成 –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在扮演上帝的角色。另一方面，生物晶片和基于DNA的化学运算过程是新型数位处理和分子电子学的基础，引领了纳米技术的扩散，最终将在包括修复和维护人体在内的一系列应用中推广纳米机器人的使用。

第三，这两个技术领域之间存在着理论上的融合，围绕着基于网络、复杂性、自组织和新兴特性的分析范式，这点已在日前由圣塔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有远见的研究团队的工作中证明，并由弗里托夫·卡普拉（Fritjof Capra）加以理论化。

基因工程技术同样以其自我扩展的处理能力、由通讯网络进行重组的能力，以及其分配权力的弹性特点著称。更具体地说，人类基因图谱的存在，以及我们身体特定部位的基因图谱、许多物种和亚种的基因图谱的增加，提高了在基因工程领域积累知识的可能性，这导致了对过往无法观察的过程之理解。换句话说，随着知识的积累和模型空白的填补，更有针对性、更新颖、更有意义的实验变得可能。

其次，基因工程技术的重新组合能力至关重要，就像数位通讯和信息处理的用途一样。第一代基因工程应用大部分失败了，因为细胞被当作孤立的实体进行操作，没有对其背景与在生命网络中的位置有全面了解。研究表明，细胞的功能是由与其他细胞的关系所界定的。在特定交互作用的背景之外，它们的DNA结构毫无意义。因此，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网络，通过代码进行通讯，而不是孤立的指令集，是基因重组策略的对象。新兴特性与基因网络相关，并通过模拟模型加以识别，再通过临床实验进行验证。

总之，遗传工程的承诺，正是重新编程不同物种、体系中不同领域之代码及其通讯协议的能力。转基因研究和生物自我再生过程是遗传工程的前沿。遗传药物，未来将通过纳米技术制造的设备传递，旨在引导身体由生物自行编程：这是通讯网络之分布式信息处理能力的终极表达。

在信息主义的基础上，网络社会作为二十世纪末逐渐成为人类活动社会组织的新形态逐渐浮现。如果没有这个新技术范式所提供的能力，网络社会无法运作，就像工业社会没有使用电力就无法完全扩展一样。但是网络社会不是技术革命的结果。相反，它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偶然巧合，导致了新形式的社会组织的出现，当这些因素有了利用信息主义力量的历史时，新形式的社会组织就会占上风并扩展。因此，我现在简要地转向网络社会的起源。

## 网络社会的崛起

每一个新社会结构都有其特定的起源，取决于时空背景。显然，特定社会结构的历史生成过程与其特征之间存在着关系。然而，我们可以将此种社会结构视为一个既定事实来分析，而不必深入考虑形成它的过程。本章聚焦于网络社会的理论，而非其历史。尽管如此，我将总结一些我早期著作中对网络社会起源的分析（Castells, 2000b、c），旨在反驳技术或社会演变必然导致网络社会的观念，将其视为现代性的后期化身（后现代性），或将信息/知识社会作为人类长期演化的自然结果。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历史没有预先确定的意义，每个时代和每种权力都以种族中心主义和历史中心主义的方式声称自己有权成为人类演化的最高阶段。我们从历史观察到的不同形式社会的出现与消失是偶然的，或因内部自毁、意外创造，更多时候则是不确定的社会斗争的结果。

确实，长期以来，技术发展趋势增强了人类克服环境的心智力量。但这个过程是否带来进步仍未可知。除非我们认为这些例子都微不足道：高度理性化的大屠杀，将工人解放的希望变成古拉格

（Gulag），对已经战败的国家在广岛和长崎投以核毁灭，在制药公司及其母国政府就支付知识产权费用争论不休时，爱滋病在非洲蔓延。

在分析层面上，没有什么能预设信息和通讯技术革命的轨迹。个人电脑并不是在革命初期就在政府和企业的脑海中：它是由人们创造出来

的。网络社会的关键技术-互联网-如果AT & T在1970年接受美国国防部的免费提供该技术的提议，或者如果文特·瑟夫（Vint Cerf）和罗伯特·卡恩（Robert Kahn）没有在网络上发布IP/TCP协议的源代码，互联网将永远无法成为全球自由通讯的网络。历史演进是一个开放、冲突性的过程，是由主体和行动者根据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来塑造社会。更多时候，是人们要抗拒那些试图用暴力将社会生活等同于自身欲望的统治者，从而产生的社会组织形式。

那么，网络社会是如何形成的呢？其源头，是在1970年代三个独立进程的偶然巧合，这些进程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新的技术范式-信息主义，以及一个新的社会结构-网络社会，这两者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这三个进程分别是：工业主义及其两种相关的生产模式，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危机和重构；晚期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以自由为导向的文化社会运动；以及上文所述的信息和通讯技术革命。考虑到本章节的分析目的，我不会详细讨论这三个复杂的历史进程的分析，但我谨此提及读者可以参考我的早期著作（Castells, 1980, 2000b, c, 2001, 2004; Castells and Kiselyova, 2003）。我将概括分析要点，以便理解网络社会的形成。

首先，发展的工业模式因其组织、价值观和政策无法利用信息和通讯技术释放的潜力而迈向知识型生产，遭遇了生产力增长的瓶颈。发展模式的危机最终会体现为在特定时空中占主导地位的积累模式的危机。就资本主义而言，这意味着对二次大战后生产力大幅增长和经济稳定成长的凯恩斯主义提出质疑。凯恩斯主义乃通过政府引导和资金支持来增加利润和社会再分配的能力，主要在受控的国内政策环境得以实现。生产力增长和市场扩张建基于确保社会稳定、改善生活条件，以及大规模生产物品和服务以及供大众消费的社会契约。生产力下降导致剩余价值下降，从而导致利润下降和私人投资下降。此模式是通过增加公共支出和私人债务的方式得以维系的。公共借贷和增加货币供应导致了猖獗的通货膨胀。在财政压力和通胀压力的环境下，1973-1975年石油输出国家及其相关跨国公司突然提高油价，不仅加剧了通货膨胀，还为宣称危机到来并寻求纠改政策提供了机会。

1970年代全球性危机引发了关于资本主义未来的辩论，不仅在美  
国，也波及世界其他地方。企业通过裁员、压低工资、削减福利和工  
作保障、全球化生产和市场、加大科研投入、投资技术回应，并寻求  
更灵活高效的管理形式。

然而，政府才是决定转向不同积累模式的决定性要素，尽管总是与企  
业同心协力。这可以与1979年英国撒切尔夫夫人和1980年美国里根的  
双重胜利相关联。他们都是政治保守派。他们上台的使命是：重新资  
本化资本主义，从而开创了经济自由政策的时代，这些政策在接下来的  
二十年内以连续的浪潮形式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版本  
逐步实施。政治上压制组织劳工、为富人和企业削减税收，以及在国  
内国际上对市场进行广泛的解除管制和自由化，扭转了之前占主导地  
位二十五年的凯恩斯主义的倡议。

平衡预算和减少政府干预是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但不是实践的一部  
分。事实上，雷根主政期间，由于减税和大规模军事支出的结合，美  
国的预算赤字在和平时期出现最大增量。他实行了当时我们称之为  
“军事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尽管这个术语具有挑衅性却非正确的，因  
为凯恩斯主义不仅仅是诱导出口，而且还将人们融入消费过程

(Carnoy and Castells, 1984)。重要的是，通过直接解除管制和私  
有化政策，以及间接的由政府向企业发送的信号，改变了游戏规则。  
首先是在美国，其次是在英国，然后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市场自由化  
和政府退出社会支出和收入再分配成为普遍做法，无论是出于意识形  
态的选择还是出于适应世界市场规则的需要，这是由最强大的玩家强  
加的，并在必要时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行，在全世界建立  
了新的正统观念。我们称这一过程为全球化。可以肯定的是，这是无  
拘无束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由金融市场的自由化（1987年10月伦敦  
金融大爆炸政策）引领，并在不对称的贸易全球化中得到确立，新的  
管理机构世界贸易组织（WTO）正是其代表。在新的条件下，全球  
资本主义恢复了活力，增加了利润、投资和经济增长，至少在被贫困  
和边缘化包围的海洋中，核心国家和连接世界各地富裕地区的网络是  
如此。

我想强调，这并非历史的必然，也不是重构资本主义并确保其从工业资本主义向信息资本主义的动态过渡的唯一政策。事实上，在我的著作《美国经济危机》（Castells, 1980）中，我强调了雷根提出的战略的一致性，但我也分析了其他美国政治方案所提供的可能性，例如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所代表的政纲，他在查帕奎迪克（Chappaquiddik）事件之前是一位潜在的总统候选人，该政纲基于重振政府主导的政策以适应新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事实上，如果西方资本主义潜在结构危机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必须适应基于知识的经济，那么一个加深和改革福利国家的策略，以提供这种经济所需的人力资本，包括教育、健康和公共部门的现代化，从长远来看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然而，恢复企业的盈利能力的迫切性及政治过程的结果，导致了雷根经济学（Reaganomics）的胜利，在欧洲是柴契尔主义，在发展中国家则是由芝加哥男孩，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门徒们所制定的，由独裁政权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算纪律强加实施。换句话说，工业主义的危机也是工业主义成熟阶段特定资本积累模型的危机，也就是主要经济体中掌握权力的政治行动者的兴趣和价值观之危机，是要优先解决的。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政治影响力和意识形态霸权，伴随着国家主义的破产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短视实用主义，一同完成了工作。

这意味着全球化和企业灵活性的制度条件，是劳力权利减弱、福利国家撤退同步发生。然而，它们并不是工业主义危机和凯恩斯主义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而是重构体系的选项之一，它恰好是胜利的选择。在全球的胜利，为结构性转型创造了条件，不仅促成了一种新的资本主义模式，还促成了一种应急的新社会结构。

这一转型的形态也受到国家主义崩溃的影响，由于试图应对经济和技术危机的重组政策失败所导致。事实上，正是在1970年代，苏联经济达到了几乎停滞不前的程度，逆转了几十年来的快速经济增长，其技术发展在信息和通讯技术等关键领域落后于西方的发展步伐。我们对此问题的研究（Castells and Kiselyova, 2003）记录了苏联国家

主义特点（基于对信息控制和在军事复合体中掌握的技术）与苏联的经济和技术危机之间的直接关系。双重危机决定性地削弱了苏联的军事力量，并促使进行改革之必要，为戈巴契夫的改革（perestroika）铺平了道路。危机深度如此之大，戈巴契夫不得不走出党的道路，从公民社会中寻求对改革的支持。随后过程的失控，导致苏联帝国出人意料地崩溃，这是历史上最不同寻常的事件之一。

没有苏联的支持，第三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国家主义国家向西方倾斜，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自由经济政策的正式和非正式领导，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飞速开辟道路。中国共产党开展了自己的改革，希望保持国家权力，同时加入全球资本主义。这个实验仍在进行中，但无论其结果如何，都明显地偏离了国家主义的逻辑，并大幅扩大了全球资本主义的空间。在21世纪初期，尽管全球资本主义还远未成为一个稳定的系统，但它已经成为地球上唯一的游戏，尽管越来越多地受到活跃少数派的挑战，并且担负着人类大多数被边缘化的责任。

还有第二个社会趋势，与工业主义、凯恩斯主义和苏联国家主义的危机完全不同：来自**1960和70年代文化社会运动**中出现的另类计划和价值观。这些运动（其第一个象征性表现可以追溯到1964年伯克利大学的言论自由运动和1968年巴黎五月运动）基本上是以自由为导向的，肯定个人自由和社会自治的文化，与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对立，挑战保守的建制和传统的左派。他们有其政治意义的深刻性，但并不以国家为导向，也不关心夺取国家权力。他们在各种社会中有不同的形式和意识形态：在美国，与民权运动相关联；在法国，呼吁工人阶级重新点燃街垒战的古老传统；在意大利，成为“想像的无产阶级”（主要以毛主义的口号招募，但可能使老毛毙了他们）；反对西班牙、葡萄牙、希腊以及整个拉丁美洲的独裁政权；批评德国、荷兰和日本之工业时代的工作伦理以及社会上的保守主义。

这些运动无一例外的反对战争，当时虽以越南战争为象征，但主要体现在肯定个人自主（autonomy of the individual）原则，直接挑战社会的文化基础，从家庭、教会、国家到企业界。当然，他们在政治上失败了，因为进入政府从来不是他们的目标。大多数的年轻激进分子成为了企业经理、受人尊敬的政治家、出版商、学者、新哲学家、顾

问和网页设计师。然而，他们的思想渗透到了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乃至整个社会，并影响了大部分世界中的文化精英。

或许，1960年代的社会运动最有意义的成果是生产性地消融于1970年代更富有连结性运动（articulate movement）之兴起。例如女性主义。当然，妇女奋斗的历史悠久，早在巴黎公社、美国妇女选举权运动、1915年的格拉斯哥大罢工，或者亚历山德拉·科龙塔伊

（Alexandra Kollontai）的追随者之前就已经存在。这些奋斗可以追溯到人类的起源，在反抗父权压迫的非官方历史中留下了印记，就像许多被虐待和烧死的女巫一样。自1970年代以来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蔓延开来的妇女运动，是女性对自己的从属地位进行的大规模起义，取得了真正的革命成果：妇女改变对自己及家庭和社会角色的看法。这场运动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1960年代运动中基进妇女对男人性别歧视的反应，并导致了1970年代自主女性主义运动的形成，此后女性主义介入了社会所有的领域。

环境运动也有类似的故事：美国的第一个地球日动员于1970年5月举行，这是1960年代社会运动的辩论之后，当明确的政治议程耗尽并且逐渐堕落为各种政治派系时的结果。拯救地球—同时拯救我的社区—似乎是一个好主意，吸引了所有人的兴趣，并与年轻理想主义者的生命力和反消费伦理观相契合，他们是这场运动的参与者。事实证明，这比左派的过时意识形态更具颠覆性，对工业主义的价值观念和利益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在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北欧和西欧，以及后来的大部分世界，环境运动继续进行，采取行动反对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自我毁灭逻辑。最终，对世界贫困和剥削性经济增长的批评相结合，为二十年后形成的反全球化运动奠定了基础。

为了本章分析目的，必须记住这些**社会运动是文化性的，旨在转变社会价值观**。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创造了新文化的核心价值有三：自由和个人自治的价值观，与社会制度和企业权力相对立；文化多样性和对少数族裔权利的肯定，最终以人权的语言表达；生态团结的价值观，即将人类的利益重新统合为共同利益（common good），与工业价值观的物质增长和不惜一切代价的消费相对立。

这些文化元素的结合形成了对父权体制的挑战，对生产主义的挑战，对文化均质性的挑战，最终乃是对国家权力和军国主义的挑战，正如和平运动所表达的那样。

因此，尽管 1960 年代的运动及其在 1970 年代引发的多样文化政治表达，发生在与工业化和凯恩斯资本主义危机相关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真空中，但它们既不是对危机的回应，也不是重启资本主义引擎的新政策和战略的先驱。其发明或重新发现的价值观、理念和计划是社会重建的基本材料，我将在下文中进行论述。

第三个组成部分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生的多维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部分，这就是**信息和通讯技术的革命**，导致信息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技术范式的形成。正如本章前文所述。我将对这一技术革命、资本主义重组、文化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作三点评论，这三者共同构成了网络社会的来源。

第一点，关于技术革命的起源与其他两个过程的独立性。微处理器、个人计算机、数位交换器、互联网和DNA重组的发明，并非对商业需求或资本主义需求的回应。军方的资助和赞助至关重要，因为技术上的优势被认为是在超级大国之间，无须发生真正的战争而能赢得冷战的手段。这种依赖军方是整个技术创新过程的通性，而非仅是关键技术特性。微型化和先进的通讯技术对基于导弹的战争至关重要，是国防合同下的目标。但是，计算机网络，互联网，是计算机科学家出于自己的科学好奇心进行实验的副产品，直到每个人在 1990 年代开始使用它之前，互联网都没有军事应用。个人计算机是计算机的反文化之意外发明，最好的软件开发是开源的，是在企业世界之外由大学和自由爱好者所生产的。

这场技术革命的原因和动机已有无数记录，超出了本章范围。这是个自主研究、创新和应用过程，并非为了应对工业资本主义危机而发展，而是在一个不太可能的十字路口—受军方资助的大型科学与大学反文化网络的交汇处—产生的一个实践共同体的成果（Castells, 2001）。

第二点评论，尽管这三个过程在其起源上是独立的，但它们在发展过程广泛相互作用。源于大学社会运动的个人自由文化影响了设计技术革命实际形态的创新者的思维。个人计算机的构想违反了公司企业的预定轨迹。专利发明的惯例受到挑战，人们主张有权无偿地传播构成互联网基础的协议，或新计算世界应用的主要应用软件。依赖的是大学分享发现并与同行交流，希望通过网络的集体工作促进发明，这与将保密和知识产权规则作为权力和财富来源的企业和政府官僚世界形成鲜明对比。

要想象出构成信息技术革命的一系列发明，人必须拥有源于上世纪 60、70 年代那种追求自由表达、个人自主和对抗权威的文化运动之理想和价值观。当然，微软是个例外，这也反映在信息时代前沿创新者对它仍有敌意。因此，尽管大多数技术创新和信息主义的过程都独立于企业界（除了晶体管的发明，事实上，贝尔实验室迅速将其推广到公共领域），其技术的型态和内容受到当时社会运动的文化影响。这并不是说发明者是社会运动家（他们不是，他们忙着发明），但他们呼吸的是与运动相互支撑，体现个人自由和个人自主同样的空气（Levy, 2001）。

另一方面，当企业开始进行自身重构，利用了这场新革命中可用的非凡技术，从而加快了技术变革的进程，大幅扩展了其应用范围。大规模走向全球化的决策虽然受益于政府的放松管制、自由化和私有化政策，但如果没有计算机网络、电信和信息技术为基础的运输系统，是不可能实现的。网络企业（network enterprise）成为了最具生产力和效率的商业形式，取代了工业主义的福特式组织（见下文）。虽然公司内部的去中心化和企业网络的形成早在之前就已开始，基于传真、电话和电子交换系统，但从 1980 年代开始，公司的全面网络化、制造的数位化、服务业和办公室工作的网络电脑化，都是基于新的信息和通讯技术才能真正实现的。

总之，自由文化对引发网络技术有决定性作用，技术反过来又成为企业进行全球化、去中心化和网络化重构的基础。唯有如此，知识型经济才能充分发挥其潜力，因为数据、思想、身体和物质生产可以在全球和本地之间实时地建立联系，形成一个持续的互动网络。

企业重构孕育了全球网络经济。凭藉其成功以及国家主义的式微的双重影响，形成了一种新的信息资本主义模式。为了反对这样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后果，催生了新形式社会运动。企业和社会运动的全球化和网络化，导致了工业时代民族国家危机。总之，最初独立的三个过程（工业主义的危机、以自由为导向的社会运动兴起、信息通讯技术的革命）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即网络社会。

## 网络社会：结构、维度、动态

### 一个全球社会

数位网络是全球性的，因为它们在重新配置自身的能力上并不受限于边界。因此，基础建立在数位网络上的社会结构在定义上是全球性的。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地方的人都被纳入了这些网络。事实上，目前大多数人都没有被纳入其中。但每个人都受到这个主导社会结构的全球网络中发生过程的影响。这是因为在全球网络中组织人类生活的核心活动包括：金融市场；跨国生产、管理和商品服务的分配；高技能劳动力；科学和技术；通讯媒体、文化、艺术、体育；管理全球经济和政府间关系的国际机构；宗教；犯罪经济；以及主张新的全球公民社会权利和价值的跨国非政府组织。（Castells, 2000a, b; Held and McGrew, 1999; Volkmer, 1999; Stiglitz, 2002; Juris, 2004）

然而，网络社会在全球是有选择性地扩散的，在仍然占据大多数人生活物质环境的既有场所、组织和机构上作用。社会结构是全球性的，但在地域和文化层面上，大多数人的经验是地方性的（Borja and Castells, 1997）。特定的社会，由当前国家边界或其历史认同的文化边界所定义，被全球网络的包容与排斥的双重逻辑深刻地割裂。我的假设是，这种割裂不仅仅是前社会形式逐渐纳入新的主导逻辑所需的时间滞后的反应。实际上，这是网络社会的结构特征。因为网络化过程中所固有的重新配置能力使得每个网络的程序都能够各处寻找有价值的添加物并将其纳入，同时绕过和排斥那些对于执行网络任务

几乎没有或毫无价值的领域、活动和人。事实上，正如杰夫·马尔根（Geoff Mulgan）所观察到的，“网络不仅仅是用来交流，还是为了取得地位，而超越交流”（1991：21）。网络社会基于包容/排斥的二元逻辑运作，其边界随着网络程序的变化和这些程序的执行条件而不断变化。

这也取决于社会行动者的能力，在不同情境根据自身利益对这些计划采取行动，并进行修改。全球网络社会是一个动态结构，极易受到社会力量、文化、政治和经济战略的影响和塑造。但无一例外地对活动其中的人们，和网络之外的人们都具有支配地位。在这个意义上，全球战胜了本地，除非本地成为替代性全球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正如被错误标记的“反全球化运动”那样，根据其参与者的说法，这是一个追求全球正义的全球运动。

网络社会的不完善全球化，实际上是其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全球性结构的网络社会，与工业社会、农村、社区社会或生存社会并存，塑造了所有国家的现实，尽管每个区段（segment）对于每个网络的主导逻辑的相关性不同，在鸿沟的两侧拥有不同比例的人口和领土。这意味着不同的网络将有不同的包容和排斥的几何特征和地理分布。全球犯罪经济的地图不同于高科技工业的国际布局版图，尽管它们都有连接点：毒品贩子依赖于计算机和互联网，而不少硅谷工程师借助古柯碱进行发明创造。

因此，在理论层面上，网络社会必须被分析为：首先，作为由网络中各维度的权力者进行编程和自我编程的自我重组之全球架构；其次，作为各种网络几何结构与地理分布的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些网络包括了塑造社会生活和工作的核心活动；第三，作为主导性网络与被排除在全球网络逻辑之外，脱勾的社会形式的几何结构与地理分布间之后设层面交互作用（second-order interaction）的结果。

完成此分析有必要提出两点理论意见。首先，结构本身并不存在；它们总是以一种矛盾和冲突的模式表达着产生结构的行动者之利益、价值观和计划，同时又受到结构的制约。其次，网络社会中的包容/排

斥不能与所谓的“数字鸿沟”相提并论，因为使用互联网和连接电信网络并不能保证真正融入塑造社会的主导网络或反主导的网络。然而，被排斥在网络社会的运作基础设施之外，恰恰好说明了更深层次的结构从属性和无关性。

## 网络社会中价值是什么？

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什么构成价值？是什么推动了生产系统？是什么激励了价值的占有者和社会控制者？这方面没什么改变：价值就是社会宰制机构所决定的价值。所以，如果资本主义仍然主宰着世界，资本积累就是至高无上的价值，无论什么情况都是如此，在资本主义下，金钱最终可以买到其他一切。关键在于，在全球网络组织的的社会结构里，网络之间的等级制度将成为组织/支配地球的规则。例如，如果我们说资本积累是推动系统的动力，且资本回报主要在全球金融市场中实现，全球金融市场将为每个国家的每一个行为分配价值，因为没有一个是经济体能独立于全球金融市场决定的金融评估。但是，如果我们认为至高无上的价值是军事力量，那么强大军事机器的技术和组织能力将通过他们的全球支配网络，结构化他们在不同社会环境中运作的各种武装力量的代理权力。阻止技术、信息和知识的传播给某个特定的武装组织，在世界脉络下变得无关紧要。另一个例子是：我们会说，今天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是人们思想的转变。如果是这样，那么媒体就是关键的网络，因为媒体以全球寡头垄断的形式组织起来，其分布网络是传达给人们思想的信息和图像的主要来源。

因此，鉴于网络支配潜在来源的多样性，网络社会是多维社会结构，其中不同类型的网络具有不同的价值生成逻辑。价值的界定取决于网络的特殊性以及其程序。任何试图将所有价值归结为一套共同标准的作法都会遇到无法克服的方法论和实际困难。如果在资本主义下赚钱是至高无上的价值，那么军事力量最终决定国家权力以及国家决定和执行制新规则的能力（问问俄罗斯的寡头们关于普京吧）。同时，即使在非民主背景下，国家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信仰，取决于他们接受规则的能力，或者他们抵抗的意愿。然后，媒体系统和互

联网等其他通讯工具，可能会先于国家权力，而国家权力则会条件化赚钱的规则，从而超越金钱成为至高无上的价值。因此，价值实际上是权力的表现：谁掌握权力（通常不同于执政者）决定什么是有价值的。

从这意义上说，网络社会并不创新。新颖之处在于其全球影响立即网络化的结构。这意味着，一方面，网络之间的统治关系至关重要。特点是不断、灵活的互动：例如，全球金融市场、地缘政治过程和媒体战略之间的互动。另一方面，由于创造价值的逻辑作为权力主导的表现具有全球性，与本质上就具有全球逻辑的事物相比，有结构障碍不易在全球存在的事物处于劣势地位。

这具有现实的重要性，因为这是工业时代的民族国家危机的根源（不是国家本身的危机，因为每种社会结构都会生成自己的国家形式）。由于民族国家只能在自己的领土上实施规则，除非在结盟或入侵的情况下，要么必须成为帝国，要么成为网络化，以与其他网络相关联以定义价值。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在21世纪初，强调将反恐安全定义为整个世界的最高价值，要建立一个基于军事的网络，通过将安全置于赚钱或次要目标（如人类福祉）之上来确保其霸权的方式。另一方面，正如大卫·哈维一再提醒我们的，资本始终享有无国界的世界，因此全球金融网络有先发优势，成为全球网络社会中定义价值的代表性实例。

然而，在依赖全球/本地、自选时间、互动式沟通的条件下，人类思想可能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增长最迅速的因素（Mitchell, 2003）。因此，思想，或特定的思想集合，可能会确立作为真正崇高的价值（例如保护我们的地球、我们的物种），作为一切其他事物的前提。

总括而言之，工业社会的旧问题—实际上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即“价值是什么？”在网络社会中并没有确定的答案。价值是每个主导网络中的行动者按其所编程的等级结构，在每一时空所处理的。资本主义并未消失，但它并不是—有别于意识形态主导的认知—全球城市唯一的价值来源。

. . .

## 工作、劳动和阶级：网络企业和新的社会分工

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新的劳动分工，从而理解了工作、生产力和剥削。人们工作，他们一直都在工作。事实上，人们工作的时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就特定社会总工作时间来衡量），以前大部分妇女的工作并没有被社会上承认的（有报酬的）工作（Guillemard, 2003）。关键问题，工作是如何组织以及人们是如何获得工资的。劳动分工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衡量劳动贡献价值与否的标准，这个判断在生产过程中以特定的形式进行组织，并在产品分配中占有一席之地，决定了不同的消费和社会阶层。

在网络社会中最根本的分野是我设想的“自我编程劳动”（self-programmable labor）和“一般劳动”（generic labor）。自我编程劳动具有自主能力，能够专注于在生产过程中分配的目标，找到相关的信息，利用现有的知识储备将其重新组合为知识，并以任务的形式加以应用，以实现生产过程的目标。我们的信息系统越是复杂，越是与数据库和信息源交互连接，劳动力就越需要具备利用这种搜索和重组的能力。需要进行适当的培训，不是技能方面的培训，而是创造能力的培训，与组织和社会知识增加的共同发展之能力。

另一方面，不受重视的工作被分配给“一般劳动”，最终被机器取代，或根据动态的成本效益分析分配到低成本生产基地。地球上绝大多数的劳动力，甚至是发达国家的大多数，都是一般劳动。他们是可以被替换的，除非他们通过集体行动主张自己作为人类和公民的生存权。但在价值创造方面（无论是在金融、制造业、研究、体育、军事行动还是政治资本方面），自我编程的工人是掌握资源的任何组织的关键。在网络社会中，劳动组织也遵循二元逻辑，将自我编程劳动与一般劳动区分开来。此外，两种劳动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弹性和适应能力是作为劳力使用的先决条件。

这种特定的劳动分工在一定程度存在性别差异。弹性劳动的兴起与有薪劳动的女性化直接相关，这是过去三十年社会结构的基本趋势

(Carnoy, 2000)。父权制的家庭组织迫使妇女重视弹性安排自己的专业工作，同时要兼顾家庭和工作职责才行。这是为什么大多数国家的临时工和兼职工中有超过 70% 的女性。此外，虽然大多数女性被雇用为通用劳动，但他们的教育水平与男性相比已经大幅提高，而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改变速度不及男性。女性成为了网络化、全球化经济的理想劳工：能高效工作，适应商业不断变化的要求，但在同工低酬，由于父权制度下性别分工的意识形态和实践，晋升的机会也较少。

套用一句老话，现实是辩证的。尽管妇女大量加入有薪劳动力，部分原因是她们处于父权制度下的从属地位，这在全球信息化资本主义的扩张中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但妇女的职业地位转变最终削弱了父权制度。从1970年代文化社会运动中崛起的女权主义思想，在受到歧视的职业妇女的经验里找到了肥沃的土壤。更重要的是，妇女在家庭中赢得的经济权力，提升了她们在家庭中相对于男性户主的地位，同时削弱了基于尊重养家糊口的男性权威对其从属地位的意识形态。因此，新的工作组织方式中的劳力分工是有性别差异的，但这个动态的过程里，妇女正在扭转主要的结构趋势，促使企业将男性引入与女性相同的弹性、工作不稳定、裁员和外包工作的模式中。因此，与其说女性工人正在提高到男性工人的水平，不如说大多数男性工人正在降低到大多数女性工人的水平。这一长期趋势对社会的阶级结构和男女在工作和家庭中的关系都有深远的影响。

劳动力的自主性和自我编程的能力如果不能与劳动力的网络化相结合，就不会有生产率的回报。事实上，对弹性和自主性的结构性需求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流程组织的变革。这种变革的代表就是**网络企业 (network enterprise) 的崛起**。在信息化条件下，这种新企业组织形式等同于所谓福特主义工业（包括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对等物，即以大批量、标准化的大规模生产为特征的组织形式，以及按照自上而下的合理化方案（“科学管理”和泰勒主义，这些方法受到列宁的推崇，并被苏联所效仿）对劳动过程的纵向控制。在福特主义下，消费者应该喜欢福特T型车，而且是黑色的。工人们只需听从工程师的指示，提高他们在流水线上的移动效率，查尔斯·卓别林 (Charles

Chaplin) 在《摩登时代》(Modern Times) 中对此作了不朽的描述。尽管仍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在类似的工厂里工作，但在生产流程的制高点(研发、创新、设计、营销、管理以及大批量、定制化的弹性生产)上的价值创造活动却依赖于完全不同类型的企业，因此也依赖不同类型的工作流程和劳动力：网络企业。

这不是一个企业的网络。网络企业是由企业或企业部门，和/或企业内部区段构成的网络。因此，大型企业内部是去中心的网络。中小企业通过网络相连，从而确保其贡献的批量规模，同时保有主要资产：弹性。中小企业网络通常是大型企业的附属网络，多数情况下就是少数几个大型公司的附属网络，除了日本的企业集团(keiretsu)和韩国的财阀(chaebol)之外。大型企业及其子网络通常形成合作网络，商业术语称之为战略联盟或合作伙伴关系。但这些联盟很少是永久性的合作结构。这不是垄断性卡特化(cartelization)的过程。这些复杂的网络根据具体的商业计划建立联系，并且在每个新项目中重组合作关系。

在这种网络经济中，通常的业务实践是针对特定产品、流程、时间和空间的联盟、伙伴关系和合作。这些合作是基于分享资本和劳力，最重要的是共享信息和知识，以赢得市场份额。因此，这些主要是信息网络，通过网络企业将供应商和客户联系在一起。生产过程的单位不是企业，而是由网络企业实施的商业计划。企业仍然是资本积累的法定单位。但由于企业的价值最终取决于其在股票市场上的金融估值，资本积累的单位，企业，本身成为全球金融流的一个节点。在网络经济中，主导层是全球金融市场，所有估值的之母。这个全球金融市场只是部分地按照市场规则运作。它还受到各种来源的信息波动的影响和牵动，这些信息由计算机网络处理和传播，而计算机网络则是网络经济的核心。信息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神经系统(Hutton and Giddens, 2000)。

金融估值在短期决定了经济的活力。从长远来看，一切都取决于生产力的增长。这就是为什么生产力的来源构成了经济增长、利润、工资、积累和投资的基石。在知识密集型、网络化的经济中，生产力增

长的关键因素是创新（Lucas, 1999）。创新是重新组合生产要素以更有效地生产，和/或在过程或产品中产生更高的附加价值的能力。本卷中的第六章提醒我们这个基本事实。创新取决于创新者。正如第二章所分析的那样，创新者依赖文化创意、对创业制度的开放程度、劳动过程中的自主性，以及这种创新驱动型经济的充分融资。

当今的新经济当然是资本主义的，但它是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它依赖创新作为生产力增长的来源，依赖计算机网络化的全球金融市场（其估值受到信息震荡的影响），依赖内部和外部、本地和全球的生产和管理网络化，以及弹性适应的劳力。价值创造者必须能够自我编程，并能够将信息自主处理成具体知识。沦为下属的普通工人必须准备好适应企业的需求，否则将面临被机器或替代劳动力取代的命运。

在此体系里，劳动的关键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剥削，可区分三类：一类是创新和价值的源泉；另一类是仅仅执行指令的人；以及那些在结构上不相关的人，要么是工人（教育不足，生活在缺乏适当基础设施和全球生产机构环境的地区），要么是消费者（太穷，无法成为市场的一部分）。对世界大多数人口来说，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避免无关紧要，要参与到有意义的关系之中，这关系就是我们过去所谓的剥削关系，因为剥削对被剥削者来说确实有意义。因为他们真正的危险是，全球生产、分配和估值网络指挥系统看不到他们。

### **传播、媒体和公共空间**

在传播领域，网络社会的特点是网络模式、弹性、代码重组和短暂的符号传播。这主要围绕着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多样化的电子媒体系统而组织整合起来的文化。电视、广播、印刷媒体、电影、视频、艺术和互联网传播形成了所谓的“多媒体系统”（multimedia system），各种文化表现形式都被这种相互联系的电子超文本所包围和塑造（Croteau and Hoynes, 2000）。

这种多媒体系统，即使在目前寡头垄断的商业集中状态下，其特点也不是向大众受众传递单向信息，那是工业社会的大众文化。网络社会

的媒体传播渠道多种多样，互动性强。并非构成一种以好莱坞为中心的统合文化地球村。它们涵盖了广泛的文化和社会群体，向选定的受众或受众的特定情绪发送有针对性的信息。媒体系统的特点是：全球商业集中，受众多样化（包括文化多元化），技术通用化，渠道多重化。受众越来越自主，他们掌握了互联网，了解游戏规则：即一切集体精神体验都是虚拟的，但这种虚拟性是每个人的现实的基本维度。

在灵活、互动、电子超文本的空间中进行传播，对政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媒体已成为公共空间（Volkmer, 2003）。哈伯玛斯主义者（Habermasian）关于宪法和民主政治制度作为社会共同基础，以及芝加哥学派（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和桑内特[Richard Sennett]无意中恢复了这观点），对城市作为沟通和社会整合的公共空间的看法已淡出舞台。社会的共同（commons of society）由电子网络组成，不论是源自大众媒体时代但在数位化发生了深刻变革的媒体，还是建立在互联网内外的新传播系统。这并不是说城市会消失，或者面对面的互动是已成过去。事实上，我们观察到相反的趋势：人们越是在电子空间中进行交流，就越多地在自己的地方坚持本身的文化和经验。（Borja, 2003）

然而，地方经验仍然是碎片化的、特殊的、个体化了的。社会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 of society）——构建共享的文化实践，让个人和社会群体共同生活（即使在冲突的共同生活中）——如今发生在以大众媒体和互联网为中心的网络化、数位化、互动化的传播空间中。因此，公民与政治家之间、被代表和代表之间的关系，取决于这个以媒体为中心的传播空间中发生的事情。这并不是说媒体主宰了政治和政策，但在媒体空间中，各种政治斗争才得以展开，有胜有负。在这里，与网络社会的其他情况一样，媒体政治也是以二元模式运作的：上或不上电视。或者，正如本书第十六章所述，在互联网上，社会政治存在的另类形式就是利用草根力量。因此，政治语言和媒体策略对于塑造公众思想，进而塑造社会的自我管理能力至关重要。这就引出了社会理论的基本问题：权力问题。

• • •

## 网络中的权力

网络社会的权力存于何处？我已经分析过构成网络社会的网络对未纳入网络的人类社区或个人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权力通过排斥/包容来运作。在主导网络中，谁拥有权力呢？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权力。权力是强加自己意志于他人意志之上的结构性能力。权力的行使可以讨价还价，但最终，无论某人（一个人、一个社会群体、一类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等等）的意志如何，都必须服从权力持有者的意志，否则将面临各种形式的暴力。这些条件下，网络社会的网络中的权力持有问题，要么是非常简单，要么是不可能回答的。

答案非常简单：每个网络根据其计划的目标来定义本身的权力体系。因此，在全球资本主义中，全球金融市场说了算，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对普通人来说解读权威的机构。这些话通常以美国财政部和联邦储备系统的语言传达，偶尔会带有德国、法国、日本或牛津剑桥的口音，视时空而定。又或者，从国家军事力量的角度来看，只有美国拥有权力，用更分析的论述来说，是任何能够将技术创新投入军事实力发展、拥有物质资源和专业知识来投资科技，且不会严重破坏其社会和经济平衡的机构力量。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试图以单一维度来回答问题：权力是单一的实体（single entity），分析会走进死胡同。军事力量无法阻止灾难性的金融危机；事实上，在某些非理性、防御性偏执狂的情况下，它可能会引发金融危机。或者，全球金融市场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自动机，不受任何主要金融机构的控制，因为其网络中流通的资本规模、量和复杂性，以及其估值标准依赖的是不可预测的信息湍流。可以说，政治决策依赖媒体，而媒体构成了多元阵地，且构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偏见之上。至于资本家阶级，确实拥有一定权力，但并非**全部权力**，因为它也高度依赖全球市场的自主动态，以及政府在监管和政策方面的决定。最后，政府本身被牵涉在不完善的全球治理网络中，间接地服从于公民，不时受到社会运动和抵抗表达的攻击，这些抵抗表达不会轻易消失在历史终结之密室中的（Nye and Donahue, 2000）。因此，也许传统意义上的权力问题在网络社会中毫无意义。但其他形式

的统治和决定对塑造人们的生活至关重要，这是他们意志之外的事情。让我加以说明。

网络世界中，对他人施加控制的能力取决于两个基本机制：根据分配给网络的目标来进行编程/重新编程的能力；以及连接不同的网络，确保它们通过共享共同目标和增加资源来进行合作。我将第一个权力位置的持有者称为“编程者”（programmers），将第二个权力位置的持有者称为“切换者”（switchers）。重点要考虑的是，编程者和切换者确实是社会行动者（social actors），但不一定指特定的个人或群体。这些机制往往是在各种社会行动者之间的界面上运作，这些社会行动者是根据他们在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框架中的地位来定义的。因此，我建议，将权力持有者本身视为网络。他们不是抽象的、无意识的网络，也不是自动装置（automata）：他们是围绕自己的计划和利益组织起来的人们。他们不是单一的行动者（个人、群体、阶级、宗教领袖、政治领袖），因为在网络社会中行使权力需要一套复杂的联合行动，超越了联盟，成为一种新的主体形式，类似于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 1993）精辟地理论为行动网络的行动者（action-network actor）。

让我们来检视这两个机制的运作。对网络目标进行编程（以及重新编程能力）当然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一旦编程完成，网络将高效运行并重新配置其结构和节点以实现其目标。由信息和通讯技术（ICT）支持的全球/本地网络是高效的机器；除了执行命令外，没有其他价值观。它们没有个人恩怨，无情地杀戮或亲吻。不同类型的行动者如何实现网络编程是每个网络特有的过程。全球金融、军事力量、科学研究、有组织犯罪或专业体育都不尽相同。然而，所有这些的网络都有共同之处：思想、愿景、计划产生的程序。这些是文化材料。在网络社会中，文化基本上是嵌入了以媒体和互联网为核心的电子超文本传播过程中的。思想的来源可能多种多样，并与特定的利益和次文化相关（例如，新古典经济学、各种宗教原教旨主义、个人自由崇拜等）。通过传播领域来实现社会加工。最终，根据每个群体对传播过程的暴露程度而抵达每个网络的支持者（constituencies）。因此，控制或影响传播机器（apparatuses of

communication) , 创造一套沟通有效的过程并且讨好那些潜在编程者的能力, 是编程每个网络的关键资产。换句话说, 社会的传播过程以及传播过程中的组织 (通常是, 但不仅仅是媒体), 是编程计划形成的关键领域, 也是为这些计划建立支持者的关键领域。他们是网络社会的权力场域。

然而, 有第二个更为决定性的权力来源, 虽然这需要研究来决定。就是在各种战略网络之间的连接点的控制者: 即“交换者”。例如, 在政治领导网络、媒体网络、科学和技术网络以及军事和安全网络之间的连接, 以维护地缘政治战略。或者是商业网络和媒体网络之间的关系, 例如利用监管机构的控制以支持商业利益。或宗教网络和政治网络之间的关系, 在世俗社会中推进宗教议程。或学术网络和商业网络之间的关系, 以交换知识和认证, 为学习机构获得资源和为其产品 (即毕业生) 提供工作机会。

这不是老男孩网络。这些是设置在相对稳定基础上的特定界面系统, 是在机构和组织正式自我表述之外来阐述社会系统运作的一种方式。然而, 我并不是在复活权力精英的概念。不存在权力精英。这是社会权力的一个滑稽形象, 其分析价值仅限于一些个人化独裁极端案例, 例如皮诺切特时期的智利 (Pinochet's Chile) 。正是因为没有权力菁英能够控制所有重要网络的编程和转换操作, 所以必须建立更加微妙、复杂和协商的权力执行系统, 以便社会的主导网络具有相容的目标, 并能够通过由行动者网络执行的转换过程与彼此沟通, 产生协同作用并限制矛盾。这就是为什么媒体大亨不应该成为政治领袖的原因, 就像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 (Berlusconi) 案一样。切换者越是粗暴地表现出单一目的支配, 网络社会就越是窒息其多元社会结构和社会变革的活力和创造力。切换者不是个人, 但由人组成。他们是行动者, 但由行动者网络构成, 参与在每个特定的连接过程具体操作的动态界面。**编程者和切换者**是那些行动者和行动网络, 因其在社会结构位置使然, 能够在**网络社会中执行权力**。

## 网络社会中的权力与反权力

必须从两个角度来看待权力生成的过程：一方面是捕获和/或执行权力；另一方面是对抗权力，代表了网络程序中被排除或代表不足的利益、价值和计划。分析的看，这两个过程最终通过它们的互动来配置权力结构。但它们是不同的，尽管运作的逻辑是相同的。这意味着对权力的反抗是通过构成网络社会权力的两个机制来实现的：网络的程序和网络之间的切换。因此，社会运动的集体行动，以其不同的形式，旨在向网络的程序中引入新的指令和新的代码。例如，在全球金融网络中，新的指令意味着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应该对一些国家的债务进行宽免，正如禧年运动（Jubilee Movement）所要求的并部分完成的那样。另一个在全球金融网络中引入新代码的例子，是根据公司的环境伦理评估公司股票价值，希望最终能影响投资者和股东对那些被视为对地球坏公民的公司之态度。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计算的代码从增长潜力转变为可持续增长潜力。

更基进的重新编程旨在改变网络基本原则或程序核心代码的抵抗运动，以保持与软件语言的平行。例如，如果上帝的旨意在任何情况下都占上风（如基督教原教旨派所说），那么构成法律和司法系统的机构网络必须被重新编程，不是遵循政治宪法、法律规定或政府决定（例如让女性自行决定自己的身体和怀孕），而是将它们提交给地球主教对上帝旨意的解释。另一个例子，当全球正义运动声称应重新编写由世界贸易组织管理的贸易协定，以包括环境保护、社会权利和尊重土著少数民族时，它正在努力修改全球经济网络运作的程序。

第二种抵抗机制在于阻断不同网络的连接，这些开关允许通过表达结构性统治的共享价值的元程序来控制这些网络。因此，挑战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允许所有权更加集中的规则，来阻止寡头垄断企业对媒体的控制。或通过监管竞选财务，或执行在职副总统不得从前雇主公司（该公司从军适合同中获益）获得收入的利益冲突之规定。或谴责学者利用自己职务作为宣传平台，为当权者提供知识服务。

切换者更基进的破坏是要影响网络社会的物质基础：对航空运输、计算机网络、信息系统以及社会维持生计的设施网络之物理和心理的攻击，这些在信息化世界高度复杂、相互依赖的系统特征。恐怖主义的挑战正是基于这种能力，能够针对战略性的物质开关并将其作为目

标，从而对它们产生威胁或破坏，瓦解人们的日常生活，迫使人们生活在紧急状态下 – 进而促使其他权力网络（如渗透到生活各领域的安全网络）的增长。确实，抵抗行动对战略开关的破坏，以及权力网络以围绕安全网络重组一套新开关，两者形成一种共生关系。

对网络中编程权力的抵抗也是通过网络来进行的，这些网络同样是由信息和通讯技术赋能的信息网络（Arquilla and Ronfeldt, 2001）。所谓的“反全球化运动”是一个在互联网上组织和辩论的全球/本地网络，结构上与媒体网络连接。基地组织（Al-Qaeda）及其相关组织是由多个节点组成的网络，中央协调很少，也直接针对媒体网络切换，通过这些网络，他们希望在异教徒中制造恐惧，在受压迫的信徒群众中燃起希望（Gunaratna, 2002）。

这是网络社会的特点，支配的和反支配的，都依赖于网络形成和网络攻守的策略。事实上，这与以往的社会类型的历史经验相一致，比如工业社会。工厂和大型的垂直组织的工业公司是工业资产阶级和劳工运动发展的物质基础。如今，计算机网络对全球金融市场、跨国生产系统、“智能”武装力量，拥有全球影响力的恐怖主义抵抗网络，和争取更美好世界的网络社会运动都发挥着相同作用。他们都旨在通过切换到媒体网络来触及其支持者和受众。在网络社会中，权力被重新定义，但并未消失。社会斗争也没有停止。支配和反支配的抵抗根据其行动修正特定社会结构而发生变化。权力统治，反权力斗争。网络处理他们相互矛盾的计划，在其中，人们则试图理解自己恐惧和希望的来源。

### **流动空间和无时间的时间**

正如所有历史转型一样，新社会结构的出现与我们存在的物质基础，即空间和时间的重新定义有关，正如吉登斯（Giddens, 1984）、思利夫特（Thrift, 1986）、亚当斯（Adams, 1990）、哈维（Harvey, 1990）、拉什和厄里（Lash and Urry, 1994）以及格雷厄姆和马文（Graham and Marvin, 2000）等人所论证的那样。网络社会具有两种新兴共存的时空社会形式。它们是流动空间和无时间的时间。空间

和时间在自然界和社会中是相关的。在社会理论中，空间可定义为支撑时间共享社会实践的物质基础。通讯技术的发展可以被理解为时间共享和邻近性的逐渐解耦。流动空间指的是在没有邻近性的情况下实践同时性（或在时间共享中选择时间）的技术和组织可能性。在网络社会，大多数主导性功能（金融市场、跨国生产网络、媒体网络、全球治理的网络形式、全球社会运动）都是围绕着流动空间组织的。

然而，流动空间并非无地方（placeless）。它由节点和网络组成；即由电子通讯网络连接的地点，信息流在其中循环互动，确保了这样空间中处理的实践的时间共享。在实践邻近性的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意义、功能都和地方性密切相关；而在流动空间中，地方从它们在特定网络中的节点角色中获得其意义和功能。因此，流动空间对金融活动或科学、媒体网络或政治权力网络并非相同。空间不能与社会实践分离。因此，本章分析的网络社会的每个维度都有其空间体现。因为实践是网络化的，所以实践的空间也是网络化的。由于网络化实践是基于通讯技术在不同地点之间处理的信息流，网络社会的空间由三个要素的关系构成：活动的地点（以及执行活动的人），连接活动的物质通讯网络，以及执行活动的信息流的内容和几何结构，赋予活动的功能和意义。这就是流动空间。

时间以社会定义来说，是实践的序列化。生物时间，是多数人存在的特征（且仍然是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常态），由自然生命周期中编程的序列定义。生物时间在历史上被我所称的官僚时间所塑造；即在机构和日常生活中，由军事意识形态装置的代码组织时间，基于生物时间节奏的工作。在工业时代，钟表时间逐渐出现；即对序列进行精确测量和组织，以便为生活的每一刻分配任务和秩序，从标准化的工业工作和金融交易的时间计划开始，这两个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基本组成部分，没有钟表时间就无法运作。在网络社会中，对序列的强调被颠倒了。信息和通讯技术的使用界定了时间，通过否定排序无情地消灭时间。一方面，通过压缩时间（例如毫秒级的全球金融交易，或努力对抗“即时战争”），另一方面，是通过模糊社会实践的序列，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以随机顺序进行，就像在电子超文本中，或越来越模糊的工作和养育子女的生命周期模式。

在工业社会中，围绕着生产力的进步和发展观念，**成为结构化存在**（becoming structured being），时间服从空间。在网络社会中，流动空间打乱事件顺序使之同步，从而消除了时间，将社会安置于结构性的短暂中：**存在取代了成为**（being cancels becoming）。

时空的构建是有社会差异化的。从最传统的生物节奏到时钟时间的控制，多个地方空间的碎裂、分离，展现出不同的时间性。特定功能和个体超越了时间，而贬值的活动与底层人们则只能随着时间流逝而忍受生活。旨在修改网络社会主导程序的社会运动，表现了时空结构能有另类选择。如环保运动提议，不要将无时间的时间视为自动机的时间，而是要在宇宙时间的长远视角中活着，将人类生活视为物种进化的一部分，并与未来世代以及我们在宇宙中归属感建立团结。这就是拉什和厄里（1994）概念化的冰川时间。

世界各地的社区也在为维护地方性的意义斗争着，并在我所称的“草根化”（grassrooting）过程里为重申地方空间的经验在斗争。事实上，流动空间并没有消失，因为它是网络社会的空间形式，但它的逻辑可以转变。它可以成为支持地方经验全球连接的物质基础，而不是将意义和功能封闭在网络的程序中。

时空同时受到新社会结构的浮现，及其形式与计划的斗争所重新定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时空反映了网络社会的文化。

## 网络社会的文化

所有社会都是文化构造，如果我们将文化理解为指导和激励人们行为的一套价值观和信仰。因此，如果存在一个特定的网络社会，我们应该能够将网络社会的文化识别为其历史标志。网络社会的复杂性和新颖性提示我们应该谨慎行事。首先，因为网络社会是全球性的，它与世界各地每个地区的历史和地理相关联的多种文化进行交流和整合。事实上，工业化和工业社会的文化并没有使世界各地的文化消失。工业社会有许多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表现形式（从美国到苏联，从日本到英国）。在其他大部分是乡村和传统社会的地区，也存在着

工业化的核心地带。即使是资本主义在其历史存在的范围内也没有在文化上实现统一。是的，市场在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都起着支配作用，但在具有如此特定规则且具有如此多样的文化形式的情况下，将一种文化标识为资本主义无能帮助分析，除非我们实际上的意思是美国或西方文化：这在事实上是错误的。

网络社会的发展以不同的文化环境为背景，由每个情境的差异性历史所塑造，以特定形式具体化，导致高度多样化的制度体系形成，正如本书所呈现的研究所示。网络社会仍然具有共同的核心，就像工业社会一样，但网络社会还具有一个额外的统一层面。网络社会是全球实时的存在，它在结构上是全球性的。因此，它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其逻辑，同时在全球层面保持其网络组织，在每个社会中有特殊形式。

这种共通和独特性的双重运动在文化层面产生两个主要后果。一方面，特定文化认同成为集体与个人反抗主宰性网络逻辑的自治壕沟，也时也是抵抗的壕沟。成为法国人再次与成为公民同样重要。成为加泰隆尼亚人、爱尔兰人、巴斯克人、魁北克人、库尔德人、藏人或艾马拉人，自我认同成为对抗民族国家统治的集结处。与历史终结的意识形态相反，历史终结者主张将所有文化融入世界公民的寰宇

(cosmopolitan) 大熔炉。抵抗性认同 (resistance identities) 在全球网络社会发展的初期阶段爆发出来，并引发了近期最戏剧化的社会和政治冲突。

尊敬的理论家和可笑的意识形态专家可能会警告此种发展的危险。我们不能忽视它。观察必须启发理论，而非理论主导观察。全球网络社会的特征在于全球网络的逻辑与多重地方自我肯定的对立，正如我在信息时代的三部曲中所试图论证和记录的那样。(Castells, 2000a, c, 2004)。我们观察到的共同趋势是历史文化的多样性：碎片化而不是融合。于是，随之而来的关键问题是，这些特定的文化认同（由单一历史传承的材料制成，在新背景下重新加工）是否具备相互沟通的能力 (Touraine, 1997)。否则，共享一个社会结构，却无法说出共同的价值观和信仰，会导致系统性的误解，从而酿成针对他者的破坏性暴力。不同文化之间的协议 (protocols) 是网络

社会的基石，因为没有协议，就没有社会，只有宰制网络和抵抗公社。

哈伯玛斯-贝克者（Habermasian-Beckian）的“寰宇文化”（cosmopolitan culture）计划，旨在为世界公民创建宪法，想为全球民主治理奠定基础，正确地指出网络社会的核心是文化制度问题（Habermas, 1998; Beck, 2003）。不幸的是，这一愿景提出了解决方案，却无法确定创建协议的过程，根据经验研究，包括欧洲在内，寰宇文化仅存在于极少部分人口（Norris, 2000）。实际上，在大多数欧洲人的心目中并不存在真正的欧洲认同。

要确定，即使是假设性地，这些沟通协议是什么或可能是什么，需要一种超出理论文本的经验分析。但是，从理论上讲，这是我的主张：**全球网络社会的文化是沟通的协议文化，使不同文化能够进行交流，不必要共享价值，而是共享沟通的价值。**这是说：新文化不是由内容而是过程所构成。这是一种为了沟通而沟通的文化。是一个开放式的文化意义网络，不仅可以共存，也可以在交换的基础上互动而彼此形塑。

我将重新诠释标示信息时代文化最原创的假设之一，“骇客伦理”，来说明这个不可否认的抽象陈述的意义。这是佩卡·希马宁（Pekka Himanen）在他具有影响力的书中所概念化的（Himanen, 2001），并在本书的第19章中总结。骇客伦理（正如在创建互联网、其应用程序以及信息时代基本技术的创新者网络中所体现的）可以两种版本来理解，我认为两种版本都是正确的，并且互补的。第一种版本在知识界和商业界都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它指的是为了创新而创新的文化。创造的热情取代了资本积累作为救赎的手段。玩耍就是生产。与新教（和资本主义）伦理的推迟满足模式不同，这是肯定一种即时满足模式：创造的喜悦和对创作的即时使用。

但是，骇客实践和希马宁的理论中被忽视的第二个维度：共享。知识和发现的自由共享是创新在信息时代（更早期社会的也存在）创新发生的基本机制。由于创新是生产力、财富和权力的源泉，共享的力量与权力的分享之间存在直接关系。因此，为了网络而建立网络，愿意

向他人学习并给予他人你所拥有之物，可能是网络社会的文化：相信网络的力量，通过向他人开放而实现自我赋能，以及多样性带来的喜悦。以骇客网络为例，网络是基于共同的价值观进行的：创造力的价值，通过挑战和创新心智能力的练习获得自我实现的感觉。

我的假设是：网络社会的文化是世界上所有文化之间沟通的协议文化，这种文化基于对网络力量及通过给予他人和从他人收获的协同作用之共同信仰而发展。网络社会文化的物质构建正进行中，但这不是工业社会遗留的主导精英在全球网络中行使力量来扩散资本主义思想，也不是哲学家梦想的抽象、世界公民的理想化提案。这是一个过程，多源社会意识行动者将他们的资源和信仰带给他人，并期待回报，分享多元的世界，从而结束对他者的古老恐惧。

## 结论：理论谬误的实际后果

到这里所提出的分析，如此结论并不令人惊讶：我们不是处于信息或知识社会中。至少，不比我们在其他历史时期更多。知识和信息一直是生产力和权力的重要源泉。如果我们强调我们当今世界的知识成分，暗示我们现在有知识而早期时代是无知的，那还是保持谦虚较好。知识始终是历史相对。当然，我们比几个世纪前知道得更多，我们甚至可以说知识的增长是指数级的，然而在许多科学领域，没有早期发现，我们仍处黑暗无明里。基本的自然或人类生活，我们确实知之甚少。例如大脑，它是我们的来源，但它的结构和功能大部分是未知的。至于社会和经济，我只想提醒读者，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1957年基于1909-1949年（工业社会的鼎盛时期）美国的统计数据，最初建立了作为生产力增长基础的总生产函数（APF）分析，这一增长是资本、劳动力或原材料以外的因素所导致的（Solow, 1957）。无所谓了：信息社会的支持者总是从索洛对生产力的分析开始，以信息的作用为基础来建立他们对新社会主张的论点。

正如我的各种著作和本书中所分析的那样，信息和知识在经济与社会中都至关重要。但它们并不是我们这种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特别之处在于，新的技术范式（信息主义）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

结构，这种结构由电子通讯技术驱动的网络社会所组成。那么，有什么不同？当然，这是技术。但也是网络化的社会结构，以及网络逻辑所指涉的特殊关系之集合。

因此，在我看来，我们必须让信息社会或知识社会的概念枯萎，并将其替换为本章中提出、从各种理论角度研究的网络社会来取代它。我认为这种重新概念化很重要，因为会造成实际的后果。

如果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信息社会，这是电子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明和传播的直接结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将取决于，如到处安装电脑，并推动每个人上网，或者不上网。对信息和通讯技术使用的研究再次证明了技术史家早已确立的观点：只有在文化、组织和机构转型的框架内，技术才能实现其承诺。学校里的电脑只有在老师足够好的情况下才有用。除非学校的组织设置超越了信息时代的学科官僚体系，老师也无法做太多事情。或者，换个角度来说，在许多情况下，自前工业时代的神学院以来变化不大的文化和学术环境中，大学的互联网也无法做太多事情。

此外，在缺乏网络企业所代表的组织形式的传播的情况下，电脑和互联网对提高经济生产力和企业竞争力的帮助甚微。网络公司的泡沫破裂是由商业顾问和未来学家们的幻想引起的，他们忘记了互联网的关键作用是为实体经济提供动力，而非逃向新的虚拟经济领域。电子民主必须从重新定义公民参与和政治参与开始。

从更广泛的社会进化角度来看，信息社会的概念再现了从游牧社会到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如今我们这个时代的顶峰，这显然是历史连续性的神话。人类历史被同化为理性指导下的长征进步（偶尔还要祈求上帝的保佑）。正如电脑、干净的厕所和智能武器的奇妙所证明的那样。没有冲突，没有矛盾，只有技术上预先决定的变化，以及对变化的抵抗。由于对理性的抵抗是非理性的，所以必须消灭它们，以清除通往我们承诺星辰的光明道路。

如果认定我们的社会是网络社会，正如本章所定义和详细阐述，我们必须将机构、组织和社会行动者的网络化能力，在本地与全球范围内作为分析的核心。连通性和对网络接入至关重要。正确结合信息和通

讯技术、发展人类充分利用这些技术的全部潜力的能力，以及基于网络的组织重构，成为确保生产力、竞争力、创新、创造力，最终是确保权力和权力共享的关键。如果将全球网络社会当作超越电信网络的存在，如果我们回忆互联网的互动式、多节点逻辑，那么就可以设计出促进包容和合作的通讯系统。如果所有文化作为网络化文化对话系统的节点都有其相关性，那么超现代性与传统之间并非对立，而是互补和相互学习。

总结来说，信息社会或知识社会的概念，仅仅是对工业社会的技术发展的推断，通常等同于西方现代化文化。网络社会的概念则将重点转移到组织变革上，以及全球相互依存的社会结构的兴起，伴随着其支配和反支配的过程。这帮助我们定义了我们世界的根本困境：一个没有社会控制的全球权力网络程序之统治，或者，替代的，由共同信仰分享价值的使用所统一的，涌现出的互动文化的网络之兴起。

## 参考文献

Adams, Barbara (1990) *Time and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Arquilla, John and Ronfeldt, David (eds) (2001) *Networks and Netwars: The Future of Terror, Crime, and Militancy*.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Beck, Ulrich (2003) "Las instituciones de gobernanza mundial en la sociedad global de riesgo," in Manuel Castells and Narcis Serra (eds), *Guerra y paz en el siglo XXI*, pp. 53–66. Barcelona: Tusquets.

Berners-Lee, Tim, with Frischetti, Mark (1999) *Waving the Web*. San Francisco: HarperCollins.

Borja, Jordi (2003) *La ciudad conquistada*. Madrid: Alianza.

— — and Castells, Manuel (1997) *Local and Global*. London: Earthscan.

Capra, Fritjof (1996) *The Web of Life*. New York: Random House.

— — (2002) *Hidden Connections: Integrating the Biological, Cognitive, and Social Dimensions of Life into a Science of Sustainabili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Carnoy, Martin (2000) *Sustaining the New Economy: Work, Family and Communit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 and Castells, Manuel (1984) "After the Crisis?," *World Policy Journal* (Fall).

Castells, Manuel (1980)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American Socie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 (2000a) *End of Millennium*, 2nd edn. Oxford: Blackwell.

— — (2000b) "Materials for an Exploratory Theory of the Network Socie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1: 1 (January–March), 5–24.

— — (2000c)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2nd edn. Oxford: Blackwell.

— — (2001) *The Internet Galax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2004) *The Power of Identity*, 2nd edn. Oxford: Blackwell. — — and Kiselyova, Emma (2003)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View from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Los Angeles: Figueroa Press/USC Bookstore.

Colas, Dominique (1992) *La Glaive et le fleau: généalogie du fanatisme et de la société civile*. Paris: Bernard Grasset.

Croteau, David and Hoynes, William (2000) *Media/Society: Industries, Images, and Audiences*, 2nd edn. Thousand Oaks, CA: Pine Forge.

David, Paul (1975) *Technical Choice,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Essays on American and British Experie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ischer, Claude (1992) *America Calling: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elephone to 1940*.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reeman Christopher (1982) *The Economics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London: Frances Pinter.

- Giddens, Anthony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a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ould, Stephen J. (1980) *The Panda's Thumb: More Reflections on Natural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Graham, Stephen and Marvin, Simon (2000) *Splintering Networks, Fragmenting Cities: Urban Infrastructure in Global Local Age*. London: Routledge.
- Guillemard, Anne-Marie (2003) *L'Age de l'emploi*. Paris: Armand Colin.
- Gunaratna, Rohan (2002) *Inside Al-Qaeda: Global Network of Terro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Habermas, Jurgen (1998) *Die Postnationale Konstellation*. Frankfurt: Suhrkamp.
- Harvey, David (1990)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lackwell.
- Held, David and McGrew, Anthony (1999) *Global Transformation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imanen, Pekka (2001) *The Hacker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the Information Age*. New York: Random House.
- Hutton, Will and Giddens, Anthony (eds) (2000) *On the Edge: Living in Global Capitalism*. London: Jonathan Cape.
- Johnson, Steve (2001) *Emergence: The Connected Lives of Ants, Brains, Cities, and Software*. New York: Scribner.
- Juris, Jeff (2004) "Transnational Activism and the Cultural Logic of Networking," unpublished PhD thesis in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alifornia.
- Kuhn, Thoma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 Bianca, Oystein (ed.) (forthcoming) *Connectivity in Antiquity*.
- Lash, Scott and Urry, John (1994) *Economies of Signs and Space*. London: Sage.

- Latour, Bruno (1993)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evy, Steve (2001) *Hackers: Heroes of the Computer Revolution*, 2nd edn. New York: Penguin.
- Lucas, Henry (1999)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Productivity Paradox*.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zlish, Bruce (1993) *The Fourth Discontinuity: The Co-evolution of Men and Machin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Mitchell, William J. (2003) *ME ++: The Cyborg Self and the Networked Ci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Mokyr, Joel (1990) *The Lever of Riches: Technological Creativity and Economic Progre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nge, Peter R., and Contractor, Noshir S. (2003)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Network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ulgan, Geoff J. (1991)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 Networks and the New Economies of Communication*.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Norris, Pippa (2000) "Global Governance and Cosmopolitan Citizens," in Joseph Nye and John Donahue (eds), *Governan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pp. 155–77.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Nye, Joseph and Donahue, John (eds) (2000) *Governan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Perez, Carlota (1983) "Structural Change and the Assimil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s," *Futures* 15: 357–75.
- Solow, Robert M. (1957)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39 (August): 214–31.

Stiglitz, Joseph (2002)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W. W. Norton.

Thrift, Nigel (1986) "The Fixers: The Urban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apital,"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Wales, Lampeter.

Touraine, Alain (1997) *Pourrons-nous vivre ensemble? Egaux et différents*. Paris: Fayard.

Volkmer, Ingrid (1999) *News in the Global Sphere: A Study of CNN and its Impact on Global Communication*. Luton: Luton University Press.

— — (2003) "The Global Network Society and the Global Public Spher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46: 9–16.

## 2 走向社会学马克思主义： 安东尼奥·葛兰西和卡尔·波 兰尼的互补汇聚

迈克尔·布洛维（Michael Burawoy）

翻译：黄孙权

本文出处：For a Sociological Marxism: The Complementary Convergence of Antonio Gramsci and Karl. POLITICS & SOCIETY, Vol. 31 No. 2, June 2003 193-261 DOI: 10.1177/0032329203252270 @2003 Sage Publication.

译注：在中国美院举办的文化领导力论坛中，我的发言〈信息技术与社会主义〉中提到现实乌托邦的重要意义与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觉得有必要让更多人知道发言的脉络，便开始着手翻译这篇经典文献，这篇对二十世纪重要意识形态对抗与“社会”的崛起，与当下，尤其是信息技术全球市场引导的国家间内部分配，都极具深刻意涵，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日益重要。没想到初稿有六万字余，经网友告知才知道已有翻译，收于《公共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后悔无知。比较之下，简中版本译文流畅，但有几处错漏。我翻译的版本更正了这些错漏，较为“朴实”准确，也有发表价值与共享价值。此译文中，学者名字与理论用语采繁体中文常见译法。波兰尼与葛兰西的著作引用，我对比了简繁版本的文字，但未全部采用，保留了我自己的理解。

\* \* \*

Michael Burawoy注：对于他们的评论、建议、鼓励和怀疑，我要感谢吉利恩·哈特（Gillian Hart）、马尔科姆·费尔布罗瑟（Malcolm Fairbrother）、刘华仁（Hwa-Jen Liu）、约翰·沃尔顿（John Walton）、肖恩·奥里恩（Sean O’Riain）以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贝弗利·银和（Beverly Silver）乔凡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周围的学生群体。我特别要感谢弗雷德·布洛克（Fred Block），他阅读并评论了无数稿件，给我提供了晦涩的波兰尼文本，并从一开始就鼓励我写作和阐述他自己解释的批评。这篇文章始于我与我的朋友、同事和合作者埃里克·莱特（Erik Wright）对我们共同探索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分歧。以他独特的方式，埃里克试图通过许多批评性评论和相当多的图表来纠正我。如果事情仍然模糊不清，那肯定不是他的错，但也可能不是我的错。最后，我要感谢罗素·赛奇基金会给我重写这篇文章的心灵宁静。

摘要：后共产主义时代需要一种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它将社会与国家 and 经济区分开来，并给予社会优先地位。这种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可以追溯到葛兰西（Gramsci）和波兰尼（Polanyi）的著作。来自不同社会世界遵循着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两者都聚焦于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和超越。对葛兰西而言，先进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市民社会的扩张，它与国家一起稳定阶级关系并提供挑战资本主义的领域。对于波兰尼而言，市场扩张威胁到社会，社会反应是（重新）构建自己作为积极的社会，从而孕育出民主社会主义的胚胎。本文将“社会”作为马克思主义概念，并用它来解释共产主义秩序的兴衰、从阶级政治到承认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的转变、从殖民主义到后殖民主义的转变以及新兴跨国主义的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阶级；社会；霸权；市场

\* \* \*

对许多人来说，社会主义的死亡，无论现实抑或想像，都预示着马克思主义的最终死亡。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仍是对资本主义最全面的批评，提出过最令人信服的可行替代方案的指引。事实上，资本主义的永存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永存。但永存也意味着重建，随着资本主义重建自己，马克思主义也必须如此。毕竟，声称思想应随着尝试把握和转化的物质世界而做出改变是一个重要的理论传统。因此，每个时代都塑造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发展传统以应对当今的问题。在本文中，我提供了一个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纲要，它出现在卡尔·波兰

尼和安东尼奥·葛兰西二十世纪中期的著作中，这是迄今未经检验和意外的汇聚。当他们在努力处理某些新颖和重要的问题时，两人分别从非常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汇聚到“社会”概念。的确，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为，“社会”的动力，主要位于国家和经济之间，是先进资本主义之所以持久和超越的关键，就像其脆弱性证明了苏联共产主义的垮台一样。我将试着展示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也适合后共产主义时代，这个时代被胜利的全球资本主义所主宰，这个资本主义正在惊人地有效地瓦解和摧毁所有对它本身的替代方案。

## I: 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

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共生的。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古典社会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回应，社会主义当时在欧洲还是一个可行和引人注目的运动。马克思主义是在世纪末的知识地景中形成的幽灵，塑造了韦伯（Weber）、涂尔干

（Durkheim）、齐美尔（Simmel）和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建立自己原创理论大厦的基础。俄国革命使得马克思主义走向全新方向，再次迫使资产阶级社会理论作出反应。当世界在二战后分裂成两个阵营时，社会学成为“自由世界”的捍卫者，也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面。在这个时期，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社会学享有极大优势，成为新科学，拥有新使命，扼杀了所有马克思主义的余孽。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爆发的社会将社会学推向了危机，同时刺激了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学通过借鉴马克思主义而得以恢复，今天马克思主义要摆脱后共产主义的低迷，我认为将取决于如何借鉴社会学。每个马克思主义的后代都有自己的独创性和自主性，无法化约同等于其先辈的继承。

### 从对抗到和解

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二十世纪中叶综合了涂尔干、帕累托、马歇尔和韦伯的独立思想，他强烈而得意地否定了马克

思的著作<sup>[1]</sup>。直到他去世，他仍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过时的功利主义，其意义完全局限于十九世纪<sup>[2]</sup>。由于其基础有深刻缺陷，思考马克思主义的遗产毫无意义。结构功能主义，即帕森斯理论，编码成为救世主科学，完全忽略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忽略了其宿敌苏联马克思主义，还忽略了所有其他形式的马克思主义。

除了冷战的意识形态敌对外，他们的反对有其理论基础——帕森斯社会学，特别是《社会体系》（The Social System）<sup>[3]</sup>集中讨论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漏洞。它将“社会”作为一个自主的、全面的、自我平衡的系统，苏联马克思主义在其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框架中没有“社会”的空间。因此，两者之间没有交集，一个缺乏经济和国家，另一个缺乏社会。<sup>[4]</sup>在美国，“意识形态终结”的理论家们庆祝“社会”的稳定力量，是自由民主的堡垒，就像在苏联那方，计划经济主张自己具有生产力的无限扩张和资源的合理分配。双方都有他们的异议人士，莱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和巴灵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注入了他们的批判人文主义与阶级分析，而布达佩斯学派和科拉科夫斯基（Kolakowski）则将黑格尔和早期马克思结合起来反对极权共产主义。尽管他们是未来的先驱，在当时（20世纪50年代），这些仅是两个舒适欢欣陶醉海洋中的小派别。双方都将经历震撼，先是社会学，然后是马克思主义。

就在社会学似将埋葬马克思主义时，1960年代和1970年代报复来了。这次攻击不是来自垂死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而是来自最没有想到之处，就在社会学的家门口。社会运动：言论自由运动、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等爆发了，粉碎了美国和国际的和平。他们对“共识”

（consensus）社会学进行了审判，质疑了社会学对美国社会的乐观主义观点，重振了马克思主义的活力，形成新的理论体系——如《月刊评论》（Monthly Review）中的垄断资本主义理论、依赖理论的低度发展论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英国阶级社会史、德国系统分析和法国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正如社会学在马克思主义找不到任何可取之处一样，现在轮到复生的马克思主义全面否定了社会学。基进和批判理论毫不妥协谴责“共识”在社会学中是“编造的”，就像在社会中一样的虚幻。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当时是《新左评论》才华横溢的辩论家和编辑，他甚至更进一步<sup>[5]</sup>，不满足攻击敌人，而是深入敌营，尝试清除马克思主义本身中所有的资产阶级污染。他谴责霍克海默（Horkheimer）和阿多诺（Adorno）、葛兰西和卢卡奇（Lukács）、萨特（Sartre）和阿尔图塞（Althusser）等“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邪恶勾结，脱离工人阶级，缺乏革命视野。安德森坚持我们要回到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所开创的革命道路上。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论述的，重新审视托洛茨基对苏联的著作是有益的，但其理论在先进资本主义的世界中显得脱离实际<sup>[6]</sup>，只反映了他最熟悉的俄罗斯和苏联世界。托洛茨基遵循古典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与实践都否认社会的现实性。安德森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是在革命乐观主义的爆发中写成的，他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谴责推向高潮，也使得这种谴责失控崩溃。安德森在批评中剥夺了马克思主义所需应对共产主义崩溃和全球市场崛起的核心概念工具。<sup>[7]</sup>

阿尔文·古德纳（Alvin Gouldner）正确地诊断了西方社会学即将到来的危机，他预言了马克思主义的攻击。<sup>[8]</sup>此外，对危机的遏制大致遵循了他的处方，也就是说吸收批判性马克思主义的精华。在摩尼教的“冷战”世界中，社会学寻求消灭马克思主义，现在则以建设性的接触与和解取代。社会学对自己被打碎的基础失去信心，随着福利国家的衰落而失去信誉，它把马克思主义重新吸收到它的许多领域中。它吸取了1960年代的教训，将经济和国家恢复到与社会分析并列的应有地位。重新复活的经济社会学关注工作的转型和退化。政治社会学关注的是资本主义国家或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特征。阶层研究开始关注不平等问题和阶级的中心地位。文化社会学关注的是意识形态统治的力量。比较历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和它的历史理论。在社会学的另一端，人类学家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当时的大理论家布迪厄（Bourdieu）、福柯（Foucault）和哈伯玛斯（Habermas），以及女权主义和种族理论，都被马克思主义所渗透。经典被重新解读，如涂尔干和韦伯成为关注宰制（domination）的理论家、资本主义的批评者，甚至是社会主义的倡议者。马克思主义不再是被诽谤的“他者”，宝藏出土，以振兴疲软，挽救支离破碎的社会学。这种吸收

不可避免地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但也为社会学注入了活力。<sup>[9]</sup>

当社会学走出危机时，马克思主义迎来自己的危机。1990年代见证了共产主义的瓦解，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全球崛起以及抗议和革命的撤退。它们共同粉碎了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乐观主义的残余。本文的论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再生现在取决于吸纳社会学思想。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学的融合应该是双向的。正如社会学借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比较视野，现在马克思主义必须从社会学中吸收解放性的社会观念。离开三十年的对抗，离开葛兰西所谓的“运动战”

(War of Movement)，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学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不同的交往，即葛兰西称之为“阵地战”(War of Position)。两者不是互相征服，而是各自寻求彼此间的同等地位协调，根据谁吸收了谁而定。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当然，这两种融合体可以在相互激励和对抗的状态下并存。

## 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试图占有社会学的批判性时刻。人们可能会认为马克思本人试图将黑格尔和圣西门的社会学概念纳入其中，但说他对“社会”的概念有详细的说明是牵强附会的。正如阿尔文·古德纳所言，社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最多只是一个残留的范畴<sup>[10]</sup>。他当然是指他们关于资本主义的著作，而不是他们关于共产主义的著作，这是完全不同的问题。无论是在《巴黎手稿》中克服异化的概念，还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反复强调只有在社群中个人才能全面的发展天赋，或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宣扬的“关连”

(association)，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或者从巴黎公社与《哥达纲领批判》(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抽象出来的社会主义的概念，或在《资本论》中提到的联合生产者，甚至是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乌托邦与科学》中提到的国家消亡的想法，在这些地方，共产主义的核心都包含了某种社会的概念。马克思和古典马克思主义未能进行的，是对资本主义下的社会进

行补充分析，这种补充分析可能会带来更一致性的共产主义愿景。这就是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计划。

当马克思主义利用社会学分析资本主义时，讽刺矛盾的是，这样做是为了哀悼社会的丧失！我想到的是战间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自觉地吸收了社会学。这是一种失败的马克思主义，它接受了两重挑战：为什么在西方没有社会主义革命，以及为什么俄罗斯革命堕落成独裁政权。在这个双重计划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及其前身，卡尔·科尔施（Karl Korsch）、卢卡奇，大量借鉴了韦伯和弗洛伊德的著作，不是诉诸自治社会，而是诉诸于他们对统治和合理化的理论，甚至挖掘他们对社会消失的理论。挥舞着更新的武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反对第二国际的机械式马克思主义，其认为资本主义会向社会主义自然过度，反对马列主义的革命教条。与时俱进，法兰克福学派发展了有关资本主义（非）理性和持久性的忧郁理论，其中部分悲观情绪来自德国社会学。

然而，还有另一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没有屈服于当时的绝望，而是借鉴了大量唯心主义思想来建立了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它的两位主要代表人物是葛兰西和波兰尼，他们认真对待“社会”这个概念的严肃程度有个人特色，却造成广泛影响。他们走的道路截然不同，但都利用“社会”的思想来保持社会主义的愿景和与工人阶级的密切联系。首先，“社会”是一个概念创新，用来理解资本主义的持久性，以及它未能屈服于马克思为其制定的法则。通过这种方式，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终于开始探讨社会意义了，令人费解这是社会学一直没做到的事。<sup>[11]</sup>

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上，社会不是一个能跨越历史，中世纪世界，部落和复杂系统、传统秩序和现代秩序，能涵盖所有独立机构共同形成一个有条理和有边界的整体的通用概念。葛兰西和波兰尼赋予“社会”概念是具有历史特定性的。对于葛兰西来说，社会是“公民社会”，放在与国家的矛盾联系中才能理解。公民社会指的工会、政党、大众教育和其他自愿组织和利益团体的增长，这些组织在十九世纪末在欧洲和美国大量增加。同时，新的交通方式（汽车、铁路）、通讯方式（邮政服务、报纸）和监管方式（警察）将人们与彼此以及国家联系在一

起。一方面，公民社会与国家合作，以遏制阶级斗争，另一方面，相对于国家的自主性能促进阶级斗争。

波兰尼的社会，是我所谓的“积极社会”（active society），它总是在与市场的矛盾张力中才能理解。<sup>[12]</sup>波兰尼并不总是清楚什么构成了积极社会，但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它包括工会、合作社、组织工厂运动以缩短工作时间、扩大政治权利的宪章运动和政党的基本发展。一方面，市场倾向于摧毁社会，但另一方面，社会会（重新）行动起来保护自己并使市场屈服。<sup>[13]</sup>波兰尼经常提到社会具有自己的现实性，代表自己行动，而葛兰西则将公民社会理解为一个斗争的领域。对于两者来说，“社会”占据了资本主义内部经济和国家之间的特定制度空间，当“公民社会”溢入国家时，“积极社会”则渗透到市场中。对于两者来说，社会主义是使市场和国家纳入自我调节社会（self-regulating society）的支配之下，葛兰西称之为调节社会（regulated society）。

具有这样的社会观念，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在四个方面与社会学有所不同。首先，正如我已经强调的那样，“公民社会”和“积极社会”并非永恒的概念，而是十九世纪末欧洲资本主义的具体历史产物。事实上，“社会”在其两种表现形式中，正是随着古典社会学的产生而出现，打破了将社会视为普遍的主张。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在十九世纪末之前谈论“社会”，但它有不同的意义和重要性。在现代，“社会”的强弱、其特定的配置以及与国家和经济的关系，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都有决定性的影响。

其次，社会并非悬浮在价值共识之外的自主领域。将社会定义为一个由政党、大众教育、志愿组织、工会、教会，甚至是家庭所占据的制度空间时，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关注市场与社会（波兰尼）以及国家与社会（葛兰西）之间的关系。尽管葛兰西和波兰尼的著作并没有特别关注，但假设社会具有自身的完整性和一致性是错误的。相反的，社会是由如毛细血管般的权力所贯穿，常常被分枝散裂成种族、民族，生成不同的性别支配。我将在结论中回到这个问题。

第三，今天的社会学已经将“公民社会”、“市场的嵌入性”

(embeddedness) 和“社会资本”等相关概念纳入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稳定和有效性的条件，但对社会学马克思主义而言，社会是罗马人的门神雅努斯神 (Janus)，前后有两个面孔，既稳定资本主义，也提供了超越资本主义的地势。如果说，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是通过与国家的联系来组织赞同和限制阶级斗争的方式开始，那波兰尼的积极社会，是从抵制市场经济的非人性化影响的方式开始。但他们最终都会问，社会如何创建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秩序，使经济和国家都置于自我调节社会的支配。

第四，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据此扩展了社会学对功利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反感。它把社会学的普遍主张、社会行动和社群理论转化为批判的武器。例如，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论，弱化了权力，强调价值共识、相互补充的角色期望和自我调节机制，旨在反驳现代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描述，而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则成为了对资本主义的深刻谴责。同样的例子还包括埃兹尼 (Etzioni) 和塞尔兹尼克

(Selznick) 等共同体主义者，他们所谓的“共产主义”

(communalism) 和美国 (就算包含了未来的可能性) 相差甚远，而是对它的猛烈指责。边缘化市场和国家，社会学对社会的概念成为了对社会主义的渴望。总之，就像社会学通过吸收马克思主义而驯服它一样，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也试图将社会学纳入其民主社会主义的计划中。

在本文中，我展示了葛兰西和波兰尼从非常不同的经验出发，收敛到了同一个想法，以及他们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批评如何产生了互补的观点，即关于“社会”与资本主义的联系。然后，我将这两种观点结合起来，以揭示资本主义的连续时期、资本主义霸权和反霸权的模式，以及在全球秩序中资本主义的多重轨迹。在结论中，我提出了一个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议程，关于社会的四个主题：首先，论国家社会主义的潜力、失败和后果；其次，论种族性质的社会内部裂缝（先进资本主义以及殖民主义）；第三，论社会与国家、经济和家庭之间的界限；第四，超越国家的社会扩张。

## II: 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传记

将葛兰西和波兰尼联系起来，或甚认为他们是相关的思想家不免有些奇怪<sup>[14]</sup>。葛兰西毫无疑问的属于马克思主义传统，关注列宁有关权力和支配问题，他的独特贡献在于将文化和意识形态置于政治分析的中心。葛兰西对社会学进行了严厉批评，他与涂尔干和韦伯的亲近关系很容易被忽视<sup>[15]</sup>。相比之下，波兰尼常常被认为是韦伯对经济分析的延续，并将涂尔干的标志性声调“社会现实”（reality of society）当成自己的来用。与韦伯一样，波兰尼坚持认为国家在建立和调节市场经济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今天，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通过他的“嵌入式自治”（embedded autonomy）概念<sup>[16]</sup>进一步发展了这种韦伯式的波兰尼思想。与涂尔干一样，波兰尼坚持认为市场的社会基础是不可或缺的，涂尔干所谓的契约的非契约要素以及非契约社会也是如此。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认为，这种涂尔干式的波兰尼，是将社会网络作为市场交换先决条件<sup>[17]</sup>。波兰尼着重于交换领域而非生产领域，他经常瞧不起“大众马克思主义”（popular Marxism），<sup>[18]</sup>所以和葛兰西看起来更没关系了。

因此，二十世纪社会理论的这两位巨人从未被联系起来，我们反倒不感惊讶。仔细审视他们各自对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可以发现他们的共同之处。两人都反对社会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粗暴的“实证主义”。正如葛兰西将社会学归纳为粗糙的因果原子论和铁的历史规律，波兰尼将马克思主义简化为其最经济主义的变体<sup>[19]</sup>。他们界定自身的这个“他者”选择颇有意思，“他者”特征在以下两方都相似，即，一种脱离生活经验的社会科学，脱离历史、阶级的集体意志、政治的不确定性；以及脱离寻求新的知识和道德秩序。他们共同控诉了庸俗马克思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社会学。

在本文中，我旨在展示他们的思想有多么趋同，他们的分歧如何对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作出互补贡献，一是政治贡献，二是经济贡献。超越当时让他们看起来非常不同的争论，并将他们的理论置于他们自身的政治传记脉络里。葛兰西和波兰尼的著作经常像死亡躯壳被肢解，最

有用的部分从被赋予意义的整体中剥离出来，移植到病态的理论中。我打算将恢复这两个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与彼此关系。这需要平行探索赋予他们生命计划意义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这两位人物，历史力量和他们的理论发展密不可分。因此，传记不是背景填充物，而是理解他们思想完整性的本质。只有在确定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共同点之后，才能在下一节中转向他们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不同位置。

## 分歧的社会起源

葛兰西和波兰尼来自欧洲的两端，也来自阶级结构的两端<sup>[20]</sup>。他们最终的智识汇聚，彰显了人类可以超越其社会背景的信念。葛兰西于1891年出生于撒丁岛（Sardinia）的一个贫困农村家庭，家中有七个年幼的孩子，父亲是一名低阶官员，因被捏造的小罪名而在葛兰西七岁时在监狱中失踪，留下母亲独力抚养孩子。葛兰西排名第四，自幼驼背，由于身体畸形，极度敏感，他无法过上正常的童年生活，只能专注于书本和学习。因为贫困，他不断地从一所学校转到另一所学校，历经痛苦的心理身体的挣扎。最终，他靠着坚毅意志进入都灵大学，然而，他在那儿依旧过着悲惨、痛苦、经常孤独的学生生活。

波兰尼则完全不同，他比葛兰西早五年出生，生于1886年，在布达佩斯的一个富裕的中上阶层的“犹太”（虽然改信加尔文教）家庭中长大。他父亲靠着成功的铁路事业致富，为他提供了金钱所能买到的最好的私人教育，包括一群家庭教师和女家庭教师。波兰尼是五个孩子的中间一个，在浓厚的知识氛围中成长。母亲经营沙龙，聚集了当时布达佩斯一流的艺术、作家和基进分子。波兰尼享受文化教育的金汤匙待遇！这与葛兰西的成长经历相当不同，一个通过痛苦发展了他的智力，另一个通过智力发现了痛苦。最终都有相同的社会主义承诺。

波兰尼和葛兰西都受到了献身社会主义革命兄长的影响，但他们自己的第一个政治行动并不是社会主义。正如南方基进知识分子的典型，葛兰西成为了撒丁岛民族主义者，认为北方是非法的殖民统治者。直

到他定居在北方工业城市都灵，看到了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目睹1913年在撒丁岛罢工的农民遭受的暴力镇压，他认识了阶级力量：必须团结北方工人和南方农民，才能挑战北方资本家与南方地主的日益勾结。他放弃大学学业，投身于蓬勃发展的都灵工人运动。他雄辩的笔锋为解放目标发声，孕育雏形期的工人阶级文化。

波兰尼的早期政治活动也具有民族主义色彩。他在1908年仍是大学生时筹组了伽利略骑士团（Galilei Circle），这是个庞大组织，诉求匈牙利脱去封建的外衣，建立一个繁荣、开放的资产阶级社会，拥有自由政治和现代教育。据后来他回忆说，伽利略骑士团有约两千人，寻求民族文化复兴，为工人和农民开展识字运动。波兰尼对俄罗斯民粹主义运动非常感兴趣，这使他在1914年短暂地加入了国家资产阶级激进党（National Bourgeois Radical Party）。奥匈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于1919年解体，匈牙利出现了自由政权，随后是更激进但短暂的苏维埃共和国。波兰尼从旁观察这些陆续发生事件，于1919年6月离开布达佩斯前往维也纳，就在苏维埃共和国于1919年8月1日崩溃之前离开。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但意识到自由民主制度的局限性，提出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以争取民主自由。

## 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

如果说葛兰西和波兰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都成为了社会主义者，波兰尼比葛兰西更不确定，他们都对当时德国正统马克思主义没有太多同情。他们的社会主义观点远非历史决定论的。他们热衷于人类塑造历史的能力。尽管政治灵感都来自俄罗斯，波兰尼从农民为基础的民粹主义者得到启发，葛兰西则从工人阶级支持的布尔什维克获得灵感，但他们都汲取了他们所处时代的意大利和德国唯心主义思想，葛兰西对正发生的俄国革命深感着迷。他于1917年写下的著名文章〈反资本论革命〉（The Revolution Against Capital）是一首对布尔什维克的颂歌。布尔什维克违抗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刻意制定的历史法则，这些法则是当代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无所作为的借口，对葛兰西而言，布尔什维克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他们没有用大师的作品来编撰严格的教义……他们活出马克思主义思想，此种思想是永恒的，它代表了德国和意大利唯心主义的延续，在马克思那里则受到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影响所污染。这种思想认为历史上的主导要素不是原始的经济事实，而是人，社会中的人，彼此之间的人，彼此达成协议，透过协议（文明）发展出一种集体的、社会的意志；人们开始理解经济事实，判断它们，并将它们适应自己的意志，直到这成为经济的推动力并塑造客观现实（objective reality）。”<sup>[21]</sup>”

俄国革命使年轻的葛兰西信仰马克思主义，但不是作为一种科学教义，而是作为一种强而有力的意识形态，一种能够捕捉到底层阶级想像力的具体幻想，激发他们的集体意志，掌控历史。<sup>[22]</sup>但请注意，集体意志是由“社会中的人，彼此之间的人，通过彼此之间的协议”所锻造的，这正是波兰尼所提到的“社会现实”。

与葛兰西的唯心主义相似，波兰尼也从匈牙利著名诗人安德雷·阿迪（Endré Ady）身上获得了灵感。在1919年纪念阿迪的活动中，波兰尼写道：“事实上‘鸟儿飞翔不是因为引力的作用，而是尽管有引力存在’而‘社会的飞跃进步是尽管有物质利益存在，而不是因为有物质利益存在’”<sup>[23]</sup>，反对被实证主义包裹的马克思主义，波兰尼丝毫不弱于葛兰西。

“从未有比相信人类的历史是由独立于人的意志和行为之外的法则所支配的荒谬迷信了。未来等待着我们的概念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未来不存在，无论现在还是以后都是如此。未来是由活在现在的人不断地重塑。只有现在才是现实。没有未来可以赋予我们在现在行动的有效性。”<sup>[24]</sup>”

然而，吸引波兰尼的不是布尔什维克，而是以农民为基础的社会革命党，俄国民粹主义的真正继承者，很快就被执政的布尔什维克所击败。民粹主义者的影响无疑是导致波兰尼将对市场的批评置于其理论的核心位置的因素之一，就像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导致葛兰西从事国家

问题一样。

他们都在寻找制度的典范来体现“集体意志”，为他们的社会主义信仰打基础。葛兰西寻找著名的俄罗斯苏维埃的类比，在都灵汽车工业的工厂委员会中找到了它们。从1919年到1920年，都灵的工人阶级掌控了这座城市，导致了1920年的占领工厂。作为报纸《新秩序》

(L'Ordine Nuovo) 的编辑，葛兰西深入研究了运动的渴望。然而，由于缺乏工会和社会党的更广泛全国性支持，这场运动熄灭。失败的实验让葛兰西在其余生中深思熟虑，认识到资本主义霸权的力量，需要一个有效挑战霸权的工人阶级政党。葛兰西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成员和最终的总书记，他试图与最有阶级意识的工人保持联系，在弃权主义的“虚假激进主义”和工会的“无效改良主义”之间找到一条路。

尽管波兰尼始终与政党政治的保持距离，但他仍然深受红色维也纳的市政社会主义 (municipal socialism) 影响。由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组织，由奥托·鲍尔 (Otto Bauer) 理论化的“功能性民主”，旨在赋予工人组织权力，提高阶级文化。在他为《大转型》所做的笔记中，波兰尼写道，维也纳的市政社会主义取得了“西方历史上最壮观的文化胜利之一”。<sup>[25]</sup>

“1918年开始，在维也纳体制的保护下，高度发达的工业工人阶级的道德和智力水平同等地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他们抵挡了严重经济动荡所带来的贬低影响，实现了任何工业社会中群众从未超越的水平。”<sup>[26]</sup>

追求工人民主和都灵工厂委员会的运动相比，比较不激进，但持续时间更长。波兰尼本人只有在工人大学授课才直接接触工人阶级。他在维也纳的大部分时间 (1919年至1933年) 都在从事新闻工作，为《维也纳匈牙利报》(Bécsi Magyar Ujság)，和奥地利财经报纸《奥地利经济学人》(Der Oesterreichische Volkswirt) 报导美国、英国和苏联的事件。然而，他还是找到时间公开捍卫社会主义经济的可行性，反对冯·米塞斯 (Von Mises) 的市场基本主义。葛兰西的激

烈政治参与导致他对国家进行了批判，波兰尼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涉足使他对市场进行了批判。他们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摸索着通往社会主义第三条路，在放逐中继续深化。

## 流亡：社会理论家和社会主义

当他们希望建立新社会主义秩序时，法西斯主义从在意大利和奥地利失败的革命灰烬中崛起，这一打击是致命的。葛兰西于1926年被控叛国罪并判处二十年监禁，于1937年死于狱中，但在此之前他写下了他的著名《狱中札记》，使他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巨人。他对西方革命失败和法西斯主义的反思，促使他在俄国和法国的革命背景中进行对西方世界的分析。波兰尼于1933年逃往英国，当时奥地利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使他的社会主义前景不可行。1940年，他受邀到美国讲学。由于当时英国正处于战时围城之中，他无法返回英国，因此他在本宁顿学院（Bennington College）担任了三年的教职，写下了即将孕育而生的《大转型》。该书的副标题：“我们时代的政治和经济起源”，这句话作为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的副标题再适当不过。

当法西斯主义中断他们的政治和知识分子活动后，葛兰西和波兰尼都停止了“世俗生活”（the life of the world）。他们的政治形构到了头，但知识原创性仍在前方。葛兰西在意大利被监禁，正是波兰尼进入荒野的时候。在他去世前六年的1958年，波兰尼回顾他的一生：“世界停止了几十年……所以我现在才回归自我，途中失去30年，等待戈多，直到世界再次追上我。”<sup>[27]</sup>葛兰西在监狱中度过的岁月和波兰尼的流亡岁月并非浪费的。事实上，他们创造了二十世纪最富饶的社会科学的一部分。

这正是葛兰西和波兰尼“第二次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时刻。对葛兰西来说，这意味着他背离了年轻时的唯意志论，马克思主义不再作为意识形态，而是科学。他发现了一种更具决定论性质的马克思主义：能完善可能限制阶级形成的、限制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力量，以及对资本主义自发同意的根源。波兰尼则朝着相反的方向，通过马克思的《巴黎手稿》来巩固他的唯意志论。从马克思的早期哲学著作中，波兰尼得

出了这样一个分析：资本主义破坏了人类需要的人文主义，将多面向个体变成单一的、计算中个体<sup>[28]</sup>。与马克思在法国的政治著作一致，波兰尼采纳了当时乐观的正统派看法，即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不相容。世界面临着极端的选择：法西斯主义（没有民主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没有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sup>[29]</sup>。从马克思的经济著作中，波兰尼得出了资本主义危机的趋势，即使这些危机与过度生产或利润率下降无关<sup>[30]</sup>。相比之下，葛兰西拒绝揣测人类本质的最终特性。他否定法西斯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明显对立，认为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制度一样与法西斯主义相容。最后，尽管资本主义可能陷入经济危机，但这些危机不会危及生命。最好的情况，它们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更有利的土壤，最有可能的是，将成为资本主义重新结构自身的载体。

尽管他们解释有所差异，但法西斯主义对他们两人都极其重要。对于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尤其重要，因为这促使他们都寻找法西斯主义扭曲、破坏、吸收的东西—即“社会”的起源和意义。法西斯主义将他们带回到十九世纪，抵抗和抑制资本主义自我毁灭的新趋势。对于波兰尼来说，这个“积极社会”有其自主性：挽救市场免受自毁趋势，成为市场的束缚，威胁要超越和支配它。对于葛兰西来说，“公民社会”是一个新的斗争领域，将国家与日常生活的节奏联系在一起。波兰尼对积极社会的制度组成不清楚，但葛兰西则填补了政党、印刷媒体、大众教育以及各种志愿组织等。对于波兰尼和葛兰西来说，有着薄弱社会的自由资本主义让位给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后者标志着密集复杂的“公民社会”或“积极社会”，受到国家日益精细的干预手段所帮助和唆使。

葛兰西和波兰尼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单向扩张和收缩，不是每个国家都排队紧随领导的脚步。假定国家、社会和经济具有多样化的配置，那资本主义就是多方发展的。问题不在于经济矛盾最最深，或生产力最发达的地方，而在于如何解释通往自由民主、社会民主、法西斯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的不同路径。两人都将美国归为独特的一类。他们认为，每种国家配置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应社会中阶级力量的平衡，特别是对于某些“支配阶级”代表普遍或普世利益的能力。如果国

家社会是定向分析的单位，两者也非常清楚国际秩序对国家安排。事实上，两者都认为法西斯主义和苏联的斯大林主义转型，是对国际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反应。

虽然两者都采用全球分析，但眼光没有离开推动阶级行动的具体生活经验。葛兰西将这种生活经验理论化为“常识”（common sense），其中包含了不同阶级解放潜力的“良好判断力”（good sense）的核心。波兰尼同样对不同臣属阶级的生活经验感兴趣。在他的大部分人生中，都参与了某种形式的工人教育，从伽利略骑士团开始，在维也纳的工人大学教学，在英国于工人教育协会全职工作，在工人教育协会在那里，他敦促成人教育从劳工生活经验开始，并呼吁发展大众文化。<sup>[31]</sup>像葛兰西一样，波兰尼了解宗教的力量，尽管葛兰西反对天主教的窒息影响，但波兰尼则宣扬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潜力。

在他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犁与笔》（The Plough and the Pen）中，波兰尼与他的妻子伊洛娜·杜钦斯卡（Ilona Duczynska）共同编辑了一部匈牙利文学选集，向早期的民粹主义者和启发1956年反共起义的人文主义作家致敬。波兰尼在这里并非谴责共产主义，而是展示共产主义如何孕育了一条老路，一条通往民主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正如葛兰西将“常识”从传统知识分子的掌控下解放出来一样，波兰尼的民粹知识分子将共产主义的潜能释放出来，对抗其正统的辩护者。在二十世纪的伟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葛兰西和波兰尼在关注知识分子在阐述大众意识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并将其与国家与全球历史的展望相连接。

波兰尼和葛兰西都没有失去社会主义未来的视野。在这一点上，他们都聚焦于一个愿景，即将经济纳入“社会”范畴，由一个反应灵敏、权力极少的国家监督。《狱中札记》中对未来社会主义秩序（即葛兰西所称的“调节社会”）的讨论相对较少。然而，其中不难发现工厂委员会运动对葛兰西的深远影响，使工业生产成为团结的熔炉。他的《新秩序》（L'Ordine Nuovo）写作强烈地让人想起涂尔干的有机固体特征：每个人通过参与等级制分工与整个生产过程建立联系<sup>[32]</sup>。同样地，波兰尼受到维也纳的市政社会主义，他所称的“功能性民主”的影响，并将其与行会社会主义（Guild Socialism）联系起来，后者本身

就是19世纪社会主义的一种传承。毕竟，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是波兰尼崇拜的工业革命英雄。在所有关于工业革命的评论家中，欧文是唯一强调社会既是问题也是解决工人堕落后和道德败坏的解决方案<sup>[33]</sup>。他的“合作村庄”（Villages of Cooperation）和“劳动交换所”（Labor Exchange）等自给自足的工人社区计划，正是葛兰西一个世纪前提出的工厂委员会网络的前身<sup>[34]</sup>。工厂委员会和欧文的合作运动都未能实现其目标，但激发了一种社会主义的社会观念，一种新的道德和智力秩序，即使只是短暂地抓住了工人阶级的想象力。考虑到资本主义的持久性，葛兰西和波兰尼都密切关注具体幻想的动员力量。只有对资本主义的不可避免和即将到来的崩溃充满信心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马克思与恩格斯，才能将工厂委员会或欧文主义视为乌托邦而予以否定。

葛兰西和波兰尼对西方失败的革命、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和苏联革命的参与之共同经历，使他们超越了自身不同的社会背景、政治轨迹和迥异的国家环境，分别走向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相同道路<sup>[35]</sup>，其设想是在社会基础之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独立的空间，与经济和国家有关联但又分离。尽管他们都发现了社会，但共同点到此为止，因为他们的关注和解释来自于非常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传统。

### III：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谱系

葛兰西和波兰尼致力共同的事业，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但从不同角度拒绝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进行。他们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和反应来自非常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谱系，一是列宁，二是卢卡奇。列宁和卢卡奇的理论代表了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不完全突破，这种不完全性为社会学马克思主义铺平了道路。葛兰西和波兰尼都没有对列宁或卢卡奇进行延伸的论述，葛兰西对列宁的钦佩毫不含糊，而波兰尼认为卢卡奇的青年时期的著作存在显著的缺陷<sup>[36]</sup>。尽管如此，我下面构建的推测性对话有助于突显列宁和卢卡奇思想中的张力，这种张力由葛兰西和波兰尼概念化公民社会和积极社会提出解决之道。这些对话也通过将葛兰西和波兰尼定位在马克思主义共同传统的平行分支上，使他们成为可比较的。因此，我们先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开

始，这些问题已经存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然后转向列宁和葛兰西的著作，然后是卢卡奇和波兰尼的著作。

## 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相当奇妙精彩。他展示了三个过程在同一时空中发生。首先，资本主义根据其自身的系统逻辑，播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也就是说，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促使他们通过技术剥夺和创新来转变生产，这导致工人被驱逐出生产过程，失业后备军增加，工资下降，最终导致过度生产的危机和利润率下降的危机。危机接踵而至，破产层出不穷，直到剩下最大的（因此也是“最适合”的）资本家。

进入第二个过程。随着危机加深，小资本家消失在日益同质化和退化的工人阶级中；财富集中在社会的一端，另一端极度贫困。由于资本家无法控制危机，也因为他们只是优惠券收集者（收取利息），是无能和多余的。随着日益庞大和同质化的工人阶级，阶级意识增强。阶级分化导致阶级对立的加剧：首先是对抗个别资本家的零散斗争，然后是工会联盟。跨越工厂甚至行业，最终在国家政治层面上形成了工人党。

第二个过程的高峰与第三个过程重合，共产主义的物质条件在资本主义的子宫中成熟。技术的进步提供了缩短工作时间的的基础，垄断、信托和国有化的形成提供了初步计划。只需要最后一步，即夺取国家政权，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秩序。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是一种毫无玷污的怀孕，在其中三个过程同时发生：资本主义的深化危机、阶级斗争的加剧和自发性地创造社会主义物质条件。

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得面对棘手顽固的现实：三个进程没有发生，至少没有同时发生。换句话说，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要拆解这三个过程时空的共生性，随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选举权力增加和革命势头减弱，他们只能在三脚架的一条或另一条腿上施加重量来平衡。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确信经济危机已经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到来，但她认为问题在于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她敦促更具革命性的政治，加强议会之外的斗争来补充选举政治不足。如果工人阶级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她担心结果会是“野蛮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考茨基（Kautsky）持不同意见，最终危机尚未到来。他坚持要有耐心地建立工人阶级的力量，同时等待资本主义耗尽其潜力。他深信资本主义必然会自我限制。伯恩斯坦

（Bernstein）则与两者都不同。他反对卢森堡的革命主张，认为革命既不可能也不可取。工人阶级不是人口的大多数，阶级结构没有极化，而是越来越被中产阶级模糊化。任何革命若由少数派组织，终会自毁梦想。他也反对考茨基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不会走向任何最终危机。所以伯恩斯坦把重点放在第三条腿上，资本主义不仅在自发地奠定社会主义的基础，而且实际上正在成为社会主义。通过不可避免的民主扩张，资本主义将演变为社会主义。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最初于1899年宣布，随着工会变得更加强大和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实力，它越来越受到欢迎。但这种零碎的改革使党远离了马克思主义。

列宁和卢卡奇的著作带有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痕迹，但他们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打破了其历史法则。前者是一位革命现实主义者，坐在俄罗斯的火山口，夹在东方和西方之间，通过其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转型理论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后者是一位革命浪漫主义者，在奥匈帝国崩溃时期立说著作，曾担任命运多舛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公共教育副委员长，他的物化（Reification）理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主义。列宁的著作讲述了在俄罗斯取得的革命成功，而卢卡奇年轻时的著作则是讲述西方的革命失败。

## 从列宁到葛兰西

列宁在重建古典马克思主义方面最为明确。让我们考虑我们三脚架的每一条腿。<sup>[37]</sup>首先，资本主义没有最终危机。列宁认识到竞争性资本主义无法持久，但他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如何重建为垄断形式，同时在全球不平等地投射自己。两者结合起来，国内垄断

资本和国外的掠夺形成了资本主义新阶段，称之帝国主义。不再有任何固定的法则会带来资本主义的最终灾难。它没有崩溃，而是变得衰弱或退化。马克思认为早期资本主义的终结是所有资本主义的终结，而列宁则认为它正在让位于一个由金融资本主导的新的全球新时代。

其次，阶级斗争不会自动加剧。帝国主义在大都市中创造了劳动贵族，工人和资本家在殖民地的剥削中形成了共同利益。在边缘地区，反殖民主义斗争很突出，而在核心地区，如果没有有效的先锋党，工人只能实现工会意识，无法取得更多成果。此外，自由民主制度对缓和阶级斗争作出了自己的模糊贡献：它创造了扩大阶级斗争的最佳条件，但也使资本主义的真正性质变得神秘，至少暂时地使工人误以为资本主义提供了真正的选择。总之，在资本主义落后的地方，阶级斗争更有可能发展出革命形式，而不是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预测的那样，在资本主义最先进的地方。

第三，资本主义不会自发地创造社会主义的条件，尽管它确实创造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如泰勒主义，可以在社会主义下采用。然而，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取代私有财产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首先需要摧毁资本主义国家，然后创建一种新的国家形式，即无产阶级专政。后者由于其根本上的民主特性，将会消失。如果像列宁所信仰的那样，资本主义不会进入最终危机，资本主义也不会内在地产生的工人阶级，那么通向社会主义的过程就不可能是自动的。它只能是一个有意识的、集体努力的成果。因为没有什么规律来保证资本主义的自动消亡，列宁把注意力转向了政治和意识形态，从而预见到了社会学马克思主义。

列宁把他的理论说得好像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但是，正如葛兰西所表明的，在关键的方面，他的理论只是反映了他所处的世界，即具有落后生产力和薄弱的“公民社会”的俄国专制主义政权。即使列宁欣赏民主的战略重要性、工人阶级对帝国主义的支持、以及资本主义的持久性，他仍然没有深入了解西方相对于俄国的独特性。<sup>[38]</sup>留给葛兰西的是，强大的公民社会存在于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在俄罗斯。公民社会在资本和劳工之间协调利益的能力，深化了资产阶级民主驯化

革命趋势的影响力。简而言之，他强调了对社会对革命的重要性，而社会这个概念在列宁理论里完全不存在。

由于资本主义既不会撒下毁灭自己的种子，也不会必然地加深阶级斗争，也不会自发地创造新秩序的基础，因此葛兰西专注于政治和意识形态，这是包括国家和社会的相对自主的领域。葛兰西不是按照经济阶段（早期-先进、竞争-垄断、自由放任-帝国、自由-有序）而是按照上层建筑来划分资本主义时期的，彰显了列宁的潜在见解。区分先进资本主义与早期资本主义在于，前者建立了与扩张国家密切相关的公民社会。这是葛兰西重大的理论突破。

### 从卢卡奇到波兰尼

如果说列宁-葛兰西代表了马克思主义进入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轨道，则卢卡奇-波兰尼代表了另一条路线，仍然扎根于经济领域。这里的转变是从生产到交换，从异化到商品化。<sup>[39]</sup>卢卡奇从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关于商品拜物教的论述中展开对资本主义的精彩分析。对于马克思而言，市场交换作用遮掩生产的中心地位，生产包含了资本主义的规律性必然消亡的秘密，同时也是剥削和阶级形成的场所。生产定义了资本主义的轨迹和经验。市场只是推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驱使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命运的媒介。对卢卡奇来说，商品化不是偶发现象，其定义了资本主义经验，延伸到所有领域和阶层。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将各种关系变成商品，即他所谓的“物化”。物化侵入生产，塑造了工作本身的体验，形成了（虚假的）阶级意识。一方面，资本家只顾眼前利益，将资本主义推向它的末日，而另一方面，同样被物化所笼罩的工人们无法理解他们在共产主义中的集体利益。用卢卡奇的说法，资本家们客观上无法意识到他们的命运，即使他们在面临个人生存的威胁时主观上意识到了。而另一方面，工人们在主观上被暂时阻碍了认识到他们客观上的历史使命。

然而，这种革命性的必然性仅限于哲学领域。如果列宁仅提供了垄断资本主义如何阻碍革命推动的片段性描述，那么卢卡奇则仅提供了关于工人如何通过他们具体化体验来抓住革命机遇的薄弱临时的理由。

卢卡奇写道，工业工人只在体力劳动中被物化，精神生活未受污染；随着资本主义危机深化，去魅后的资本主会自行停滞。他建议，先锋党应保护干部免受物化，同时向工人阶级传达共产主义的愿景。这姿态是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套路，旨在对抗他的物化理论所带来的沮丧影响。卢卡奇是在抓着稻草不放，他无法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革命分析能与他的物化分析的力量相匹配，物化乃是他永久的遗产。法兰克福学派将卢卡奇的消极面发展成为一种批判理论，统治和工具理性会否定革命的主体性，即使革命变得更加“客观”地可能，甚至是必要。

正如葛兰西将列宁的资本主义理论历史化，指出西方的特殊性和社会的崛起，波兰尼对卢卡奇的哲学分析进行了类似的历史化工作。波兰尼研究了市场的历史，其起源、再生产和衰落，主要是在英国，附带提到其他一些西欧国家。他展示了商品化本身如何通过否认土地、劳动力和货币的正当功能来威胁资本主义的生存能力。土地商品化威胁农业和环境，劳动力商品化使工人无能工作，货币商品化引起资本不确定使得现代商业无法运作。在波兰尼的分析中，资本主义只能通过构建“积极社会”来保护自己免受商品化的破坏性影响。卢卡奇的物化是同质且整体，除了同时是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神话般工人阶级，没有任何抵抗与抗衡。相较之下，波兰尼则以积极社会对抗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各阶级自我保护，对抗恶化所推动的社会。积极的社会拥有一些卢卡奇神话般工人阶级的特征，同时存在历史的客体和主体，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它也具有一些非常具体的属性，为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提供了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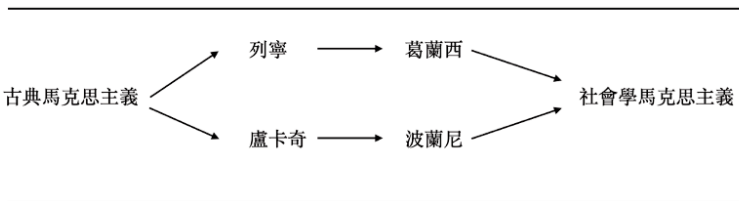


图1: 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谱系

波兰尼和葛兰西从非常不同的马克思主义遗产中汇聚到一个类似的概念，社会是资本主义矛盾的容器，又是超越资本主义的场所。图1总结了不同的轨迹。葛兰西和波兰尼从如此不同的出发点汇聚到类似的框架，即国家、经济和社会的相互关系，强调了将先进资本主义与早期资本主义区分开来的真正的社会进程的重要性，这些进程现在是全球性均衡的而非仅是国家均衡。在文章的其余部分，我们将追溯葛兰西和波兰尼走向他们未被注意的共同框架的不同路径，以及这些路径如何导致对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互补性贡献。

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基本主张将被社会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前提所取代。讨论每个前提时，由葛兰西理论开始，我们会指出其假设的缺点，然后波兰尼是如何补位成功的。

1. 资本主义经济并非播下自身灭亡的种子，而是创造了一个包含但不结束危机和矛盾倾向的积极社会或公民社会。尽管葛兰西将公民社会置于其分析的核心位置，但他对其起源的理解甚少，不知道为什么它可能在某些国家出现而在其他国家不出现。通过将社会视为对市场的反应，波兰尼指出了关于其起源的理论。

2. 随着阶级结构的极化，阶级斗争并非加剧，而是在积极社会或公民社会的领域中组织起来。尽管葛兰西对霸权作为在资本主义内限制组织阶级斗争的分析具有说服力，但他没有反霸权的理论。虽然波兰尼没有理解资本主义霸权的力量，但他将经验从生产转移到交换，为潜在的反霸权创造了基础。

3. 当资本主义生产力受到束缚后，社会主义发生的条件就会自发成熟的主张不再成立，社会主义是一个政治计划，将经济置于自我调节的社会之下。鉴于资本主义没有不可避免的最终危机，阶级斗争不一定会加剧，因此资本主义内出现了多样的政治计划：法西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对葛兰西而言，三个因素塑造了政治轨迹：历史遗产、有机危机里阶级力量的平衡，由知识分子所实现的国家模式。如果葛兰西的分析集中在国家层面，那么波兰尼对市场反应的分析则在地方、国家和全球层面上运作。

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放弃了历史唯物主义，单一生产模式的运动规律和线性模式的接替演进，将之替换为单一世界经济中多种资本主义和新兴社会主义的共存。然而，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完全摆脱决定论，经济和政治的制度结构仍然对历史结果设定了限制。这种有限制的决定论如何发挥作用是本文其余部分的主题。接下来的三节分别涉及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每个前提：（IV）社会的起源和功能，（V）霸权和反霸权的组织，以及（VI）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中的国家发展轨迹。每一节都先论述葛兰西，然后是波兰尼，最后尝试综合两者。

## IV：社会：起源与功能

波兰尼和葛兰西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明显分歧在于，他们划分资本主义时期不是基于其经济，而是基于积极社会/公民社会的出现。对于波兰尼，社会对抗市场，对于葛兰西，社会是国家的延伸。对于两者来说，社会是一种新形式的“组织”或“规训”资本主义的基础，为资本主义内外的世界创造了新的可能性和障碍。但是这个“社会”从哪里来？它是如何诞生的？在这里，这两位理论家分道扬镳：葛兰西对其起源几乎没说什么，而波兰尼将其追溯到市场革命但中间产生了一系列有问题的假设和主张。

### 葛兰西：公民社会的政治功能

葛兰西的《狱中札记》试图处理西方革命的失败，特别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在都灵工厂占领行动失败后，其他欧洲国家工人在战后进行的各种斗争，特别是德国，都未能取得成功，他的理论关注点逐渐转向政治党派、意识形态和国家的重要性。他确定了一种新的统治形式，霸权（hegemony）。

霸权在议会制度的传统领域下的“正常”运作，是强制和同意的结合，相互平衡，没有强制力过度压制同意。事实上，总是确保强制看起来是建立在多数人的同意之上。<sup>[40]</sup>

随着同意的范围扩大，权力不会消失，它的能见度会降低。权力离开舞台，用来对付个别异己和预防危机时刻的到来<sup>[41]</sup>。社会学家将由“价值共识”维持的和由恐吓力量维持的社会秩序相作对照，葛兰西的霸权则明确地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共识不应该被理解为社会学家所说的维持社会的“自发共识”，而应被视为通过特定制度组织起来的東西，而且始终（必然）需要通过潜在的强制手段来支持。

具体而言，新型统治形式在机构上的积极体现就是国家的扩张，包括阿尔图塞后来所称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特别是教育和法律，但也包括葛兰西仅仅瞥见的福利机构。然而，霸权不仅是“政治性的”，它也是“公民的”；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涉及国家的扩张，还涉及国家向新形成的公民社会的扩展，即介于国家和经济之间的机构和组织的综合体。因此，葛兰西引入了新的资本主义时期划分，这个划分不再是由经济的转型来定义，而是由与扩张的国家相连接的坚实市民社会的存在与否来定义。

与国家相连接的公民社会的兴起，不仅标志资本主义的不同时期，也标志着资本主义的不同地域。适用于“现代国家”，但不适用于落后的国家或殖民地<sup>[42]</sup>。在这里，葛兰西划分了“东方”和“西方”的区别。

在俄罗斯，国家是一切，公民社会是原始和软弱的：在西方，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有适当的关系，当国家动摇时，一个坚实的公民社会结构立即显现出来。国家只是外围防御线，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堡垒和工事系统：数量因国家而异，不言而喻，这表示需要对每个国家进行准确的侦察。<sup>[43]</sup>

如果早期资本主义、殖民主义或像俄罗斯这样的“落后国家”可能会屈服于正面攻击，这就是葛兰西所谓的“运动战”，那么先进的资本主义就需要一种全新的策略，即“阵地战”，它将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前，慢慢征服公民社会的“壕沟”。

现代民主制度的庞大结构，包含国家组织与公民社会的协会群体，此种政治艺术要在前线的阵地战中构筑“壕沟”和永久防御工事：他们生产运动战必须的“部分”，这在过去就是运动战的“全部”了。<sup>[44]</sup>

公民社会扼杀任何直接夺取国家权力的企图，因此革命活动涉及重新组织协会、工会、政党、学校、法律制度等。所谓“运动战”的政治策略，是传统革命那种快速深入征服国家的策略，只属于资本主义早期阶段。

在这个时期，大规模的政治党派和贸易工会尚未存在，社会从许多方面来说仍处于流动状态：乡村极为落后，政治和国家权力几乎完全被少数城市或甚单一城市（例如法国的巴黎）所垄断；国家机器相对简单，公民社会相对国家有较大的自主性；特定的军事力量和国家武装部队；国民经济相对独立于世界市场经济等等。[45]

每当葛兰西谈到国家和公民社会时，他都是指它们在阶级斗争组织方面的政治功能。事实上，根据他的定义，国家潜在地可以包含任何机构：“国家是统治阶级为了证明和维持其支配地位而进行的全部实践和理论活动的综合体，想方设法要成功地赢得统治对象的积极同意。”[46]然而，谈论功能避免了起源的问题。这个与国家密切联系的坚实的新公民社会从哪里来？在不同的时候，葛兰西暗示“持续发展之生产的经济机器”需要提高“最广泛的民众的文明和道德水平”[47]，但导致这种新的壕沟、堡垒和工事配置的确切机制从未被研究过。就像功能分析一样，机构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必须出现！

葛兰西可能对现代国家的普遍扩张和扩展机制保持沉默，但他对其中一种特定形式的来源非常感兴趣，即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其中国家吸收并规训公民社会。他的分析聚焦于法西斯主义的阶级起源：首先，农民起义缺席；其次，压迫性的农业社会结构，无法接触工人阶级；第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动联盟。[48]

葛兰西的参照点是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驯服了革命的农民。

因为雅各宾派既代表了法国资产阶级现实中个体的需求和渴望，又代表了整个革命运动的历史发展和未来需求，不仅包括具体个人的需求，还代表了所有需要被同化到现有基本集团的国家集团的需求，所以他们成为了革命进程中唯一的政党。[49]

意大利的加里波第行动党（Garibaldi's Action Party）刚好是法国雅各宾党的对立面，软弱依赖，无法弥补意大利资产阶级的落后。它未能支持将农民成为土地改革的革命力量，没有领导资产阶级巩固国家霸权，而是陷入与保守中间派党（Moderate Party）的斗争，后者在意大利统一运动掌握政治权力，即“复兴运动”（Risorgimento）。从葛兰西的比较观点来看，这种国家统一是自上而下的一场消极革命（passive revolution），一场没有革命的革命，是“转型主义”（trasformismo）小规模权力转移过程。它没有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市民社会，这本应是自由民主的堡垒。

消极革命的遗产不仅是薄弱的公民社会，还包括有限的社会主义运动。南方农民缺乏革命传统，被他们的封建领主、神职人员、教师和公务员等一系列传统知识分子压迫着。当北部意大利的工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历他们的革命时刻，他们被孤立了。他们无法将他们的工厂占领扩展到都灵之外的更广阔区域，不仅因为南方农民是不可触及的，而且因为他们面临着南方土地贵族和北方资产阶级之间形成的反动势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阶级斗争确实加剧了，但随之而来的政治危机却以法西斯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的结局告终。社会主义者和之后共产主义者失去了对公民社会的控制（如果他们曾经有过控制），让位于将社会变成了它专政的工具的法西斯主义。

葛兰西所提供的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和公民社会特定结构的比较史研究，但并没有提供更一般的公民社会起源理论。研究其出现的一般机制时，葛兰西用功能分析取代理论，即资本主义如何从公民社会中受益的理论。这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个革命性突破，他扩展了列宁关于国家的理论，国家包括正面的和压制性的机构，国家包括了公民社会。他发现了一种新的统治形式：霸权，它转变了社会主义的意义和策略。即使没有对霸权机制起源提出深刻理论，他仍主张把阶级力量和阶级联盟置于核心位置。波兰尼将研究重心从政治转移到经济领域内的生产到交换，推进了社会阶级起源分析。

## 波兰尼：社会的经济起源

我们知道，波兰尼的参照点不是意大利而是英格兰；不是政治和资产阶级革命，而是经济和市场革命；不是国家资产阶级的形成，而是国家市场的形成。然而，他分析的关键是“社会”，更准确地说是“积极社会”。此外，出现时间与葛兰西的公民社会是重合的。

在1879年-1929年这半个世纪里，西方社会发展成为紧密结合的单元，潜在着强大的破坏力量.....由于社会被迫适应市场机制的需求，市场机制运作中的缺陷在社会中产生了累积的压力。<sup>[50]</sup>

市场经济需要一个积极的社会。随着市场作为主要的经济调节模式的崛起，社会塑造自己以适应市场，因此成为其矛盾和压力的传递者。

经济不再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而是社会关系嵌入在经济体系中.....因为一旦经济体系在特定动机基础上组织成独立的制度，并赋予特殊地位，社会必须被塑造成这样一个模式，以使该系统按照自己的规律运作。<sup>[51]</sup>

允许市场按照自己的规律运作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必须保护生产的三个关键要素，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免受商品化的威胁。把劳动力降低为可买卖的商品会破坏其独特的人性特质，进而威胁其实用性。同样地，商品化土地会威胁环境和农业，进而降低土地的使用价值。最后，商品化货币会产生不确定性，从而危及交换的过程。再次强调，把价值降低为交换价值会削弱使用价值。社会必须反抗市场创造这三种虚构商品的趋势。“这是那个时代（十九世纪）的历史特征。”<sup>[52]</sup>社会保护免受商品化的影响是怎样得到保障的？是什么促进了社会保护措施对抗商品化？我们是否回到了葛兰西的粗糙功能主义，其中“社会现实”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机器（*deus ex machina*）中自发地遏制商品化？不完全是！社会加诸市场的限制，是受到历史条件下的阶级力量推动。

波兰尼为社会的阶级起源辩护，其依据是英国独特的历史。他花了很多篇幅来谈论史宾翰连（Speenhamland）制度，这是一个初级福利制度，补贴工资，创造了一个缺乏自我组织能力的依赖性工人阶级。1834年史宾翰连制度被废除后，一个虚弱的工人阶级被抛到市场的魔爪中，迫使他们为自己的生存而战。

如果说史宾翰连制度防止了工人阶级的形成，现在，劳动贫困者则是被一个冷酷无情的机制压迫而形成了这样一个阶级。如果在史宾翰连制度下，人民被当做毫不珍贵的兽类照顾，那么现在他们被期望自己照顾自己，而这样做的成功机会微乎其微。如果史宾翰连制度意味着卑贱的悲惨，现在工人阶级则是在社会上彻底无家可归了。如果史宾翰连制度过分强调了邻里、家庭和农村环境的价值，那么现在人们疏离家庭和亲人，断开与一切有意义的环境联系的根源。简而言之，如果史宾翰连制度意味着僵化的腐败，那么现在的危险就是坐着等死。<sup>[53]</sup>

为了让工人阶级生存下来，它必须自我组织进行自我保护。“废除史宾翰连是现代工人阶级的真正生日，他们的直接自我利益注定使他们成为保护社会免受机械文明固有危险的人。”<sup>[54]</sup>这个意志消沉、懒洋洋、迷失方向的工人阶级自发地站起来，捍卫“社会”，反对市场的侵略。

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个具有韧性和活力的社会，与建立工会和合作社等工人阶级机构以及通过限制劳动商品化的法律（如工厂法案）密不可分。简而言之，一旦旧社区被摧毁，社会就会在阶级力量的剧烈压力下扩大。但这些阶级力量是否总是会为了社会的防御而挺身而出呢？读波兰尼对英国的描述，读者可能会这样认为，但转向他对殖民主义的分析，人们很容易意识到建立社会的特定条件。在殖民主义中，社会反应的薄弱性导致文化和社会灾难，摧毁了血缘、邻里、专业 and 信仰等所有形式的土生土长、有机的前资本主义社会<sup>[55]</sup>。特别需要但却缺乏的一个条件是主权。波兰尼主张，在没有独立国家的情况下，殖民地社会无法保护自己免受破坏性的国际贸易和帝国主义的侵害。<sup>[56]</sup>这就是欧洲大国和其殖民地之间的区别。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葛兰西和波兰尼之间更进一步的相似之处。就像葛兰西基于民间社会的强度区分“西方”和“东方”一样，波兰尼基于市场对市场的反应区分英格兰和她的殖民地。这些相似之处还持续到了对他们最感兴趣的两种病态社会形式的起源，即政治专制（法西斯主义）和市场专制（自我调节市场）。葛兰西关注了占主导地位的意大利统一在19世纪下半叶表现出来的消极革命所带来的后果一样，波

兰尼也关注了另一种消极革命，即史宾翰连教区福利制度的反动家长式主义。就像葛兰西认为“转型主义”是一个精英策略，旨在使农民牢固地服从封建等级制度，在18世纪末引入，旨在将劳动力束缚于当地土地贵族阶级之下。转型主义和史宾翰连旨在防止革命（政治和市场），并都依赖于安抚底层阶级的策略。

类似的平行进展不只止于此。让我们更仔细地看看史宾翰连系统，通过将工资提高到最低水平来补贴工资的贫困救济制度，该水平是基于面包的价格而定的。由于工资得到保障，雇主完全有兴趣只支付工人最低限度的工资，其余部分转交给教区。这个系统不利工人发挥能动性，他们的收入不依赖于劳动力的付出，无法激励他们贡献劳动力与生命力。随着教区资源的消耗，“援助工资”和他们可以维持的最低工资水平进一步降低，低于生存水平。史宾翰连并未消灭贫困、依赖、乞讨和逃避工作的现象，反而使其变得普遍。如果旨在保护工人免受劳动市场的影响，那么它实际上从工人阶级的骨骼中吸取了每一丝独立性。波兰尼在谴责史宾翰连方面毫不手软，称其为一种可耻的罪行，是对人类的一种罪行，撕裂劳动阶级并导致最严重的贫困。在它的手中，“生存的权利”变成了“一直到死的疾病”（sickness unto death）<sup>[57]</sup>。其腐蚀作用引发了马尔萨斯、李嘉图和汤森德

（Townsend）自由主义信条的出现，即市场作为普遍万灵药的乌托邦信仰，支持了1834年《新穷法案》中取消所有不在救济院内的贫困救济。

有趣的是，葛兰西以非常相似的措辞谴责了乡村等级制度，使农民变得麻木不仁，使他们屈服于各种传统知识分子的统治，包括从教师到小官员，从神职人员到南方的大知识分子。他也将窒息的乡村社区对比于蓬勃发展的工人阶级，虽然被剥削，但仍然自由地在自己的领域中铸造历史。葛兰西对乡村和城市的底层阶级建立了希望的联盟，而波兰尼则认为废除史宾翰连制度即足以解放工人阶级。最终，转型主义深化为法西斯主义，而史宾翰连在市场革命中被推翻。

## 综合：阶级和社会的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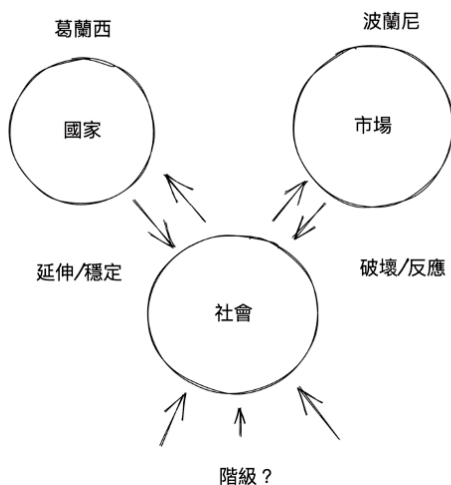


图2: 社会的起源和功能

根据古典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必然、铁律般地埋下自毁的种子，但葛兰西和波兰尼超越了这种理论。在我们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中，资本主义产生的不是自我消灭，而是一个奠定新形式资本主义基础的社会：一个与资本主义结合的社会。图2概述了葛兰西和波兰尼之间的区别。葛兰西的公民社会与国家结合，吸收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挑战。因此，葛兰西描述了在资本主义内部从政治独裁到政治霸权的转变，这发生在西方但不发生在东方。波兰尼的积极社会阻止了劳动、土地和货币的商品化。这里的转变是从市场专制到市场监管，发生在欧洲但不发生在其殖民地。政治独裁（法西斯主义）和市场专制（自我调节市场）的起源都是使底层阶级失去动员能力的消极革命。在葛兰西和波兰尼的理论中，繁荣的“社会”与动员的底层阶级相关联。但这里我们遇到了这两个理论的永恒难题：先有阶级还是先有社会？

葛兰西透过谈论公民社会的功能及其与国家的联系，避免了这个问题，提供了阶级形成的基础。我们并不知道社会从哪里来。另一方面，波兰尼更勇敢，但却陷入了死胡同。波兰尼关心社会的起源。对他来说，社会是阶级动员的产物，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动员，当他们捍卫自己不受商品化侵害时。因此，问题被推回到此类阶级动员的起源。波兰尼认为，自我调节的市场对工人的存在威胁如此之大，他们

只有从失去枷锁别无选择，于是他们克服史宾翰连制度遗留的弱点，组织成一个阶级。问题是，这样非组织化的工人群众如何突然、自发地成为一个阶级呢？为什么他们会在英格兰迅速而自发地成为一个阶级，而在殖民地却没有这样的情况，市场却摧毁了社会呢？

波兰尼采用一种过时的阶级形成观念，认为无组织会奇迹般地导致组织。他写作时还未有汤普森（E. P. 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本重要的转型性著作<sup>[58]</sup>，该书强调工人阶级传统对于阶级形成的重要性，特别是“英国自由民”的作用。要使一个阶级动员起来，它需要“资源”：文化、政治和经济资源。在波兰尼的描述中，这样的资源从哪里来呢？最近的史学研究显示，波兰尼对于史宾翰连制度的解读是错误的。例如Block和Somers表明，波兰尼太容易受到“自由派信条”的影响，史宾翰连并未带来低生产力、低工资和道德堕落<sup>[59]</sup>。更加关键的是，史宾翰连的废除并不与工厂运动、宪章派运动（chartism）、合作运动、欧文主义有关，因为它们的主要据点在英格兰北部，而史宾翰连的遗产在南部最为强大！事实上，可以将英格兰的南北分裂与意大利的分裂画上平行线：南部是封建农业和史宾翰连制度，北部是工业社区。工人阶级的动员不是从无组织和绝望中形成的，而是从北部原始工业化的组织传统中形成的。

今天我们必须修正波兰尼的理论，指出工业化背景下，特别是对劳动力商品化的尝试，为阶级动员铺平了道路，但是已存在的社群塑造了随后故事走上，甚至决定是否会发生。英国工人阶级不能被视为一块白板，面对市场毫无防御。工人阶级早就深深地嵌入社区之中，这给了他们自我保护和推动积极社会的武器。事实上，在玛格丽特·苏默斯（Margaret Somers）有趣研究中，十九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取决于一个已经存在的“公民社会”或她更常称之为“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这个领域在很大程度上由底层阶级掌控<sup>[60]</sup>。她表明，参与式民主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出现，在转向耕植农业之前的放牧农业时期，政治控制被委派给村庄，工人可以利用法律制度为自己谋取利益。他们形成了一个权利社区，这是阶级形成的先驱。随着工业革命的市场扩张，可能会激发工人阶级，但它并不是从无到有创造的。

波兰尼对殖民主义的分析，社会在市场面前毫无防御力，这和英国的强韧形成了对比，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呢？为什么殖民主义对于阶级形成来说要比史宾翰连更加毁灭性？这里也需要修正波兰尼的说法。波兰尼的分析主要依赖南非的殖民历史，而这些历史是在爱德华·鲁（Edward Roux）、杰克·西蒙斯（Jack Simons）和雷·西蒙斯（Ray Simons）以及查尔斯·范·翁塞伦（Charles van Onselen）之前所写的，他们展示了非洲人如何反抗资本主义，限制自身的衰退，并参与自己历史的建设。市场破坏是有限度的，非洲人确实打造了一个强大的工人阶级。但它并不是从无到有产生的。尽管殖民主义是毁灭性的，但它并没有把“高贵的野蛮人”（原文如此）变成“一个没有自尊和标准，实是人类废物般的存在”。<sup>[61]</sup>

殖民秩序不仅未能摧毁原生社会，反倒积极努力维护这样的社会。殖民者为市场对非洲社会的侵入设限。殖民统治力图保护原生社会作为廉价劳动力的储备，一方面是为了政治稳定，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防止白人农民的竞争（他们获得了各种价格补贴和垄断）。较小的土地面积，与白人农民竞争不利（白人有种类的价格补贴和垄断权力），最重要的是受到税收压力，非洲人被迫在城镇寻找就业机会<sup>[62]</sup>。但一旦他们到了矿区（或其他雇主），他们在城市地区居住，享有受限的居住权，作为个体工人出售的劳动力。工资水平低于生存水平虽然确保了资本的廉价劳动力，但也迫使城市工人保持与农村社区的联系，那里的家庭依然靠自己维持生计。以种族隔离和间接统治为特征的殖民统治，依赖于原生社会的生命力，以防止工人在城市聚集，这会对种族隔离制度构成政治威胁（最终也确实如此）。考量利润和政治稳定限制了对殖民社群掠夺，那么这些限制也为形成阶级奠定基础，最终将成为种族隔离的败因。

从我们现在对英国和南非的了解，可以同意波兰尼和葛兰西的观点，即社会和阶级之间存在共生关系：一方需要另一方。但是，波兰尼认为市场是起源力量，从无中生成社会，这是不符合历史的。为了弥补他对社会的历史缺陷，他创造了一个有缺陷的阶级形成理论。这种从无中生成阶级的理论最终也高估了工人阶级实际上可以实现的事情。换句话说，他忽视了组织传承的重要性，不仅误解了阶级的起源，也

错过了这些传承如何塑造、限制和抑制阶级计划的方式。相比之下，葛兰西对起源的问题并不过分困扰，而是对阶级和社会的共生关系有了更现实（且悲观的）理解<sup>[63]</sup>。这种共生关系不是通过市场的介入来理解的，而是通过国家的介入来理解的。在集中讨论阶级、国家和社会的三位一体时，葛兰西并不是太关注市场作为物质力量，而是将其视为意识形态的力量，作为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武器！要理解葛兰西的三位一体，我们需要着手处理他的霸权的第二个维度。

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假设是阶级斗争的加剧。阶级行动者和阶级利益是由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关系所决定的，宰制阶级与臣属阶级之间越来越深入的不可调和的阶级对抗，成为历史的推动力。但是，葛兰西和波兰尼拒绝这种经济主义谬误（波兰尼的术语），转而采用（第二种）霸权的概念（葛兰西的术语），它现在指的是社会如何组织阶级本身，它们的意义、能力、利益、联盟，从而成为转变性阶级斗争的潜力。他们也许拒绝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自动机制论，但葛兰西和波兰尼仍然保留阶级分析，使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阶级范畴：地主阶级、农民、工人、制造商、商人、银行家等，这些都由对生产资料的关系所定义。阶级极化没有必然趋势；不能预设阶级利益、能力、联盟，因为这都受国家政治配置的影响。

### 葛兰西：霸权与生产

不论是考茨基、卢森堡、伯恩斯坦，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古典马克思主义将经济结构赋予了自我生成的动力。实际上，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优点在于它提供了合理的社会变迁理论，尽管事后看来它们常常与形而上学非常相似。虽然葛兰西的理论中仍有目的论的痕迹，但他通过横截面分析复杂的历史时刻有这重大贡献。如果他的时势分析（conjunctural analysis）有灵感的话，一定得自马克思对1848年至1852年间法国政治局势的分析，即他的《法国阶级斗争史》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葛兰西比马克思更加专注于理论化社会变革的限制和可能性，而不是它的固有方向，以及阶级形成和阶级斗争的机会，而不是假定历史的推动力。

在“情势分析”这个标题下，葛兰西探讨了势力的平衡，或他所谓的“力量关系”（relation of forces）。一方面，存在着从经济结构中出现的“社会力”，它们独立于人的意志存在<sup>[64]</sup>。正如他所说，没有人可以改变“公司或其员工的数量，城市或给定的城市人口的数量。”<sup>[65]</sup>在经济领域，一个固定物质现实对可能发生的事情设定了限制。如果没有工资劳动者，你就无法进行工人阶级革命。另一方面，存在军事力量的关系，首先是在严格的技术意义上（国家暴力的客观手段），但也包括军事人员的准备和其主观意愿<sup>[66]</sup>。社会和军事代表了两个外在的极限，政治势力的关系在其中摆动，葛兰西将其理解为各个社会阶级达到的“同质性、自我意识和组织程度”<sup>[67]</sup>。

在政治时刻中，阶级形成可以分析为三个集体政治意识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经济企业层次，在这个层次中，一个阶级成员的行动是他们当地的经济利益，例如作为制造业或工人阶级的某个分支，如商业协会或工会。第二个层次是经济阶级层次，阶级以经济利益为目标进行集体行动，但仅在经济层面上。制造商可能会为廉价食品（例如通过“谷物法”）而战，为组织银行业或仅仅是为了增强政治代表性而战。工人可能会组成一个工会联盟，甚至是一个政党，为保护集体谈判、最低工资法律、保险等进行斗争。

最后，第三个层次，纯粹政治层次，或称霸权层次，阶级将自己的利益呈现为所有人的现在和未来利益。霸权意识形态的运作，是一个有等级的意识形态体系。成就一个有效的霸权力量，一个占主导地位或有潜力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必须做出经济上的让步，以获得下级或盟友阶级的同意。但是让步不能伤及根本，就资本家而言，就是保证利润不变。<sup>[68]</sup>葛兰西在这里阐述了“霸权”统治的第二个维度。如果第一个维度是霸权透过强制强制和同意的结合与独裁区分开来，第二个维度则指的是一种阶级统治的配置，其协商妥协取代了不可调和的利益，合作对抗取代了零和冲突。

除了这两个分析上独立的霸权维度，还存在着资本主义霸权（资本家的统治）和社会主义霸权（工人阶级及其盟友成为普遍阶级，通过强制和同意的组合进行统治）。葛兰西仅暗示了后者，我将在下文中进一步阐述。因此，当讨论“霸权”时，他几乎总是指的是资本主义霸

权。在上述三个阶级形成水平的分析中，他的例子全部来自资本家阶级的形成过程。事实上，所有对葛兰西阶级霸权概念的有趣诠释都假设他在写资本主义霸权。因此，亚当·普热沃茨基（Adam Przeworski）对资本主义下阶级妥协的重要性进行详细讨论和分析，指出它协调了经济利益，还支撑了资本主义民主制的稳定作用。<sup>[69]</sup> 香塔尔·穆菲（Chantal Mouffe）则展示了霸权意识形态的灵活性，指出它必须被视为不同元素的分层组合，而不是常常被理解为从上而下覆盖所有底层阶级的浓密云雾<sup>[70]</sup>。穆菲的解释是，工人阶级不能发展自己的意识形态，而必须在现有意识形态的体系内工作，扩大、深化和推崇与其利益最相符的那些。采纳社会正义、平等、民主的概念，工人阶级或者说其有机知识分子会加深和激进这些概念。也就是说，阶级斗争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斗争，而是霸权意识形态的斗争。

可以理解为什么葛兰西会对提出潜在的，自我产生的反霸权，基于工人阶级的经验和利益的替代霸权持保留态度了。工人阶级很难将自己的利益呈现为普遍的利益。没有资本家的物质资源，它无法向联盟阶层作出实质性的让步，但它仍然必须说服农民和中产阶级为社会主义而奋斗。它所能做的就是声称（承诺！），盟友的长远利益就在于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霸权。转向霸权的制度基础，还有更大的困难。当资本家拥有国家来调控强制和同意的精准组合时，工人阶级只有现代的君主（Modern Prince），也就是共产党，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前线铸造平等、正义和民主。让我们聆听葛兰西的描述。

极权主义的政策明确：1. 确保某个特定政党的成员在该党中找到他们以前在多种组织中找到的所有满足，即隔断成员与外部文化组织联系的所有纽带；2. 消灭所有其他组织，或将它们纳入一个由该政党作为唯一调节者的系统。<sup>[71]</sup>

即使我们把“极权主义”（totalitarian）解释为“整体的”（totalistic）或“无所不包”（all encompassing），对现代君主来说仍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葛兰西想像共产党能够在其内部或监视下培养一个替代性的民主社会，并以此希望调和“整体”（totalism）和社会主义霸权。

如果这场“阵地战”需要巨大的牺牲和耐心，如果它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公民社会的领域进行，如果它无法诉诸暴力，那么人们就会感激社会主义计划的艰难之处了。

有时候，葛兰西会打破他对基于工人阶级独特经验的“反霸权”替代道德和知识秩序的沉默。他说，有机知识分子必须打击工人的常识，这些常识“源自过去，被不加批判地吸收”造成工人们道德和政治的被动，发扬工人彼此共享的良知，即“实际地改变世界”<sup>[72]</sup>。在下面的引文中，葛兰西罕见且明确的将生产领域作为一个上升的社会主义对抗资本主义霸权的替代方案之基础。

从众行为（conformism）永远存在：今天涉及的是“两种从众行为”的斗争，即霸权的斗争，是公民社会的危机。社会的旧知识分子和道德领袖感到他们逐渐失去立足点，他们的“说教”就是“说教”，脱离现实，只有形式没有内容，没有灵魂的形体。这就是他们保守和反动倾向的原因；他们代表的特定文明、文化和道德形态正在分解，他们高声宣布文明、文化、道德的死亡，危机导致他们生活和思维方式消失，因之他们呼吁国家实施镇压，组成与现实历史进程脱节的反抗团体，拖延危机。另一方面，孕育中的新秩序的代表们，受到对旧秩序的“理性”仇恨的启发，宣扬乌托邦和美妙计划。孕育中的新世界的参照点是什么？是生产、劳动的世界。最伟大的功利主义必须依据传播原则来创造道德与知识的分析，集体和个人的生活必须依照生产机器的最大化组织起来。在新基础上的经济力量发展和新结构的进步装置，将治愈不可避免的矛盾，当新秩序的代表们由下而上建立的新“从众行为”时，将允诺自我纪律的可能性，如包括个人自由的自由。”<sup>[73]</sup>

社会主义以符合工人阶级解放的方式来呼吁扩大生产，沿着都灵工厂委员会的路线。“正是在代表工厂作为实物生产者而非利润生产者的机构中，他（‘集体工人’意义上的工人）展示了外于他所习得的意识的政治表现。”<sup>[74]</sup>因此，葛兰西相当正统地指出生产是替代霸权

的熔炉。当然，资本主义的分工将工人降至“细节的分析动作”，但同样原因也让工人认识自己在国家和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这就是他们共同意识的良知，在经济分化的社会底层中，为了自身自由，反对无所不在的资本主义霸权的反霸权。

但是，这种生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否足以在公民社会的战壕里激发一场工人阶级的阵地战，与同盟阶级结合起来？其他阶级没有被以生产为中心的世界的思想所“感动”，不正是委员会运动的问题吗？至于工人阶级本身，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工人阶级何曾有过委员会的想法？这难道不是一个特殊时期，不仅是政治危机，而且是新兴汽车工业内技术工人统治的特例？一旦福特主义到来，任何颂扬生产的诱惑都被扼杀了。意大利工人并没有像葛兰西所希望的那样接受福特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更高的生产形式，而是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以罢工瘫痪来反对它。如果没有一种意识形态来建立新的秩序，没有物质上的让步来附和它的盟友，没有一个国家通过强制和同意的结合来组织它的统治，工人阶级怎么可能用自己的霸权来取代资本主义的霸权？如果葛兰西让我们相信资本主义霸权的力量，那么波兰尼是否发现了盔甲上的一些缺口？

### **波兰尼：社会利益与市场**

虽然葛兰西反对任何决定性的历史规律，但毫无疑问他有个首选的终点，即社会主义，而且他正是从这个角度看待所有的历史轨迹。我们将看到的，波兰尼也是如此，他也推崇一种结合性的历史观，在这种历史观中，替代性的轨迹总是可能的。他一方面密切关注英国历史，另一方面关注其他国家的多种结果—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也证明他对未来有必然性的反感。在他关于史宾翰连的兴衰相当偶然的叙述里，市场的出现并没有什么必要。只有当“自我调节”的市场在英国兴起时，它才会遍布全球，尽管是不均衡的，产生了不同的反应浪潮和政治解决方案，其中之一就是潜在的社会主义。

不同于葛兰西对于任何情境的三个时刻（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分析，波兰尼转移了他的分析焦点关注完全不同的领域，即他所谓的三

种虚拟商品（土地、劳动力和货币）。商品化破坏了它们的真实特性。正如我们已经观察到的那样，这三重的商品化为阶级对抗市场的腐蚀效应铺平了道路。在英国，工人通过合作运动、工会主义和宪章运动来对抗劳动力的非人性化。通过多种途径，制造商因此被阻止追求盲目的自私利益。在土地方面，农业阶级引入了环境法律和关税，以保护他们在农业方面的利益。在货币方面，各个阶级的利益都受到影响。在开放的世界市场上，波动汇率对企业 and 所有人都有破坏性影响。构建了由中央银行保护国家货币以符合国家共同利益。

如果商品化为阶级反应创造舞台，一旦积极社会出现，是什么决定了阶级的实际动员和阶级利益的组织呢？是否有类似葛兰西的三个阶级形成层次的概念？就像葛兰西将狭隘的经济-企业或甚至阶级的经济利益视为阶级组织的有限基础一样，波兰尼反复表示，动员“分段”或“狭隘的阶级利益”无法取得预期的结果<sup>[75]</sup>。正如葛兰西的霸权，在波兰尼的阶级观念中，阶级在捍卫共同利益时更有效。这正是波兰尼和葛兰西的分歧所在，共同利益不是资本主义利益的另一个名称，而是代表着社会利益。“最终，让事情发生的是整个**社会利益**，尽管他们的捍卫主要落在一群人而非另外一群人。”<sup>[76]</sup>因此，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地主阶级通常代表社会利益反对商品化。他们在立法上处于领先地位，规定工作日的长度，因此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反对剥削。在其他时候，工人阶级似乎站在最前线，把自己的利益当成社会利益来维护。资本家在反对开放汇率时也可能成为捍卫共同利益的先锋。阶级彼此竞争已争取代表自身利益，以维护和扩大社会。

当波兰尼写道：“阶级的命运往往由**社会需要**决定，而不是社会命运由阶级的需要决定。”<sup>[77]</sup>当阶级为自己的局部利益而斗争时，他们将将是无效的，但当他们为捍卫或扩大社会而斗争时，他们可能会更成功。换句话说，对波兰尼来说，社会是超然的历史范畴，而不是阶级！这就是为什么他如此强烈地坚持认为，社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就是为什么他如此强烈地坚持“社会现实”，以及为什么我们把他的“社会”称为“积极社会”。他使用从“自在社会”（society in itself）到“自为社会”（society for itself）的运动取代了传统的“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社会主义不是别的，而是实现其潜力的社

会：“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工业文明中固有的趋势，即通过有意识地使市场从属于民主社会来超越自我调节的市场”<sup>[78]</sup>。

这里不止一点目的论的味道！社会主义可能不是必然的，但“工业文明的固有趋势”也不远矣。我们想起了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的进化社会主义（evolutionary socialism），民主制从政治领域向经济领域的法律扩张。另一方面，多少都有些暗示，转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消灭私有财产也非平稳的、无摩擦的过程。

从经济体系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与当下局面彻底切割，因为它摆脱了试图让私人获利成为促进生产活动的普遍动力，不承认私人拥有主要生产工具的权利。<sup>[79]</sup>

波兰尼并未讨论这种“从现实中直接发出的基进改变”，这种断裂将如何实现。他未能深入探究和问题化社会主义过渡的原因，在于他不能欣赏阶级统治的力量。<sup>[80]</sup>波兰尼谈论到工业文明本身的固有趋势，而不是资本主义的趋势，忽视了资本家全力反对废除私有财产或坚持追求利润的事实。

对于波兰尼来说，在资本主义里，任何阶级都可代表自身利益来作为普遍或社会的利益。这不是资本家的特权！波兰尼谈论到阶级代表普遍利益并不是巩固统治的手段；这不是霸权。<sup>[81]</sup>当波兰尼谈共同利益，或偶合利益（coincident）是联系起所有阶级的，葛兰西说的是对立阶级利益的协调（coordination）。我们可以看到葛兰西和波兰尼对英格兰地主阶级的处理方式的差异。两者都承认，当地主阶级为缩短工作日的长度而与工人阶级一起奋斗时，代表了一种普遍利益。然而，波兰尼认为这种普遍利益是所有阶级共同拥有的社会利益，葛兰西则将普遍利益视为资本家阶级的开明利益，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时候将会占上风。

工业发展所创造的阶级关系，促使资产阶级不会全力反对旧制度，而是允许旧制度的一部分继续存在，并在其背后掩盖自己的真正统治。<sup>[82]</sup>

波兰尼将“社会”（积极社会）作为各阶级团结的基础，葛兰西则将“社会”（公民社会）视为资本主义霸权的武器。这种霸权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转向社会主义需要进行艰苦、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阵地战。毫无疑问，资产阶级民主提供了比专制资本主义更丰富的地形，以进行阵地战，例如法西斯主义，但并没有暗示资产阶级民主具有成为基进民主的必然趋势。资本主义霸权的力量，通过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的联系发挥作用，必须透过广泛的斗争转化成根本上不同的新道德和知识秩序，即所谓的“规训社会”。在这两种情况下，社会主义的终点是相似的：经济服从于自我组织的社会，不过葛兰西对其实现更加悲观。

### 综合：生产与交换作为斗争基础

葛兰西十分重视资本主义霸权的力量，以致于他不理解霸权如何被削弱。工人没有物质资源或强制手段的能力来进行有效的阵地战。他们唯一的武器似乎是有机知识分子，通过他们与工人阶级的紧密联系，可能发展出一个政治意识形态，围绕着一个替代性的霸权形成集体意志。根据葛兰西的说法，这样的意识形态必须基于实践性地改造自然的核心，集中在生产组织上。但今天这种观点已不再具有说服力。在一篇有先见之明的论文〈福特主义和美国主义〉（Fordism and Americanism）中，葛兰西描述了在福特主义下霸权是如何在工厂中产生的，这也与美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落后有关。福特主义在全球推广，虽然最初移植遇到了阻力，但一旦生根发芽，它再次成为资本主义的共识。如果生产从未能成为反霸权的基础，今天更不能这样认为了。<sup>[83]</sup>

波兰尼或许不欣赏资本主义霸权的力量，但他却矛盾地提供了一个更有说服力的反霸权的理论。相较于生产，市场经验更能吸引所有阶级。市场对工人来说，似乎意味着失业、贫困、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惨痛的工作条件。对农民来说，市场意味着失去土地和被迫成为雇佣劳工。市场对地主来说，意味着空间的品质下跌和廉价食物的进口。对资本家来说，市场的无政府状态会以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威胁生存。

妇女在工作和家务的加速中面对市场，面临着双重负担。每个人都因为市场的不受限制会导致环境破坏、全球变暖、有毒废弃物、自由时间被殖民等等而深受其害。然而，问题在于“反霸权”运动可能具有什么样的阶级特征？工人阶级，不论何种理解方式，能成为组织反霸权的主导力量吗？表1总结了葛兰西和波兰尼对霸权和反霸权的理解的优缺点。

	霸權	反霸權
生產領域	1. 生產是組織霸權的基地 2. 資本主義累積是霸權的物質基礎	葛蘭西反霸權概念薄弱，因為基於虛幻的，替代性道德和知識秩序的生產主義的視角。
交換領域	波蘭尼霸權觀念薄弱，導致對資本主義弱點的幻想	1. 商品化是反資本主義基地 2. 限制市場是普遍利益

表1 葛兰西和波兰尼的霸权和反霸权

葛兰西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论点，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积累是资本主义霸权的物质基础，但他认为生产，至少是生产的经验，也可以成为反霸权的基础，这是错误的。他和马克思一样认为市场是表象，掩盖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核心，生产是旧秩序衰亡和新秩序基础的魔咒。然而，异化和被剥削的劳动力可能激发有限的替代方案，但它没有市场的普遍性，市场以多种方式影响着每个人。因此，市场为反霸权提供了可能的基础。我们可以在反对全球化的多种形式的运动中看到这一点<sup>[84]</sup>。从建立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葛兰西提出了霸权理论，但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反霸权基础，波兰尼为我们提供了反霸权结构的路标，尽管他没有意识到前方道路的障碍。

## VI: 国家：全球秩序下的国家轨迹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替换了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前两个命题。第一个命题，资本主义产生自我消灭条件的趋势被替换为资本主义产生包容和吸收自我消灭倾向的社会。第二个命题，极化和深化的阶级斗争被

替换为在霸权领域组织斗争。现在我们来到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命题：随着资本主义的自我毁灭，同时也创造了新社会主义秩序的物质基础。对于葛兰西和波兰尼来说，社会主义必须在资本主义内部启动，但两者都将这个过程视为自我意识集体组织的预示政治，不过这预示的社会主义既非自然发生的，也非必然的。

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命题是其线性历史观的巅峰，其中社会主义首先出现在新秩序条件最成熟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每个国家按照自身条件的成熟度依序迎接社会主义。就像在跑道上的飞机，它们按照严格的顺序飞上天空，每一架都注视着前面的那一架。正如马克思告诫德国人的名言：“de te fabula narratur”，在英国，你会找到你未来的故事。<sup>[85]</sup>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摆脱了机械的一致性，认识到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独立性，因此，先进的资本主义沿着不同的动脉扩散，每个动脉都有不同的可能性，而不是排队等待一个单一的未来。政治而非经济危机是引导国家沿着不同轨道发展的转换点制。此外，一个国家特定的危机解决方案可以校准其他国家的发展轨迹。这是线性历史观的最后一击：不仅没有单一的成熟度维度可以用来排列国家，不仅经济和政治力量组成发展的引擎，而且发展压力和障碍来自其他国家和自身在全球秩序的位置。

葛兰西和波兰尼拒绝线性历史观念中的目的论，采用了“最终目标”（telos）作为评估不同发展轨迹的标准。葛兰西一直在探究国家的社会形态转型为社会主义的条件和可能性。当然，某些国家提供了更大的机会。同样地，波兰尼根据它们提供的自由程度来评估不同的自我调节市场替代方案。然而，在某种程度上，波兰尼和葛兰西有所不同。葛兰西认为国家发展轨迹是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形构，而波兰尼则认为它们是经济与积极社会之间的（不平衡）关系。这不仅与他们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框架有关，也与他们的关注的国家有关，葛兰西的意大利，波兰尼英格兰，他们是从这里开始进行比较历史研究的。

## 葛兰西：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形构

我介绍了葛兰西有关公民社会的概念，作为他对资本主义时期划分和分类的基础。在早期的资本主义中，公民社会薄弱，独立于国家自治，而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广泛的领域中逐渐扩展其网络，通过教育、交通、邮政、电信、警察、政党政治、大众媒体等扩展到日常生活，与国家相连。对葛兰西而言，资产阶级民主制是先进资本主义的国家与公民社会达成“适当平衡”的。法西斯主义仍然是国家吸收公民社会、破坏其自治、调控其节奏的异常情况。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的界限消失了。法西斯主义应与社会主义区分开来，因为社会主义倾向于解散国家的强制机构，通过自我调节的社会扩大自由。<sup>[86]</sup>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比代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的两种不同发展道路，但它们是在与美国和苏联的进一步比较中框定的。在解释国家和社会的不同配置时，葛兰西依靠了三组原因：（1）历史遗产（过去的积淀）；（2）阶级斗争引发的有机危机；（3）国家对彼此造成的挑战。我们将逐一处理每个原因。

像许多二战期间欧洲的知识分子一样，葛兰西对“美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认为美国是一个经济先进但政治落后的社会。由于没有封建遗产需要应对，也就没有相应的寄生阶级需要国家组织其同意，美国能够有效地使其经济和上层建筑合理化。

美国没有“伟大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但也无须承担重负。相比于欧洲，美国生活水平要高得多，但资本积累依然取得惊人进展的主要原因之一（肯定比其所谓的自然财富更重要）。历史没有留下黏性寄生沉积物，让工业，特别是商业能够在健全的基础上发展。<sup>[87]</sup>

福特主义是资本主义合理化的典型形式，从生产组织开始向外扩展，延伸到意识形态和政治。在历史条件的支持下实现，这是葛兰西对福特主义的描述。

通过熟练地结合强制力量（在地域层次上破坏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和说服（高工资、各种社会福利、极其微妙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宣传），相对容易地使整个国家的生活围绕着生

产进行合理化。霸权诞生于工厂，只需要极少量的专业政治和意识形态中介者就可以行使其权力。所谓的“群众”现象...只是这种“合理化”社会的形式，在这种社会中，“结构”更直接地支配着上层建筑，并且后者也被“合理化”（简化并减少数量）。<sup>[88]</sup>

在生产过程中通过有效结合强制力量和同意来组织霸权，公民社会要组织对资本主义的同意就无关紧要了。公民社会的战壕无须深挖。因此相较其他地方，美国经济优势只需要更瘦小的公民社会，我们可以用“大众社会”（mass society）的概念来代替公民社会。

缺乏异议阶级的组织，国家就无需提升到霸权层次，在经济企业上直接促进资本的经济利益就行。<sup>[89]</sup>事实上，霸权斗争甚至还未开始，因为工人们仍然忙于捍卫他们的工艺传统，这斗争早在十八世纪已经在欧洲展开。美国工人在政治上落后是因为缺乏欧洲的政治自由主导的革命斗争。葛兰西指出：“此外，还应该考虑到缺乏国家同质性、种族文化的混合以及黑人问题。”<sup>[90]</sup>因此，葛兰西对先进生产力所带来的解放意义没有任何幻想：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超级理性化的资本主义使得美国政治上比任何其他先进国家都要落后。然而，这些先进的生产技术本身并不具有限制性。在具有阶级意识的意大利工人手中，尤其是如果他们组织成工厂委员会，福特主义可以产生社会主义的效果。

与美国完全相反的是俄罗斯：一个深陷封建遗产且政治老练的落后经济体。在这里，社会主义革命代替了意大利消极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但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只能在革命之后建立，并透过由上而下的方式来培育社会主义霸权。党国必须种下公民社会的种子，希望在贫瘠的土壤中也能见到生根发芽。对于没有先前道德和知识发展的群体来说，登上国家权力后：

必须要通过执政来确定建立一个复杂且结构良好的公民社会的意愿。这个公民社会存在于政治社会的外壳之内，个人可

以在其中自我治理，而不会与政治社会发生冲突，反而成为其正常延续和有机补充。<sup>[91]</sup>

这种后革命的“崇拜国家主义”（statolatry）很容易陷入“自我放任”的境地，变成“理论上的狂热主义”或被认为是“永久的”。<sup>[92]</sup>这可能是葛兰西对斯大林主义的暗中批评。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葛兰西来说，经济因素不会以任何简单线性的方式限制政治上的可能性。

到目前为止，葛兰西对二十世纪意大利、俄罗斯和美国的分析看起来像是班革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的比较社会学，通过比较不同国家的历史来解读民主和独裁的阶级起源，并假定国家的结果是明确、固定和独立的。<sup>[93]</sup>但接下来的两个步骤使葛兰西超越了这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历史遗产提供了阶级斗争的场域，这反过来又可以引发危机，使国家从一种政治形式转向另一种。关于经济危机，葛兰西写道，它们只是潜在的传播替代意识形态的场域，也是统治阶级重新确立霸权的机会<sup>[94]</sup>。政治或有机危机则更加重要，因为它们往往是国家历史的转折点<sup>[95]</sup>。通过阶级斗争引起的霸权危机有两种形式：一是支配阶级内部和之间不可挽回的分裂，二是支配和从属阶级之间的灾难性力量平衡。并不清楚葛兰西指的是哪种霸权危机，尽管在战后，资本与劳工之间的毁灭性的力量平衡，法西斯主义在对抗社会主义方面取得了胜利<sup>[96]</sup>。有机危机或霸权危机是历史性的关键时刻，当遗产和结构失去了它们的韧性、顽固性，未来出现惊人的开放性之际，就是替代轨迹出现的可能性时刻：民主可能催生法西斯主义或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可能催生资本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

历史传统问题不仅可能因为霸权危机而受到干扰，还可能因为其他国家的转型对其产生客观制约或新的意识形态影响。<sup>[97]</sup>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历史不仅仅是一个孤立而独立的“案例”，用于解读特定政治结果的因素，还可能改变国家的意识形态地形。在任何成功的国家革命后，都会出现一个“消极革命”时期，在这个时期，其他国家的统治阶级会防范在自己的国家中出现任何革命的重演，这是一个反动时期，其中新的强制和让步的组合成为时代秩序。<sup>[98]</sup>

因此，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反动思潮席卷整个欧洲，支撑着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地主政治崛起，甚至法国自己，从热月政变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

只有当新的资产阶级为夺取权力，击败了那些不愿承认其已被彻底取代的旧社会代表，击败仍然维护1789年革命所创造的新结构后已经过时的更加新潮的群体；资产阶级才证明了自己对于旧和非常新的事物都具有活力。<sup>[99]</sup>

换句话说，1871年标志着后革命时期法国消极革命的最终超越，以及资产阶级霸权的巩固。

同样地，在俄国革命之后，反动阶级利用社会主义或“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危险，法西斯政权巩固了权力，在力量平衡考虑的情况下，以社会民主主义形式出现，美国也出现了新政。虽然葛兰西对二十世纪20年代末苏联政策向中央计划和强制集体化的转变进行了谨慎的解释，但这也可以说明是同一时期“消极革命”的一部分，这种革命将法西斯主义带到了意大利和德国。<sup>[100]</sup>

不仅政治威胁，经济威胁也在全球共鸣。法西斯主义是意大利资本主义唯一的出路，被传统的地主和小资产阶级所束缚，无能与建立在更加合理化的上层结构之上的经济体竞争，尤其是在没有封建遗产的情况资本主义发展蓬勃的美国。<sup>[101]</sup>法西斯主义领袖依靠传统阶级的畏惧而获得支持，通过动员对美国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敌意来使其经济实现法人化，并抵御国际竞争。相比之下，葛兰西认为意大利工人阶级将美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进步面向的福特主义化身而受到了欢迎。因此，美国先进的经济不仅对欧洲构成经济竞争，而且被敌对阶级动员，当成美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今天，另一种美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不是福特主义而是新自由主义，同样成为战场，因为市场意识形态被发展中国家的支配阶级所吸纳，以获取援助，刺激经济，疏通被剥夺权利者的愤怒。

采纳或抵制外来意识形态的不一定总是统治阶级。在葛兰西早期的著作中，他指出俄罗斯工人阶级不必经历所有的阶段斗争，而可以直接

吸收欧洲先进工人阶级学到的经验和创造的意识形态。俄罗斯工人阶级可以跳过意识形态阶段，直接从英国工人阶级停留的地方开始。<sup>[102]</sup> 他们可以直接采纳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能激发被压迫阶级集体意志的意识形态。今天，我们注意到新自由主义已经激发了反对全球化的跨国运动。“反全球化”是一种容易携带的意识形态。

尽管葛兰西对国家间的相互关系有想法，但这世界没有自身的逻辑。某些国家或一个国家集团可以具有霸权地位，将世界组织成某种等级制度，相对于国际性（internationality），他没有跨国国家（transnationality）或超国家（supernationality）的概念，葛兰西始终将国家当成基本的分析单位，是历史和外国力量汇聚的地方，是霸权危机的孕育地。<sup>[103]</sup>

### 波兰尼：对市场的不同反应

葛兰西提供了一个通用的矩阵，以历史和环境因素为基础，用于比较不同国家，追踪它们的分歧轨迹，为阶级斗争和可能的未来设定了基础。归根结底，历史没有内在的动力学：经济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因为阶级斗争乃是一系列取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的随机产物。波兰尼回归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但并非回归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分析，而是着眼于探讨市场在不同时期引起的社会反应如何形塑了阶级斗争的场域。

从两个角度来概括塑造了十九世纪社会历史的那场运动。首先是经济自由主义原则与社会保护造成深刻的机制冲突：另一方面则是阶级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与上述原因纠缠一起，把危机变成了大灾难。<sup>[104]</sup>

让我们看看他的分析如何在对市场的反应中具体展开，首先是在地方层面，然后是在国家层面，最后是在国际层面。

“十九世纪的社会史因而是一个双重运动的结果：就真正的商品而言是扩展市场组织；就虚拟商品而言是限制其发展。”<sup>[105]</sup>那么，这个

限制是如何发生的呢？波兰尼主要关注是英国，反对史宾翰连法案孕育了自由主义信条，将市场美化为万能良药。十九世纪30年代的改革法案无节制地推动市场自由化，迫使工人阶级，尤其是其地主阶级去寻找自己的生路，建立商品化之障碍。市场释放出一股阶级动员的洪流，进而涌入（重新）构成社会。“虽然自由放任的经济是有意的国家行动的产物，但对自由放任的后续限制是以自发的方式开始的。自由放任是计划的，但过程却非计划的。”<sup>[106]</sup> 工会、宪章派运动、合作运动、欧文主义是对市场破坏的在地反应。但是，随着这些当地支流的展开，它们最终流入了全国性运动。

波兰尼的历史研究实际上是英国特定的，即第一个国家市场的所在地。在四页关键性的篇章中，他概述了英国和“欧洲大陆”之间的差异，工业革命在后者出现晚了半个世纪<sup>[107]</sup>。在那里，市场的渗透更加缓慢温和，并导致了非常不同的阶级力量组合。在英国，工人被剥夺了谋生手段，例如通过圈地运动，被迫从事雇佣劳动，而在“欧洲大陆”，工人则被雇佣劳动的经济回报所吸引。工人在欧洲大陆的地位要高得多。他们着迷于阶级意识形态，形成一股政治力量导致了早期社会主义政党的形成；“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凝聚了城市工人的观点。”<sup>[108]</sup> 在英国，工人保留了自愿、自助的态度来面对自己的命运。“在欧洲大陆，工会是工人阶级政党的产物；在英国，政党是工会的产物。”<sup>[109]</sup> 他们的阶级联盟也不同，在英国，地主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与资产阶级对抗，在欧洲大陆，高地位和自尊心的工人更有可能支持制造业反对地主。

这时候，波兰尼引入国家观念，这在他分析英国时是次要的。现在我们明白为什么了。在欧洲大陆，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需要更长的时间，直到十九世纪后期才通过工党代表获得工人阶级的积极支持。随着阶级力量在国家内的凝聚，反映在有利于工人的立法上，例如社会保险、劳工立法、选举权扩大等，保护他们免受市场的破坏。欧洲工人们望向英国再清楚也不过了，知道他们需要避免什么。与英国工人自己建立社会不同，欧陆国家的代表性工人积极为社会的自卫而努力。在《大转型》第14章末尾的几页中，我们发现了波兰尼和葛兰西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分歧的历史基础。波兰尼之积极社会的理论反

映了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工人的自发主义，葛兰西则从国家向市民社会扩张的理论反映欧陆，尤其是意大利在十九世纪末的国家建设经验。<sup>[110]</sup>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考虑了劳动力和土地商品化的限制<sup>[111]</sup>，这些限制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以一种或多种方式进行。现在我们转向国家对货币交换的限制。在自由贸易时代，汇率波动不仅对商业造成麻烦，对社会中的每个群体都产生影响<sup>[112]</sup>。保护国际货币体系，特别是保护金本位制度，成为国家计划，由国家银行主导调节汇率。随着国家经济的压力增加，退出金本位制的诱惑也越来越大。二十世纪20年代的自由放任主义再次崛起，1930年代反应更为严厉，国家纷纷退出金本位制度。国际货币体系像纸牌屋一样倒塌。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击败并需要支付巨额赔款的国家，特别是德国和奥地利，是第一批退出金本位制度的国家。

个别国家案例不同，退出国际货币体系伴随着国内市场对国家的从属，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在美国，是新政法案保护了土地和劳动力，在苏联，是集体化和中央计划，在德国和奥地利，解决方案是法西斯主义，其中市场和社会都被从属于国家。与葛兰西的看法一致，轨迹并不是自由选择的，而是历史条件塑造阶级斗争的产物。在德国，灾难性的阶级力量平衡，葛兰西称之为霸权危机，为法西斯主义开创了机会。

劳工在议会里坚守立场，占据数量优势而举足轻重，资本家将工业筑成城堡，借此支配国家。……最终，经济和政治体系都被完全瘫痪的威胁所困扰。人们感到害怕，而领导权将被交给那些提供简单解决方案的人，不管其最终代价为何。这正是法西斯主义解决方案的时机。<sup>[113]</sup>

国际经济传递了转型的压力，但转型形式是由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特定国家情况下的阶级力量平衡所决定的。美国的新政案和苏联的集体化和计划经济案例中我们只能得到一些暗示，但在德国，这个想法就清晰地阐述了出来。

波兰尼的分析并没有像葛兰西的三个“时刻”（经济、政治和军事）和三个阶级形成层次那样充分，但他确实通过对地方、国家和全球层面市场发展趋势和抵抗趋势的动态分析，赋予了转型和转变的动态的分析。这矛盾，即所谓的“双重运动”，构成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和国家发展轨迹的基础，使任何基于国家超前的线性历史变得荒谬。

### 综合：新的全球秩序？

这就是波兰尼和葛兰西留给我们的，国家转变轨迹的联合分析吗？那么包含这些国家的全球秩序中是否存在逻辑呢？波兰尼在这里比葛兰西更有帮助，后者的分析始终根植于国家。《大转型》的开篇章节描述了一个由四个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构成的十九世纪世界秩序：自我调节市场、自由主义国家、代表金融资本统治的黄金标准，以及为一个世纪防止大战爆发的国际权力平衡。在二十世纪，这个秩序崩溃了。在对抗劳动商品化的阶级斗争的推动下，自我调节市场被调节市场所取代，自由主义国家被干预主义福利国家所取代。在对抗货币波动的民族保护主义的推动下，金本位在1930年代崩溃，随之而来的是权力的老旧平衡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被两个世界大国——美国 and 苏联——所取代。在1944年的写作中，他希望战后秩序将采取民主社会主义。即使不完全符合他的希望，战后期间也展现出向左的开放，但随后被打压，直到1960年代和1970年代重新燃起。自那时以来，世界已经向后转，将波兰尼十九世纪的“自我调节市场”作为未来的蓝图再次复活，或者，成为主要渴望。

波兰尼会发现这令人困惑。他认为市场意识形态在1930年代的失败—广泛认识到如果要遏制市场的破坏性，就需要对其进行调控—是永久性的。“回顾历史，我们这个时代将归功于见证了自我调节市场的终结。”<sup>[114]</sup>他错了，因为他没有看到市场乌托邦主义作为政治统治在全国和全球范围内的武器，这是一种意识形态，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复活，而不论其耻辱性后果。自由主义信条的复兴将引起什么反应？我们将首先回顾波兰尼对自我调节市场的相继反应的描述，以了解它们

对未来的意义。最后，我们将波兰尼的乐观主义与更为悲观的葛兰西主义对比。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波兰尼对自我调节市场引起不同国家的反应，可以看作是从地方到国家再到国际的运动。市场革命首先在英国落地生根，当时反应的是社会自发地保护劳工免受商品化的侵害。这些反应根植于地方，但也可以汇聚成为国家运动。第二回反应发生在十九世纪后期，主要在欧洲大陆。这种不仅包括福利国家法案，还包括保护农民阶级的关税和土地法。第三回由金本位引发的，这对国家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因此国家撤离国际经济体系，转而实行经济自给自足。今天也有一些国家开始出现类似的国家保护主义复苏迹象，但没有像1930年代那样大规模的国家调节和计划，无论是基于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相反，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波兰尼所描述的第一回市场反应的回归，即社会的自发自卫。现在这种自卫具有跨国性质，将非政府组织（NGO）、环保运动、妇女运动、劳工网络等联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可护卫各种选民免受市场破坏的跨国公众。表2总结了这些历史上依次发生的社会和国家对市场的反应。

	對國內市場反應	對全球市場反應
社會反應	1. 地方社群：十九世紀中葉的英格蘭	4. 跨國公眾：湧現的未來
國家反應	2. 規訓國家：十九世紀晚期的歐洲大陸	3. 自給自足的國家：二十世紀年代的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社會民主制

表2 对市场的相继反应

这种乐观的自下而上的观点来自波兰尼，因为他对于资本主义霸权在国家 and 全球层面上的影响力没有很强的概念。即使在他的十九世纪国际秩序中，它必须具有强大的力量才能持续这么长时间，但它是基于国家之间的有机相互依存和平衡的力量而维持的。他对帝国主义的力量

量或世界大国的霸权这些构成葛兰西对世界秩序的解读基础没有什么想法。

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和贝弗利·席尔瓦（Beverly Silver）以一种特别有趣的方式将葛兰西引入了波兰尼的世界体系分析中<sup>[115]</sup>。简言之，他们认为，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秩序是在二十世纪70年代美国“霸权”危机后出现的。这一危机根源于基于现代公司内部化交易成本的积累模式的枯竭，表现为先进资本主义世界中阶级斗争的不断加剧。在短期内，这场危机成为重构资本主义的机会，以更有利于美国资本的方式进行—在国内进行去管制，对外开放贸易，剥夺福利国家的收入保障等等。因此，通过葛兰西的视角来看，新自由主义似乎是全球范围内的“消极革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保守和防御性转型。资本主义不再像过去那样基于对国内劳工甚至第三世界国家的让步而建立新政策秩序和美国和平。现在，资本主义展现出更加残酷的一面，它的军事实力基本上没有遭到抗议。美国的独裁取代了全球霸权。美国霸权的衰落不仅在经济领域表现为旧的积累模式的枯竭，也体现在金融资本寻求新的投资出路的崛起上。阿里吉和席尔瓦认为，新积累方式的灵活性将构成中国和东亚地区新秩序的基础。

在这里，两种不同的观点呈现在我们眼前。一方面，有一个新的独裁统治，由美国安全国家为中心，与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等超国家霸权实体合作。另一方面，由下发展起来的跨国运动。恐怖主义网络组织了一种可能的反帝国主义力量的运动，尤其是反对美国，而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反全球化、女权主义、环境保护等）的紧密结合则进行了一场阵地战。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当前的局势提出了一个更加紧迫的问题，即阵地战和运动战之间的关系—这是葛兰西回避的问题，但我们将回到这个问题。

## VII: 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

我们现在来到本文的最后一部分，旨在将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带入二十一世纪。到目前为止，我们从葛兰西和波兰尼的著作中挖掘了社会学

马克思主义，着重于他们如何打破了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信条。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的构成，如何调节了国家和经济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自我毁灭的资本主义经济。它关注的是一个阶级的霸权系统，通过妥协和联盟协调阶级利益，而不是阶级斗争的自我扩张。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不认为有什么社会主义自发性的条件，而是要分析单一世界资本主义框架下的不同国家发展轨迹。聚焦于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和历史起源，我们正掠过发生的世界，我们老背着走进未来，现在必须转身面对未来。有了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前提，必能建立一个当代的马克思主义，一个为了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这些理论解释有何收获？

### 今日马克思主义任务

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超越了霍布斯邦的《极端时代》？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生产方式的转变（用正统语言来说）就是时代的仲裁者。这无疑是后共产主义时代。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是古典马克思主义从未认真考虑的转变。在它的观点中，一旦建立了社会主义，它将会永存。但是，古典马克思主义既没有考虑到国家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也没有考虑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斗争<sup>[116]</sup>。一些人会认为中国或苏联的社会主义是某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因此不值得特别的分析和历史关注。我认为，相反地，苏联及其卫星国家，无论是好是坏，都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形式，可以从中吸取许多教训。在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下，我们问苏联是否存在“社会”，它采取了什么形式，以及其后果如何。有没有“社会”的存在或缺失，对苏联的发展方向、最终的崩溃以及其后果有何影响？这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任务。

共产主义的崩溃不仅对社会主义的可信度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害，也破坏了对社会民主制的热情。在后共产主义时代，进步的斗争已经从分配政治转向了身份认同政治或者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所称的“承认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今天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必须适应这一重要变化，但不能失去对阶级的关注。这意味着我们

不能再把社会看作一个连贯而无缝的整体，相反，我们必须把它看作是被切割成种族和族裔片段，这些片段需要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理解。我们从殖民主义开始，因为它的二分法非常鲜明，也因为我们需要研究边缘和先进资本主义中“社会”的意义，一方面，这必须深入思考社会、国家和经济的界限。另一方面，则是代表私人领域的家庭/家户，需求是如何在界限之间传递和满足。最后，我们必须认识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弹性，超越了国界—通过跨国非政府组织联系，由流离社区建立，社会运动推动而不再停驻于国家之中。这一切，可以葛兰西和波兰尼为出发点，但非结束之地。他们将社会放在了马克思主义地图上，但他们只是瞥见了它的广阔、轮廓、峡谷和山脉。在探索社会的所有当代维度中，我希望发现“真正的乌托邦”，即使它们只是初步的，也能重新唤醒社会主义想象力。

### 共产主义：崩毁和余波

让我们先说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在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视野中，葛兰西和波兰尼把社会置于中心地位，为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民主意义。与他们的许多前辈不同，他们不认为社会主义自由可以通过毫无干预或由政党中介的国家经济关系来确保。葛兰西提议通过工厂委员会来施行生产的社会性规管，波兰尼则提议将市场纳入社会的控制之下，或者如黛安·埃尔森（Diane Elson）和其他人所称的“社会市场”

（social market）。在这两种安排中，社会是一个自治的领域，用于表达和汇总需求，确保领袖对领导的民主回应能力。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自治的社会领域，社会主义容易退化成为极权主义，更好的说法是“国家主义”。

不仅如此，社会主义如果没有一个具有弹性的社会，也无法应对其所产生的危机。早期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相似之处值得深究。早期资本主义由于生产力受到生产关系的限制，也竞争所产生的利润和过剩产能危机，陷入深刻的经济危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以国家扮演的中心角色来重新平衡经济。同样地，国家社会主义（在某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为明显）纳入市场以抵消计划经济的局限性，这就是国家

社会主义在经济上生存的方式。经济危机只有在转化为有机危机，即政治危机时，才会威胁现有秩序。为了遏制政治危机，国家社会主义必须完成与资本主义一样建立起发达的公民社会。尽管公民社会在不同的时代和形式下出现过，但它从未像葛兰西期望那样巩固得以建立社会主义霸权。

但是为何他的希望落空了呢？波兰尼告诉我们，社会是在对市场做出反应的情况下产生的，尽管市场在二十世纪20年代开始在苏联蓬勃发展，但它们被计划和集体化的导入所扼杀。没有市场，社会就会受到限制和不稳定。东欧的市场改革，特别是在匈牙利，确实产生了一个初步的社会性霸权，但这并不足以抵御对国家社会主义。今天，在中国，市场也正在创造一个充满活力但不稳定的社会，导致尚不清楚的方向，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或更可能是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这反映了中国的特定转型策略，即市场被党国孵化出来，与俄罗斯的震荡疗法策略有很大不同。事实上，俄罗斯复制了布尔什维克的运动战策略，旨在摧毁旧的社会主义秩序，作为新的资本主义秩序自发增长的先决条件。而中国的策略是从上而下的阵地战，一种消极革命的转型来避免革命。

因此，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俄罗斯的市场转型，都是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惨痛的教训，市场可能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却非充分条件。前苏联发生的后社会主义转型并没有伴随着“大转型”，而是我称之为的“大内卷”<sup>[117]</sup>。工人并没有发展工会和合作社来抵制商品化，而是退回到家庭经济；地主阶级没有通过关税和补贴来保护农业，农业从而农民化（小农经济）；企业转向相互交换货品服务，而不是由国家银行来监管货币。尽管俄罗斯加入全球经济促进了顶端的金融业和自然资源工业，但这是以大多数人的贫困、退化和对市场的撤退为代价的。这里没有积极社会或公民社会。相反，是一个相当被动、防守的社会，正在退缩，远离市场和国家。举例来说，后社会主义的匈牙利和波兰经验是不同的，因为它们的社会遗产更加强大，市场转型也不那么灾难性。下层阶级更能够为自己辩护，并更容易被纳入国家重建之中。<sup>[118]</sup>

我们不应将波兰尼的双重运动当成不可避免的法则。需要研究其运作的条件。市场并不总是能够产生一个充满活力的积极社会。在后共产主义俄罗斯进行了十年的市场转型后，并没对震荡疗法的动态社会做出有效反应，而是社会大规模从市场的大规模撤退。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也是如此。根据历史背景，市场扩张后可能会出现反应或撤退，可能会产生巨变或内卷。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是需要了解在什么情况下，国家和社会以什么形式能够支撑市场的崛起，以及阻挡或迅速逃离土地、劳动和货币商品化的趋势。

## 从殖民到后殖民

在建立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时，我们主要关注了波兰尼和葛兰西对先进资本主义本质的洞见。然而，他们自己的社会并未符合这一模式。他们关注的是自己祖国的匈牙利和意大利的落后，但这种落后是相对于未来可能在西欧和美国实现的发展。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望向东方而非西方（从南方而非北方），他们对欧洲边缘地区的分析也可以应用到第三世界。例如，葛兰西对意大利南方问题的论述以及他稍后的《意大利历史笔记》包含了研究边缘国家、现代工业部门和半封建的农业部门所需的要素。葛兰西对工人和农民革命联盟的障碍感兴趣，他相信这种联盟是俄国革命背后的力量。就像他的布尔什维克前辈一样，他毫不怀疑工人阶级拥有唯一真正的革命潜力。

另一方面，面对与意大利不同的匈牙利的社会结构，波兰尼得出相反的结论。或许因为出身于城市资产阶级家庭，因此更容易浪漫化乡村生活，或因为受到俄罗斯民粹主义者的影响，从年轻到晚年，波兰尼从未放弃对农民革命潜力的信仰。他的最后一本书《犁和笔》（*The Plough and the Pen*），是由他的妻子伊洛娜·杜钦斯卡（Ilona Duczynsk）和他一起编辑的，专门介绍匈牙利民粹主义所创造的农民的文学、民族志和基进社会学。在波兰尼的观点中，这些民粹主义者与改革共产主义者一起，是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创造性力量，一次“正在进行的工作”的重生，寻求“自由和社会主义的联盟”。<sup>[119]</sup>

尽管波兰尼和葛兰西都非常清楚奥匈帝国的殖民主义力量，但他们并没有将自己的国家与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放在同一层面上思考。将波兰尼的民粹主义情感与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结合起来，这工作落到了弗兰兹·法农（Frantz Fanon）身上<sup>[120]</sup>。虽然没有迹象表明他曾经阅读过葛兰西，但法农采用了鲜明相似分析方法，通过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关系以及不同的阶级形态水平来识别情境。然而，法农从分裂的世界社会开始，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世界。不存在单一的公民社会，而是一个与殖民管理局建立霸权关系的主导阶层和一个通过传统首领和独裁统治与殖民管理局相连的从属阶层。反殖民斗争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反对殖民秩序的斗争，另一方面是在被殖民社会内争夺霸权的斗争。被殖民地居民之间的政治斗争决定了去殖民化的方向。

就像在葛兰西的理论中，法农将替代路径投射到未来。第一条去殖民化的路径由城市集团领导，由非洲精英、技术人员、教师和公务员组成的国家资产阶级支持，小规模工人阶级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国家资产阶级想要的只是用自己来替代殖民者<sup>[121]</sup>，但保持社会结构不变。这正是葛兰西所谓的“消极革命”。第二条去殖民化的路径，即国家解放之路，让人想起波兰尼的民粹主义运动。它以革命性的农民为中心，由被驱逐出城市的持异议政治的激进知识分子领导。但他们能否获得足够的支持？随着殖民者支持国家资产阶级，这两个“历史集团”——城市和乡村，以国家资产阶级和革命农民为中心——竞争吸引剩余群体的支持，包括失业工人和部落领袖。这场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决定了去殖民化的路径，无论是资产阶级的还是社会主义的、改革的还是革命的。

正如在葛兰西的理论中，知识分子扮演着两种关键角色的类型：传统知识分子支持去殖民化，为了防止社会转型；来自农民阶层的有机知识分子追求推翻殖民主义，开创新的社会主义秩序。成功的社会主义斗争总是结合了两种形式：在本土社会内进行的“阵地战”和对殖民主义暴力的“运动战”。尤其是通过阵地战，民族解放运动试图建立民主参与的社会，免受世界资本主义的威胁。他的愿景类似于波兰尼的民主社会主义和葛兰西的调节社会。

这样的情况是否可能实现呢？法农提出像葛兰西那样的分析：军事和经济力量对“政治”会施加限制，但这种分析是不现实的。首先，他假设国际资本会为其过去掠夺殖民主义提供赔偿；其次假设殖民地的都会国家会坐视社会主义的建设。尽管阿尔及利亚殖民者犯下了许多暴行，但法农对殖民者的最终人性，法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力以及联合国人权言论的诚实性仍抱有天真的信仰。

法农预见最坏的情况是，如果民族解放斗争失败，国家资产阶级取得了权力，它依赖国际资本，没有自己的物质资源，无法建立自己的霸权。它变成了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漫画形象和附属品，通过炫耀性消费来弥补自己的不安全感，通过从民主到专制、从政党国家到一人独裁来击退反对派。后殖民秩序压制了公民社会，堕落成了国家主义。尽管在过去四十年中出现了曲折和变化，但法农的悲观情景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证实。站在去殖民化的终点，后殖民深殖的时代，法农的民族解放理想是否可行仍然不清楚。<sup>[122]</sup>

南亚底层研究学派（Guha、Spivak、Chatterjee、Chakrabarty）回顾了一个令人沮丧的半世纪之久的去殖民化历程，认为反殖民主义的斗争是在西方意识形态的无形沼泽中进行的。在去殖民化的欢欣鼓舞的时刻，民族解放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选择是虚假的，两种愿景都陶醉于一个只会带来“没有霸权的支配”的民族独立的愿景。例如，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用了葛兰西的“消极革命”的概念来解释印度独立的失败承诺，“没有革命的革命”<sup>[123]</sup>。印度国大党的从上而下的现代化计划，就像意大利晚十九世纪的温和党所组织的分子变革一样，压制了从下面发起的起义，用国家替代了一个虚弱的资产阶级。后殖民主义者提出，反殖民运动最好挖掘被殖民者经验中被掩埋的替代性愿景，而非拥抱西方的理念。关于这些愿景的性质，它们可能是什么以及它们的可行性如何，后殖民主义理论基本上保持沉默。<sup>[124]</sup>

在将葛兰西的思想扩展到第三世界时，法农颠覆了革命和反动的阶级基础。在殖民地背景下，工人阶级是一群被宠坏的劳动贵族，致力于捍卫自己的特权，而农民则因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东西而怀有自发的基进主义。法农认为阶级利益的构成是殖民地背景下的一个因素。在他对“西方”的看法中，他遵循了葛兰西的观点：西方社会的公民社会厚

实，资产阶级霸权深入人心；农民政治上落后，而工人阶级仍然是革命的先鋒。他将葛兰西的思想扩展到第三世界，但并未触及葛兰西对第一世界的观点。这并不是法农的西方解释者的结论，从麦尔坎·X（Malcolm X）到休伊·牛顿（Huey Newton），美国民权运动的激进派都将被排斥和受压迫的人视为革命的力量，认为他们总是比被剥削和融入社会的人更具革命性。当应用到美国时，法农的殖民主义分析将那些处于荒废的城市贫民窟中被剥夺的非洲裔美国人视为革命的力量，而不是其沉醉于安逸的工人阶级。例如，在黑豹党的鼎盛时期是将阵地战和运动战相结合，重建黑人公民社会来攻击白人权力。但是，这种革命乐观主义最终走向了悲惨的结局，尽管它教会了人们种族主义的恶毒性。

尽管法农对殖民地的分析细节与先进资本主义的相关性值得商榷，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我们不能再抱持对社会的整体性或一致性概念。这一点对波兰尼的适用性比对葛兰西更大。我们必须放弃波兰尼将社会的纯洁与天真对立于市场破坏性的观念。对波兰尼而言，社会与市场之间的争战是一场诸神之战，是善与恶之间的斗争。葛兰西对公民社会及其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的能力不那么乐观。公民社会与国家联手时，它既是支配的工具，也是一个争夺权力的领域。但即使在葛兰西的方案中，支配也是基于机构与国家的联系，通常是通过知识分子实现，而不是公民社会本身固有的特征。在概念上，我们区分了穿越整个公民社会的广泛分歧，如种族和阶级，以及散布在公民社会中的工作场所和家庭等机构所凝聚的微观权力。现在必须思考公民社会分裂成一系列父权制组成的星系。

## 公与私

葛兰西是透过对现代工业经济前提条件之功能分析来探讨性别问题的，在他的文章《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中，葛兰西描述了福特开创的新生产形式如何需要相应的性倾向规范（regulation of sexuality），以最大限度地保存工人的能量。由管理层严密控制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将成为规范性倾向的机构。相对地，波兰尼则从保护

社会的角度来看待家庭，而非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待。家庭对抗市场破坏、劳动力商品化的力量有多大？无论是葛兰西还是波兰尼，都不关心家庭内部组织对政治的影响。

以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为基础，建立一条连结到葛兰西的女性主义桥梁。该书将女性视为被囚禁在家庭中，她们唯一与社会联系的方式是透过她们的男人<sup>[125]</sup>。除非女性能够自主地离开家务领域，否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女性主义运动。与黑人或工人的社会情况相较，女人无法在与男人绑定关系的碎片化霸权（Scattered Hegemonies）中建立团结<sup>[126]</sup>。正是因为她写作的强大力量，是意识形态又是理论，激励了女人脱离男人，建立了超越父权统治星系的女性主义运动。这是如何实现的呢？

如果西蒙波娃的计划中存在一个更自由、潜在的性别平等的地方，那就是公共领域，她自己成为了其中一个卓越的人物。她的公共领域将葛兰西的公民社会转化为知识分子之间交流的场所，在那里，不同的意识形态相互冲突、发生冲突，并以某种不稳定的平衡方式相互结合。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在她的女性主义需求解释分析中探讨了这些思想<sup>[127]</sup>。公民社会再次被分为两个，但这次划分的界线不是基于社会关系，而是基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空间——功能(spatio-functional)差异。

在朱尔根·哈伯玛斯（Jürgen Habermas）的理论中，公共领域指的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舞台，通过交谈的方式实现政治参与。公民就共同事务进行讨论的空间。”<sup>[128]</sup>弗雷泽称之为“社会”领域，以有别于哈伯玛斯的差异，强调领域的边界的流动性和其具争议的解释。私人领域成为剩余范畴，是外于和超越政治讨论的领域，但又包括了正式经济和家务劳动。尽管弗雷泽主要关注家庭领域，但与经济之间存在一种未明示但对我们很重要的比较。葛兰西默认需要从经济领域流向社会领域，成为作为阶级利益进行解释和争议的需求，直到其中的一个或多个组合占据优势地位，成为对国家的要求。国家会将原始诉求去政治化转变成管理政策，这里可以想到关于工会认可、集体谈判或失业保险的立法。

弗雷泽的独创性在于她对需求如何从家庭领域“渗漏”或“流出”，进入社会领域，以及这些需求是否被认可、表达和被满足进行了平行分析<sup>[129]</sup>。与劳动力的利益已被广泛认可并拥有其自己的组织代表不同，母亲和家庭主妇的需求仍在得到确认的过程中。因此，这场斗争首先是关于确认妇女的需求是否在政治上合法。妇女运动使性骚扰、强暴、家暴和双重负担成为社会话语的主题，开拓了这些要求，迫使国家创建机构来管理这些需求。这场斗争一直很艰苦，因为保守势力也在公共领域中运作，试图重新将这些“流出”的需求私有化，将它们归还到家庭领域。

重新私有化是保守派对抗这些“流出”需求的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不是确认需求，而是政治上中立化她们的满足。社会运动可能成功地迫使国家代表妇女介入，但需求的管理可能会引起分裂和非政治化。正是出于这个角度，弗雷泽探索了福利政策。美国政府建立了两个福利层次，一个与雇员权利有关，另一个与被污名化的依赖者的要求有关。该体系歧视妇女和少数族裔，因为他们更有可能发现自己处于较低的层次，被当作不应得的乞求者，而不是劳动力的权利成员。更普遍地说，国家将最初是社会运动者变成个案的方式来管理这两个层次，将其规范化、监控和审查的客户。这个非政治化的过程可能会在社会领域内刺激反应的政治化，但并不常常发生。

弗雷泽的女性主义分析不仅以性别统治为中心，而且更普遍问题化了国家、公民社会和私人领域的界限，这对葛兰西的理论有了重要补充。在葛兰西的著作中，有关这些边界所在的位置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而弗雷泽将隐含的内容明确化，即这些边界本身也是政治争议的对象，划定哪些是政治合法的对象，哪些是私人领域、超出政治关注的范围。女性主义者一直努力使家庭成为政治领域的一部分。同样，在另一端，将公民社会与国家明确区分，将公民社会转化为没有政治意义的谈话场所的企图，也受到了激烈的争议。许多在公民社会中进行的女性主义斗争都集中于控制再生产的条件，例如剥夺国家对堕胎权利的垄断，将决策权交到受影响人手中。这正是“阵地战”的主要内容。

不同领域边界的保为何突破，关键在于知识分子。这里有着弗雷泽与葛兰西的可能结合。一方面，有机知识分子将需求从私人领域带入社会领域，或者将社会的政治功能扩展到私人领域。另一方面，传统知识分子通过强制将需求逼回私人领域或专家管理，使其得以家务化。尽管她谈到很多问题，但很少谈到说话者自身，即知识分子以及所代表群体之间的关系。如此她做出了一个很有问题的假设，女性主义知识分子与她们所声称代表的妇女是一致的？

## 跨国社会？

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必须考虑社会的起源和功能；市场、国家和社会的多种配置；这些又如何影响并被阶级力量的平衡所影响。在考虑社会结构作为斗争场域时超越了葛兰西和波兰尼，沿着种族和父权之线而分裂。正如我们所见，它必须考虑社会边界的转移，这本身就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最后，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必须探索社会如何超越国家界限，形成由以民族或国家为基础的离散社区、为扩大人权、环境保护或甚至劳工利益而存在的非政府组织（NGO），以及内部或外部跨国公司的经济网络组成的跨国社会。同样，我们必须考虑其结构与上述由联合国或世界银行等上层机构组成的跨国机构，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

波兰尼和葛兰西从不同阶级的生活经验、国内阶级的动员，再到阶级如何与国家的发展在国际秩序中的交错轨迹，具有非凡的延伸。但是，两者都没有考虑到社会的跨国性。正如我们在第六部分的结尾所看到的那样，我们可以利用波兰尼和葛兰西观点来生产关于跨国社会的新见解。从波兰尼的角度，我们可以考虑跨国社会是如何应对土地、劳动力和金融资本的商品化而形成的。但我们必须非常小心，不要将跨国社会浪漫化，因为它也是一个非常不均衡的政治地形，充满了权力层次结构，从中心到边缘的斜坡，以及它自己的裂缝和峡谷。<sup>[130]</sup>从葛兰西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考虑跨国社会与超国家级机构的关系，但这种联系经常包含了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也提供超越资本主义基础并存的可能性。

超越既有地形的是困难的，超越意味着什么？社会主义转型不再被理解为旧秩序崩溃，新秩序建立。它不再源于经济矛盾，阶级斗争和新秩序种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巧合。明天的社会主义转型也不仅仅集中于国家，而是包括各种不同类型的地方斗争，在同时进行的阵地战和运动战中跨越国界相互联系。这需要一种新型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会制定资本主义崩溃律法的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立法者，也不是工人阶级革命的有机知识分子，而是民族志考古学家，他寻找地方实验，新的制度形式，如果你愿意，将真实的乌托邦置于其自身脉络中，翻译成通用语言，并将它们连接到全球<sup>[131]</sup>。阵地战需要用解释者来超越立法者，用齐格蒙特·鲍曼的术语来说，一位旅行的解释者总是在挖掘新的地形。<sup>[132]</sup>

这场最新未完成的全球社会主义斗争，可能不如先行者成功，然而，如果它表达得越清楚，批评资本主义的力量越大，我们生活的世界就越人道。



• • •



## 注释

[1]Talcott 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37). 正如帕森斯通过韦伯、涂尔干、帕累托和马歇尔的汇聚推导出他的自由意志主义行动理论一样，我正试图从葛兰西和波兰尼的汇聚中推导出一个共同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相对于帕森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我则借鉴了社会学的解放时刻。

[2]在1965年美国社会学年会上的卡尔·马克思的全体会议时，帕森斯总结道：“卡尔·马克思是完全属于十九世纪最伟大的社会理论家。他在知识史的地为是稳固的。然而，作为一个在科学意义上的理论家，他属于已被超越的发展阶段。在今天社会学中，以严格定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否定马克思以来有任何实质性理论进展，是站不住脚的。”“Some Comments on the Sociology of Karl Marx,” in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ety*, by Talcott Parson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7), 135. 当帕森思提到“马克思以来的理论进展”时，你可以肯定他并没有考虑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超越！他在马克思主义复兴，颠覆和越过帕森斯自己的理论建构不久之前发表了这篇演说。正如派森思曾经对斯宾塞（Spencer）所说的那样，现在谁还会读帕森思呢？

[3]Talcott Parsons, *The Social System* (New York: Free Press, 1951).

[4]正如马克思主义将“社会”纳入其中，帕森斯也发展了他著名的AGIL方案，将适应（经济）、目标实现（政治体）、整合（社区或“社会”）和“潜伏”（支持价值观的家庭和其他组织）作为独立的制度领域。参见Talcott Parsons and Neil Smelser, *Economy and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56); Talcott Parsons, “An Outline of the Social System,” in *Theories of Society*, by Parsons et al. (New York: Free Press, 1961), 30-84; and Talcott Parsons, *Politics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1969).

[5]参考 Perry Anderson,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6).

[6]参考 See Michael Burawoy, “Two Methods in Search of Science: Skocpol versus Trotsky,” *Theory and Society* 18 (1989): 759-805.

[7]为庆祝《新左评论》的第100期，佩里·安德森进行了一项对葛兰西的“霸权”（hegemony）概念的冗长详细的解剖，指出了其内部的不一致性，包括他高估了同意的重要性，低估了国家压制力量的强度，忽略不同形式的国家，因此是倾向于改革主义政治，以应对可怕的欧洲共产主义。安德森声称，在葛兰西的分析中可以挽救的部分，在卡特斯基（Kautsky）与在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的辩论中，关于改革主义形式或托洛茨基的革命形式中已经说过了。该文章以对托洛茨基双重权力理论的致敬作为结尾。他声称预见了几位葛兰西霸权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没有人将其与公民社会联系起来，或将公民社会作为先进资本主义的标志，因此也没有人可以被视为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参见安德森，“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 *New Left Review* 100 (1976- 77): 5-8

[8]参考 See Alvin Gouldner, *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0).

[9]有些人，例如帕森斯本人，可能会主张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1950年代已经存在于塞摩尔·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和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著作中。见Talcott Parsons,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Author,” in *The Social Theories of Talcott Parsons*, edited by Max Black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61), 362.。确实，与帕森斯不同，利普塞特和贝尔都严肃地涉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

主义问题。在他1981年对《政治人物》(Political Man)的补充(“Second Thoughts and Recent Findings”)中,利普塞特将他的政治社会学称为“非政治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它依赖于“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论假设”,包括阶级这一范畴。见Lipset, *Political Ma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81), 459。但在他对“意识形态终结”的阐述中,他认为美国社会已经克服了工业化的所有主要问题,因此,即使不是社会主义本身的一种形式,也可以被视为接近或应该达到的程度。保留批判性修辞来掩盖远离马克思主义的实质转变,因此,对市场的关注把生产抛在了后面,对分类斗争的时髦兴趣把阶级抛在了后面,社会运动理论从关注社会变革转向了对集体行动原因的一般理论,而政治社会学则将资本主义置于括号之内,回归到公民身份和自由民主的问题上。随着政治风向的变化,社会学再次向马克思主义告别

[10]Alvin Gouldner, *The Two Marxisms: Contradictions and Anomalies in Development of Theory* (New York: Seabury, 1980), chap. 12.

[11]正如弗雷德·布洛克在他的评论中对我说的那样,“[你的论文]指出了社会学传统在150年的时间里未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充分或有用的‘社会’概念之荒谬,表面上,这还是你们分析的主要对象。”

[12]我使用“积极社会”的概念,与艾米泰·艾兹尼(Amitai Etzioni)在其著作《积极社会》(The Active Society, 纽约:自由出版社,1968)中的概念有所不同。艾兹尼所谓的“积极社会”是“回应性社群”和“个人需求”之间相互促进的平衡,这是一个相当抽象的乌托邦,确实让人想起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念。不同的,波兰尼(Polanyi)所提出的积极社会是对市场带来的恶化的积极反应,艾兹尼的积极社会则是对无所不在的后现代秩序的内在特性的反应。然而,正如将会看到的,波兰尼的社会也有乌托邦的特性,当他有时候理解社会是以行动者的权利来定义自身时。

[13]这里有两个社会概念:公民社会和积极社会,有重叠之处,但它们并不相同。此外,葛兰西和波兰尼对它们的使用充满了歧义。我在定义“积极社会”时采取了某种特权,将其类比并与“公民社会”重叠。在一份未发表的手稿中,伯克利·弗莱明(Berkeley Fleming)重现了卡尔和波兰尼之间的部分交流,围绕《大转型》手稿。麦克波兰尼试图理解他兄弟对“社会”的使用,这是一个历史上出现的实体,与市场分开。只有这样,卡尔才能维持市场趋向于摧毁作为其前提的社会想法。参见Fleming, “Three Years in Vermont: The Writing of Karl Polanyi’s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presented to the \_Eighth International Karl Polanyi Conference, Mexico City\_, Mexico, 2001), 20-21. 。波兰尼对社会的看法是独立于市场的，这一点得到了他对“社会现实”的反复引用的支持。我认为，波兰尼的市场不是嵌入式的，而是被一个独立的社会所包含。同时，市场总是有社会基础，即共同的理解和信任，通常基于网络，才使得交换成为可能。但是，社会基础或涂尔干的非契约性合同元素并不是波兰尼所指的社会。参见Lie, “Embedding Polanyi’s Market Society,” \_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_ 34 (1991): 219-35.

[14]我知道两个例外。Giovanni Arrighi和Beverly Silver在他们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动态的分析中结合了波兰尼和葛兰西（从熊彼特（Schumpeter）得到一些帮助）。像许多世界体系分析一样，他们的综合排除了“社会”，这个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请参见“Polanyi’s ‘Double Movement’: The Belle Époques of British and U.S. Hegemony Compared,” \_Politics & Society\_ 31, no. 2 (2003)。在第六节中我会回到Arrighi和Silver。另一个例外是Vicki Birchfield，她发现波兰尼对市场反应和葛兰西对政治统治和霸权意识形态的描述之间存在补充性。请参见Birchfield, “Contesting the Hegemony of Market Ideology: Gramsci’s ‘Good Sense’ and Polanyi’s ‘Double Movement,’ ” \_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_ 6, no. 1 (1999): 27-54.。

[15]葛兰西对社会学声称的能够发现社会规律的“科学性”是严厉批评的。他对“自治”于国家之外的社会概念同样轻视：“明显的社会学的所有重要问题都不过是政治学的问题。如果有什么残余，那只能是由虚假问题组成，即琐碎的问题。”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244., 244页。有趣的是，在所有现代社会科学经典著作中，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变迁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可能是最接近葛兰西的。尽管亨廷顿是保守派，他没有使用“霸权”这个概念，但对霸权力量有着惊人的认识。他对政治社会学缺乏对社会的政治维度，缺乏及社会与国家的联系也非常不满。尽管亨廷顿没有提到葛兰西，但他从列宁那里得到了许多启示。

[16]参考 Peter Evans, \_Embedded Autonomy\_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17]参考 Mark Granovetter, “Economic Action, Social Structure, and Embeddedness,” \_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_ 91 (1985): 481-510.

[18]参考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1944] 1957), chap. 13.

[19]葛兰西最激烈的批评对象是布哈林 (Bukharin) 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普及手册》 (*Theor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 Popular Manual of Marxist Sociology*)，此书在葛兰西看来，代表了最好的马克思主义中的“社会学”传统，他批评它虚假客观性、经济决定论、所谓的经验法则的空洞性、概念的抽象性，和“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唯心主义，这种方法论从未与现实世界接触过。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419-72)。葛兰西非常努力地将他自己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或他所谓的“实践哲学”与布哈林所称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划清界限。

[20]对于葛兰西的生平，我倚赖朱塞佩·菲奥里 (Giuseppe Fiori) 的《安东尼奥·格兰姆西：一个革命者的生命》 (*Life of a Revolutionary*,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0)。对于波兰尼的生平，没有单一的来源，但我从三个编辑的文章中获得了一些资料：Kenneth McRobbie, ed., *Humanity, Society and Commitment*,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1994; Kari Polanyi-Levitt, ed., *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Polanyi*,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1990; Kenneth McRobbie and Kari Polanyi-Levitt, eds., *Karl Polanyi in Vienna*,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2000).

[21]Gramsci, *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1910-1920*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7), 34-35.

[22]我在这里提及的是葛兰西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定义，它既不是冷酷的乌托邦，也不是学究式的理论思辨，而是通过创造具体的幻想来表达，这种幻想能够对分散、支离破碎的人民产生作用，唤起和组织他们的集体意志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126)。

[23]引用自Fred Block and Margaret Somers, “Beyond the Economistic Fallacy: The Holistic Social Science of Karl Polanyi,” in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edited by Theda Skocp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50.

[24]Kari Polanyi-Levitt and Marguerite Mendell, “Karl Polanyi: His Life and Times,”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22 (1987): 22.

[25]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288.

[26]Ibid.299

[27]引自Cited in Polanyi-Levitt and Mendell, “Karl Polanyi,” 12.

[28]波兰尼明确地表示他批评的是庸俗马克思主义，同时仍然坚持马克思早期哲学著作的永恒真理。他将古典马克思主义对立为“以社会的整体性和人的非经济本质为中心的马克思的基本哲学”(*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151).

[29]在《大转型》之前写的一篇文章中，这种观点表达得相当粗略：“人类已经陷入了僵局。法西斯主义以道德和物质的倒退为代价解决了这个问题。社会主义通过向功能性民主的进步来寻找出路。”(“Marxism Restated,” *New Britain*, 4 July 1934.)。波兰尼后来并没有抛弃这种观点，而是通过社会的概念来深化，“因此，发现社会要么是自由的终结，要么是自由的重生。虽然法西斯主义者只能放弃自由，将社会的现实看作权力的赞美，但社会主义者却能接受这种现实，并维护对自由的要求。”(*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258A)

[30]我对波兰尼第二次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交响曲之解释与布洛克 (Block) 截然相反。布洛克认为，波兰尼在《大转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断裂”构成了决定性的打击。布洛克主张，波兰尼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型和相对自治的经济概念，转而支持一个含蓄但未明示的论题，即经济关系始终嵌入社会关系之中。见Block, “Karl Polanyi and the Writing of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ory and Society* (forthcoming) (即将出版)。然而，认识到经济由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和实践所构成，并不意味着否定马克思主义。见Michael Burawoy,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London: Verso, 1985)。此外，将波兰尼简化为“始终嵌入市场经济”，就是将他的工作简化为一种静态社会学，这已经是涂尔干、齐美尔和韦伯解释过多的了。没有充分体现波兰尼对资本主义动态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独创性，这是市场和社会的著名“双重运动”。正如本文所主张的，与其认为《大转型》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决裂，不如将其视为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新颖发展，是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完美的伴侣。

[31]有关波兰尼对社会主义教育的终身投入，可以参考Marguerite Mendell, “Karl Polanyi and Socialist Education,” in *Humanity, Society and Commitment*, 25-52.

实际上，可以说波兰尼是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伯明罕文化研究学派的先驱。

[32]涂尔干认为，“正常”的劳动分工通过将具体细节与更大的目标联系起来，赋予他们意义和目的感，但他补充说：“对此，他没有必要涵盖社会地平线上的非常广阔的领域；他只需要感知到足够的领域，只要理解他的行动具有超越自身的目标的就行了。”（\_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_ (New York: Free Press, [1893] 1984), 308.）。对于涂尔干来说，过多的理解可能会很危险，而对于葛兰西来说，它则是解放的！也就是说，对于葛兰西，工厂委员会的目的是几乎无限地扩大工人的智力视野：“从这个起点-工厂，作为一个单位，作为创造特定产品的行为，工人逐步理解越来越广泛的单位，一直到国家本身的层面……此时，工人已经成为一个生产者，因为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在生产过程中的角色，从车间到国家到世界。”（\_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_, 110-11）。

[33]Polanyi, \_The Great Transformation\_, 127-29.

[34]欧文的新拉纳克（New Lanark）和葛兰西的都灵之间的平行比较必须加以限定！毕竟，新拉那克是欧文创造的，他是这个社区组织和母公司父亲般的人物，而都灵工厂委员会则是工人运动的产物。直到议会否决他提出的减轻贫困和恶劣环境的计划之前，欧文一直与有钱人与富豪过从甚密。他的想法是保守有着托立党特质的，提倡和谐但等级分明的社会理想。随着他的思想走向更激进的方向，批评当时的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理查德·李嘉图（Ricardo）和马尔萨斯（Malthus），他的计划和社区才成为了“社会主义”的标志。的确，欧文主义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社会运动，以对抗工业主义的严酷现实，尽管欧文本人对任何阶级斗争的概念都有排斥感。参见Robert Owen, \_A New View of Society and Report to the County of Lanark\_,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V. A. C. Gatrell (Harmondsworth, UK: Penguin, [1813 and 1821] 1970); G. D. H. Cole, Robert Owen (Boston: Little, Brown, 1925).

[35]没有理由相信葛兰西会认识波兰尼，尽管他确实认识卢卡奇，但似乎是二手货。见 \_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_, 448.。波兰尼死于1964年，就在对葛兰西的兴趣重新兴起之前。

[36] 波兰尼和卢卡奇是儿时的朋友，卢卡奇出生于1885年，比波兰尼早一年。他们在同一个圈子里活动。卢卡奇后来是波兰尼母亲的文学沙龙的常客。见Éva Gábor, "The Early Formation of Polanyi's Ideas," in \_Karl Polanyi in Vienna\_, 297, and

Ilona Duczynska, "I First Met Karl Polanyi in 1920," *Ibid.*, 309. 在诗人恩德雷-阿迪的纪念会上，波兰尼与卢卡奇辩论了"共产主义"的优点和缺陷。见György Litván, "Karl Polanyi in Hungarian Politics (1914-1964)," in *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Polanyi*, 33. 虽然他们在1919年后肯定同时在维也纳，但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彼此有什么关系，一个是热心的共产主义者，另一个是独立的民主社会主义者。

[37] 在这里，我借鉴了列宁的一些基本文本，*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Russia* (1899) *Collected Works of Vladimir Il'ich Lenin*, vol. 3 (Moscow: Foreign Language Publication House, 1960); *What Is to Be Done?* (1902) in *Selected Works of Vladimir Il'ich Lenin*, vol. 1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0), 119-272;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1917), in *Ibid.*, 667-768; *State and Revolution* (1917), in *Ibid.*, vol. 2., 283-376;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Renegade Kautsky* (1918), in *Ibid.*, vol. 3, 65-149; and *Left Wing Communism: An Infantile Disorder* (1920), in *Ibid.*, vol. 3, 345-430.

[38] 佩里·安德森详细指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已经用霸权的概念来指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对同盟阶级的领导。用它来代表资本主义的统治，怎么说呢，是很新颖的。Anderson, "Antinomies," 15-18.

[39] 我这里指的是乔治-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Cambridge: MIT Press, 1971),)，这是一本首次在1922年出版的论文集。1967年，卢卡奇写了一篇新序言，回收了他年轻时著名的"救世主的乌托邦主义"。

[40]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80.

[41] *Ibid.*, 12. 为了强调同意的时刻，葛兰西有时将新的统治形式识别为“由强制武力所保护的霸权”(hegemony protected by the armor of coercion) (*Ibid.*, 263).

[42] *Ibid.*, 243.

[43] *Ibid.*, 238.

[44] *Ibid.*, 243.

[45] *Ibid.*, 243.

[46] Ibid., 244. 葛兰西采用这种国家的功能定义，宣称公民社会的所有机构（家庭、学校等）都是政治的，因为它们对资本主义统治的再生产有影响。当然，国家机构与公民社会的机构是有区别的，尽管这种区别在法西斯主义下的形式与自由民主相比非常不同。正如我们在结论中所看到的，国家机构和公民社会之间的界限本身就是政治争论的产物。也就是说，这些界限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

[47] Ibid., 242. 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对法国、英国、美国、日本、中国和印度进行了巨细靡遗的比较，指出这些因素都是法西斯主义的倾向性因素。民主制度需要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和/或农民反抗。然而，我们将看到，摩尔的分析存在着葛兰西所避免的缺陷，即假设国家是独立发展的，假定现代性到来后是沿着预设道路不变的。此外，摩尔没有关于阶级利益、阶级形成和阶级联盟的详尽理论，而这正是葛兰西关注的核心问题。见摩尔，《独裁与民主的社会起源》（Moor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 Beacon, 1966).）。

[48]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78.

[49]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78.

[50]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201. See also Ibid., 82.

[51] Ibid., 57

[52]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201. See also Ibid., 82.

[53] Ibid., 83

[54] Ibid., 101

[55] Ibid., 163

[56] Ibid., 182-83.

[57] Ibid., 101.

[58] Edward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Victor Gollancz, 1963).

[59] Fred Block and Margaret Somers, "In the Shadow of Speenhamland: Social Policy and the Old Poor Law," *Politics & Society* 31, no. 2 (2003).

[60] 参考 Margaret Somers, "Citizenship and the Place of the Public Sphere: Law, Communit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8, no. 5 (1993): 587-620.

[61]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157.

[62] 的确，有人会说非洲农民有着促进市场进一步扩张的利益，鼓励白人和黑人农民之间的自由竞争，并消除对移民的保护。

[63] 葛兰西也有他乐观、目的论的一面。虽然他欣赏遗传观念的守旧力量，但他也认为武装起来的知识分子，以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将能够消解遗传“常识”的废物，从而成为解放无产阶级的“良知”精华。

[64]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180.

[65] *Ibid.*, 181.

[66] *ibid.*, 183.

[67] *Ibid.*, 181

[68] *Ibid.*, 161.

[69] Adam Przeworski, *Capitalism and Social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70]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Ideology in Gramsci," in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 edited by Chantal Mouffe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1979), 168-204.

[71]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265. 72. *Ibid.*, 333.

[72] *Ibid.*, 242.

[73] *Ibid.*, 202.

[74] *Ibid.*, 202

[75] 参考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154, 156.

[76] *Ibid.*, 162, emphasis added.

[77] Ibid., 152, emphasis added.

[78] Ibid., 234.

[79] Ibid., 234.

[80] 他对国家的概念也存在着同样的失败。国家在创造自我调节市场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一旦建立起来，社会的反应就占据了主导地位，国家变成了监督者：“社会保护的重要需求，其代表通常落到负责社会普遍利益的人手中，在现代条件下，是的政府”（同上，154页）。这里没有把国家看作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认为“普遍”利益可能是“虚幻”的，是资本利益的开明代表。相反，国家是“社会”的工具和保护者。

[81] 波兰尼似乎在《新不列颠》一文中提出了“霸权”概念：“某人群的利益并不存在神奇力量，能够引导大量拥有相反利益的其他人群追随他们的领导……成功并非是由他们自身利益的力量所决定。实际上，成功的秘诀在于这些人群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其他人群的利益，包括但不仅仅是自身利益。为了实现这种代表，他们经常需要调整自身的利益以符合更广泛的群体的利益，这些群体是他们想要领导的。（重申马克思主义的重申），（Marxism Restated, New Britain 4 July 1934.）。葛兰西本人也不可能表达得更好了！这确实支持弗雷德·布洛克（Fred Block）的观点，即波兰尼后来在《大转型》中向着更多的涂尔干社会观念迈出了一步。参见布洛克的文章（“Karl Polanyi and the Writing of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82]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83. See also Ibid., 115, 216.

[83] 这种观点的详细解释可以参考Michael Burawoy的《制造共识：垄断资本主义下劳动过程的变革》（*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和《生产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而乔瓦尼·阿里吉和贝弗利·席尔强调资源（职场谈判力和组织或联盟力量）是过去一个世纪不同国家工人阶级动员变化的关键。席尔在这种马克思主义观点中加入了波兰尼的元素，即资本主义在获利危机和合法性危机之间摇摆。获利危机导致劳动力商品化的加剧（降级、薪资下降、失业等），进而引发劳工激进运动和非商品化（通过工会、福利国家等保护劳动力）。他们假定劳工的自发利益在于挑战资本主义，这种挑战只有在工人被迫到绝境或拥有丰富资源时才能发挥作用。在恢复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大胆尝试中，他们没有探讨劳动利益，或更一般

地说，没有探讨阶级利益在社会（以及国家和经济体系）中是如何组织的，这是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项目。参见阿里吉的《马克思主义世纪，美国世纪：世界劳工运动的形成和重塑》（“Marxist Century, American Century: The Making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Labor Movement,” *New Left Review* 179 (1990): 29-63）和席尔的《劳动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和全球化》（*Forces of Labor: 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84] 例如，Marcos Ancelovici 在他的文章中描述了一个在许多国家都有存在的重要反全球化运动，称为为公民援助征税的金融交易协会（ATTAC）。在 Ancelovici 的释中，ATTAC 在法国使用一种反市场的意识形态变体，他称之为“反对全球市场的政治”，来动员其成员。然而，ATTAC 的起源和组织，更好理解是放在法国特定的国内政治情境，通过激活公民社会来对抗国家，构成了 Ancelovici 所谓的“联合主义国家主义”（Associational Statism）。跨国公司、国际金融、超国家机构威胁人类社会，但它们的影响受到国家和公民社会组织配置的调节，这些配置仍然是政治统治和重建的有效场所。换句话说，波兰尼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而葛兰西则捕捉了 ATTAC 的政治形成和策略。参见 Ancelovici 的文章，Ancelovici, “Organizing against Globalization: The Case of ATTAC in France,” *Politics & Society* 30, no. 3 (2002): 427-63.。MICHAEL BURAWOY 259

[85] 列宁和托洛茨基（更重要）修改了马克思主义的线性假设。从《结果与前景》（*Results and Prospects* (1906), NY: Pathfinder, [1906] 1969）到《俄国革命史》（*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36), London: Pluto, [1936] 1972），托洛茨基说明了资本主义的联合和不平衡发展如何导致边缘地区的革命是有一贯性的。一方面，俄罗斯与更先进经济体系上的国家竞争，过度征收了不成比例的剩余价值，因此扼杀了国内脆弱刚起步的资本主义。另一方面，边缘地区的资产阶级羸弱且依赖外国金融资本，劳动阶级则是激进的，刚从封建制度中解放出来，并移植到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中。推动生产力发展革命是必要的，而唯一可行的革命代理人是工人阶级。从最终分析来看，只有在西方革命的支持下，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成功。

[86]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268.

[87] *Ibid.*, 285

[88] Ibid., 285-86.

[89] 这与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加布里埃尔·科尔科 (Gabriel Kolko) 和詹姆斯·温斯坦 (James Weinstein) 等美国威斯康新学派 (Wisconsin School of American History) 的论点非常一致。

[90]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287. 91. Ibid., 268.

[91] Ibid., 268

[92] Ibid., 268.

[93] Moore, *Social Origins*.

[94]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184, 234-35.

[95] Ibid., 219-23.

[96] 依循葛兰西的传统中, 有些人则主张,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是统治者势力中的分歧产物, 正如葡萄牙共和国的崩溃和萨拉查尔 (Salazar) 威权政权的崛起是由于支配阶级的混乱所导致的, 这是由葡萄牙在世界体系中的半边缘经济地位在不同方式下推动的。参见大David Abraham, *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and Kathleen Schwartzman, *The Social Origins of Democratic Collapse; The First Portuguese Republic in the Global Economy*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1989).

[97]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182.

[98] Ibid., 118-20.

[99] Ibid., 179.

[100] Ibid., 120.

[101] Ibid., 120.

[102]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36.

[103]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240-41.

[104]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134. (查阅原文版本是140)

[105] *Ibid.*, 76 (查阅的英文版本在80页)

[106] *Ibid.*, 141.

[107] *Ibid.*, 173-76. 似乎“大陆”主要指的是中欧（奥匈帝国、德国），尽管该论点的某些部分也适用于法国和意大利。

[108] *Ibid.*, 174.

[109] *Ibid.*, 176.

[110] 一本有趣的当代比较分析市场、社会 and 国家的著作，也在其框架上广泛使用了波兰尼的理论，就是Gosta Esping-Andersen的*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Esping-Andersen将自由主义、社会民主和保守派福利制度区分为不同的去商品化劳动的模式。解释了它们在制度遗产、工人阶级的力量和阶级联盟方面的差异。一个类似但更具葛兰西风格的分析是Claus Offe出版的*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Cambridge: MIT Press, 1984), 以累积作为出发点。因此，Offe认为国家是在重新商品化劳动的同时，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矛盾关系，这随后在公民社会的领域中产生社会运动。民主社会主义在Andersen的书中几乎没有提到，但在Offe的书中仍然存在。

[111] 事实上，波兰尼对于保护土地免受商品化的问题并没有多少发言，往往被简化为保护国内农业的关税问题。

[112]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205.

[113] *Ibid.*, 235.

[114] *Ibid.*, 142. 这再次让我想起派森思试图在20世纪60年代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被淘汰，而此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和东方、北方和南方都正蓬勃发展。作为资本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信仰和马克思主义都不会在资本主义之前消失。

[115] 参考Giovanni Arrighi and Beverly Silver, *Chaos and Governance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Arrighi, “*Antisystemic Movements and Gramsci’s ‘Piedmontese Function’*” (manuscript,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2002); Silver and Arrighi, "Polanyi's 'Double Movement.'" "

[116] 托洛茨基再次成为一个例外。他的《叛变的革命》 (*Revolution Betrayed*, New York: Pathfinder, [1936] 1972) -适当地副标题为“苏联是什么，它将走向何方？”，研究了苏联的阶级性质以确定它是否将向社会主义前进还是倒退回资本主义。这个过程尚未完成，未来也不确定，因为许多事情取决于国际力量的平衡。事实上，革命爆发19年后的1936年，他仍然认为苏联秩序的存在像他自己一样不稳定。

[117] Michael Burawoy, "Transition without Transformation: Russia's Involuntary Road to Capitalism,"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15, no. 2 (2001): 269-90.

[118] 本文无法进一步深入进行波兰尼式分析俄罗斯和中欧的市场转型。但可以参考 Maurice Glasman, *Unnecessary Suffering* (London: Verso, 1996) and David Woodruff's *Remarkable Money Unmade: Barter and the Fate of Russian Capit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119] Ilona Duczynska and Karl Polanyi, *The Plough and the Pen* (London: Peter Owen, 1963), 13.

[120] 这里我想到的是法农的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New York: Grove Weidenfeld, [1961] 1991).

[121] 法农早期的著作《黑皮肤，白面具》 (*Black Skin, White Masks*, 伦敦: Pluto, [1952] 1986年) 描绘了这样一种渴望成为资产阶级的人的心理。当法农试图应对他在法国面临的意外种族主义时，他开始通过一种对无意识、内在化的压迫的新颖视角看待他的家乡马提尼克。据法农所说，只有通过暴力革命的净化，才能从黑人心灵的内心深处消除自卑感。

[122] 南非是一个明显的反例。在殖民主义统治下，工业化在南非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富有战斗性的工人阶级，这个阶级是同时进行的阵地战和运动战争的核心，以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参见盖伊·赛德曼 (Gay Seidman) 的《制造激进主义：巴西和南非的工人运动，1970-1985年》 (*Manufacturing Militance: Workers' Movements in Brazil in South Africa*, 伯克利: 加州大学出版社, 1994年)。尽管南非的反殖民斗争具有不同的阶级基础，但后殖民主义仍然取得了成果，在一个后殖民政权中，它开始吸收和打压公民社会，并将劳工运动附着于新自由主义项目。人们可

以说，这证明了法农对后殖民情境下劳工保守主义观点的正确性，但这也忽略了在国内和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的复杂性。参见爱德华·韦伯斯特（Edward Webster）和大卫·阿德勒（David Adler）的《在南非“双重过渡”中迈向一个阶级妥协：协商自由化与民主巩固》（Towards a Class Compromise in South Africa's 'Double Transition': Bargained Liberalization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 政治与社会27, 第3期（1999年）：347-85）。

[123] 参考Partha Chatterjee,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A Derivative Discourse?* (London: Zed Books, 1986).

[124] 再次地，有一些重要的例外情况。其中一个特别有趣的案例是印度的喀拉拉邦（Kerala），那里有一个强大和受欢迎的共产党通过重新分配和民众动员来引领发展。它的成功并不是通过复活某种次级愿景，而是先摧毁封建主义，然后继续扩大参与式的公民社会。请参见帕特里克·海勒（Patrick Heller）的《发展的劳动：工人和印度喀拉拉邦资本主义的转型》（*The Labor of Development: Worker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apitalism in Kerala, India*）（伊萨卡，纽约州：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9年）以及《推动国家：喀拉拉邦、南非和波多阿莱格里的民主分权政治》（*Moving the State: The Politics of Democratic Decentralization in Kerala, South Africa, and Porto Alegre*）（*Politics & Society*, 第29卷，第1期（2001年）：131-63）。

[125] Simone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New York: Vintage, [1949] 1989), pt. V.

[126] 参考 Inderpal Grewal and Caren Kaplan, eds., *Scattered Hegemon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他们共同创造了这个适当的术语

[127] 参考，特别是 Nancy Fraser, *Unruly Practices: Power, Discourse, and Gender in Contemporary The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 and *Justice Interruptu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Postsocialist" Con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Kegan Paul, 1997).

[128] Fraser, *Justice Interruptus*, 70.

[129] See Fraser, *Unruly Practices*, chap. 7 and 8.

[130] See, for example, Millie Thayer's analysis of transnational feminism. Thayer, "Transnational Feminism: Reading Joan Scott in the Brazilian Sertão," *Ethnography* 2, no. 2 (2001): 243-72.

[131] 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努力是埃里克·赖特的“真实乌托邦项目”（Real Utopias Project）。特别是请参考Archon Fung和Erik Wright编辑的《深化民主：赋权参与治理的制度创新》（Deepening Democracy: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in Empowered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伦敦：Verso, 2003年）。另请参考Michael Burawoy等人的《全球民族志：后现代世界中的力量、联系和想象》（Global Ethnography: Forces, Connections, and Imaginations in a Postmodern World,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2000年）。

[132] Zygmunt Bauman, *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Cambridge, UK: Polity, 1987).



Follow the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of iNetworkSociety



iNetworkSociety  
Official Site

